ローマ人の物語

罗马人的故事

XV

罗马世界的终曲

[日] 盐野七生◎著　田建华　田建国◎译



古罗马，今天的中国最需要懂的国家

再灿烂夺目的太阳，也有日落之时
罗马帝国轰轰烈烈地出现
会以何种方式落下幕布

15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当然也不会一天结束

王石　王巍　|作序|

版权信息

书名:罗马人的故事15：罗马世界的终曲

作者:[日]盐野七生

译者:田建华 田建国

ISBN:9787508640495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金币故事



一个民族的兴亡好似一个人从生至死。在写完一个民族的兴亡史之后，我深深地感到，亡国的悲剧并非由于人才的匮乏，而是缘于用人机制的失灵。

人才不只出现于鼎盛期，也出现于衰退期。人才也并非鼎盛期的就优秀，衰退期的就拙劣。在用人方面，鼎盛期和衰退期唯一的不同只是鼎盛期能够用好人，而衰退期却用不好人。

所以我认为，亡国的悲剧可以说就是那些至死未能用好的人才之悲剧。

写一个民族从诞生到死亡，在历史学上称为写“通史”。写着写着有件事情我不会做了——我无法批判、裁决那些失败者。对那些生在空有一身力量而不知如何发挥的时代里的人，我们不能居高临下地批判他们，而只能将他们的故事如此这般地娓娓道来。这早已成为我面对历史人物的做法了。

盐野七生

2011年初夏于罗马

金币故事





出版社不会向人气很高的流行作家约稿写通史。因为通史是从诞生写到死亡，漫长的时间里既有时势好的时代，也有时势不好的时代。可是，读者中有人不愿看到时势衰退时代的到来，往往导致书的销量下跌。

福兮祸兮，我不曾做过人气高的流行作家。对于我这样的作家，不论你写什么，写多长，也不论因为载入许多地图等使书价昂贵，出版社都未予干预。这只是他们觉得销量尚差强人意，没有说什么而

已。结果我便能写我之所想写，尽写我之所想写，地图和照片等得以大量载入书中。

从现在开始，您将阅读的是悲惨时代的罗马人的故事。当您并未放弃而读完故事时，我敢说，您会看懂罗马人之死。

盐野七生

2011年初夏于罗马

金币故事





在出版本丛书的时候，我希望让读者通过封面所刊人物面容的变迁来通观罗马史。而丛书封面上，我决定不用人物的面容，而使用硬币。

我在这里想让读者关注的并不是货币质地的价值，这很难通过照片了解。我想让读者关注的是货币铸造技术的演变，这通过照片即可一目了然。读者一览本书卷末的硬币图谱就会了解到，铸造技术并非随着时代的逝去而发展。这一点实证了人类不一定随着时代的推移而进化这一事实。

在历史的长河中，既有进化的时代，也有退步的时代。如果没有面对这一切的思想准备，就不能玩味历史。我相信，没有“玩味”也就不能在真正意义上“得到教训”。

盐野七生

2011年初夏于罗马

推荐序1　为什么是罗马?

这是一部煌煌15册的巨著，作者盐野七生写了15年，我曾整整读了一年。读后，逢人就推荐。我读的是台湾出版的繁体横排本，当时感到奇怪：为什么这样的书，在大陆却看不到？没想到，现在就有了简体中文版。大概是因为此前我在各个场合不遗余力地推荐，中信出版社希望我能为之写篇序言。

过去我也读过罗马史，比如《罗马帝国衰亡史》，但这类史书，更多的是从政治、军事的角度来理解罗马帝国。盐野七生不同，她以现代史观的方法论来解读罗马，其间涉及国家与民族、君主与公民、宗教与人性、权力与秩序、科学与技术、领导与公关等方方面面，视野极广，见人所未见。正如她自己所说：“别的研究者是写自己知道的，而我则是写我想知道的。”

我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所以对书中所讲罗马帝国的城市与建筑极为关心。在第十册《条条大路通罗马》中，作者专门讲了罗马的道路建设：与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倒不如说“条条大路起罗马”。罗马是这个庞大帝国的心脏，而这些四通八达的国家公路，有如血管脉络，把政令和资源高效率地传输到帝国的每个角落。

盐野七生说，东方帝国在修建长城的时候，罗马人正在修建罗马大路。接着，她就告诉读者，2000年过去了，罗马修的大路现在还在使用。这时，你会很自然地想：中国的长城，现在除了收门票之外，还有没有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长城，主要是明朝修建的，而且从工程的角度讲，也有很多质量问题。同样是国家主导的巨型工程，哪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更有用？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联想。为什么罗马修的路现在还能用？作者展示了一张罗马大路的剖面图，告诉我们这条路是怎么修的，为什么能连续使用上千年。这样的图示还有很多。作者很愿意从科学与技术的角度解释，罗马帝国有其与众不同的力量，而建筑在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建筑给市民和士兵带来极大的安全感。

在作者的描述之下，罗马帝国宛如一个强大的跨国企业，《罗马法》就好比这个企业的内部规章。这个企业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企业文化、思维惯性、话语系统、人力资源储备，甚至还有自己的保安系统。制度、人才、资源配置等等，都是罗马得以长盛不衰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这部书会被国外一些研究者拿来当做领导者论、组织论、国家论的现成教材。

盐野七生贯穿始终地自我设问，并希望回答：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成就如此大业？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够建立并长期维持一个巨大的文明圈？一望而知，作者认为罗马帝国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与它所秉持的价值取向和施政目标有关。

作者认为：罗马的力量，来自保障国民安全的基础设施和贵族行为理应高尚的传统。国民最需要的是安全系统，其次是尊贵和快乐的生活。罗马皇帝努力满足了国民的需要。一切政令、公共设施、对外战争，都是为了满足国民的安全感和享受需要。

其次，罗马人智力不如希腊人，体力不如高卢人，经商的本事不如迦太基人，却能一一打败这些部族，而且在战后还能与这些部族有秩序地和睦共处。为什么？你会发现，罗马帝国的强大，归根结底是因为它的宽容开放，它的兼收并蓄。

罗马帝国是多神教的国家，罗马人把被帝国征服的民族的神，全部当做自己的神来供奉。这样的神有30万个。罗马甚至赋予被征服者

公民权，历届罗马皇帝里有很多被征服者。试想，这在东方帝国，可能吗?

这些分析让我非常受启发。对于国家来说，自由与宽容，这才是罗马帝国的立国之本，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宽容开放、兼收并蓄应当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念。正是这些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赋予罗马帝国强大的力量，并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这也是我向朋友们力荐这本书的原因。

作为一个先睹为快的中国读者，我只能谈一点浅见，算是对作者盐野七生的感谢。如果这篇小文又能够对读者有小小的帮助，会令我更加高兴。

是为序。

王石　万科集团董事长

2011年8月8日

推荐序2　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

多年前，在朋友处看到台湾出版的一本书，《我的朋友马基雅弗利》，借来后一口气看完。文笔的清美，布局的平实，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作者起笔的角度真是别开生面：

◇马基雅弗利看到了什么？由此展开了佛罗伦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事件。

◇马基雅弗利做了什么？由此展示了马基雅弗利一生的经历和事变。

◇马基雅弗利想到了什么？由此发掘了马基雅弗利的成就和遗憾。

这是一本历史，也是一本游记，还是一本政论，更是一本优美的散文集。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就这样让我铭记在心。她年轻时就爱上了意大利，一住就是大半生，写了很多书，获了很多文学奖，在日本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近年来在英语世界也声名大振，大陆读者久闻大名，翘首以待。

感谢当年资深书友衣锡群兄专门从香港带回两大袋书，这便是台湾版的《罗马人的故事》全集15本。我如饥似渴地读完。掩卷长思，深深敬佩。一位日本女人这样如痴如狂地写古罗马，发掘2000年前的往事，娓娓道来。她的细腻描写让你身临其境，她的逻辑铺陈促你遐思当下因缘。我读过许多不同作者的罗马史，只有盐野七生女士真正带我走进历史。

我去过意大利四次，也自驾游过西西里岛两次。曾带着盐野手绘的地图在佛罗伦萨四处寻觅马基雅弗利的故居。意大利作为政治国家的历史很短，不足200年，作为文化国家的历史却波澜壮阔地上溯到3000年前。在维罗纳的一个酒店里，看到一幅将意大利历史描绘为一棵盘根错节的古树，展示了几十个诸侯公国，几百个影响欧罗巴文明的政治、艺术、哲学、科学、军事等名流的来龙去脉。一瞬间，我体验到了卑微和崇拜，也叹服盐野女士把握历史的勇气与能力。

意大利有两个历史的骄傲：一个是古罗马的鼎盛，是当时世界上幅员辽阔的强盛帝国；一个是文艺复兴的辉煌，它直接启发并推动了全球现代文明的兴起，而这个复兴就是以回归古罗马为道德旗帜。此后一代代的意大利人梦寐以求地希望光荣历史得以重演，统一意大利的民族英雄马志尼如此期许自己，不到40岁便一举颠覆了民主政府的墨索里尼也这样激励自己。此外，法国的拿破仑和德国的俾斯麦都以古罗马的恺撒大帝自居。“条条大路通罗马”，地球上各个角落的部落都这样厘清自己的文明坐标。

古罗马成为意大利人的永远图腾，也成为欧罗巴大陆高度默契的文明血脉。继承希腊文明的古罗马的法典、礼仪、艺术、建筑等构成了当下西方世界主流价值的表达，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华文明的演进。百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始终在希腊文明中捕捉思辨的知音，在印度文明中寻求失落的安慰，但却是在罗马文明中锲而不舍地吸收普世价值体系。我饶有兴趣地注意到，日本作家盐野女士不断用东方的思维来探寻古罗马的蛛丝马迹，体现了类似的精神焦虑。

阅读盐野笔下的罗马史与罗马人，时空穿越2000年，体验着人类文明中顽强生长并趋同的精神动力。尽管语言、宗教、习俗、体质和自然环境有千差万别，但内在的思辨、伦理、行为、愿景和组织制度可以彼此熟悉和理解的。现代人往往以仍然蓬勃发展的中华文明与曾经衰落的罗马文明进行比照，发掘出许多文明之谜和文化冲突的理

念。不过，从更高的时空立场上看，罗马文明仍然在一波波地前行，荡涤着不同社会形态的隔阂。同样，中华文明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进化成长，与前者共同汇成当下全球文明的主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我读盐野的罗马人故事，看到了主导当时文明的精神特质，也是传承至今的进化基因，更是鞭策中华文明的动力。我也希望读者能与我一起用心体验至少这样几点：

◇自信与宽容：罗马人的生活态度和对异教对外族的接纳与吸收。

◇竞争与开放：罗马人的生存立场和对制度对风险的尝试与面对。

◇人性与权利：罗马人的生命价值和对快乐对自由的追求与捍卫。

去年在东京本来有机会见到盐野女士。索尼集团的前董事长出井伸之先生与她是好朋友，愿意安排见面。得知她正在赶下一系列关于十字军故事的书稿，我惶恐无知会浪费她的时间，借口推脱了。我有机会写上几句，真是非常荣幸的事情。期待我能将这部中文版亲手呈给盐野七生女士。

王巍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2011年8月6日

给中国读者的序

对于以超级大国为发展目标的当代中国，在欧洲历史上可作为借鉴的，唯有古罗马帝国了。

生活在当代中国的读者，如果读了我写的《罗马人的故事》，对书中的内容不知会作何感想呢？若细细品味读者的感受，必将看到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也是作者我最关心的事情。

盐野七生

2011年夏于罗马

前言

最古老的基督教教堂——圣乔万尼大教堂坐落在罗马市区南端的拉特拉诺。公元312年，君士坦丁打败政敌马克森提乌斯，作为胜利者进入了罗马城。他最先建造的就是这座教堂。君士坦丁还建造了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不过那已是在此12年之后的公元324年，在击败了残留的政敌李锡尼之后的事了。顺便提一下，君士坦丁是基督教得到承认后的第一位罗马皇帝，因此他成了历史上第一位被尊称为“大帝”的人。圣乔万尼大教堂的建造比颁布承认基督教的“米兰敕令”仅早一年。

据说，基督教教堂是建在誓死守教的殉教者墓地之上的，在被称为早期基督教时代的古代更是如此。圣彼得大教堂就建在被认为是使徒彼得殉教之所的梵蒂冈。圣保罗大教堂与圣彼得大教堂和圣乔万尼大教堂同为罗马四大教堂之一，它也如其名——“城外的（Fuori le Mura）圣保罗大教堂”——所示的那样，是建在相传为保罗殉教处的城墙外大道旁。

然而，圣乔万尼大教堂却不一样。与城墙相接的拉特拉诺一角，曾是马克森提乌斯皇帝麾下骑兵军团的军营。马克森提乌斯在与君士坦丁的权力斗争中失败。摧毁反基督教仇敌的势力地盘，并在其上建造基督教教堂，这是无与伦比的政治人物君士坦丁在以胜利者的姿态向马克森提乌斯派的罗马市民示威，也像是一年后颁布“米兰敕令”的前奏曲。



现在的拉特拉诺的圣乔万尼大教堂

这样一来，圣乔万尼大教堂就不是一座普通的教堂了，它是皇帝君士坦丁送给罗马主教的主教教堂，是指引“羊群”（信徒）的“牧羊人”的官邸和公邸。当时的罗马教皇于公元314年墙壁未干就早早地住了进去。此后一千年间，圣乔万尼大教堂一直都是罗马教皇的居所，直到14世纪初发生以“阿维尼翁之囚”闻名的法国国王绑架教皇事件为止。

“阿维尼翁之囚”事件结束以后，教皇的居所迁到了圣保罗大教堂，但圣乔万尼大教堂作为罗马主教教堂的地位至今未变。罗马教皇同时也是罗马的主教，这个兼职至今仍在延续。事实上，教皇当选后最先去的地方就是圣乔万尼大教堂。

圣乔万尼大教堂已经历了近一千七百年的沧桑岁月。在它的漫长岁月中几经改造也是很自然的事。我们现在看到的教堂不论是外观还是内部，满眼都是18世纪巴洛克风格的威容。既然是教堂，那就是祈祷的场所，弥撒的场所，也是举行洗礼、葬礼、婚礼等各种仪式的场所。如今，由于教堂正殿过大，朝拜者和观光客络绎不绝，往日教皇公邸的一部分好像也用于私人仪式了。在一次出席朋友女儿的婚礼时，我看到了一段文字。

对与新郎、新娘没有亲近关系的人来说，婚礼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慨之处。举行仪式的小型礼拜堂不常对参观者开放，一任好奇心的驱使，我将视线投在了墙面上。这时，面对祭坛的右侧墙壁上的文字映入我的眼帘：

CHRISTUS VINCUT

CHRISTUS REGNAT

CHRISTUS IMPERAT

就我这拉丁语翻译的水平，老师是一定会打红杠杠订正的。不过这些文字的意思是：

基督胜利了

基督君临了

基督统治了

我听不进祭司的说教了，脑子被某种思绪所占据：如果把“CHRISTUS”替换成“ROMANUS”，那意思就变成了：

罗马人胜利了

罗马人君临了

罗马人统治了

主语改变了，战胜了谁、如何君临、用什么方法统治，当然也就改变了。我想，这些不同点不正是划分古代与中世纪的分水岭吗?

东西分离后的罗马帝国





斯提利科



进入罗马的11条水道桥之一的克劳狄亚水道桥



查士丁尼和臣子们



第一章
最后的罗马人

（公元395—410年）

东西分裂

公元395年1月，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去世。享年48岁，在当时也算是早逝。他不是战死，也不是被刺杀，而是病逝。在位的最初4年，他和格拉提安皇帝分治帝国东西，而接下来的12年，实际上由他一人统治。他的早逝是累积长达16年繁重公务的结果。“皇帝”（Imperator）原本是授予承担率军保卫国土的“凯旋将军”的尊称。狄奥多西是最后一位不愧于这一称号的罗马皇帝。这16年来，广袤的罗马帝国从东到西，一旦有敌来袭，他就要率军驰骋征战。他死在米兰，是因为直到前一年的秋天，他都一直在指挥讨伐高卢皇位篡夺者的战争。他死在1月，则可能是他进入冬令营后突发劳疾的结果。

但是，为保国安民不惜亲自率军征战，这实在是十分罗马式的想法。在君士坦丁因承认基督教而获得“大帝”尊称之后，狄奥多西也被称为“大帝”，理由是他也为基督教的振兴尽了力。

君士坦丁是4世纪初的人，因至少在原则上像对其他宗教一样承认了基督教的信仰而被尊为“大帝”。而狄奥多西是4世纪末的人，他不承认并彻底排斥、镇压一切异端异教，是强行推行一神教思想的“大帝”。影响巨大的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实在是一位有能力的“牧羊人”。他在狄奥多西的葬礼上如是说教：

> 皇帝狄奥多西没有死！他附体在两个儿子身上。即使在天上，父亲的眼睛也会片刻不离地注视着地上的儿子，并保护着他们！将士们、公民们都要像对待先帝那样为两位年轻的继承者竭尽忠诚！

继承狄奥多西皇帝的是长子阿卡狄乌斯和次子霍诺里乌斯。阿卡狄乌斯18岁，霍诺里乌斯只有10岁。除了这两人之外，狄奥多西与和他一起当了4年皇帝的格拉提安皇帝的异母妹妹加拉之间还生有一个女儿。父亲去世时这位皇女才五六岁。

公元395年，伴随着狄奥多西之死，罗马帝国分裂成了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这是历史上的定论，但这只是结果。我认为，狄奥多西起初并没有把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分别传给长子和次子的想法。

分治东西是从3世纪末“四帝共治制”时代就已开始的统治方法，这是在周边各蛮族一同入侵的时代用以应对外敌的苦肉计。所以，可以说狄奥多西把阿卡狄乌斯放在东部、把霍诺里乌斯放在西部的本意并不在于把帝国一分为二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而在于延续东西分工负责的传统做法。也许他认为，亲兄弟之间的分工应该比外人更能发挥作用。

事实上，狄奥多西皇帝临终时把两个儿子托付给了将军斯提利科一个人。如果他真有意分割帝国的话，就应该把两个儿子分别托付给不同的武将。这不正是狄奥多西生前并没有想过自己死后要把罗马帝国一分为二的证据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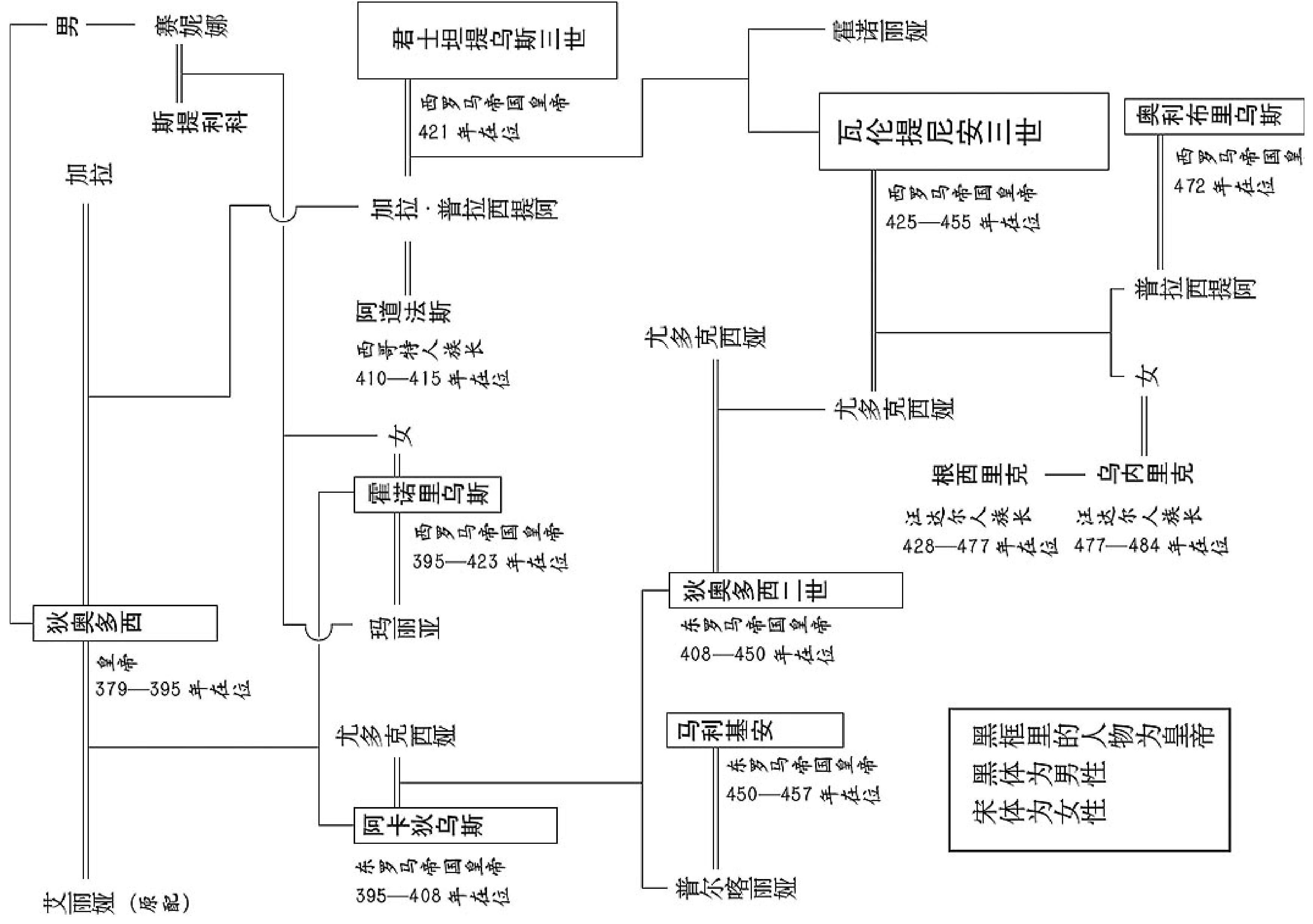
但狄奥多西的遗志最终并未得到继承，罗马帝国的统治并未变成分工制，而是走向了分裂。个中原因：第一，即使是兄弟，关系也未见得就好；第二，西征前受托统治东部的长子阿卡狄乌斯的心腹之中，有很多高官希望从西部分离出来。但是，臣子必须首先遵从先帝的遗志。所以帝国并不是在狄奥多西死后立即分裂的。东西罗马帝国的分裂起初是在暗中进行，是以渐进的方式逐步形成的。然而，这给当事人带来了许多不幸，其原因是在混沌不清的状态下行动时，双方极易发生误解。

狄奥多西虽然是一位热心的天主教徒，但他也是当了16年皇帝的人。他一定认为，死后仅仅通过主教之口给两个儿子带来神的恩宠，或是仅靠自己在天之眼的监督是不够的。于是他把两个儿子托付给了既有才干又忠心耿耿的右臂斯提利科。

意大利罗马史研究者帕里贝尼这样评论18岁的阿卡狄乌斯和仅有10岁的霍诺里乌斯：

> 他们常年生活在宫廷里，远离民众，与民众没有任何接触。士兵们从未见过自己的最高司令官驱马统军。兄弟两人能即皇位，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他们是先帝之子。

狄奥多西皇统谱系图（主要人物）


男
赛妮娜
斯提利科
加拉
狄奥多西
皇帝
379—395 年在位
艾丽娅（原配）
君士坦提乌斯三世
西罗马帝国皇帝
421 年在位
加拉·普拉西提阿
阿道法斯
西哥特人族长
410—415 年在位
女
霍诺里乌斯
西罗马帝国皇帝
395—423 年在位
玛丽亚
尤多克西娅
阿卡狄乌斯
东罗马帝国皇帝
395—408 年在位
霍诺丽娅
瓦伦提尼安三世
西罗马帝国皇帝
425—455 年在位
奥利布里乌斯
西罗马帝国皇
472 年在位
普拉西提阿
女
尤多克西娅
尤多克西娅
根西里克
汪达尔人族长
428—477 年在位
乌内里克
汪达尔人族长
477—484 年在位
狄奥多西二世
东罗马帝国皇帝
408—450 年在位
马利基安
东罗马帝国皇帝
450—457 年在位
普尔喀丽娅
黑框里的人物为皇帝
黑体为男性
宋体为女性



狄奥多西银盘上描绘的父子肖像

阿卡狄乌斯担任东罗马帝国皇帝13年，而霍诺里乌斯稳坐西罗马帝国皇位长达28年。可以想象，现世的最高权力者因神愿而能占据皇位，这种基督教的“君权神授”说对统治者是多么有利。已经不再是以前那样由精英荟萃的机构元老院（senatus）和拥有罗马公民权的民众（populus）委托皇帝行使权力的时代了。

狄奥多西在位16年，几乎都是在统军作战。他也许生前就看透了两个儿子的天资并不适合领军打仗，这才在死前把他们托付给了斯提利科将军。可是斯提利科的门第在罗马史上并无来头。他是汪达尔人，在当时的罗马人眼中是蛮族出身。

罗马人与蛮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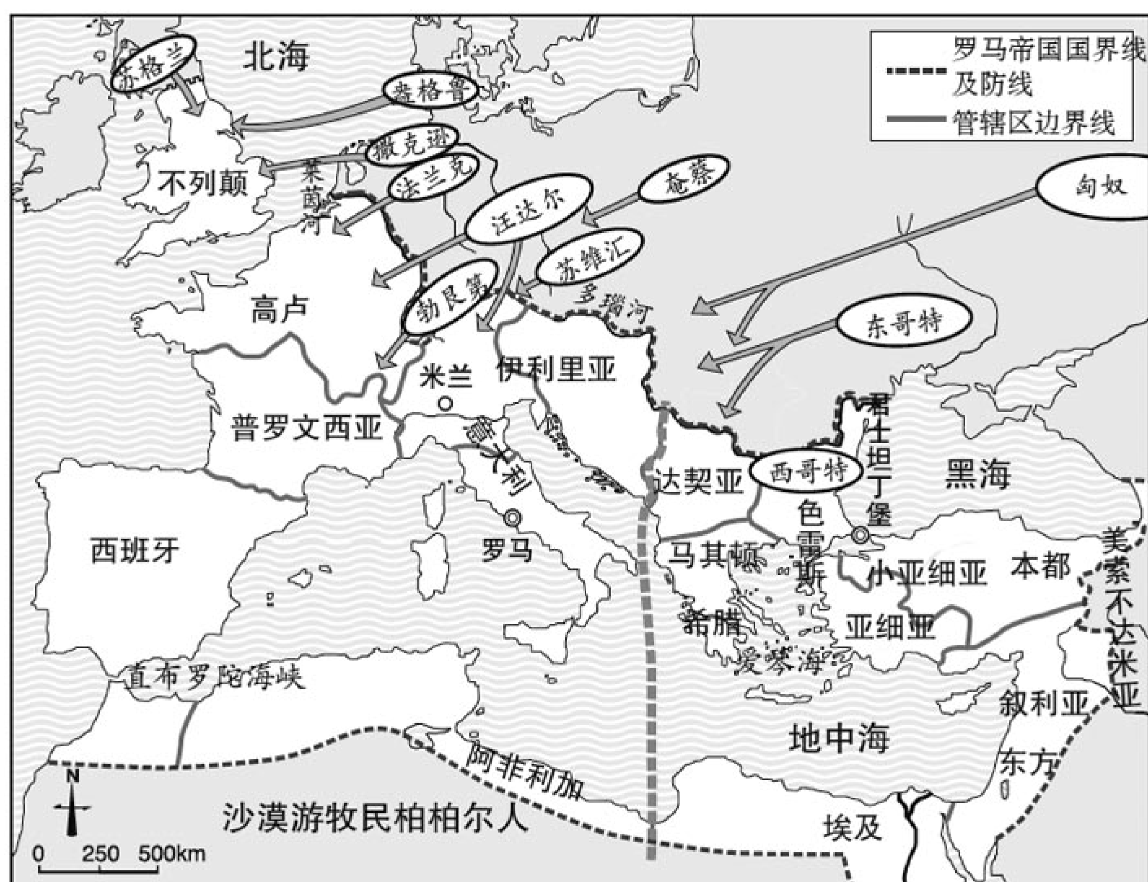
公元5世纪是罗马帝国的末世纪。这是一个“蛮族”（barbarus）的重要性剧增的时代，不论这蛮族是不是日耳曼系。被统称为“barbarus”的蛮族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的人出身于蛮族，至少从在罗马军队中从军的父亲一代就开始了与帝国的关系，可能还利用父亲的罗马公民权以及通过父亲获得的人际关系，在罗马帝国内部有了丰富的经历。模仿第二代移民的说法来说，他们该是第二代蛮族吧。

第二种类型的人从未离开自己出身的部族而一直担任统率同胞的部族长，但本部族与罗马帝国结成了“友好同盟”关系。所谓“友好同盟”，是指当时盛行的拉丁语“foederatus”的直译。

这种同盟关系是建立在下面这种约定之上的：罗马在帝国领域内给蛮族居住地，而蛮族要与罗马军队共同战斗，击退来犯的其他蛮

族。因为是一种佣兵关系，所以罗马方面要付军饷。蛮族则因居住地和军饷得到保障而不再侵犯和掠夺罗马领域内的其他地域。



4世纪末的蛮族分布

在势压周边的时代，罗马帝国经常可以看见蛮族人在皇帝亲任总指挥的军中从军。不过，那个时代不需要给予与罗马兵一同作战的蛮族集体聚居地，何况他们又约定不侵犯和掠夺罗马领域内的其他地域，不论是罗马人还是蛮族，压根儿不会多虑。3世纪前的罗马和4世纪后的罗马，虽都称为罗马帝国，内在实质却有非常大的不同。一言以蔽之，在4世纪以后的罗马史中，罗马人和蛮族的地位已经攻守互易了。

这最后的第三类蛮族，对他们而言，罗马帝国只是侵略和掠夺的对象，所以与罗马的关系实在是很淡薄。他们来犯、掠夺财物，然后

撤退。可是后来，他们来犯、蹂躏之后却久待不去，这对罗马来说就很难对付了。罗马人曾经遭到远自亚细亚西进而来的匈奴人的驱赶。匈奴人就属于这第三类非日耳曼系蛮族。

到了这样的时代，宗教信仰上的不同就具有了重大意义。

在属于第一类的蛮族中，很多人是天主教派的基督徒。这一教派亦称“三位一体教派”，在君士坦丁大帝主持的尼西亚公会议上被定为正统。

第二类蛮族是由阿里乌斯教派的基督教徒抱团而成。大概在尼西亚公会议之后，该教派被打成“异端”，其宗教活动受到阻碍。不仅如此，很多阿里乌斯教派的神职人员遭到驱逐。他们热衷于向居住于帝国之外的蛮族布教，才形成了这样的情形。

而第三类蛮族，无论是日耳曼系还是亚细亚系，“异教徒”是他们的共同点。这些异教徒并不信奉希腊和罗马的诸神。日耳曼系的蛮族继续信仰自古以来的日耳曼诸神。在北方蛮族的异教徒之间，仍然流行用活人当祭品的做法，而这种做法因罗马人的厌恶，700年前即已在罗马绝迹。

我们把4世纪以后的蛮族分成了这三种类型，但这三种类型后来并非一成不变。比如，属于第二类蛮族的部族长，一旦因为某种原因心怀不满，就会摇身一变而为第三类蛮族。这种事情时有发生。此外，原来的第三类蛮族被赶出家园后，因无家可归而转为第二类的情况也不在少数。

所谓亡国，并不是默默地过日子、静静面对国家末日的现象。正像被狂风掀起的巨浪，前后左右相互碰撞，扬起泡沫一样，亡国就是社会不受控制地汹涌流动的结果。尽管可能意识到这三类蛮族在性质上有所区别，但这个帝国最后的主角大多都有“蛮族”的共同特征。

斯提利科将军

斯提利科属于被称为“罗马化的蛮族”的第一类蛮族。他的父亲是汪达尔人，但母亲是罗马人。说不定斯提利科的母亲还是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时代来到帝国边境附近定居的罗马人农庄主的子孙。罗马人自古并不反感与异族通婚所生的混血儿。不过，昔日多是像图拉真皇帝那样的由罗马人官兵与异族女子结婚生下的混血儿。而4世纪以后，蛮族男子与罗马女子的结合占了绝大多数。这方面也是“攻守互易”了。

可是，罗马社会是父系社会。即使母亲是蛮族人，只要父亲是罗马人，他们的子女也就是罗马人。但如果母亲是罗马人，而父亲是蛮族人，他们的子女最终还是蛮族人。所以即使给他冠以弗拉维乌斯·斯提利科这样一个罗马式的名字，也没有人把他视为罗马人。圣哲罗姆是意大利本土出生的罗马人，长年居住在巴勒斯坦地区，留下了拉丁语《圣经》译本和众多研究著作。他虽然没有把斯提利科定为“蛮族”，却把他写成了“半蛮族”（semi-barbarus）。这两人虽然栖身于不同的世界，却是同时代人。

然而这个“半蛮族”却被后世的史学家们称为“最后的罗马人”，这多少有些讽刺的意味。话虽如此，如果尤里乌斯·恺撒以及其后的元首制时代的皇帝们知道了这一情况，又会作何评论呢？他们可都是毫不犹豫地起用、用好异族人才的皇帝。也许他们会说，帝国虽已日薄西山，唯有这样称呼，才与多民族国家的罗马相称。

然而，斯提利科对帝国末期的罗马人而言终究是“蛮族”，所以并未留下他出生在哪里的记录，只知道他的生年是公元360年前后。父母亲的名字也不为人知。人们只知道他的父亲从瓦伦斯皇帝时代起就在罗马军中率领骑兵团了，还有就是他的母亲是罗马人。尽管斯提利科不是军团司令的儿子，母亲也不是罗马名门之女，他这个“半蛮族”却

早早地崭露头角。他不是从军团中摔打锻炼出来的，军团出身的人在处于他那种环境而崭露头角的人物当中比较多见。他也没有在宫廷内部积累起行政官僚的丰厚履历。实际上，完全没有人知道这位“半蛮族”在23岁前的这段时间里究竟人在哪里、做过何事。不过，他在这个时期得到了狄奥多西皇帝的认可，这可是事实。他并不缺少机会认识很多时间都与部队在一起的狄奥多西和他麾下将军的子弟。

只闻其名就可知道，这位汪达尔人出身的年轻人并不是罗马人。他在公元383年，即23岁那年走到了前台。这位年轻人的身影出现在派往与波斯交涉互不侵犯协约的使团里。有研究者认为，他是狄奥多西亲自任命的。如此年龄，大约不会位居首席吧。然而，正是这位23岁的年轻人，率领了全是由年长高官组成的使团，完成了这次困难的交涉。

在外交交涉中，需要在与对手之间寻找妥协点的灵活性。但是，一旦到了不可退让的底线，决不退让的毅然决然的态度也不可或缺。从那次出使以后，灵活和毅然就成了同时代人提到斯提利科时所用的形容词。未作多大让步就与东邻的大国波斯达成了互不侵犯的约定，即使在问题较少的时期，这对罗马帝国而言也属难能可贵。这一年正是负责帝国西部的格拉提安皇帝被杀的年头，整个帝国的防御都落到了狄奥多西一人身上。难怪皇帝会喜形于色地迎接缔结协约后回到君士坦丁堡的斯提利科。

斯提利科一回来，狄奥多西皇帝就任命他为近卫军（comes domesticorum）长官，作为对他功劳的回报。这已是格外提拔了。狄奥多西又把斯提利科迎进了皇帝家族。

狄奥多西有一个弟弟，去世后留下一个女儿。皇帝便把这个姑娘赛妮娜接到身边抚养。赛妮娜在君士坦丁堡的宫廷里宛如皇帝的女儿一般成长起来。那时，狄奥多西亲生的女儿加拉·普拉西提阿还没有出生。

狄奥多西皇帝正式收赛妮娜为养女，把她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嫁给了斯提利科。蛮族出身的年轻人就这样成了现任皇帝的家庭成员之一。罗马时代管这种关系叫“parens”（亲戚）。这个词是意大利语“parente”和英语“parent”的词源。在已经变成绝对君主政体的罗马帝国后期，成为君主的亲戚是超越私人意义而具有公共意义的事情。

皇帝与这位蛮族出身的年轻人之间在年龄上有13岁的差距。从心心相印的心态看，他们并不是父子关系，而更像年轻的伯父与侄子的关系。狄奥多西把侄女收为养女，又把她嫁给了斯提利科为妻，所以两人之间实际上也是伯父与侄子的关系。不光在“血缘”上，在“心态”上也成为“亲戚”了。当时狄奥多西36岁，斯提利科23岁。

被皇帝嫁给蛮族人为妻的赛妮娜和伯父一样出身于西班牙。她是一位苗条的美女，知书达理，直言不讳。在东方色彩浓厚的君士坦丁堡宫廷里，她是一位特异的女性。

在中近东、埃及和希腊出身的男子中间，斯提利科也独具异彩。他从父亲一方的日耳曼民族血统中继承了高大结实的体格，从母亲一方的拉丁民族血统中继承了品格高尚、气质开放和举止大方的风格。从斯提利科和赛妮娜后来的生活可以看出，两人之间存在着一种超越政治的男女之爱。这次婚姻留下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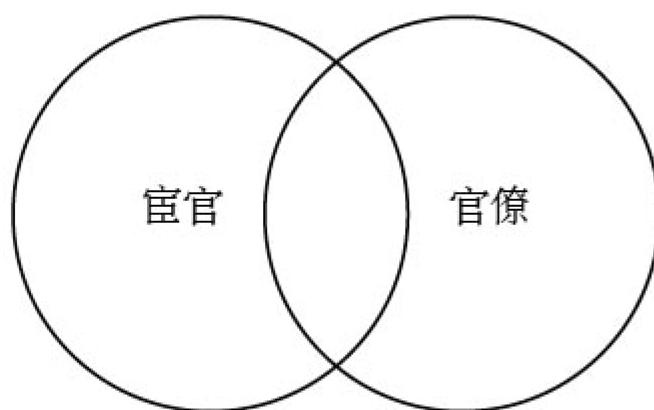
儿子希拉克略跟狄奥多西皇帝的次子霍诺里乌斯年龄相仿，感觉上就像是皇子的同学。霍诺里乌斯出席的庆典他也会出席。霍诺里乌斯的母亲早逝，斯提利科的妻子赛妮娜似乎还代为照管过他。

当上近卫军长官以后，斯提利科便跟随狄奥多西四处奔波。跟在长期征战沙场的狄奥多西身边年头久了，没有从军经验的斯提利科也必不会缺少学习一般军事的机会。他积极参加实际战斗。28岁那年，在与杀害格拉提安、篡夺皇位后统治高卢的马克西穆斯的战斗中，他受嘱率领的一支部队，成为那天取胜的主要力量。罗马在迎击再次大

举进犯的西哥特人的战斗中取得了辉煌战果，成功击退了来犯之敌，斯提利科居功至伟，那年他31岁。

狄奥多西皇帝提升斯提利科为“大元帅”（magister militum）之一。“大元帅”可以位列罗马帝国末期的“主角”行列，不仅可在最高司令官皇帝担任总指挥的战役中独率一翼，很多时候都会担任皇帝派遣军的总指挥。以他的地位可以统率万人规模的兵士，是主力军的最高长官。给年方30岁且出身蛮族的年轻人如此待遇，只能说是破格拔擢。

谁都看得出，如此的晋升靠的是实力，但即便如此也会树敌。在帝国东部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宫廷里，越来越多的高官对斯提利科心怀反感。如果用图来示意，我想大概会如下图那样。君士坦丁堡的宫廷受到东方专制君主宫廷的强烈影响。宫廷中的很多部门可以说就是官邸。很多官僚在那里负责行政工作。其中宦官（Eunuchus）为数不少。作为公邸的皇宫“深处”是皇帝一家的私人专用区域，在那里工作的人，如果是男性，可以说全都是宦官。



本来，行政人员对军事人员就有成见。如果行政人员是宦官，这种倾向就会更加明显。所谓宦官，就是被阉割的人，使其失去生殖能力，在宫廷内侍奉帝王，这与同性恋还不同。具有男子汉气概的男人

不是宦官憧憬的对象，而是嫉妒的对象。嫉妒就是对比自己优越的人心怀憎恶。

皇帝狄奥多西不论是从征战的需要还是从他的本性来看，都不会被深宫旋涡般的阴谋所耍弄。斯提利科也是跟随皇帝离开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多。他没有直接暴露于宫人们的反感和嫉妒之中，是因为在宫中的妻子赛妮娜利用自己是皇帝的养女以及代行皇位继承人母亲的角色，起到了“盾牌”的作用。

监护人

12年就这样过去了，时光到了公元395年，这是决定斯提利科命运的一年。

狄奥多西进入冬令营区时，似乎悟到自己的死期已近。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任命斯提利科为“联军总司令”（magister utriusque militiae）。“大元帅”有数人，可联军总司令整个帝国只有两人，另一人负责与波斯接壤的帝国东方的防御。接着，狄奥多西把两个儿子和他们即将肩负的罗马帝国托付给了将要迎来35岁的“半蛮族”。

这两件事是狄奥多西在围满将军和高官的病榻上办的。这样做既是为了向他们显示这是正式决定，是遗言，同时也是为了让将军和高官们为他给斯提利科的遗言当证人。

我认为狄奥多西对斯提利科是真心信任和期待的。不过，狄奥多西也有心计：就凭蛮族出身，斯提利科再守信义、再有能力，恐怕也不会去觊觎罗马帝国的皇位。

事实上，出身蛮族在罗马军队里得到擢升的武将发动叛乱、杀害上司皇帝的事情时有发生，但这时他们往往也不是自己登上皇位，而是转入幕后，让“罗马人”自己去登皇位。那个时代，蛮族想名副其实地成为最高统治者还是有强大阻力的。在这种情况下，斯提利科是托付两位皇子的理想人物。

其实，在公元395年1月17日狄奥多西去世前嘱托后事时，斯提利科已经把罗马全军中数量众多的精锐部队置于自己的指挥之下。在皇帝狄奥多西决心一扫帝国西部之敌而整编部队时，趁着与波斯关系良好，选拔驻扎在帝国东方将士中的优良人员，掺入驻扎在西方的将士中，让他们一同作战。这些军队就这样被就任“联军总司令”的斯提利科接收了。

这样，斯提利科在公元395年掌握了当时罗马帝国最强的军队。这支军队正式的最高司令官是两位皇帝，一位18岁，另一位才10岁。只要斯提利科有心踢开18岁和10岁的皇帝，攫取皇位也有可能。至少把10岁皇帝分治的帝国西方弄到手，是确乎无疑能够办到的。这一年，斯提利科35岁，他还握有在这种情形下行之有效的王牌——先皇的养女赛妮娜是他的妻子。但斯提利科没有这样做，就连试探性的微细动作都没有。

这种男人不可能没有对他占据的地位和拥有的权力感到不快的敌人，而另一方面却又多有仰慕者相助。总之，他是一个能让其他男人敬佩的男人的典型。生于埃及的诗人克劳狄安就对这位斯提利科敬佩之至。

“现场证人”

提到“诗”（poema），会有许多现代人认为，那就是主观叙述作者自身感动和情绪的韵文文学作品。于是，“诗人”（poeta）就是要弄用韵抒情诗的人。不过，所谓“诗”，原本是由抒情诗、叙事诗和诗剧构成的文学样式，不是仅有抒情诗才叫做“诗”。在古代，在剧场里表演的悲剧、喜剧也被视为“诗”的正统领域。换言之，所谓诗人可以说就是选择以文章作为表现手段的人。克劳狄安尽管出生在埃及，热爱的却是希腊人荷马和罗马人维吉尔，而他们都是叙事诗人。

克劳狄安的生年不详，但他的创作活动集中在公元395年到404年之间。可以想象，他与斯提利科是同时代人，或是介于狄奥多西与斯提利科之间的一代人。他的作品几乎全是讲述斯提利科的，但读不出年少男人讲述年长者的味道，也看不出所谓宫廷诗人为谄媚主人而写作的文笔。斯提利科对这位诗人而言，是一位与蛮族出身等等无关的英雄。对出身于埃及却坚信自己是罗马帝国公民的克劳狄安来说，斯提利科是保卫自己国家的“罗马帝国最后的盾牌”。

钟情于作品主人公的作者所创作的作品缺乏客观性，这种评论应有几分正确。不过，如果诗人克劳狄安没有写给我们什么东西的话，背负逆贼的污名去世的斯提利科在历史上的评价，就只能有反对者一方的说法了。在给后世留下己方的而不仅仅是敌方的信息方面，克劳狄安的著作起到了中和的作用。不管怎么说，从公元395年到404年这9年间，诗人的确一直跟随在这个时期的主人公斯提利科身边，是这位蛮族出身的将军所作所为的现场见证人。

狄奥多西皇帝死在米兰。4世纪的皇帝们把罗马帝国西方的大本营放在米兰，而不是罗马，其理由有二：

第一，蛮族的入侵多在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率军赶赴延伸到两河中游的帝国防线，驻扎在位于意大利北部的米兰要比驻扎在位于南部的罗马更加有利。

第二，4世纪以后的皇帝们已经成为基督教徒。对他们而言，无论怎么说，罗马城的异教色彩都过于浓厚。

总之，他们全都出生成长在帝国的“行省”。尽管伦敦、巴黎、维也纳、贝尔格莱德后世都发展成为一国的首都或主要城市，但在罗马时代只不过是下属行省的地方城市。我有时会琢磨，如果只认识这些城市的人造访罗马，会生出怎样的感慨？！

在现代，这些城市都在精心地注意发掘保存那些罗马时代的遗迹。每当我看到这些遗迹总是感到，被称为“世界之都”的罗马与帝国的那些行省城市之间，在城市的规模和水准方面有巨大落差。这就类似于美国人从蒙大拿和俄亥俄的乡下走出来站在纽约曼哈顿时所怀有的那种感慨。

按照常理，成为基督教徒之后大可去厌恶、蔑视过去基督教徒的敌人罗马了，可是人们做不到。罗马实质上已不再是首都，但它的存在感依然是压倒性的。到了帝国末期，罗马城年久失修，曾经的壮丽在依旧强烈的阳光下暗淡下来。可是自建造当初开始，罗马就是那样的罗马，建城就要漂漂亮亮、一丝不苟。4世纪中叶，君士坦丁皇帝驾临罗马后也无话可说。即使到了帝国末期，罗马仍是异教文明首屈一指的都市。作为基督教徒，皇帝们也许都感到了罗马文明的强大压迫感。这些皇帝只是在举行非基督教式的凯旋仪式时才会移足罗马。

与罗马不同，意大利北部城市米兰就没有这种压迫感。帝国末期的米兰在才情横溢的领袖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脚下，已经成为热情的基督教徒们的城市。对身为基督教徒的皇帝们而言，难道这里不是一座远比罗马更亲切的城市吗?

10岁丧父登上皇位的霍诺里乌斯也把皇宫安在了米兰。少年皇帝监护人斯提利科自然也把大本营放在了米兰。妻子赛妮娜也从这时开始离开君士坦丁堡，住到了米兰。可是，这也使得再也无人可以制止

东方首都君士坦丁堡宫廷里反斯提利科派的行动了。失去了皇帝狄奥多西这位镇国之主，18岁的新皇帝又不问国事，从官僚层爬上来的宰相鲁菲努斯开始在君士坦丁堡的宫廷里肆意弄权。

西哥特人

有实力的皇帝死后，取而代之的是没有业绩和任何作为的新皇帝，这对企图入侵的人来说是个好机会。公元395年春，先皇死后不到三个月，西哥特人便早早行动了。

进入4世纪以来，哥特人屡屡侵犯罗马帝国的领土。世纪进入尾声的时候，哥特人一分为二为西哥特人（Visigoto）与东哥特人（Ostrogoto），分别由两位领袖率领。西哥特人是罗马帝国的“友好同盟”，率领西哥特人的是阿拉里克，他曾在罗马军队里打过仗。既然有同盟关系，照理是不该侵犯同盟方的，但蛮族就是蛮族，一有机会就轻易撕毁协约。他们不在指定居住地色雷斯地区从事农业，而选择了掠夺这种快捷的赚钱方式。奸诈狡猾的阿拉里克避开斯提利科统率的罗马军驻扎的西部，把目标集中在已将精锐派至西部而防御薄弱的东部。他们离开多瑙河下游沿岸的色雷斯北部，大举南下。

南下宛如雪崩海啸。城寨、堡垒连准备迎战的时间都没有，就被打垮摧毁。历史研究者中有人主张，这种现象不是蛮族侵犯，而是民族大迁徙。但有如此暴戾的“迁徙”吗?

蛮族很少只以战斗人员——士兵来犯，几乎是以包括妇孺老人在内的拖家带口的家庭集团形式来犯。这不同于只用战斗人员前来迎战的罗马军。当然，在战场上只有男人相向而战，家属则在后方，把货车摆成圆形，人在中间等待。

但是，家属只有两军布阵会战的时候才在后方待命，刚开始袭击或是会战胜利后，妇孺老人也都积极参与杀戮和掠夺。人们很容易认为，这些羸弱人群的杀戮行为造成的牺牲和掠夺造成的损失都很小，但实际情况绝非如此，经常是妇孺的残酷狠于大男人。再者，士兵要听从指挥官命令，只要指挥官愿意，局面仍可控制。但女人、孩子不受这种束缚。这帮人在族长统领之下，其暴虐行为很难控制。

话虽如此，既然有妇女儿童，牺牲于罗马军队迎击之下的人中，他们的比例就会更多。不过，文明之人才会敏感于人的牺牲，而非文明之人常常对此无动于衷。这是蛮族的特质之一，也是他们强悍的原因之一。所谓罗马帝国末期的“民族大迁徙”，就是由这样的一群人这样地进行的。

考虑到他们携家带口的情形，阿拉里克率西哥特人南下的速度是相当快的。需要什么就抢什么，迁徙未携带家当和牲畜。很快，位于现在保加利亚一带的色雷斯和达契亚全境遭到蹂躏，连现今土耳其西部的重要城市哈德良堡也被占领。罗马时代，哈德良堡这个取自建城皇帝之名的城市到君士坦丁堡的距离，沿古代“高速公路”罗马大道只有不到200公里。通往东罗马帝国首都的大门洞开。

同一时期在西部，斯提利科为使新老皇帝的更迭不被蛮族利用，正在奔赴莱茵河上游地带，建立防御体系。在这里，斯提利科收到了巴尔干地区的重镇哈德良堡落入西哥特人之手的消息。他立刻把部队一分为二，让第一军留下继续建立高卢的防御体系，自己则只率领狄奥多西从东部所带士兵组成的第二军奔巴尔干地区而去。

斯提利科已经被狄奥多西皇帝任命为“联军总司令”。这位35岁的武将认为，不仅帝国西部，东部的防御责任也落在了自己的肩上，与西部邻接的巴尔干地区就更是如此。他不等身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阿卡狄乌斯发号施令就奔赴了巴尔干地区，因为他坚信这是自己当然的职责。

斯提利科和阿拉里克并非互不相识。这不是斯提利科的血管里流着汪达尔人的血、而阿拉里克是西哥特人出身的缘故，而是因为阿拉里克曾率领过“友好同盟”西哥特的汉子们在狄奥多西手下从军。这位西哥特人头领的生年不详，但从死亡年份倒推，我想他与斯提利科应为同一代人。

这年初夏，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城市萨洛内附近的平原，这两个男人展开了正面对决。斯提利科始终占据优势，推进战斗，最终获胜。阿拉里克在战场上弃尸3000后逃入山区。

斯提利科追击并包围敌人，打算在第二次战斗中彻底解决敌人，然而手头部队不够。他一直在等待事先就命令从莱茵河前来的部队，可这些部队直到盛夏过后才抵达。

预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来自高卢的部队也已到达，在让他们进行必要的休整之后马上就要打响第二仗的时候，斯提利科接到了来自皇帝的命令，命令他前往希腊东北部港口城市塞萨洛尼基。把这里作为集结地，是因为部队要取道水路自高卢而来。诗人克劳狄安这样描写当时的情形：

> ……骑兵紧拉缰绳，战马斗志高昂；号手最后擦拭着将在战场上嘹亮响起的军号，等待着总司令下达出击的命令。就在这时，急使手持皇帝的命令飞驰而来。斯提利科立即读了皇帝的敕令，当即目瞪口呆。然后抑制不住的愤怒从他嘴里迸出：“一定是那个胆小鬼混蛋搞的鬼！”
>
> 那人是谁，就是不说全体将士也都知道。他就是以辅佐皇帝为名、独揽大权的宰相鲁菲努斯。回到充做营寨的宫殿，斯提利科的脸因爆发愤怒后感到屈辱而扭曲……

阿卡狄乌斯皇帝的敕令是命令总司令斯提利科把狄奥多西皇帝带到东部去的部队，径直送到君士坦丁堡，自己则率西部的部队向西折返。

斯提利科通过副官告诉即将发起进攻的士兵停止进攻。斯提利科进了宫殿谁都不见，过了好一阵才单把将军盖纳斯叫进来。盖纳斯虽出身哥特人，但长期在罗马军队中从军，在军内的升迁完全靠的是自己的才能。斯提利科委派他指挥送往君士坦丁堡的士兵。

已经完成进攻准备的部队突然被命令停止进攻，各回基地。万人规模的部队是不可能立即就掉转方向的。而且，军队有个特点，若不能基本自给自足，在军事方面就不能发挥作用。不要说进攻，哪怕是行军，也不是只要战士服从就办得到的。军队的各个方面都需要重新进行适应行军的准备。

这些准备用了多少天无人知道。总之，此次取道陆路回西部去的斯提利科和他的部队进入意大利时已是冬天；盖纳斯率领的东去部队到达君士坦丁堡郊外时也已是11月末了。

迎接归来的将士是军队最高司令皇帝的义务。阿卡狄乌斯皇帝要在离君士坦丁堡市区1罗马里（约1.5公里）的练兵场检阅归来的士兵。宰相鲁菲努斯当然也要出席。公元395年11月27日，在满脸对国事不在乎的18岁皇帝面前，指挥官盖纳斯一声令下，阅兵开始了。

仪式进行到将近一半时，队列行进到皇帝面前。突然一队士兵离开队列，冲向站在皇帝右边的鲁菲努斯。飞剑出鞘，边上的人还未及叫出声来，一切都已结束。在君士坦丁堡宫廷里夸耀权势的鲁菲努斯，在满脸苍白、全身颤抖的皇帝脚下，倒在血泊之中。

东罗马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贵被杀，却完全没有引起混乱，因为立即就有别的当权者取而代之了。这个人就是皇宫的侍卫长

尤特罗庇乌斯。这个宦官平安无事地收拾了一切。

刺杀鲁菲努斯的士兵没有一个人受到处罚。

皇宫内的敌人是皇后和以与皇后狼狈为奸的侍卫长尤特罗庇乌斯为首的宦官们。皇宫外的敌人是民众，他们对严苛的重税感到绝望，而一有抗议就会被派来的军队无情镇压，痛苦不堪。总而言之，没有人为鲁菲努斯被杀而感到悲伤遗憾。人们不知道斯提利科是否与刺杀鲁菲努斯有关。后世的很多史学家都认为这里面是有关系的。

罗马帝国内部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给了在夏季战斗中败给斯提利科而逃进山区的阿拉里克东山再起的充分时间。

阿拉里克

第二年，即公元396年的春天，阿拉里克再度率西哥特人行动起来。斯提利科去了西部，巴尔干地区已无障碍。

君士坦丁堡有盖纳斯指挥的东部军队，但阿拉里克并不是要避开这支军队，而是要避开进攻大城市，因为攻城必然会导致持久战。

蛮族的入侵就这样自北向南席卷了希腊。祸害了马其顿之后进入亚该亚地区的西哥特人攻占了雅典，攻陷了科林斯。埃莱夫西纳这个以哈德良皇帝和马可·奥勒留皇帝在此参加厄琉西斯秘仪而闻名的地方也遭到掠夺。蛮族的铁蹄甚至踏进了伯罗奔尼撒半岛最大的城市阿戈斯。

斯巴达地处伯罗奔尼撒半岛，素有“斯巴达式的严酷”之称，却自古与有钱人无缘，这样的穷地方也没有逃过蛮族的蹂躏。蛮族的目的是劫掳人口，主要是年轻人和孩子。富人们受到威胁后可以交出藏起

来的金钱。不那么富有的人一想到要把自己的孩子卖身为奴，就会不惜一切手段筹钱赎身。父母筹不到钱的孩子就只有被卖身为奴的命运了。



刻在印章上的阿拉里克肖像（印章上是反刻的）

就这样，在那一年之中，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人在希腊全境如入无人之境，横行霸道，极尽暴戾。君士坦丁堡的宫廷明明知道，却只作壁上观。阿卡狄乌斯皇帝给盖纳斯将军下的命令只有一个：巩固首都防御！

在这样的情形下，即使是别人，也想大大利用一下这种机会，更何况是阿拉里克。只要想做，很快就能控制住希腊中南部。可是希腊的这一地区多山，耕地贫乏。正因为如此，古时希腊人才会在贸易和迁徙海外方面气运旺盛。哥特人居住在多瑙河以北，在无物可抢、无

人可掳的地方留着也是白留。于是，到了公元397年春天，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人为寻找有物可掠的地方向北开拔了。

他们北进的步伐恐怕和先前怒涛一般南下时不同，速度一定会慢下来，因为要带着抢来的财物和人口，何况这也不是和平形势下的迁徙。这次，希腊西岸地带从南向北遭到了彻底的破坏。

我们不知道斯提利科是否收到了阿卡狄乌斯皇帝的命令或是要求，他开始出兵了。他亲自率军直奔希腊。他们从意大利半岛亚得里亚海一侧的港口出港，南下渡过亚得里亚海，进入爱奥尼亚海，在希腊西北部登陆，将一路向北的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挡在了眼皮底下。

不过并没有立即开战。士兵们建起了一道长长的围栏，打算把包括女人孩子在内的西哥特人赶进去。这次的作战目的是要消灭敌人。按我的想象，斯提利科似乎是等他所欣赏的盖纳斯指挥的东罗马帝国军队到达后再开战。如果从北面和东面两面夹击，就有充分把握给西哥特人致命一击。

罗马军队传统上偏好一举投入大军迅速解决战斗的战法。共和政体时代是这样，进入帝政时代以后仍然一成不变。他们淡然无视那些“对微弱之敌不须投入大军”的批评。在公元1世纪的犹太战争中，拒绝投降、坚守马萨达要塞的犹太人只有区区500人。尽管马萨达要塞建在高耸的悬崖之上，易守难攻，但罗马军队竟对坚守这里的500人投入了6000人的兵力。罗马人对渐次投入兵力，即间断性投入兵力的做法非常厌恶。那样做结果会演变成为持久战，要付出原本可以不用付出的牺牲。但是，这种作战方法与帝国衰落的程度相一致地被人忘却。公元397年春天，君士坦丁堡的部队终未现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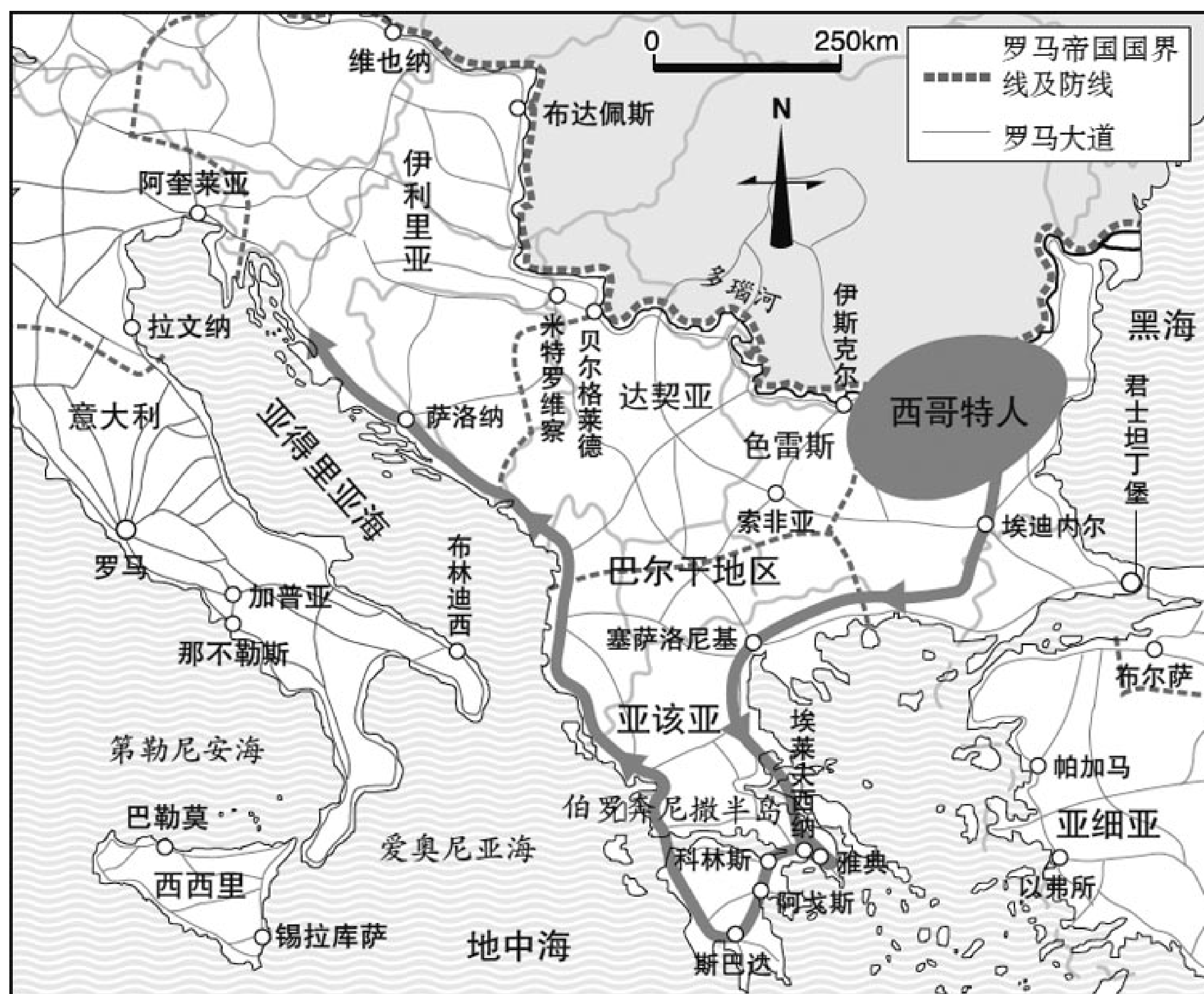
相传4世纪初，戴克里先皇帝时代，整个罗马帝国的士兵总数为60万。但在其后的百年间，兵力逐渐减少。有研究者说，进入帝国的最后一个世纪5世纪时，这一数字已经减少到了三分之一，弄不好甚至到

了四分之一。如果这是事实，那么就连联军总司令斯提利科能够率领出征的兵力顶多一两万人。这只相当于元首制时代的一个军团，这样的战斗力，终究是不可能包围并消灭西哥特人的。

结果，斯提利科只能靠从意大利带来的兵力对付阿拉里克。不过这次战斗的胜利者依旧是斯提利科。阿拉里克再次败北，只得丢弃掠夺来的财物和人口，逃进了山区。

然而，君士坦丁堡对斯提利科的责难之声已经沸沸扬扬，说斯提利科也是蛮族出身，阿拉里克也是蛮族出身，同是蛮族，斯提利科在战斗中手下留情了。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中甚至有人发出了应该把斯提利科定为“国家公敌”的声音。斯提利科心情大坏，他停止追击，直接率军返回了意大利本土。这又给了阿拉里克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

阿拉里克率领西哥特人将暴行的舞台转移到了希腊西北部一带。是否可以认为，他们离开后，位于希腊东端的君士坦丁堡就安全了呢？完全不是那样。横穿希腊北部的埃格那提亚大道直接连接着曾经叫做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这座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很快就会因为看到大道对面的西哥特人而恐惧得夜不能寐。



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对巴尔干地区的入侵

君士坦丁堡宫廷的主导权没有掌握在阿卡狄乌斯皇帝手中，而在皇妃优多克西娅和积极帮助她当上皇妃的宦官尤特罗庇乌斯手中。优多克西娅是法兰克人出身的一位将军的女儿。这两个人在商量如何消除阿拉里克的威胁，结果想到一个计策，21岁的皇帝只是在提交上来的文件上签了个名。

西哥特人的族长阿拉里克被正式任命为罗马帝国的“大元帅”（magister militium），还是“负责伊利里亚地区的大元帅”（magister militium per Ilyricum）。伊利里亚是指北起多瑙河南至亚得里亚海的广大地域。这块地域公元2世纪以前被分为近潘诺尼亚、远潘诺尼亚、诺里克、达尔马提亚四个行省，是作为铁壁来守卫的保

卫多瑙河中游的“防线”。这条防线被称为罗马帝国安全保障能否发挥作用的晴雨表，备受重视。因罗马军团基地驻扎而成为城市的文多博纳（今维也纳）、阿昆库姆（今布达佩斯）、辛吉杜努姆（今贝尔格莱德）都面向多瑙河，罗马一直严密监视着河对面的蛮族。

这一区域对4世纪末的帝国防卫而言，地位极其重要。昨天还在掠夺帝国子民、焚烧破坏城市的人物，居然被任命为统领这一带的大元帅。而且，族长既已正式获封，其属下自然成为皇帝承认的“友好同盟”。从此以后，再也用不着袭击掠夺了。只要下令，就可以要什么有什么。儿子被杀也好，妻子被奸也罢，现在都必须服从“大元帅”阿拉里克的命令，这是皇帝的旨意。

给阿拉里克的待遇并非特例。但是，过去都是在罗马方面战胜后，与被打得穷途末路的蛮族缔结同盟关系，蛮族向罗马军队提供兵力才能成为自己人，才能被任命为“大元帅”，成为“友好同盟”。对阿拉里克做法的不同在于，这样做把罗马帝国一受到威胁就屈服的事实揭示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个风潮蔓延到其他蛮族只是时间问题。

罗马帝国不但处于蛮族的袭击之中，还会处于蛮族的胁迫之下。

阿拉里克出任“负责伊利里亚地区的大元帅”，对西罗马帝国而言又面临了别的问题。

伊利里亚地区在众多史书所载东西分离后的罗马地图上，明确属于西罗马帝国，但那是东西罗马帝国明确分裂之后的状况。眼下，狄奥多西皇帝死后尚不到3年，东西界线还没有那么明确。当初也只不过是狄奥多西皇帝给两个儿子分工，由长子负责东部，次子负责西部而已。狄奥多西遗言的本意是兄弟二人友好地统治帝国，所以他并没有认为要用一条明确的界线把东西罗马帝国完全分开。

狄奥多西皇帝在负责西部的格拉提安皇帝死后一个人统治、保卫帝国长达12年。他是出身于西班牙的拉丁系罗马人，并没有同时代希腊系罗马人身上常见的那种轻视西部的倾向。罗马帝国的历代皇帝没有谁考虑和实施过把帝国分成东西两部，狄奥多西也不可能强行分割帝国。元首制时代的皇帝奥古斯都、图拉真、哈德良等人自是当然，就连帝国进入衰退期以后的皇帝戴克里先、君士坦丁大帝也都是让人分担防御，并没有把国土分给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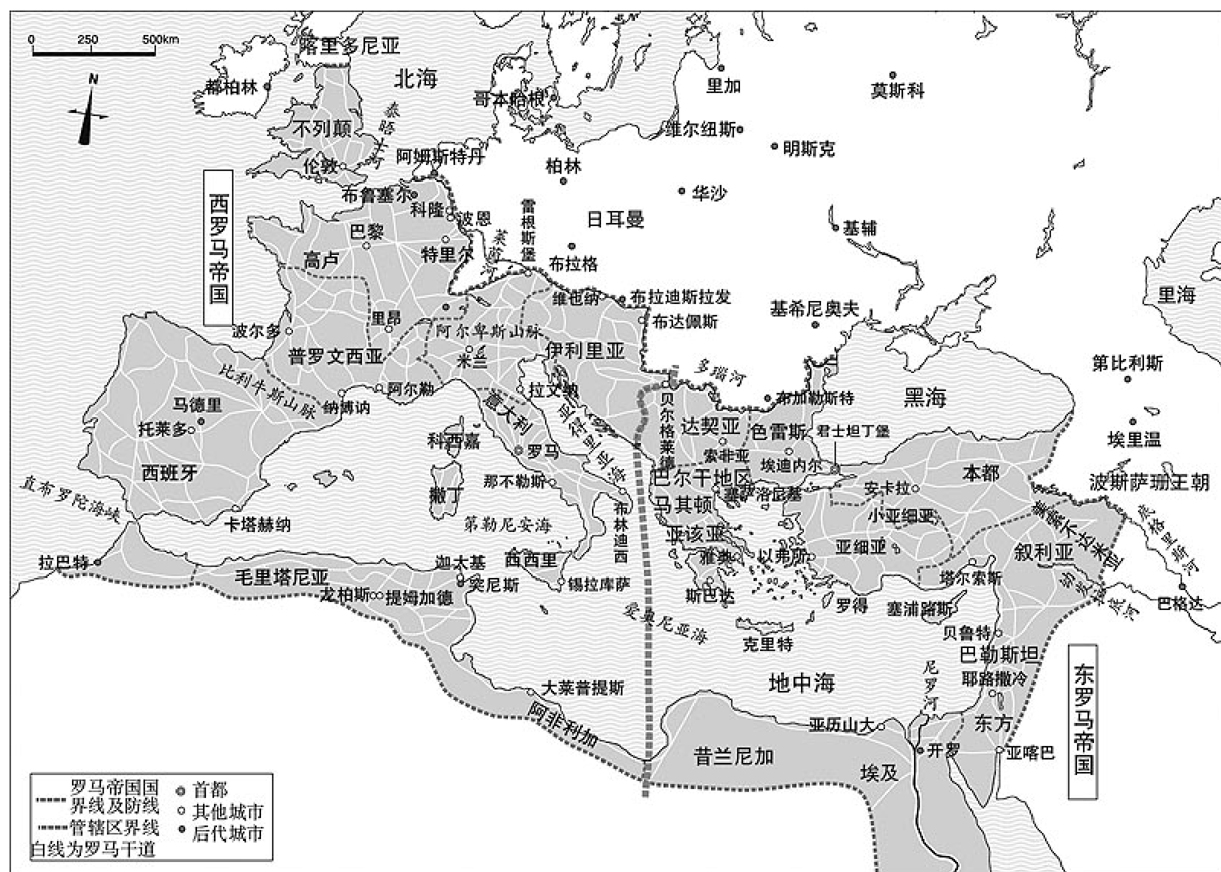
狄奥多西被称为罗马帝国最后一位亲自带兵的皇帝，他不会破坏罗马皇帝的传统。但他死后罗马帝国东西分离了。主要原因是与西部分离的想法在东部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段时期正好是君士坦丁堡的主人由拉丁系罗马人变为希腊系罗马人的时期，君士坦丁堡可被看做东罗马帝国政府所在地。

任命阿拉里克为“大元帅”，也是这种想法在君士坦丁堡宫廷里渐占上风的具体表现。他们的真意是把麻烦制造者从自家庭院中体面地赶出去。被赶走的人去了别家院子，与赶走他的人并无关系。

但是，即使狄奥多西皇帝没有明确定下分界线，即使同样都与多瑙河相接，看看地图就能明了，达契亚、色雷斯属于东部，而伊利里亚属于西部。多瑙河被视为帝国最重要的防线。起自边界，沿着上游和中游沿岸的道路几乎全都朝向本土意大利，也就是帝国西部。而起自多瑙河下游边界的道路则朝向君士坦丁堡，即东部帝国。

这在君士坦丁大帝建设君士坦丁堡之前就是这样。从叙利亚安条克出发去意大利罗马的皇帝，顺便视察多瑙河防线，再前往意大利的例子不在少数。当然，当时从东部行省叙利亚直通帝国本土意大利的道路，不论陆路还是海路都很畅通。从东部出发绕道多瑙河，再从那里前往本土意大利，走这一路径可能出于军事需要。皇帝可以因军事原因绕道，而行政官、商人则没有必要绕远路。

这样，起于多瑙河的罗马大道可以大致分为东南向和西向两种。而起于伊利里亚的道路几乎都是通往西部的。这个伊利里亚地区的大元帅由昨天还暴戾恣睢的阿拉里克担任，西罗马帝国的心情自然不能平静。



公元5世纪初的罗马帝国

以现代的观点来看，古代的罗马世界不可理解。伊利里亚地区相当于现代的“中欧”南部。而意大利属于南欧。古代的罗马世界不但包罗了从中欧南部到西欧的地区，还包罗了从北非到中近东的地区。从伊利里亚地区北边的维也纳到意大利半岛东北入口的阿奎莱亚，其距离与从阿奎莱亚到罗马的距离相当。而且，伊利里亚地区南临亚得里亚海。出海到意大利半岛只需一天行程，现代的非法入境者用橡皮艇都能渡过。也许换成现代非法入境者的心境会更容易感受古代的罗马世界。

这个时期的东罗马帝国确实“搞不懂”西罗马帝国的防御。而且，不论是出于地理上还是出于防御上的理由，伊利里亚都当然地归属于西罗马帝国。把它送给蛮族是不负责任的，也是心术不正的做法。

罗马帝国的东西分离，是“东部”分了出去。东罗马帝国被希腊人建成了单一基督教帝国，而西罗马帝国虽说也是拉丁人的基督教帝国，但异教时代的罗马色彩依然浓重。因此，东罗马帝国也许并没有视西罗马帝国与自己性质相同。这样一来，罗马世界分裂为东西两半就成定论了。

不过，还有一件事情也不应忘记。尽管罗马世界东西分离了，但南北并未分离。用现代的观点看，这又是一个古代罗马帝国不可理解的地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如果也换成非法入境者的观点去考虑，就非常便于理解。同时也可以理解这样的情形：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人甚至侵入了与亚得里亚海隔海相望的现今的克罗地亚，这时实质上独自管理西罗马帝国的斯提利科却不得不暂且放下阿拉里克，去认真处理风云突变的北非问题。

地中海为“内海”的时代

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攻破迦太基，把霸权扩张到了北非。已经被打败的迦太基人及其他许多民族久已定居在北非，其中，摩尔人就是一个主要居住在现今摩洛哥一带的民族。这个地方在罗马时代开始被称为毛里塔尼亚，因为那里居住着罗马人称之为“毛鲁”的毛里塔尼亚人。从拉丁语的“毛鲁”派生出了“摩尔”、“摩洛”这样的称呼。莎士比亚创作的悲剧和威尔第作曲的歌剧《奥赛罗》的主人公就是摩尔人。

摩尔人与同为北非民族但居住在沙漠里的游牧民族柏柏尔人不同，他们肤色浅亮，身材并不威猛。摩尔人是通商民族，不论陆路海

路都颇具行动能力。

罗马人尽管是征服者，但总是会把被征服者当成自己的命运共同体，用罗马人的说法叫做“大家庭”的一员。他们将此作为自己帝国的基本政治方略。其实，罗马人所认为的“帝国”本身就是多人种、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国家，“共存”不过是再当然不过的观点。在罗马人看来，连百年以来反复死斗的迦太基人都已被吸收，把摩尔人吸收到自己的社会中来也应理所当然。

古代北非还盛产良马，毛鲁人在罗马军队中多为骑兵。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图拉真皇帝指挥的达契亚战争中的有功之臣卢修斯·昆图斯。“图拉真记功柱”至今仍矗立在罗马市内，通过浮雕“讲述”着那场战争。他是纯种的摩尔人，后来被选为执政官，姓名也改成了罗马式的。雕刻在这根圆柱上的战场人物图景中，出现次数最多的，除图拉真以外，就数他了。这位摩尔人当时率领毛里塔尼亚出身的骑兵们在战场上纵横驰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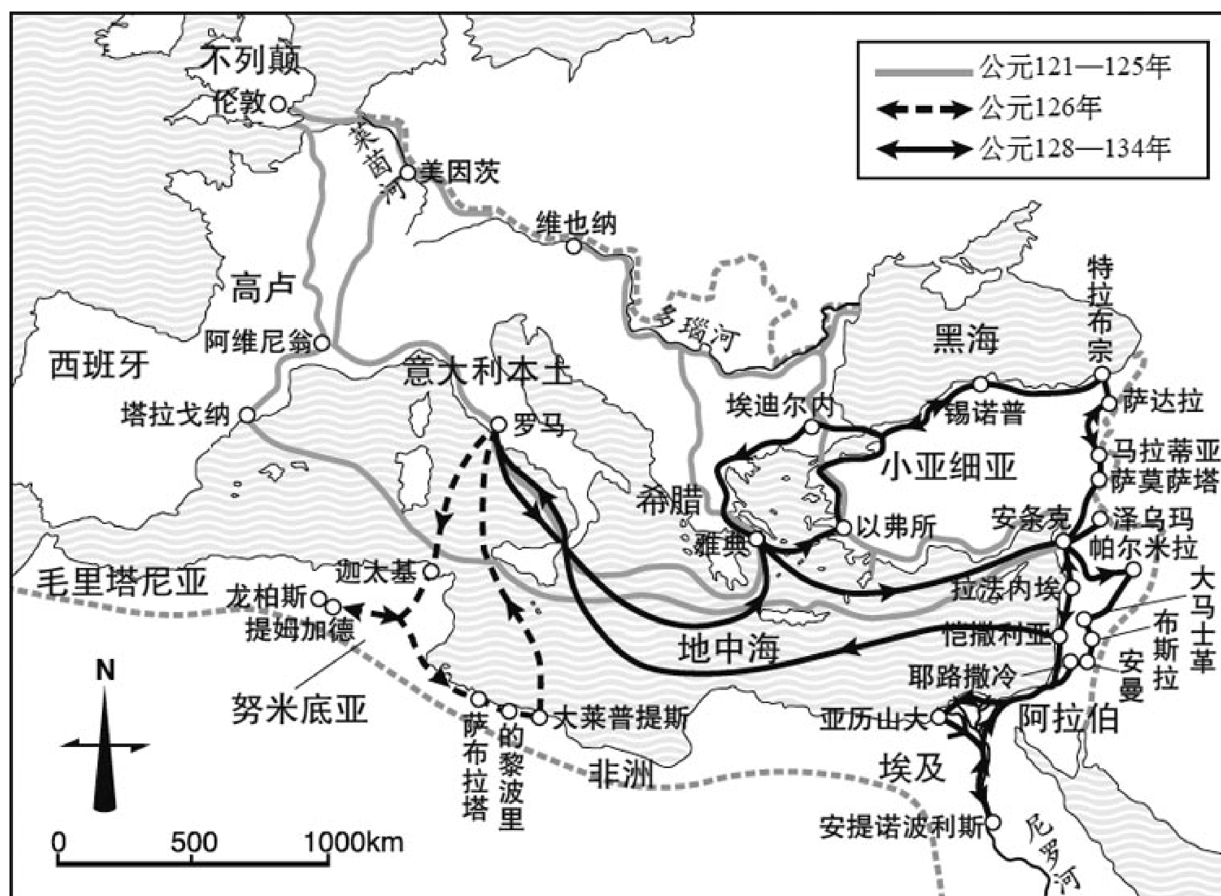
在罗马的威势行遍帝国全境的元首制时代，帝国内部的异民族也接受了与罗马人共存的状态。除了犹太民族，几乎没有发生过叛乱。这也证明了共存路线的作用。然而，如果在共存过程中得不到什么好处，异民族也会向离反的方向转向。在北非，这种“共存”的时间很长，已经超过了500年。不过，再怎么是“大家庭”的一员，假如火车开始狂奔暴走，自己想要跳下去逃命也是人之常情。

在罗马帝国时代，“行省”的状态如实地反映了国家是否在发挥作用。在罗马，历代皇帝多有被授予“国父”尊称的。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罗马帝国这个“大家庭”的“家长”。不过与流着相同血液的人组成的家庭不同，光坐着当不成多民族国家罗马帝国的家长。

在《罗马人的故事10 ·贤君的世纪》中，我曾讲述过图拉真皇帝的故事。我把他比做规规矩矩地回复每位职员电子邮件的总经理。这位

皇帝不仅过目受任统治行省的总督们发来的报告，还不惜时间认真而正确地回答他们提出的种种问题。

在同一卷中叙述的哈德良皇帝，更是不坐等报告，亲自到各行省去巡察，在现场当即解决行省面临的问题。可能会有这样的跨国企业老总，他会在任职期间挨个儿视察分散在各国的海外企业。哈德良皇帝就很像这样的老总。这对被委以重任的人来说是一种责任，元首制时代的皇帝们尽管有几个例外，但都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



哈德良巡回视察之行

可是，这样的“家长”在2世纪末以后消失了。3世纪，“家庭”在蛮族的大举入侵下风雨飘摇。4世纪，“大家庭”这个共同体自身的含义也因基督教而改变。这两个世纪以后，“家长”已无余力照顾到所有的家

庭成员了。行省的总督们成了断线的风筝。这种弊害在北非的表现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明显。

非洲叛乱

罗马人说到“非洲”，是指除埃及之外的非洲北部。罗马时代，从东向西排列着昔兰尼加、的黎波里、阿非利加直属领地（前执政官统治的阿非利加）、努米底亚、毛里塔尼亚·恺撒利亚、毛里塔尼亚·廷吉塔尼亚等六个行省，相当于现在的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四国。这北非的行政长官们比其他任何行省都更像“断了线的风筝”。因为在北非，以迦太基为中心的基督教教会势力强盛，这些行政长官的统治也变得随心所欲。

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叙利亚的安条克和君士坦丁堡成为罗马帝国东部强而有力的教区的时代，帝国西部强有力的教区是罗马和迦太基。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因影响巨大而闻名于世，但那靠的是他个人的才干，并非因为米兰教区很强大。所谓教区强大，是指信徒众多，教会资产雄厚，与当时的当权人物关系密切。当然，取得并维持这样的特权，没有主教的才具发挥影响是办不到的。

尊敬、敬意和崇拜这些无形的感情有时也会转化为某种形式表现出来。既然宗教也是一种人类活动，就不会与这一现象无关。这极端类似于在金钱是绝对主角的金融世界里，信用所起的重要作用。以迦太基教区为核心的北非基督教教会的强大，受惠于这里卓越的神职人员，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又热心于宗教活动。

这样的神职人员中，就有迦太基的主教居普良。《罗马人的故事12·迷途帝国》最后总结的那句话便是他说的。他完全不是狂热的信徒，如果他想逃避4世纪后半叶时常发生的皇帝对基督教徒的镇压，那

他一定可以逃脱。事实上，他曾经逃过一次。但想到自己是主教，他便自首而殉教了。

虽然自己最终殉教了，但他很宽容那些因受到镇压而离教的信徒重新皈依。也许他认为“牧羊人”有自身的责任，但向“羊”要求那么多则有悖于人性。我觉得，即使自己与他生于同一时代，听了他的说教，我也不会成为基督教徒。但我大概仍会毫不犹豫地称他为“时代的良心”。不过，他那些想法一旦传布开来，必定有人反对。同为北非主教的多纳图就谴责居普良和他的支持者们太温和。于是，人们把不同于居普良宽容派的强硬派称为“多纳图主义者”。



北非及其周边

多纳图主义者认为，教会应该纯粹是由无罪的人组成的信仰组织。这里的罪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罪，而是信仰上的罪。犯了这种罪，光靠忏悔不行，必须重新洗礼，从头来过。现实生活中的天主教与多纳图主义者的区别，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天主教承认世俗机构——罗马帝国，而多纳图主义者不承认现有的组织，不论是罗马还是其他。

在基督教获得承认，尼西亚公会议决定三位一体教派即天主教派为正统后，多纳图主义者在罗马帝国自然就成为“异端”而受到排斥了。

可是，当时北非纯情的基督教徒断比罗马要多，多纳图主义者的数量也多于以天主教为主流的其他地方。这两派为寻求妥协点而召开了正式会议，双方出席的主教人数不分伯仲。这样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天主教与多纳图主义者在北非的势力旗鼓相当。这种状态之下，被打成“异端”的一方不可能默默退出。如果天主教是体制派，多纳图主义者就是反体制派，抗议行省政府的恶政，就成了他们的特色。于是，在北非这样的大环境中，就会出现利用形势的野心家。摩尔人吉尔多就是这样的人。

多民族国家的罗马帝国，对败给罗马接受罗马统治并融入罗马社会的人，即使是异民族出身，也是敞开门户的；也认可希望以聚居的形式成为罗马帝国“大家庭”一员的部族。完全被罗马社会同化并产生过皇帝的旧迦太基人，就是前一种情况的例子；而罗马时代被称为“毛鲁”的摩尔人则较倾向于后者。现代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西部地区，在罗马时代被称为毛里塔尼亚，也是因为那里居住着很多摩尔人。

吉尔多出身于摩尔人的望族人家。在行省，实力家族的男人多在罗马军团中积累资历。吉尔多家族也有兄弟三人当过罗马军队的将官，他就是其中之一。

可是长兄菲尔穆斯不知何故对迦太基总督发起叛乱。行省政府一时未能采取措施断然镇压，叛乱的烈火瞬间蔓延。那时狄奥多西皇帝还在世，对北非叛乱不容放任。他从欧洲调军极力镇压，吉尔多则加入其中，箭射亲兄。

镇压行动以主谋菲尔穆斯被杀而告终。狄奥多西任命吉尔多为以后北非防御的负责人。罗马皇帝授予这位摩尔人的官位是“负责非洲的

大元帅”（magister militum per Africae）。在行省总督不能充分尽职的4世纪末，这实质上是北非全境一把手的地位。但吉尔多觊觎的是有名有实的北非最高地位。

狄奥多西皇帝之死给他带来了机会。继位的是狄奥多西的两个儿子，年龄都小，而继承北非所在的帝国西部皇位的霍诺里乌斯还只是个10岁的少年。

公元395年狄奥多西去世。当时，吉尔多还没有明确态度。两年后他迈出了野心家的第一步。他宣布，自己担任大元帅的北非不向身在米兰的皇帝霍诺里乌斯，而向身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阿卡狄乌斯宣誓效忠。大概他判断，“主人”在远方自己更能随心所欲。

紧接着他又迈出了第二步。如果吉尔多出生于公元330年的说法正确，那他当时已经67岁。也许他觉得不能再耗时间了，于是迈出了这一步：北非向意大利禁运粮食，禁止满载小麦的所有商船从迦太基港口起航出港。

自从罗马战胜公元前3世纪以前一直绝对强于自己的迦太基，成为西地中海的霸主以来，罗马帝国的本土意大利，尤其是首都罗马的主食小麦就开始依赖海外进口，这已经成为持续了550年的传统。其直接原因是意大利半岛缺少大面积耕地，出产的小麦在价格上竞争不过拥有大片耕地的西西里和北非等地。于是罗马就把进口小麦变成了一种统治其霸权之下各国的政治策略。

人们往往由于军事上的失败而屈服于人，而一旦自己对霸主有用，对霸权的抵触感就会淡化。大概胜利者罗马觉得应该容忍失败者长年积累的某些东西，尊重失败者的心情，这样统治起来会更容易。

于是，对拥有地中海世界最高学府的希腊雅典和埃及亚历山大的做法，不是将其教育机构迁到罗马，而是让罗马的良家子弟前去留

学。

而且，布匿战争开始很久以前，迦太基就有研究农耕的书籍，准确地说是农作手册。迦太基人是通商民族，同样也是高效的农场经营者。罗马攻破了迦太基，将他们的特点——通商与农耕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北非变成了罗马的粮仓，迦太基人的船只将以小麦为主的农产品运往意大利。迦太基人的商船公司甚至在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驻有分公司。征服者罗马也是通过购买尼罗河流域出产的小麦，使埃及成为罗马的粮仓，从而统治了这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大国。自己独占一切，是统治策略中最低劣的做法。不过，主食依赖进口以后，保障粮食供应便成为历代皇帝的重要任务之一。皇帝们为储备小麦、维持其品质付出了心血，而把这些只作为内幕历史去讲述未免可惜。

意大利和北非之间的这种关系已历时550年。吉尔多似乎认为，停止向意大利出口小麦是手中的强大武器。他使用这一武器的目的，当然是要把北非从西罗马帝国分离出去。

把西罗马帝国置于军粮攻势之下，这种战略的着眼点确实高明。事实上，罗马民众知道消息后都争先恐后地冲向市场。

仅此一点，对西罗马帝国而言就是值得忧虑的事态。北非民众有近一半支持吉尔多，又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吉尔多拥有“大元帅”的正式地位，但他把一个世纪以来反抗天主教的多纳图主义者纳入了自己一方。

这些被称为“多纳图主义者”的人被天主教打成异端，长期受到排斥和镇压。粗略分类，我们可以说居住在被罗马同化较快的城市里的旧迦太基系居民信奉天主教，而在同化程度较低的农村则更多的是多纳图主义者。可见，多纳图主义者们一直被排斥在行省政治的主流之外。北非号称罗马帝国的粮仓，与意大利半岛的生意兴隆，但更多的利益落在了中间商而非生产者手里，这一点古今东西概莫能外。

这样来看，多纳图主义者在北非的势力变得不可小觑，是有着宗教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诸多原因的。圣奥古斯丁后来被奉为基督教天主教派的“教父”，列为圣人。但不论他多么真心地说教，对多纳图主义者也未见效果。其真正原因就在于此。

一旦宗教介入进来，就不可能会有妥协。对北非的多纳图主义者而言，天主教徒只能是信仰错误教义的可憎敌人。同一个宗教内部的异端排斥比异教排斥更加阴险、更加残忍。这是一种历史事实，并非只表现为席卷中世纪的异端裁判。狂热的反体制反天主教的多纳图主义者，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了吉尔多身上，因为他是摩尔人，与现有统治阶层有着距离。

这是即将进入5世纪时的北非实情。在这种情况下，名为霍诺里乌斯皇帝的辅佐，实际上却统治着西罗马帝国的斯提利科当然要思考解决办法。最终，这位汪达尔人出身的“联军总司令”选择了果敢而慎重的解决办法，与他37岁的年龄十分相称。

他首先发出紧急命令，从高卢和西班牙大量进口小麦，以图平息市场风波。然后，估摸这些小麦将要上市，他前往首都罗马的元老院，要求作出决议，认定大元帅吉尔多为“公敌”（hostis publicus）。面对远比自己年长的元老院议员们，年方37岁的他侃侃而谈：

> 我们的食物被一个摩尔人随心所欲地掌控着。这个人恣意妄为，他不是供应者，却是胁迫者。

仰慕斯提利科的诗人克劳狄安这样写道：

> ……没有元老院的决议，军队不能进军。这是罗马人自古以来的做法。在经过了几个世纪后的今天，斯提利科恢复了罗马的这个

好传统。元老院议员向将军下令，军队才能开始军事行动。这一做法使得罗马在战场上屡屡获胜。

打心里说，看到罗穆路斯以来的法度权威复活，武器服从元老院的决定，这多么令人喜悦……

所谓仰慕者，有用却也有麻烦。首先，与生活在4世纪的这位埃及出身的罗马仰慕者所认定的不同，政体已经历经了王政、共和政体和元首制的变化，而历史上，元老院却没有一次仅由文官组成。在罗马这个国家，文官和武官从来没有区别。直到进入4世纪后，这种情况才发生改变。而这时的罗马已不再是元首制，它已经变成了绝对君主政体的帝国。

最高权力者不再是“元首”或“第一公民”，而变成了“绝对君主”。最高权力者的辅佐机构、具有控制其权力作用的“元老院”地位下降也就理所当然。进入4世纪后，元老院的权威和权力急速下降，其中真正的原因是文官与武官有了明确分离。

没有实权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权威。诗人怀念的昔日元老院是文官的，同时也是武官的。传统的罗马元老院是由通晓军事的政治家组成。正因为如此，元老院对是否宣战这样的重大问题也能作出在军事上合适的判断，打胜仗的概率很高。

斯提利科在以往的战斗中显示出了自己在军事方面的才能。他不可能一味地怀古，去向百年来从未上过战场的元老院议员征询是否能远征北非。他向元老院要的是自己这个“联军总司令”对原本是同僚的“大元帅”吉尔多开战的大义，要的是名分。尤其是他在罗马人眼里是蛮族出身，大义、名分就更为必要。不管怎样，对手是比汪达尔人早数百年就开始与罗马人共同战斗的摩尔人。

元老院颁布的“公敌”宣言将从侧面支持军事行动。如果战争的对象是公敌，军队就可以招募在大农庄干活的农奴充军打仗。如果农庄主不愿意，就会被课以每个农奴25枚苏勒德斯金币作为代偿。当然，这个代偿金会被作为佣兵费，用来雇用对在罗马军中服兵役感兴趣的蛮族人。这也是罗马帝国军队中蛮族兵数量增加的原因之一。

对斯提利科的请求，大农庄主占主流的元老院出于这一原因不肯发布“公敌”宣言。大农庄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自给自足，即使来自北非的进口断绝，也不会像老百姓那样受到影响。当然，一旦粮食从市场上消失，就会发生民众暴动，大农庄就有遭到袭击的危险。但斯提利科的紧急进口已使市场平静了下来。

面对目光狭隘、只知利己的元老院议员，斯提利科不得不诉诸强硬手段。他请皇帝霍诺里乌斯从米兰来到罗马，在元老院的议会厅发表演说，陈述讨伐吉尔多的必要性。十二三岁的少年只是念念斯提利科写好的文章而已。这样就成功地使得远征北非成为皇帝、元老院也共同参与的举国军事行动，而不是斯提利科的个人想法。在皇帝在场的情况下，元老院一致通过了把吉尔多定为“国家公敌”的宣言。

远征北非并非斯提利科亲往。应该说他不能亲往更正确。现在，阿拉里克这个甚至合法取得了大元帅地位的人正带着西哥特人属下盘踞在意大利半岛附近。在这样的形势下，意大利不能没人。他把远征军的指挥权交给了一位最适合代他讨伐吉尔多的武将。

这个人是吉尔多的亲弟弟马西泽尔。他在与哥哥吉尔多的争斗中败北，逃到了意大利。传说兄弟阋墙的原因是吉尔多为了实现野心，不惜与被打成异端的多纳图主义者联手，而热情的天主信徒马西泽尔反对这样的做法。因为宗教的掺和，争端愈发激烈，马西泽尔的两个儿子被吉尔多杀死。马西泽尔不得不亡命意大利。弟弟对哥哥吉尔多的憎恶，又加上两个儿子的被杀之恨，狂热天主教徒的宗教热情支撑

着马西泽尔，要打倒异端多纳图主义者！斯提利科选择他的理由也在于此。

马西泽尔率领的讨伐军规模称不上军团，士兵只有5000人。但这5000人不单是作战高手，还全部是狂热的天主教信徒。斯提利科选拔这些士兵的意图很明确。敌方除了天主教士兵以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多纳图主义者士兵参战。派坚信自己是正统基督教徒的天主教徒去，就可以达到分裂敌军的目的。

这次作战完美成功。马西泽尔率领5000兵马在北非登陆。与之对峙的吉尔多军人数近乎他的15倍，达7万人之众。两军在平原上布阵完毕，马西泽尔独自一人挺出中军，大声喝道："这是一场正统基督教与异端的战斗！"真是一声定胜负。吉尔多方的天主教徒士兵们扔掉武器，无心恋战。并非狂热基督教徒的摩尔人士兵们见状也脚下不稳，只想逃跑。全线崩溃了，吉尔多也望风而逃。他不久被抓住，在马西泽尔面前被斩首。就这样，公元398年夏，讨伐军从比萨港出发不到半年，北非便再度回归西罗马帝国。

马西泽尔却未能作为胜利者进入迦太基城。传说他在去迦太基城的途中，过桥时坠入河中，因身着沉重盔甲而溺亡。他也是摩尔人，但他反吉尔多，反多纳图主义者。马西泽尔死后，立即就有别人继任指挥官。这人不是摩尔人，他事先被斯提利科派去讨伐吉尔多。斯提利科还委托他重新整顿吉尔多统治多年的北非。

北非问题迅速得到解决。不仅老百姓因为不用再担心主食小麦紧缺而欢喜，以前总是不配合的元老院也决定在古罗马广场建造斯提利科立像，承认他的功绩。在罗马中心立像，从这里成为帝国的大脑和心脏时起，就是罗马男人的无上荣耀。

不过，斯提利科未被允许模仿共和时代罗马的领袖们，建造公共建筑赠送给市民。帝政之后，沐浴胜利荣誉的是皇帝，建造公共建筑

还礼的权力也在皇帝。

吉尔多的财产被悉数罚没，成为胜利者皇帝的所有。由于吉尔多擅权已久，财产数额巨大。斯提利科决定以东罗马帝国皇帝阿卡狄乌斯和西罗马帝国皇帝霍诺里乌斯的名义，将吉尔多的财产统统用于全面修复向罗马城输送新鲜水水渠的工程。罗马帝国的公共建筑当然都要镶嵌镌刻下令建设者名字的石板，明确记载下令修缮修复者的名字也属惯例。罗马人非常了解维修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形成了特有的惯例。公元398年，罗马人也遵从了这一惯例。镶嵌于耸立的水渠桥壁面上的大理石板上，有如下记载：

> 皇帝阿卡狄乌斯和皇帝霍诺里乌斯接纳尊敬的联军总司令斯提利科的进言，投入皇资，完成了此水渠的修复工程。特记于此。

但是，年已38岁的斯提利科不会因为这点事情就得意忘形。他没有忘记元老院至今还在执拗地反对他。蛮族的出身背景经常困扰着他，他感到有必要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个时代，很多父母给女儿起名玛丽亚。斯提利科决定把女儿玛丽亚嫁给皇帝霍诺里乌斯。霍诺里乌斯14岁，玛丽亚似乎年纪略小。还是少男少女，不能指望他们马上生儿育女。但至少斯提利科成了皇妃的生父，同时也是皇帝的岳父。斯提利科认为，先帝狄奥多西托付自己辅佐少年皇帝，如果自己又成了皇帝的岳父，反对派就难以反对他了。

有人认为，即使没有这个地位，在公元398年迅速解决了北非问题之后，斯提利科的威势也是不断上升的。但是，权力和威势也会因为细小的原因而急转直下。38岁的联军总司令希望在威势下滑之前更加巩固自己的地盘。从以后他要干的事情来看，他不能允许自己的地盘不稳。对他这位做任何事都有“蛮族出身”困扰的人来说，这更不能容许。

随着罗马历史走近尾声，我感到有一个想法在我头脑中慢慢地却是实实在在地膨胀着。人的走运与否不是与他自身的才干，而是与他生活的时代密切相关。斯提利科的后半生不就是一个典型吗？生活在高速发展时期——共和时代和稳定发展时期——帝政即元首制时代的罗马帝国的人，不会去直面某些难题，而生活在帝国最后一个世纪的斯提利科却不得不去面对。

在罗马人眼中，斯提利科身上确实流着蛮族汪达尔人的血。如果他生活在坦然包容异民族的开放的罗马帝国，他的军事才能一定会得到认可，一定会被委以重任，保卫帝国的重要防线，一生都会生活在赞扬和名誉之中。可是，人类社会也会随着活力的劣化变得封闭起来。这与时代的进步完全无关。虽然在5世纪许多事情做起来比在2世纪以前方便得多。

4世纪以后，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已不是表示“第一公民”的“元首”，而成为体现基督教上帝旨意的“绝对君主”。人事神定，人类不可随意加以改变。这个后人所谓“君权神授说”的体制是君士坦丁大帝首创的。此后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100年的时间足以使一种体制稳固运行。即使5世纪上半叶的皇帝们平庸无能，他们却意外地享受到了帝国的长治久安。这证实了这个体制的有效性。

除了皇权神授的天条以外，对斯提利科来说，还有一条保护霍诺里乌斯皇位的义务，那就是他在皇帝狄奥多西临死前当面的誓约。罗马人是崇尚法治的民族。这样的法治民族不仅认为签了名的誓约书具有效力，他们认为口头誓约也充分有效。用现代的说法，这是“君子协约”。这是双方相互信赖而立下的约定，在日本叫做“男人的约定”。毁坏这种誓约而不感到羞耻，正是罗马人所认为的蛮族做法。要做到比罗马人还罗马人的斯提利科根本不可能破坏誓约。

不过，尽管拥立了少年皇帝，斯提利科实际上仍得事必躬亲。这就是5世纪罗马帝国的实际情况。这时，罗马帝国的一切都与元首制时

代完全相反了。

不论是否称为国家，人类社会大体由生产者和非生产者这两种人构成。二者很难严格区分，但如果要划分一下，应该是下述的情况：

所谓生产者，用汉字表达就是从事农、工、商的人们。有人会说“商”自己不生产。但出于流通连接着下一个生产环节的理由，我将其列为生产者。

所谓非生产者，就是负责政治、行政和军事的人们。他们自己不生产，其职务是建设能够让生产者专心于生产的环境。他们与农、工、商三者在这点上是相通的。

这两个阶层对人类社会而言都十分重要，不可或缺。但非生产者阶层的责任更重，因为他们的职责是在硬件、软件两个方面完善社会基础建设。我认为，基础建设依靠个人努力不可能做到，这样的事情应由社会来做。尽管个人可以做到每夜锁好自家房门，但外敌侵袭靠个人却是防不胜防的。

从农民到农奴

在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古代，农民是生产者的代表。罗马帝国从3世纪到5世纪逐渐走进了衰退。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这期间农民的情况。

3世纪：农民面对频仍的蛮族入侵束手无策，卖掉或抛弃耕地，离开自己的土地，流入城墙包围的城市。于是出现了农村过疏化和城市过密化的状况。基督教把拯救的希望带给了对未来绝望的人们，遂在城市里普及开来，城市过密化是其温床。

4世纪：为这个世纪上半叶添彩的两位专制君主戴克里先皇帝和君士坦丁大帝建立了职业世袭制度。生为农民就必须以农民终其一生。这个政策的强制实施，成功地降低了迅猛发展的农村过疏化的速度。然而，尽管迎击入侵蛮族的战斗成功击退了敌人，罗马帝国的领土沦为战场却成为常态。“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并没有得到恢复，被土地束缚的农民并没有再次得到和平和安全的保障。

5世纪：4世纪后半叶开始出现农民回归地方的现象。但回归的内涵与字面意义不同。参与军事、承担帝国防御的人数增加到了元首制时代的两倍之多，但未能保障帝国内部的和平与安全，使农民专心农耕。农民们尽管回归耕地，却不是以前的“自耕农”（agricultor）了。他们被大农庄包去干活儿，成为“农奴”（colonus）。格拉古兄弟和尤里乌斯·恺撒制定了《森普罗尼乌斯农地法》后，曾经努力培育和确立这项法律的罗马社会中坚力量已是明日黄花。这样，以自耕农为支柱的罗马军事力量在质与量两方面的式微便无可救药了。

然而，在批评从自耕农转变为农奴是罗马人活力的衰微之前，我们如果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又会怎样看呢?

蛮族入侵频仍，不仅掠光了他们辛苦收获的农作物，人的生命安全也难保。那种恐怖令农民日夜心惊肉跳。

曾经保障罗马帝国全境和平安全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时代终结以后，不仅蛮族来袭，强盗也结伙肆虐。农民把农作物运往城里的途中被抢也成为家常便饭。

农民一向被视为最容易课税的职业，税种名目繁多。如果农民租公有地耕种，实质上相当于一种永久性的借款。过去，租金为收入的10%。现在，这一比例已经远远不够。据研究者计算，耕作自有农田的自耕农也得缴纳收入的25%到30%，而租种公有地或他人农田耕种的农民，这一比例则要高达50%。税金必须用不受币值变动影响的金

币支付。这可能得卖掉全部收成才能勉强做到。可见对农民的保障一直在降低。

如果去当农奴，压在自耕农肩上的这些重压几乎都会卸去。大农庄为了自卫组织了自卫团，即使不能抵抗大规模蛮族入侵，但可抵御小股蛮族或强盗团伙。农奴还不用担心销售，纳税和与官方机构的交道均由主人处理。自己和家属是农庄主的劳动力，对皇上征兵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胆战心惊。大农庄的主人很多都是元老院议员或是高官。个体农民没有办法的事，他们总会有逃避之道。

当然，农奴也会失去相应的自由和独立。不过，他们也并非只被视为“工具”的奴隶。农庄被转卖时，在那里劳作的农奴通常也会一同被转卖。在职业世袭制度下，农民只能当农民。在那样的时代，安全和食物的保障比自由和独立更为优先。国力衰微给这些人带来的损害最多，他们不应再受到责备。

如果担心主人因遗产继承而更换，可以到属于基督教教会教产的农庄去当农奴，那里不会发生这类问题。教会与时下当权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寄身于教堂和修道院所拥有的农庄以保障安全和食物，这在当时是一个有效的选择。支撑中世纪农业的地方豪族和教会大农庄就这样产生了。

从自耕农转变为农奴的现象，一句话说，就是背靠大树好乘凉。“国家”（res publica）不能尽到应尽的责任，个人就只有靠自己寻找活路了。

对国家而言，农民即使变为农奴，只要能够维持生产力就还有救。可是生产力也在不断地下降，原因与前述自耕农生产力下降的道理一样，与“工”、“商”的生产力低下相互影响，是与整个罗马帝国经济生产力低下相互关联的。

经济实力下降会导致人口减少。首先结不起婚的人增加了，这等同于出生率下降。营养不良会使身体的抵抗力下降，容易患病。此外，基督教不喜欢洗澡沐浴，基督教的普及导致保持身体洁净的生活习惯式微。即便未被蛮族和强盗杀死，因生病而死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即使考虑到农民回归农村的情况，从4世纪末到5世纪，大城市也经历了一个戏剧性的人口减少过程。

有研究者推测，传说2世纪有150万人口的首都罗马，进入4世纪时人口已经减少一半，到世纪末又进一步减少，只剩约30万人。“世界之都”在人口方面也是日薄西山了。

非生产性人群的增加

公元4世纪后半叶到5世纪，罗马帝国面临的真正问题在于，非生产者的人数增加，而生产者人数减少、生产力下降。这两者成反比例关系。罗马国家必须养活军人和官僚这两大非生产者群体，还要养活基督教教会人员，这些人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势力上都不差于前两者。因为基督教已完全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这个新国教与传统罗马宗教最大的不同之处不在于是一神教还是多神教，而在于有无专业的神职阶级。

既然侍奉神是主要任务，就得有其他人来建设侍奉神的环境。有人会说修道院有田产。但在那里，生产不是目的，劳动本身才是目的。重体力劳动可能会给侍奉神带来不好影响，所以这样的活儿交给农奴去做。此外，教会各项活动所需的费用能靠捐赠和教会资产运作维持最为理想，可是，现实中的教会组织已经庞大到仅靠这些无法维持的地步。

当然，国家并没有保证像给军人和官僚支付工资一样，向以主教为首的所有神职人员支付工资。神职人员的工资都是所属教区以教会活动经费的名目支付的。不过，教会的活动不仅包括弥撒和祈祷，还包括慈善、福祉、医疗、教育等等。元首制时代以前的罗马，福祉由国家、地方自治体及富人们分担，医疗和教育则通过给从业人员免征直接税的特别待遇让民间承担，如果从业人员是行省之民，就会给他罗马公民权，从而免缴行省税。但是，帝国的衰退破坏了这些由“公”与“私”之间绝妙组合形成的系统。

这个系统受到破坏形成了空洞，基督教便乘虚而入，形成了教会在原本擅长的慈善领域之外，又垄断了福祉、医疗和教育的局面。这样一来，作为世俗组织的国家也不得不以某种形式出来赞助或支持。罗马史研究者认为，有四类非生产人员给末期的罗马帝国带来重压，基督教神职人员位列军人和官僚之后的第三位。这就是其背景情况。

公德心的衰退

欧美的罗马史研究者及继承他们观点的学者中，有很多人把大农庄主占很大比例的元老院阶级列为四大非生产者的第四位。这个阶级获得莫大收入却只将其用于个人奢侈和豪华的观赏节目。他们以此为例，认为这体现了帝国末期公德心的阙如并加以谴责。他们的攻击对象不是东部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议员和行省的大农庄主，而是西罗马的元老院阶级。后者比前者富裕却更缺少公德心，理应遭到谴责。我以前也有同样的想法，怀有同样的愤怒，认为是额头从不出汗的有钱阶级的利己主义毁掉了罗马帝国。

然而，现在我却对这种想法抱有巨大疑问。

首先，他们这些大农庄主是非生产者吗？公元前1世纪，罗马帝国在国外开始拥有行省。从那时起，大农庄支撑起了行省的农业。只有本土意大利半岛继承了共和政体时代的传统，农业以中小规模的自耕农为主力。城邦的农民也是公民，也有权决定国家的未来走向。从那个时代开始，元老院就已经被视为大农庄主的堡垒。相对于这个富裕者阶级，格拉古兄弟和尤里乌斯·恺撒则被视为民众派。他们格外热心于确立自耕农的权利，在培育罗马国家的中坚阶层这个大目的之外，这也是为支持自己的人谋利益。

即使是为某些人的利益，好政策就是好政策。因为有了这个优惠自耕农的政策，自耕农阶层在帝国本土意大利生存到了最后。不过，到了帝国末期，意大利的自耕农也都变成了农奴，为大农庄所吸收。

这种社会现象用现代语言说就是垄断。罗马帝国末期的农业也不能幸免于垄断带来的弊害，整个农业生产力下降。不过，并不是农产品上不了市。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充分发挥作用的时代，农产品的流通能够得到保障，自耕农仍然健在，生产力也很高，所以上市的农产品数量充沛。不过，即使“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和自耕农在4世纪末都已式微，历史上也没有大规模饥馑经常袭击罗马帝国的记载，甚至没有记载会使人很容易联想到的饥馑。即使价格高于以前，农产品仍然流通于市。我认为，这主要是大农庄在起作用。

如果确实如此，我们就不应把同时也是大农庄所有者的元老院阶级断定为非生产者。从本源上看，罗马人的“别墅”（villa）是田园之家的意思，是种田、饲养家畜、生产葡萄酒（vinum）等农产品的基地。只是到了帝国末期，本土意大利也与行省一样，小规模别墅变成了大规模农庄而已。到了自耕农消失而农奴令人注目的时代，大农庄开始成为主力，承担为整个国家提供“食”的重任。事实上，一旦连大农庄也深受亡国之害，食物也就会立即从市场上消失。

不过，随着历史渐渐走进5世纪，罗马元老院阶级也确实渐渐失去了公德心。斯提利科在派遣军队去北非时强烈希望元老院宣布吉尔多为“公敌”，就是因为，只有宣布这是非常事态，才能把大农庄的自卫团和在大农庄劳作的农奴征召为士兵。昔日的元老院议员中也有很多大土地所有者，但在那个时代，农庄主都亲率在自己农庄干活的男人驰骋疆场。而在今天，如果不提供农奴则必须为每人缴25枚苏勒德斯金币，即使这样，农庄主也舍不得出钱。正如许多罗马史研究者所说，帝国末期元老院阶级的利己主义已经非常严重，甚至可以看做末期症候之一。

当然，我们也不能以一千五百年之后的21世纪的眼光来看这件事。那么以5世纪的眼光来看会是怎样的情况呢?

大农庄主们抵制对自卫团和农奴的征兵令。他们知道，只有这些人守在农庄，才能保护自己的家庭和财产。换言之，他们已不再相信国家提供的安全保障。

公元前1世纪，尤里乌斯·恺撒考虑扩大首都罗马的市中心。他知道当时围着罗马的塞尔维乌斯城墙妨碍扩建，但他没有改变设计，而是拆除了城墙。要拆掉城墙这一公共建筑物，需要有相应的大义名分。恺撒这个人不论做什么都不会仅有一个目的。他宣布，罗马的国家安全保障应由“防线”即国界线来构筑，而不是依赖首都的城墙。城墙拆掉后便被放置在了那里。他的这个想法决定了罗马国家未来的走向，被后来的皇帝所继承。因而，保护了共和政体时代罗马的塞尔维乌斯城墙便在各地被截断，现今剩下存几处残垣断壁。

帝国首都罗马在没有城墙保护的情况下走过了320年。“防线”把广袤的罗马帝国坚固地围起，抵御了外敌，保卫了帝国。这期间不光是首都，帝国的其他城市也都只有仅用于夜间防盗的城墙。“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划时代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抵御国外敌人，还打击国内敌人来保障安全。如果前者是国土防御，后者就是公众安全保障。第二代皇

帝提比略特别关心治安，因为有他，人们不论上街行走，还是居住在乡间，都非常安全。

我们看看罗马时代的别墅和后来中世纪时代领主房屋的形式和格局，便可感到这两者明显的不同。罗马时代的别墅缺少防御上的考虑。虽然有低矮的石墙围绕，我不禁要想，那种围墙，夜里防防森林里野兽出来骚扰村庄大概有点用处，但怎么能阻止强盗团伙的袭击呢？不过，提比略皇帝是会把强盗团伙首领绑在竞技场中央矗立的原木柱上活活地喂给猛兽，这是当时的极刑。

用罗马人的话说，就是国内外的“securitas”（安全，security的语源）有了保障，才会有“pax”（和平，peace的语源）。“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真正价值即在于此。而生活在其后时代的人们，就只能靠自己去保障“安全”与“和平”了。

我还认为，“共同体”（per publica）与“个人”（privatus）的利害不能一致，也是末期症候之一。所谓公德心应该在个人的利害与自己所属共同体的利害联系在一起时才会发挥作用。

罗马帝国行将步入最后一个世纪。这时的帝国，尤其是西罗马帝国的元老院阶级，把国家防御置于脑后，生活依旧骄奢淫逸。这个事实，为后世研究者所批判。

不过，如果站在当时而不是以后世的眼光来看这事，我们仍可为之辩护。

以前有一个时期，我曾为同样遭受蛮族入侵，而西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却得以幸存的情况作了下述假设：

西罗马帝国内的富裕阶级看到东罗马帝国更安全，便纷纷前去避难，导致西罗马帝国经济实力衰退，而经济实力衰退又导致防御费用

减少，从而不能抵御蛮族入侵。这也就是说，东罗马帝国靠把从西部迁徙而来的人和把钱投入防御工作而得以幸存。

然而，我现在完全抛弃了这一假设。我认识到，西罗马帝国富裕阶级的经济基础在于广袤的农田。土地是不能带走的。他们明知蛮族入侵的危险，仍然留在了西部。根据学者们的说法，西部首都罗马元老院阶级的财力远大于东部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阶级，但他们只能留在罗马，留在意大利。

尽管他们留下了，但手中的金钱用在了召开竞技大会、角斗士比赛和斗兽这些观赏节目上。这遭到了后世的谴责，认为这是缺乏公德心的表现。

不过，这难道不是民族文化的问题吗?

英国乡村绅士爱好狩猎，我这个日本人就不能理解。我认为众多猎犬、人和马一起追逐一只狐狸，这不公平。但他们大概也有自己的说法，第一是保护自然环境，第二是保护就业，第三是保护祖先传下来的文化。

对罗马帝国末期的元老院议员来说也同样如此。为了庆祝儿子担任公职，搞些战车比赛、斗兽来招待市民，对他们来说不过是继承了自古以来罗马精英的生活方式而已。严格区分文官和武官，参与国政的权利也被剥夺之后，元老院议员已经不允许参与国家的防御。找些名目办些娱乐节目招待市民，也许就是留给他们作为元老院议员仅有的荣耀了。我在《罗马人的故事14 ·基督的胜利》接近尾声时曾经介绍过，西马库斯曾经以异教的身份对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进行过最后的论战。他在私信中也曾谈到为庆祝儿子就任公职举行比赛的事，担心所需的猛兽是否能从北非安全到达。读了这封私信，人们尽可以叹息帝国末期精英的堕落，但是，我们对留给他们的这个唯一的“生存理

由”是否可以容忍一下呢？虽然这确实是一个时代错误，蛮族渐渐迫近，而他们却像罗马帝国鼎盛时期那样狂热于战车比赛。

前面所述的情况就是斯提利科一边拥着少年皇帝，一边却不得不面对西罗马帝国的实际状态。恕我不够清高，蛮族出身的斯提利科，抛弃麻烦的罗马人而站到蛮族一边，难道不是明智的选择吗？以斯提利科的武将之才和日耳曼民族的骁勇，打垮西罗马帝国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吗?

然而，他也有他的“生存理由”。即使别人不能理解，对他而言，一旦失去了某种东西，他的生存价值就会随之消失。

从公元398年到401年这3年间，西罗马帝国享受了短暂的平安。发生粮食危机的北非问题没有加重西罗马帝国的衰微。在不到6个月的短短时间里，只派了5000人的小部队，就成功地完成了对摩尔人首领吉尔多的讨伐。这样，暂时不用担心南方之敌了。这一期间，斯提利科仍驻留在意大利北部，警惕着西部的高卢、北部的日耳曼和东部的巴尔干，阻止了经常渡过莱茵河和多瑙河来犯的北方蛮族的入侵行动。不过，西哥特人的统帅阿拉里克也推迟了入侵，利用这段期间巩固了自己的势力。

阿拉里克被东罗马帝国皇帝正式任命为负责巴尔干地区的“大元帅”。他十二分地利用了这个职位赋予他的权力——可以自由使用储备在罗马帝国军用仓库里的武器、军服和粮食。这样，西哥特人的士兵就与其他蛮族士兵大不相同了。他们学会了使用高精武器，身着防护功能强大的军服，营养充足。斯提利科只能默默地看着这一切。阿拉里克现在是东罗马帝国皇帝正式任命的“大元帅”，尽管地位在“联军总司令”斯提利科之下，但在军事上成了与他平起平坐的同僚。

公元401年，对斯提利科来说流年不利。位居东罗马帝国大元帅的盖纳斯失宠被杀。哥特人出身的盖纳斯将军在先皇狄奥多西手下资历

雄厚。当初，斯提利科遵从了皇帝阿卡狄乌斯把从东罗马帝国带去的士兵带回东部的命令。斯提利科把这一任务托付给了盖纳斯。刺杀擅权宰相菲尔穆斯，没有盖纳斯的参与也是实现不了的。这在当时就传是斯提利科的谋略。

盖纳斯的失宠，是因为受到席卷东罗马帝国的排蛮运动的牵连。虽然现在站在罗马帝国一边，但盖纳斯是哥特人出身，而哥特人信奉的是阿里乌斯派基督教。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则都是信奉三位一体说的天主教派的基督教国家，信仰的热度东部要高于西部。东罗马帝国排斥蛮族，就是借民族歧视之名排斥异端。

盖纳斯之死对斯提利科而言不只是切断了连接东罗马帝国的脆弱纽带。在东部，以天主教的主教为先锋，排斥蛮族的气焰高涨。在他们眼里看来，纯粹的哥特人且信仰阿里乌斯教派的盖纳斯和体内流着一半汪达尔人血液的天主教徒斯提利科一样，都是“蛮族”。东罗马帝国主教们的说教狂热而激烈：

> 解放西部！要把帝国西部从蛮族和阿里乌斯教派的专横之下解放出来！

东罗马帝国非但没有帮助被北方蛮族觊觎的西罗马帝国，相反，似乎想要亲手摧毁本该是同胞的西部。

再度入侵

公元401年秋天，随着盖纳斯之死，东西关系的冷却接踵而至。居住在多瑙河上游一带北边的蛮族，再度大举进犯今天位于德国南部和奥地利西部的行省雷蒂亚。蛮族的入侵已不像从前那样，活不下去就

侵入罗马帝国大肆劫掠，然后带着抢夺的东西退回自己的领地。他们转而采取占领的形式，入侵之后就地盘踞。蛮族遭到其他蛮族侵袭，为寻找新的定居地而侵入罗马帝国，这一现象在2世纪末就已经开始出现。但在那个时代还属于同一个日耳曼民族部族之间“被赶来赶去”的形态。到了4世纪末，由于亚细亚民族匈奴人的出现，情况彻底地改变了。匈奴人凶猛剽悍，连日耳曼系的蛮族也为之恐惧，也称他们为“蛮族”，不想被杀就只能逃跑。进入5世纪后，蛮族也是大举入侵，但打仗更动真格。因此，迎战的一方就需要多用心计。

接到北方蛮族占领雷蒂亚的报告后，“联军总司令”斯提利科好似恭候多时一般，迅即率军北上。那里已拥满了蛮族，与意大利之间只隔着阿尔卑斯山脉。阿尔卑斯山脉从西向东呈弓形挡在意大利半岛北边。罗马人有好几条铺好的大道直通这一山脉。通往西面高卢方向有4条，通向北面多瑙河上游一带有3条，连接多瑙河中游的东部有2条，罗马人共计铺设了9条干线道路，即使冬天到阿尔卑斯山脉也可以畅通无阻。

不消说基础设施，不论是公路、桥梁、公共建筑这样的硬件，还是法律、金融制度、医疗、教育这样的软件，没有维护保养这样的后期服务，就不会持续发挥功效。元首制时代并不缺乏维护。但自帝国进入迷茫的3世纪起，罗马用在这方面的心思和财力便一路衰减。

根据专门研究罗马大道的学者的说法，最后一次修缮工程完成于公元375年。道路，不论是新建还是修缮，实际上都是由士兵来完成。罗马大道原本就是为加快军团的行军速度而修建，军团兵放下手中之剑而携镐劳作早已成为传统。因此，只要使用士兵，就意味着这是真正的工程，哪怕只是铺路。如果这真正的维护工程完成于公元375年，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在公元401年，罗马道路网还在发挥着相当的作用。这样，即使在平原上仍是秋天而山区却已是冬天的季节，前往迎战的罗马军队也可以轻易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同样，全家出动、直奔

南方的蛮族要翻过阿尔卑斯山脉，虽比军队行军困难，但也并非不可能。不要忘记，蛮族对人员的损失并不神经质，这是蛮族之所以为蛮族的理由。他们的可怕之处在于，不管是渡河时有人溺水，还是翻山时有人踩空跌落悬崖，他们都会继续前进。

没有人知道赶往多瑙河上游地方的斯提利科是如何击退蜂拥而来的蛮族的，但他似乎成功地击退了蛮族。因为他并未像钉子一样扎在雷蒂亚，而是得以回师了意大利。这时，不只是德意志南部，意大利也陷入了危险。阿拉里克得知斯提利科去了多瑙河上游，便动员了全部西哥特人，从东面翻过阿尔卑斯山脉，直奔意大利北部而来。

到意大利去

作为大元帅，阿拉里克负责的区域是罗马时代的伊利里亚地区，后来被称为巴尔干地区，位置紧挨在东西罗马帝国分割线的西侧。不管靠得多么紧，这里还是属于西罗马帝国的领土。被东罗马皇帝任命为大元帅以后，阿拉里克便成了东罗马帝国的高官。由于“东”、“西”分割不明确，这里成了一个所谓“巴尔干式的”，即双方想法叠合的例子。

阿拉里克及其率领的西哥特人，在东罗马方面看来是蛮族，信奉阿里乌斯派基督教，这在天主教眼里是异端。在得知排斥蛮族、排斥异端的狂潮正席卷东罗马帝国之后，阿拉里克认为与其把自己及部族的未来寄托于东部，不如寄托于西部。这也无可厚非。北方蛮族因被匈奴人赶出家园，遂渡过多瑙河入侵罗马，而西哥特人则是为躲避同为基督教却狂热信奉天主教的教徒而前来掠地。

理应以巴尔干防御为己任的阿拉里克侵占意大利，不仅是越境行为，身为东罗马帝国的大元帅，这还是越权行为。阿卡狄乌斯皇帝应

该禁止这种行为。但东西关系因前述原因已至冰点，而且对东罗马帝国而言，阿拉里克及其麾下的西哥特人既是蛮族，又是信仰阿里乌斯教派的异端，他们自行出“东”入“西”正求之不得。

恐怕阿拉里克也预想到“东出”才会去攻占意大利。他们翻过古代称为尤里安阿尔卑斯（Alpes Iuliae）的山脉大举入侵。这座山现在仍与古代同名，只是在意大利用意大利语去发音，在斯洛文尼亚用斯拉夫语去发音。阿拉里克随后立即开始进攻意大利半岛东北部的重要城市阿奎莱亚。这是公元401年11月下旬的事。

斯提利科同时两面受敌：一面是在多瑙河上游的雷蒂亚，一面是在意大利东北部的家门口。那年他41岁，既是“联军总司令”，也是执政官，军事和统治的双重责任压在他的肩上。

阿拉里克是位了不得的战略家。进攻次数再多，攻占围着城墙的城市也绝非轻而易举。于是他不断进攻，直到意大利北部居民无人不晓的阿奎莱亚遭到进攻的消息传遍整个意大利北部。但他并未执意要拿下这座城市，而是改变战略，首先横扫因阿奎莱亚危如累卵而风声鹤唳的意大利北部。意大利北方的冬天虽然寒冷，但不用担心大军的粮草，那可以靠抢夺得来。在波河横贯的意大利北部，农田丰饶，入冬时粮食已经收获进仓。

斯提利科在多瑙河上游收到了阿拉里克进攻意大利的报告。他没有立即返回意大利。他与阿拉里克5年前就已刀剑相交，而且两度获胜，当然知道如何作战可以取胜。但是，当他得知身在米兰的霍诺里乌斯皇帝已经吓得灵魂出窍时，便急忙带着少量骑兵翻过阿尔卑斯山脉，回到米兰。

西罗马帝国的皇帝霍诺里乌斯即位已经6年，年龄也到了16岁。他一想到阿拉里克马上就要开门现身，就夜不能寐。这位霍诺里乌斯只能说出一句话，就是逃往高卢南部（现在的法国南部）去。

见斯提利科回来，霍诺里乌斯又重复了那句话。面对这位不像皇帝的16岁孺子，41岁的斯提利科严厉地说道：

对罗马帝国来说，没有比皇帝出逃行省更大的耻辱了！

话虽如此，霍诺里乌斯生性懦弱，但对他认定的事往往会莽撞行事，把他继续留在米兰也很危险。斯提利科任命了一位心腹为“首都长官”，把避难去罗马的皇帝皇后的安全托付给他。皇后就是斯提利科的女儿玛丽亚，一直是总督之母的妻子赛妮娜也同行罗马。他还命令首都长官搞好城墙的加固工程。

从罗马时代被称为梅蒂兰姆的米兰到罗马，通常的途径是首先走埃米利亚大道到亚得里亚海岸的里米尼，再从这里走弗拉米尼亚大道到达罗马。可是，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出没于此，如果他们向南横切意大利，埃米利亚大道就不能通行了。皇帝一行先从米兰到热诺瓦（现在的热那亚），再从那里走沿第勒尼安海南下的奥雷里亚大道去罗马。罗马人认为应该有多种选择，大道也建成了复线。这种做法在这个时候发挥了作用。

斯提利科没有为皇帝一行送行，在此之前就早早地动身北上了。隆冬的阿尔卑斯山脉不日往返，多瑙河方面的问题正等着他去处理。

渡过多瑙河上游侵占雷蒂亚的是苏维汇和奄蔡，两个部族同属日耳曼系，都被匈奴人驱逐，同病相怜。对斯提利科来说幸运的是，率领这两个部族的是苏维汇人的君王。如果交涉对手握有实权，谈判、订约就都好办。斯提利科回到雷蒂亚后，直接与这位君王进行了谈判。苏维汇人君王遭到了斯提利科率领的罗马军队的凌厉反击，他积极地响应了斯提利科的建议。

所谓谈判，就是缔结“同盟”（foedelatus）协约，蛮族得到居住的土地并承担相应的防御。这是一种佣兵合同。没有关于这次佣兵费用的记录。可以想象，因为以往的战斗都是罗马方面占绝对优势，这次不用付钱即可搞定。总之，斯提利科可以不用再去操心两面敌人中的一面了。率领去多瑙河上游的部队几乎全军回到意大利，下面要做的只是率领这些士兵与阿拉里克决战了。

往返于米兰和多瑙河上游地区时总要穿越阿尔卑斯山脉。山区分布着以科莫湖为主的许多湖泊，湖上经常停泊着渡船。穿越阿尔卑斯山脉时就从米兰到科莫，再从那里上船。罗马人在山区也并非全走大道，如有湖泊，便会把船队停泊在湖上，用船只运兵。遇到壁立的悬崖时并不勉强开凿道路。用这种方法，不仅利用了位于阿尔卑斯山脉下的科莫湖，也充分利用了阿尔卑斯山脉里为数众多的小湖泊。最初想到这个办法并予实施的是公元前1世纪前半叶的尤里乌斯·恺撒。正如他所想的那样，以后五百年间，罗马人的“防线”不是阿尔卑斯山脉，而是莱茵河和多瑙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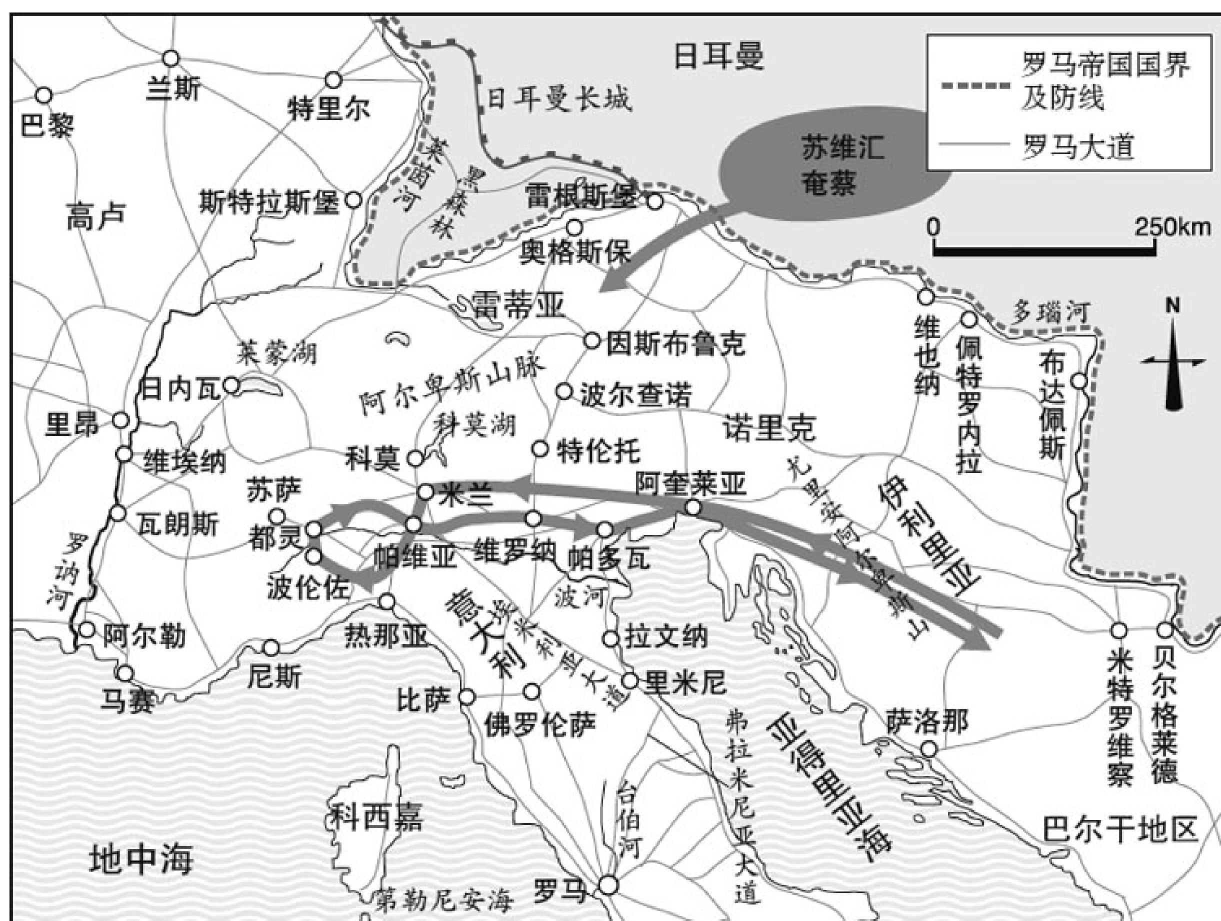
不过，从意大利向北穿越阿尔卑斯山脉的道路不止这些。公元402年2月，斯提利科率兵翻越阿尔卑斯山脉回到意大利的也不是这条路。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奥古斯都当上了帝政后的开国皇帝。在他决心征服日耳曼的时代敷设了一条大道。斯提利科选择的路线就是位于东侧的这条大道。从意大利北部穿越阿尔卑斯山脉的道路中，这条路比其他三条路况更好。一千八百年之后，以歌德为代表的憧憬着“君知啊，南国”意大利的德国人仍行走在这条大道上。罗马时代，因斯布鲁克被称为威尔第德纳。从这里南下，在布伦纳罗山口越过奥地利与意大利的国境，直下波尔查诺、特伦托，就可以到达维罗纳。在现代，走高速公路感觉只是一个跨步，但在罗马时代那可是北去的干线。

斯提利科选择这条路并非因为它是干线，而是因为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指望开春进攻米兰，眼下正在米兰周边过冬。如果沿科莫湖南

下，就必须分散兵力，各个击破冬令营中的敌人。与其如此，不如下到维罗纳之后转而西指米兰，这样就可以从阿拉里克所在的敌人大本营背后发起进攻。而且，阿拉里克的根据地位于东面的巴尔干地区，从东面进攻还可以断其退路。

决战

一切按照斯提利科的设想在推进。2月还是冬天。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压根儿没有料到斯提利科敢于在冬季翻过阿尔卑斯山脉前来反击，他们失去了让妇女儿童躲避而由男人重新布阵的时间。米兰周边也没有妇女儿童避难的安全地方。米兰遭到了进攻，但未被占领。这样，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极有可能受到东面逼来的斯提利科和坚守米兰的守军两面夹击。



公元401—402年阿拉里克及北方蛮族入侵

阿拉里克决定逃跑。可是，北面阿尔卑斯山脉高耸壁立，阻断了去路，东面斯提利科步步紧逼。南面的热那亚也不能作为逃跑的去处。当时的热那亚只是一个小港，无法养活数万规模的蛮族。结果，阿拉里克认为只有西面可退，尽管同样也有阿尔卑斯山脉横亘面前。他决定先攻陷都灵，乘势翻过阿尔卑斯山脉，逃往高卢。

解除米兰的包围之后，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首先南下，直驱帕维亚，从那里取道向西，直指都灵。听着米兰居民摆脱困境的欢呼声在身后消失，拉着满载掠夺而来的财物的货车踏上了路途，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从此转为颓势。

斯提利科没有听到米兰满城响起的欢呼声。他和他的士兵们连米兰城都没进，就转而追击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去了。他们走了另一条路，也没有全军追击，而是分成多股队伍分头追击。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人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携妇将雏，拉着货车，不可能全员统一行动。

就像渔网广撒慢收，渐渐地把海里的鱼儿拢到一处一样，必须通过各部队的追击把西哥特人收拢起来。以劣势兵力打击数量占优势的敌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分散的敌人集中到一处一举歼灭。阿拉里克中了斯提利科这一计。他们本来应该向西直取都灵，却在途中大大改变了方向，偏向了西南方向。

波伦佐，今天不过是一个村落，人们只知道那里有19世纪意大利君王狩猎用的别墅。罗马时代，这里被称做波勒提亚，是一个手工业繁荣的小城市。直到今天，这个连地图上都不标的地方还残存着罗马时代的水道桥、神殿等遗迹，与小村庄极不相称。斯提利科与阿拉里克决战的战场就在这波勒提亚附近的平原上。

公元402年4月6日，在波勒提亚的原野上两军对阵。西哥特人方面把女人、孩子和货车撤到后方，男人们在阿拉里克的指挥下准备战斗。斯提利科方面则采取了传统的罗马式布阵形式，步兵在中间，骑兵布在两翼。

不过，能看到两军全貌的人大概会说，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军比斯提利科率领的罗马军队更像罗马军。斯提利科军的左翼是刚刚成为“同盟者”的奄蔡骑兵团，正半裸着身体待命，远远一望便知是日耳曼人。而敌方西哥特军却是用从罗马帝国军用仓库中拿出来的武器和厚重的军服武装起来的。

没有人知道阿拉里克在哪里指挥战斗。但斯提利科在中军阵后，一如既往地身板挺直地催马扬鞭，英姿飒爽。

人们并不清楚战况进展的细节，可能是记录战况的诗人克劳狄安对此并不关心。好像是斯提利科方面的骑兵团先发制人，迅速从两翼开始行动的。西哥特人的士兵被追杀到狭窄的平地，背靠溪流，无法腾挪，遂致大败。崩溃，被追，被杀，连阿拉里克的妻子儿女也被俘虏，可见身处后方的士兵家属也并不安全。不过，阿拉里克和一半的军队还是成功地逃脱了。所以，这场战斗还不是斯提利科与阿拉里克的最后决战。

斯提利科追击向东逃窜的阿拉里克，战场移到了维罗纳。在维罗纳附近的战斗又是斯提利科获胜。西哥特人这次没能逃过彻底失败的命运。

但这次阿拉里克又成功逃脱了。不过，这次不像波勒提亚战役，既不是撤退，也不是退却，那状态只能是溃逃，只能逃回半年前刚刚离开的巴尔干地区。

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的确遭到了一时半会儿无法重振的打击，阿拉里克在一段时间内没有成为意大利的威胁。

不仅是直接受害的意大利北部，意大利全境都因驱逐蛮族的喜悦而沸腾。不论是元老院议员还是老百姓，都松了一口气，沉浸在喜悦之中。这段时期再无人怀疑斯提利科会第二次故意放走阿拉里克。

抛弃高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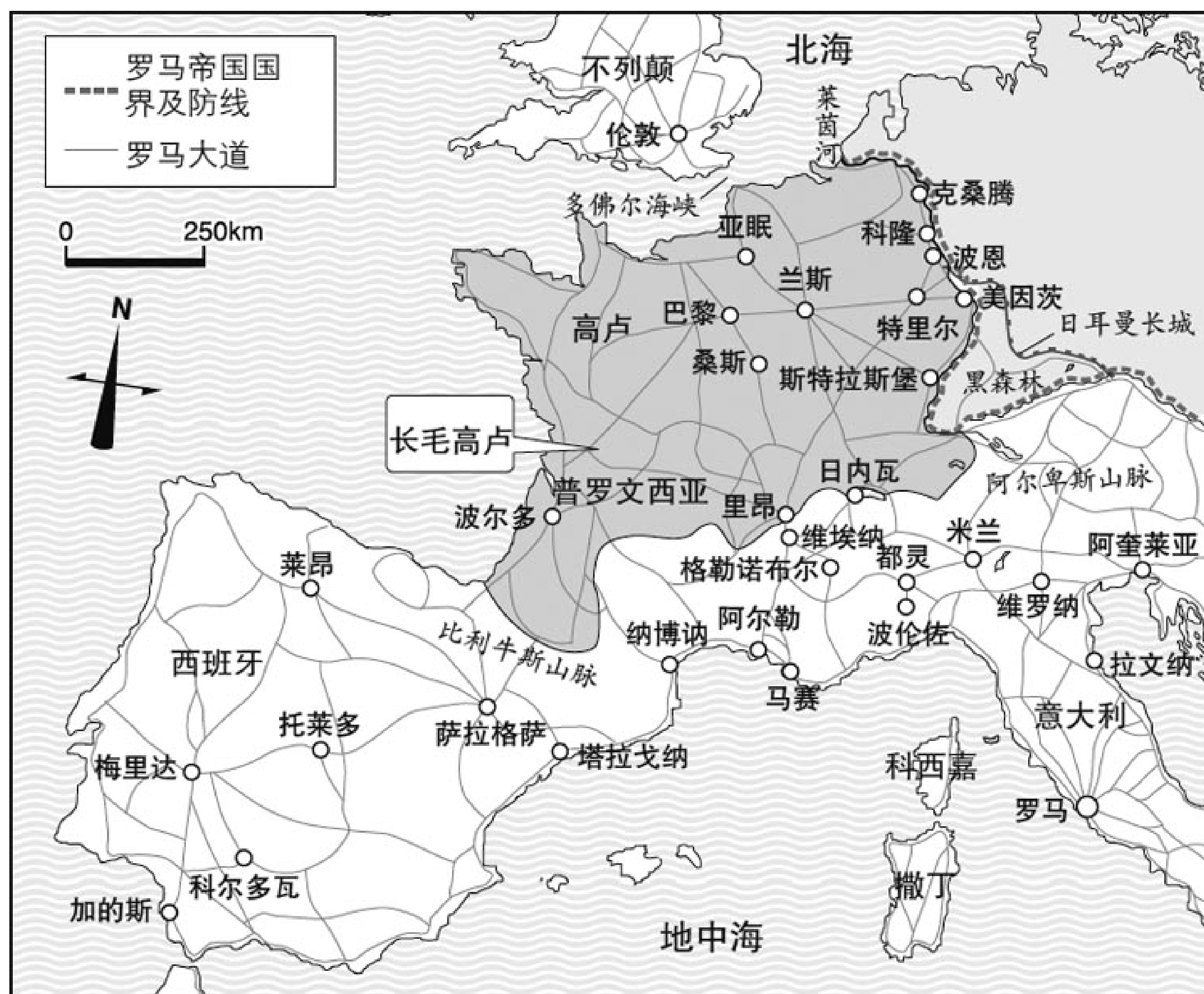
多半人都因摆脱了蛮族的威胁而松了一口气，只有功臣斯提利科依旧清醒。他利用这个机会一个接一个地制定了平时人们并不欢迎的各项法律。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大帝施行君主专制以后，罗马人习惯了“敕令”的形式。但斯提利科却采用了元首制时代的立法程序，由立

法机构元老院通过形成国法。在他看来，眼下有望获得人们支持，这正是通过不受欢迎的法律的好时机。

从公元402年秋天到403年秋天的一年中，斯提利科制定的法律大致可分成两类：首先是意大利的防御，其次是行省尤其是与意大利安全休戚相关的高卢南部的防御。这两类法律都是为了整顿完善防御体系。

最先制定的法律规定，征兵权完全交给意大利半岛的“长官”，其次承认长官的运作机构。法律还加强了对入伍后无故离队者的惩罚。后来法律中的罚则更为严厉，甚至规定开小差者被抓回后将当场处死。

这些法律在当时的情况下甚为需要，但遭到了社会上下的恶评。一百多年以来意大利半岛上就没有招过兵。本土男人被视为软弱，以可以耐受严酷条件和恶劣环境为理由，从高卢东部和巴尔干地区招募志愿兵已成常态。共和政体时代和元首制时代的罗马人如果知道居住在意大利半岛的男人逃避兵役，一定会感到愤慨。不断发生老百姓自残以逃避兵役的情况。大农庄主不愿意交出自己农庄的警卫和农奴。公德心一旦丧失再想恢复，实在是件难事。



高卢与西班牙

人们不知道整顿完善高卢防御体系是在何时，根据的又是什么法律。也许到了末期，罗马帝国记载历史的热情也已衰退。且不说关于意大利的，就连行省的相关记载，量与质也都明显下降。今人还能知道的是，斯提利科将高卢全境罗马势力的根据地从过去的特里尔移到了阿尔勒。

特里尔过去是最重要的基地，它位于注入莱茵河的一条支流摩泽尔河的中游。不仅有摩泽尔河，还有3条大道从这里连接着罗马帝国的“防线”。这里被以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之名冠名为“奥古斯都特来佛里”。斯提利科放弃了这个基地，把根据地转移到了靠近地中海、罗马时代称为“阿瑞拉特”即今日的阿尔勒地方。从现在来说，就是把在高

卢的根据地从德国西端移到了法国南端。这足以使我们想象到斯提利科设想的高卢防线是怎么回事了。

这意味着斯提利科放弃了罗马人长期以来称为“长发高卢”的高卢中部和北部。公元前1世纪尤里乌斯·恺撒征服的高卢在四百五十年后被抛弃了。放弃“长发高卢”意味着放弃了高卢防御不可或缺的、值得驻扎3个军团的不列颠地区。那他为什么留下了高卢南部呢?

今法国南部被统称为普罗旺斯，在罗马人的语言拉丁语中为“provincia”（普罗文西亚），是行省的意思，只不过法语念成普罗旺斯。公元前3世纪末，罗马在与迦太基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战胜汉尼拔后，使这里成为行省。自推行元首制前的一个世纪开始，罗马道路网已自本土意大利向外大大扩张。横跨法国南部的道路在元首制前一百年就已铺就，是连接意大利与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获得的西班牙之间的通道。高卢北部和中部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被恺撒纳为行省，而高卢南部则在此一百五十年前即已成为行省。

所以，普罗文西亚对罗马人而言不单纯是行省，它已与罗马融为一体。“长发高卢”和不列颠出身的人没人登上过罗马帝国的皇位，法国南部却有这样的人。如五贤帝中的安敦尼·庇护。图拉真皇帝和哈德良皇帝虽然出身于西班牙，但有着殖民者罗马公民的血统。与他们不同，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皇帝之一安敦尼·庇护是被罗马征服的部族的后裔。元首制时代，像他这样罗马化的高卢人在帝国高级官员中比比皆是。

古代的普罗旺斯并非像我们这些后人想象的那样是法国的一部分。对古代罗马人而言，法国南部、西班牙和北非比法国北部、中部和英国更为亲近。我们不应忘记，不管是共和时代还是元首制时代，罗马都是一个地中海帝国。

斯提利科虽然身为日耳曼族系的蛮族汪达尔人，但在这点上看，他也还是罗马人。舍弃不列颠和“长发高卢”而留下普罗文西亚，对他来说无疑是自然的选择。

然而，这次他又遭到恶评。对居住在意大利半岛的老百姓来说，阿尔卑斯山脉对面的高卢很遥远。他们对此没有像严厉的征兵制那样的切肤之感，因而并未引起什么反对。但是，斯提利科没能蒙住元老院议员。他们看清了把在高卢的罗马势力根据地从特里尔移到阿尔勒的真实意图。斯提利科当然没有公开说过一句要放弃高卢中部和北部的话，也没有撤回驻扎在不列颠的军团。但仅凭把根据地从莱茵河中游迁至地中海这一点，就足以看透斯提利科的本意。

在“元老院阶级”这个词所包括的、地位财力上都属于罗马社会上层的人中间，开始萌生反斯提利科的倾向。他们对强使自己把自家大农庄里的警卫和农奴送去服兵役的斯提利科感到窝火。“长发高卢”事实上的放弃，让这些人感到自己祖先辛苦得来的荣耀被糟蹋，从而心生愤懑。何况做这事的居然是蛮族出身的人，这更使他们怒火中烧。

这种感情带有怀古情调，而正视严酷现实，要有勇气与过去一刀两断。但如此去说服他们，只怕是白搭。公元5世纪的上层罗马人也懂得这个“理”。但是，在国家瓦解过程中，强烈支配人们心灵的，与其说是“理”，不如说是“情”。

斯提利科也知道社会上下开始对他起了反感。他试图通过举行久违的凯旋仪式去化解这种反感。

举行凯旋仪式也师出有名，那就是两年前的胜仗。斯提利科在波勒提亚和维罗纳两度打败阿拉里克率领的进犯意大利北部的西哥特人，使阿拉里克狼狈逃回巴尔干地区。如果目的是与民同庆，凯旋仪式就应该在胜利的公元402年当年的秋天举行。斯提利科在公元404年

秋天举行凯旋仪式是要拿庆祝胜利做幌子，其真实意图在于消解反对自己的呼声。

凯旋仪式

进入帝政时代以来，在首都罗马举行的凯旋仪式上，主角都是皇帝，即使胜利功臣另有人在。皇帝毕竟是罗马全军的最高统帅。公元404年秋天举行的凯旋仪式上，坐在侍者驾驭的双驾战车上接受群众夹道欢呼的也是皇帝霍诺里乌斯。

凯旋仪式是罗马特有的祭典，与罗马人的传统深深地结合在一起。在基督教来看，其异教色彩过于强烈。凯旋仪式原本就与基督教国家相矛盾，民众也会因凯旋仪式而狂热。所以，罗马变身为基督教国家后虽然还保留着凯旋仪式，但色彩已与从前不同。

首先，由凯旋将军驾驭4匹白马的形式完全消失了。马匹好像仍为白色，但已由4匹改为2匹，这2匹马也由侍者驾驭，这已成了惯例。

其次，凯旋将军用红色颜料涂面的做法也消失了。把脸抹红在罗马是神的表示。这样做的意思是，凯旋将军因打败敌人保卫了大家的安全，因为这样的功绩可以在凯旋仪式这天当一天的“神”。然而，基督教是一神教，不允许唯一的神以外还有其他神的存在，哪怕只是一天。不过，因废止了“一日之神”，也就没有奴隶像以前那样站在接受民众欢呼的凯旋将军身后不断轻声重复“肉身当死，不可忘却”的情况了。即使一日为“神”，也不可忘记自己是“人”身，这种巧妙的平衡感正是基督教化以前罗马人的特质。可是罗马国家性质已变，不能再把这种平衡感视为必需。

作为胜利者象征的月桂树枝编的月桂冠也销声匿迹了。月桂冠曾经戴在希腊奥林匹亚竞技优胜者和罗马皇帝的头上而光耀过，从而被看做异教的象征。实际上，在成为基督教国家以后，罗马的钱币上再也看不到头戴月桂冠的皇帝雕像了。

公元404年秋天，在罗马举行的凯旋仪式就是这种极力排斥异教色彩的仪式。在队伍最后压阵的胜利者乘坐的双驾战车上，除了霍诺里乌斯皇帝，还有斯提利科。当然，在前面接受民众欢呼的是霍诺里乌斯皇帝。可是，不论军装多么华丽，19岁的霍诺里乌斯身材矮小，腿短肥胖，毫无表情的脸上根本看不到击败入侵蛮族的男人的霸气。

相反，紧挨在他身后的斯提利科40来岁，正值壮年，有着男人的镇定和力量。他比霍诺里乌斯高出一头，肌肉健硕，目光锐利，远比主角皇帝更能吸引人们的视线。民众也都知道，3年前霍诺里乌斯刚举办过成年礼，敌人袭来时即从米兰避难来到罗马，而前去迎敌的是斯提利科。元老院议员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两人一同站在凯旋将军用的双驾战车上与民同庆，游行似乎取得了成功。

之后斯提利科又进一步利用了这个大好机会，他让皇帝霍诺里乌斯出席元老院会议，请他说明元老院议员先前阻挠制定的那些法律的必要性。霍诺里乌斯年纪轻轻却无精打采。他念的演讲稿一定是斯提利科所写。通过皇帝的说服而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除以“国家公敌”宣言的形式宣布紧急状态的时期以外，大农庄主也有如下义务：如果不交出指定数量的农奴服兵役，则每个人头须支付25枚苏勒德斯金币。这样一来，斯提利科整编新军的财源便有了保证，身为大农庄主的元老院议员几乎都选择支付金币而不愿提供卫士和农奴。

迁都拉文纳

这个时期，斯提利科把皇帝的居所从米兰迁到了拉文纳。霍诺里乌斯不听劝解，坚决不愿意再回危险的米兰，他甚至不愿意继续住在罗马。斯提利科遵从了他的意思，迁都拉文纳。

罗马太大，居民都很开放，习惯于在熟人簇拥下生活的霍诺里乌斯不适应这里的环境。而拉文纳城市小，且位于波河河口，水路成网，屏障四周。流经拉文纳南边的卢比孔河在共和时代是本土意大利与意大利北部行省的分界线。当时意大利北部行省的总督官邸就在这个城市。进入帝政以后，拉文纳城市也得到扩建，有了两个港口，四百年前开始成为帝国的两大军港之一，另一个军港是意大利南部的米塞诺。

把皇宫安在拉文纳，还可以让胆小的霍诺里乌斯放心，遇到危险时也可以取海路逃跑。迁都拉文纳就这样实现了。顺便一提，拉文纳与罗马和维罗纳一样，从古到今城市的名称从未变过。

斯提利科至此并未完成重整意大利半岛防御体系的工作。没有充分取得罗马人从上到下的合作是其原因，但更大的原因是罗马帝国国力的衰微。

4世纪初，戴克里先皇帝行使强权，使罗马全军的兵力倍增，发展到了60万人。其后的百年之间兵员逐渐减少。据研究者的推测，到了5世纪初，兵力或已减少到三分之一以下。随着帝国接近末期，历史记录的质量下降，甚至已无法弄清“联军总司令”斯提利科所率将士的数量。不过，他恐怕一次也没有统率过10万人以上的军队，人数顶多也就一两万。可是，来犯的蛮族动辄超过10万人！

与西罗马帝国防御力量相比，东罗马帝国虽然兵力也在减少，但程度不像西罗马帝国那样严重。

这并不是说东罗马帝国国力强于西部，也不是说东罗马帝国的士兵比西部同辈更勇敢。在这个时代，东罗马帝国的敌人是大国波斯。波斯军渡过幼发拉底河向西进犯，并不是波斯活不下去的掠夺行为。波斯军队曾经进攻过罗马帝国的领土，但那是在七百年前败给亚历山大大帝之前，是七百年前梦想复兴大波斯帝国的军事行动。当时的波斯物产丰富，如果打败波斯军队，东罗马帝国的士兵就可以缴获丰盛的战利品。

另一方面，西罗马帝国士兵们打仗的对手是活不下去或被新来的蛮族驱赶而不得已入侵的蛮族。打败他们所能够缴获的战利品少得可怜。

这样的差别表现在东西罗马帝国志愿当兵的人数上和每个士兵的战斗意志上。这或许也是衰退期“国家”与“个人”的利害关系趋于不一致的现象之一。元首制时代的罗马帝国处于鼎盛期，尽管那时打仗的对手同样是蛮族，也不能指望战利品，但当时军队在使用严格标准筛选优秀士兵方面并不困难。

不过，全盛时期的帝国政府为此也是出过几招的：

第一，保证罗马社会的平均收入与中产阶级相当。这在收入不固定的时代实在是极富魅力。

第二，保障期满退役时的退役金。这在那一时代的其他国家也是做不到的。这使士兵在退役后开始第二人生时没有了后顾之忧，虽然有人想要耕地，而有人想要现金。皇帝奥古斯都为了保障这项财源，还新开征了前所未闻的遗产税。而且，对非直系亲属继承遗产课以5%的遗产税，让没有服兵役的公民也为保障国家安全作出贡献，这在培育公德心方面也发挥了作用。

这个待遇是给由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组成的罗马军队主力军团兵的。行省出身没有罗马公民权的辅助兵也能在25年期满退役时领到“退役金”——罗马公民权。行省居民只要为罗马帝国的防御作出了贡献，就有资格被授予与罗马公民同等的权利。这实在是一项出于罗马式思维的政策。授予医生、教师的公民权只限于一代人，而授予行省出身士兵的公民权却是世袭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子女不再是行省居民，而是在所有方面都与祖辈为罗马公民的人等同。

第三，尤里乌斯·恺撒开始的士兵退役后回归公民社会的政策也与此相当。我想正是因为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绝妙配合，才使得罗马帝国充分发挥了作用。中央政府的最高领袖皇帝不是选举产生，但在“地方自治体”却盛行选举。就任“终身独裁官”的恺撒行使强权断然推行了多项改革，其中之一就是搞活地方议会。他确定了可当选议员的三种年龄资格：

一、未服过兵役者30岁以上；

二、服兵役当过军团兵者23岁以上；

三、服兵役当过骑兵或百人队队长者20岁以上。

在罗马，年满17岁方被视为成人，志愿兵也不接受更年轻的人。下一代皇帝奥古斯都时代形成了明确的制度，规定军团兵入伍后20年才能期满退役。这样一来，军团兵期满退役应该在37岁至40岁之间，士兵如果在23岁或20岁退役，原因只能是服兵役期间负伤或生病。尤里乌斯·恺撒作为最高司令官，没有忘记给因在战斗中负伤或在服兵役期间生病而不能享受期满退役待遇的士兵提供后续服务。

考虑到个体差异，公德心也好，战斗积极性也罢，都是不能量化的不确定因素。如果连这种不确定因素都想充分利用的话，保障军饷和退役金、回归社会等确定因素就更不可或缺了。人，大多是只有生

活安心才会有干劲。只有这样，“国家”（res publica）与“个人”（privatus）的利害才会趋于一致。

然而，根据卡拉卡拉皇帝著名的“安托尼努斯敕令”，罗马在公元212年决定将罗马公民权授予除奴隶外的居住在帝国领土内的全体人民。乍看这实在是一条人道的法律，但使罗马公民权的魅力丧失殆尽。这使得只有为国出力才会被授予的“取得权”变成了什么都不做只要出生在帝国领土内就能得到的“既得权”，也使兵役期、军饷、退役金等都变得模糊而不明确。武官和文官的分离又使得服过兵役者转职地方议会也化为梦想。

纵令有可能，又有没有人愿意担任地方自治体的要职呢？从4世纪起，罗马帝国变成了与以前元首制不同的专制君主型帝国，变成了中央集权制国家。地方议会只是中央的征税机构，议员们不得不在完不成规定税额时去填补空额，因此无人愿意当议员。但根据职业世袭法，议员的儿子生来就被绑在议席上。处于这种状态，国家与个人的利害也自然不相一致了。

可能有人会提出反驳，认为给士兵的种种优厚待遇是尤里乌斯·恺撒和开国皇帝奥古斯都确立的，又被后来的皇帝所承袭，成为罗马帝国的基本政策，原因在于罗马是军事国家。我想对持这种观点的人说：在现代，文官控制国家已成金科玉律，但若从现代的情况出发去评判古代，就容易妨碍我们对古代的真正理解。

对出身于希腊城邦的公民而言，他的义务是抵御外敌，保卫自己的国家。尽此义务所获得的权利是参与国家政治。所以古代希腊城邦的公民们都是自己持剑冲向敌人的，如哲学家苏格拉底、政治家伯里克利、悲剧作家索夫克勒斯、作家色诺芬、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罗马也是城邦。“公民”（civis）的义务是保卫国家，通过选举参与国政是他们的权利，这一点与希腊毫无二致。强调这种类似性，历史上才会有“希腊罗马时代”的称呼。这就是说，无论是在希腊还是在罗马，“公

民”最重要的义务是保卫“国家”。罗马在公元前1世纪出于救济失业者的需要推行了志愿兵制，但在那以前一直实行全民皆兵的征兵制度。即使在推行志愿兵制以后，是否服过兵役也是担任国家要职的必要条件，对此没有谁会提出异议。在共和时代罗马重要人物中，我们只能找到哲学家、律师并且曾当过执政官的西塞罗未被确认有过从军经验。皇帝们也几乎都有从军经验。交叉获得行省军事经历和本土文官经历是成为罗马国家精英的途径。

在罗马，文官与武官长期不分，无法产生文官主持军事这种概念。正因为文武的合二而一，发展出文武兼备的人才，产生了有利于罗马国家整体利益的结果。

进入4世纪以后，这种状况发生变化，禁止元老院议员干预军事的相关法律成为国策。后来文官与武官完全分离，但二者的质量并没有得到提高。看看后来两者的实际成绩，认为其质量不升反降也许更加妥当。由于纵向的分割，人们得不到只有经历不同领域才能得到的刺激。即使军队总兵力增加到元首制时代的两倍，长期效果自然也要与期待相去甚远。4世纪初叶，罗马军队总兵力虽然从以前的30万人增加到60万人，但靠国家财政维持越来越难，兵力也逐渐减少，再次陷入北方蛮族随意入侵的境地。我认为，卡拉卡拉皇帝3世纪初叶实施的将罗马公民权变为既得权的政策和4世纪初叶强行推行的文官与武官的完全分离政策，是导致罗马军事实力衰退的两大要因。

经历了这样的200年，罗马迎来了5世纪。在斯提利科承担防御全责的5世纪初叶，这种倾向经过200年已逐渐稳定，不可能再回头了。我不禁在想，如果元首制时代的领袖们看到现在的罗马帝国，一定会同情以一人之躯肩负起帝国的斯提利科。

公元404年秋天举行凯旋仪式后的小康状态只持续了一年。翌年，即公元405年即将入冬时，传来了蛮族大规模入侵的消息。这消息震惊

了整个意大利。皇帝霍诺里乌斯已年满20岁，却不愿意走出拉文纳一步。斯提利科只得再次一个人替他扛起意大利防御的重任。

巨浪袭来

公元260年，当时的皇帝被波斯国王俘虏。在这个前所未闻的不幸事件中，罗马放弃了在保障帝国安全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作用的“日耳曼长城”，后来也未能恢复。第二代皇帝提比略早已注意到这座长城的重要性，大体搭建了框架。图密善皇帝围起了真正的墙壁。通过图拉真、哈德良、马可·奥勒留等五贤帝时代皇帝们的努力，日耳曼长城成为铜墙铁壁。付出如此之努力自有其道理。北去的莱茵河和东去的多瑙河，都发源于此。注入这两条大河的支流为数众多，如罗马时代称之为尼克尔的内卡河等。这一带西南部的“黑森林”被罗马人称为“未开垦的森林”（silva），即使罗马人修通了罗马式的石板大道，这里的森林依然遮天蔽日，白昼阴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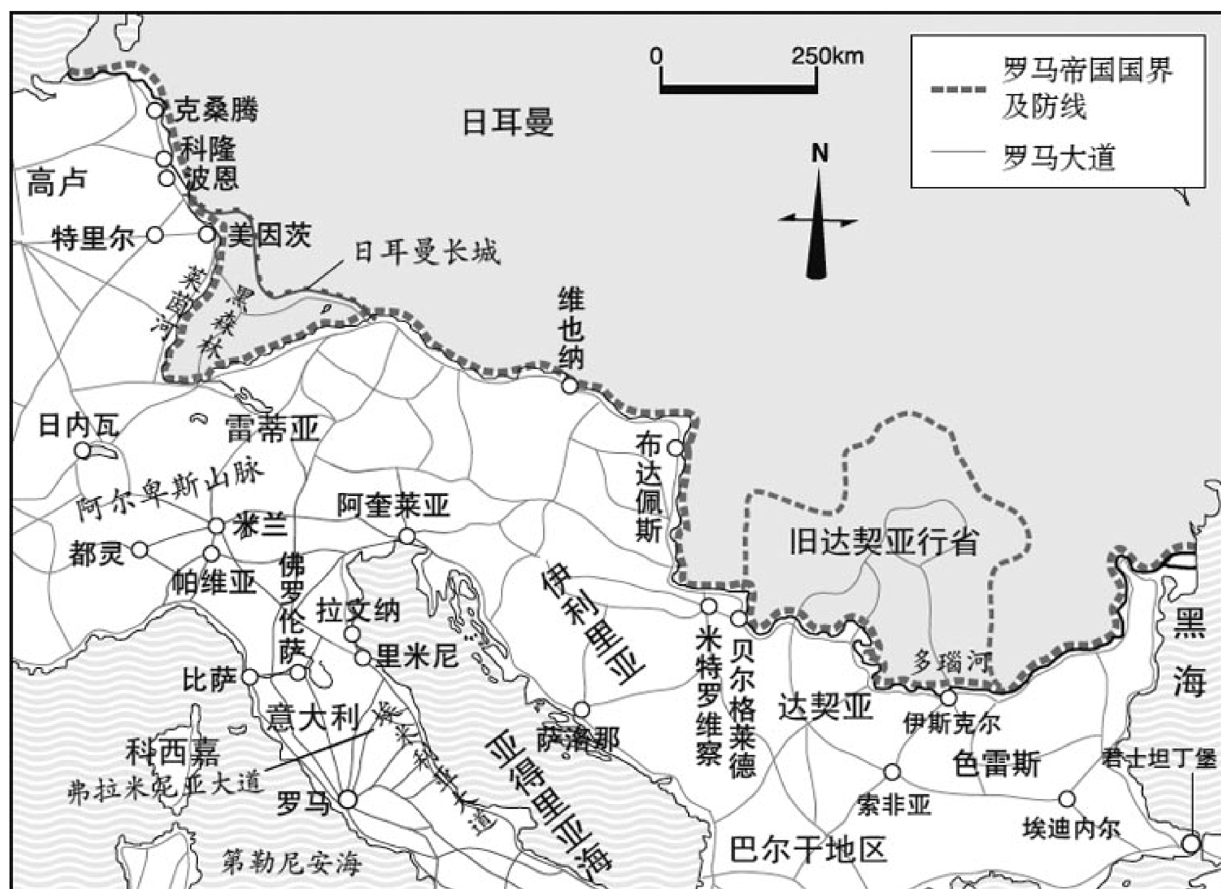
这里被罗马人称为“阿格里·戴可美特”（agri decumates），受到莱茵河和多瑙河两河上游的两面包夹，又地处山区，难以防御。拉丁语“阿格里·戴可美特”，直译是“什一税耕地”，意思是罗马帝国承认居住在这一带的日耳曼人为行省居民，他们的安全由帝国保障，相应地，他们要向帝国缴纳收益的十分之一。罗马人承认他们的居住权，与他们缔结同盟协议，为他们去打仗，为此他们要向帝国支付佣兵费用。这是4世纪以后罗马帝国与北方蛮族力量对比的体现。与此相比，罗马鼎盛时期的元首制时代，帝国与蛮族力量的悬殊让人印象深刻。不过，这也是罗马人借以击退近逼两河上游、山岳地带及黑森林地区之敌的日耳曼长城早于150年前即已消失的结果。

罗马放弃这一带以后，入侵的蛮族蜂拥而至。这个事实证明了日耳曼长城曾经发挥的重要作用。公元405年秋的蛮族入侵不过是其中一

例，但这次入侵的人数之多史无前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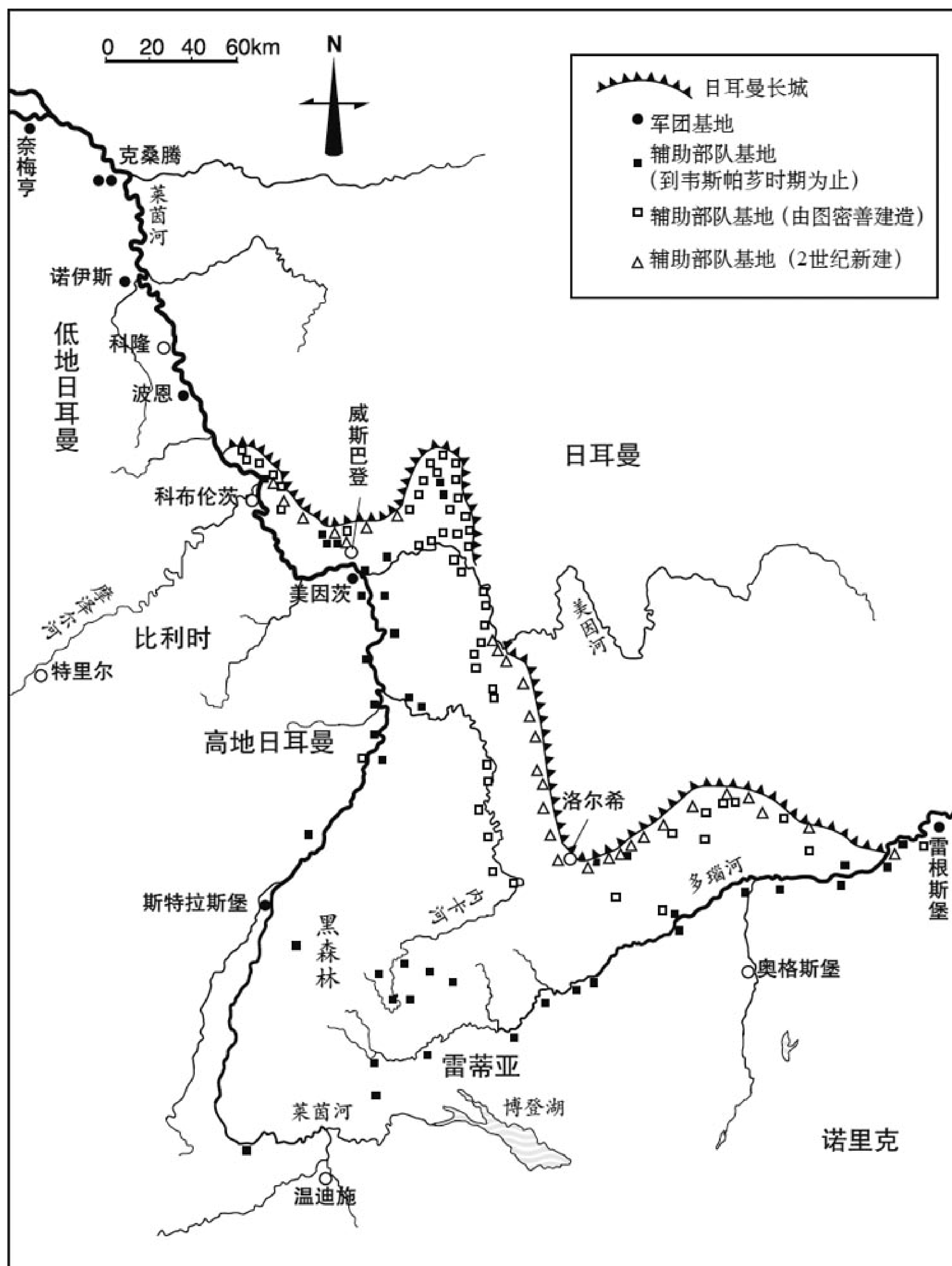
这次蛮族入侵帝国境内的原因也是被匈奴人所驱赶。这是4世纪后半叶到5世纪前半叶蛮族入侵的特点。站在入侵者的立场上看，他们是“难民”。匈奴人当初从遥远的亚细亚向西进犯，首先赶走居住在多瑙河下游北侧的蛮族，接着转移到中游地区故伎重演。到了5世纪初叶，匈奴打到了多瑙河上游。亚细亚系蛮族凶猛至极，日耳曼系蛮族亦不能敌。老的蛮族经常被这个新来的匈奴人驱赶出去。匈奴人凶猛剽悍，所向披靡，名震遐迩。

“什一税耕地”听上去只是一个讽刺。这里为罗马帝国的势力所不及，蛮族被赶出去后，蜂拥进入位于莱茵河南边的行省雷蒂亚。他们并不是预谋入侵并在部族长统率下有组织的集团。东哥特人君王拉达盖苏斯是他们的领袖。但这时拉达盖苏斯也只是入侵而来的日耳曼系各部族联盟的代表。公元405年秋天，涌入西罗马帝国境内的除了拉达盖苏斯属下的东哥特人，还有苏维汇人、奄蔡人、勃艮第人等。他们都属日耳曼系，都是因匈奴人入侵而失去家园，不想被杀也不想当奴隶，逃亡是他们的共同目的。



从莱茵河到多瑙河

尽管同为日耳曼系蛮族，他们与被天主教打成异端的阿里乌斯派基督教徒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人”有所不同。拉达盖苏斯率领的“东哥特人”是异教徒。与东哥特人共同行动的苏维汇、奄蔡、勃艮第各部族也和东哥特一样，信奉日耳曼民族的传统诸神，相信森林是日耳曼之母，都生活在罗马文明圈之外。罗马人也称这些人为“蛮族”。这次他们涌来的人数，包括妇女孩子在内，有40万人之众。



完成后的日耳曼长城（引自“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反观迎战的罗马方面，如果瓦格纳生活在当时，也许他的感觉会像是在聆听雄壮而充满野性的乐曲。多说一句，瓦格纳的代表作《尼布隆根的指环》由《莱茵的黄金》、《女武神》、《齐格菲》和《诸神的黄昏》四部曲组成，其中的人物就是在罗马帝国末期一再入侵罗马的蛮族勃艮第人。德意志西部和南部古代时属于罗马帝国，瓦格纳的出生地莱比锡诞生于中世纪，位于日耳曼纵深处。罗马帝国曾想征服日耳曼，而后又放弃了这一想法。顺便一提，按照日耳曼与罗马这样的古代分类法，生于萨尔茨堡的莫扎特和生于波恩的贝多芬都属于罗马一方。瓦格纳的音乐让人产生日耳曼式的感觉，我想，也是因为有这样的历史背景。

如果伴着瓦格纳的乐曲行进，入侵罗马帝国的日耳曼民族一定会雄壮整齐。然而现实情况却是，人和家畜数量庞大，哪有什么队列，既无纪律，也不知目的地何在，只是一个劲地南下。

南下沿途所经之地，生灵涂炭。蛮族并非前来挑战，只是潮水般地涌来，抢夺劫掠，杀死反抗者，再一路走下去。所到之处宛如大片蝗虫过境。

迎战

这次来犯之敌在各个方面都出乎斯提利科的意料。在罗马军队中从过军的蛮族族长已经越来越多，但拉达盖苏斯并不在其中。他从未与罗马军交过手，罗马方面无从预测他在战场上的打法。罗马人甚至还不知道人数庞大的蛮族目标何在，也根本不清楚他们的路线。起初似乎他们去往高卢方向，直到406年春天，拉达盖苏斯和他那40万人马翻过阿尔卑斯山脉出现在北意大利，罗马人才知道意大利是其矛头所向。

斯提利科要迎战的就是这样完全不知底细的敌人。对他而言，集结士兵是最切实的课题。他于公元405年冬收到拉达盖苏斯率领日耳曼各部族从多瑙河上游入侵而来的报告。当时，他已向西罗马帝国所有行省发出命令，要求集结士兵。然而，没有一个行省集结兵力，应召前来。这不是因为行省要抛弃本土意大利。没有送兵的理由有二：其一，不列颠、高卢、西班牙、北非都忙于自身防御而派不出兵；其二，即使派兵，士兵在去意大利途中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我确信只有“和平”才是终极的基础建设。“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终结，影响了帝国抵御外敌、防御国内之敌及维护治安的功能。响应斯提利科的号召来到意大利的，只有高卢作为“同盟”在罗马一方从军的蛮族士兵，其中有原阿拉里克的部下萨罗率领的西哥特人的一支队伍和乌尔丁指挥的一支匈奴人队伍。

更为糟糕的是，在意大利半岛内的征兵也因大农庄主的消极抵抗而毫无进展。公元406年5月，斯提利科终于采取了罗马帝国史无前例的强硬手段，通过了可以征召奴隶的法律。这一时期的法律并不是国法，国法需要大农庄主占大多数的元老院通过。法律似乎是敕令，只要皇帝下令就能立刻生效。这就是临时措施法。不过，大敌当前，迅速应对高于一切。

给奴隶志愿兵的报酬是战斗结束后解除奴隶身份，并发给两枚苏勒德斯金币。既有奴隶，就该有主人，但给奴隶的主人什么报偿就不得而知了。总之，公元406年入夏以后，斯提利科总算有3万人的军队可以调遣了。

罗马帝国的实战能力

如果把元首制时代的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那时常驻西部的兵力是10个军团6万人的主力（军团兵拥有罗马公民权）和与之数量相

当的辅助兵力（行省士兵），共计12万人。这个数字经过3世纪的危机，到4世纪初叶增长了一倍，增员到25万人。4世纪上半叶的罗马帝国能够避免大规模的蛮族入侵，更多依靠的就是这种坚定的兵力倍增政策。可是，军事上的坚定政策不能不压迫到国家财政，到了4世纪后半叶，弊害便渐渐显现出来，造成了在此期间罗马帝国的防御力量不断衰退，无论是人力还是财力，国力都已不敷供给。

西罗马帝国的联军总司令甚至把手伸向了奴隶，才征召到3万人的兵力，这真令人惊愕。元首制时代的皇帝之下有10名司令官、军团长，3万人只相当于其中一位率领的作战单位的人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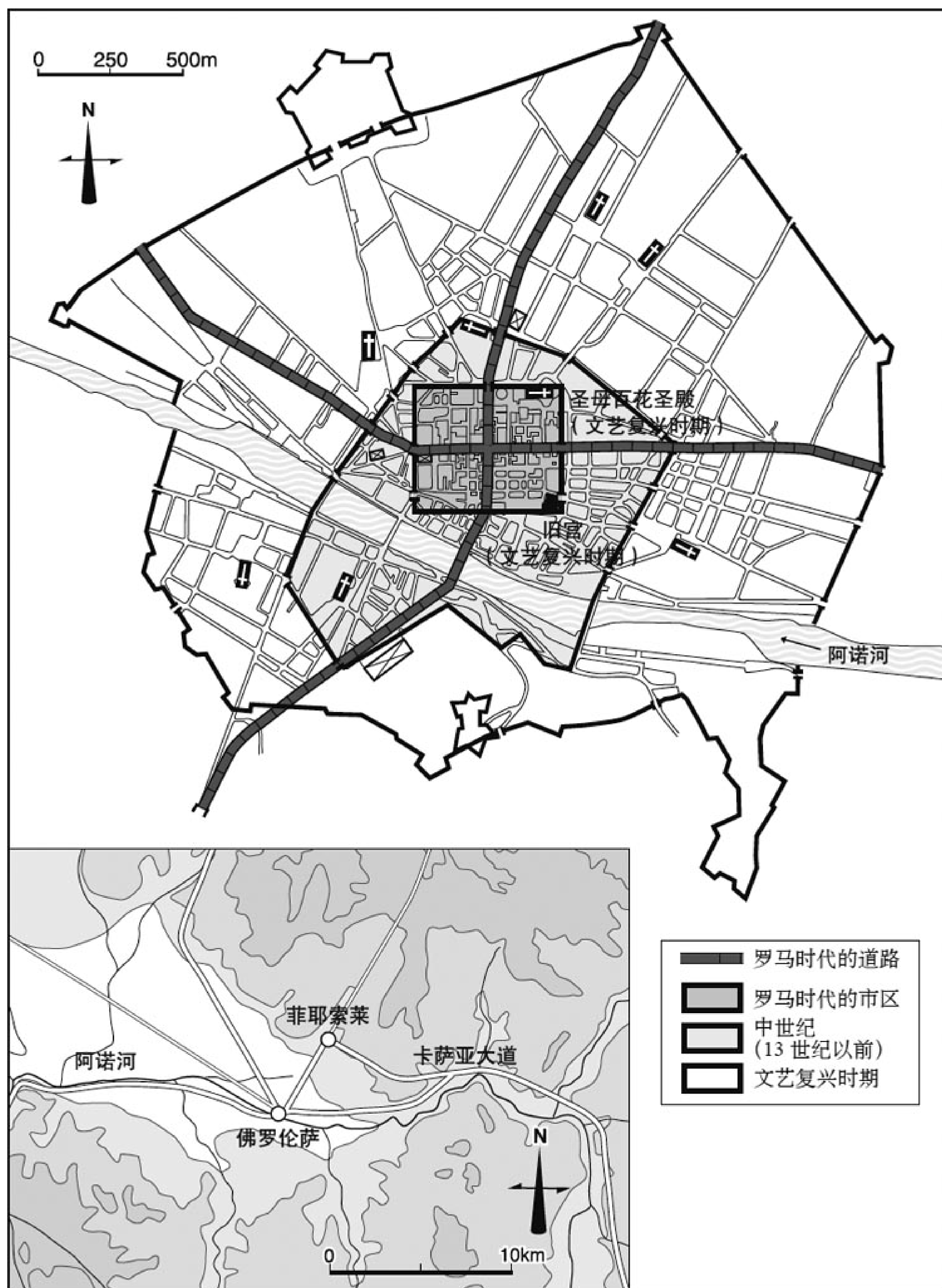
优秀的司令官会思考尽可能减少手下士兵牺牲的战术，但他也知道不可能没有牺牲。不论是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或尤里乌斯·恺撒，他们都取得了战争的完胜，但也有自己的士兵牺牲在战场上，尽管数量较少。然而，公元406年的斯提利科却连这点牺牲都不允许有了，他没有任何补充的途径。斯提利科还面临一个不利的情况，把手伸向征召而来的3万奴隶，没时间经过充分训练就得面对敌人。

在这种状态下，留给总司令的就只有一条路。不允许损失士兵，就不能积小胜而后决战。这样，就只有待敌人集中一处时一举决战这一条战略了。

46岁的斯提利科在等待这个“时机”。为此，他眼睁睁地看着拉达盖苏斯和他身后的40万人像大片蝗虫过境一般把意大利北部啃食一空。

菲耶索莱之战

6月，拉达盖苏斯和他的40万人抛下了吸干榨净的意大利北部，转向意大利中部。如果他们的目标是罗马，经埃米利亚大道到达里米尼，再从那里经弗拉米尼亚大道去罗马是最快最容易的路径。但拉达盖苏斯以前没有接触过罗马帝国，也许并不很了解首都罗马的富庶和走罗马式大道的便捷。他们就像墨汁滴在纸上扩散一样从意大利北部逐渐渗到意大利中部。而且，在进入意大利中部后刚遇到第一个城市，就陷入了佛罗伦萨攻防战。他们刚刚翻过亚平宁山脉而来，粮草怕也已告罄。



0 250 500m
N
圣母百花圣殿
（文艺复兴时期）
旧宫
（文艺复兴时期）
阿诺河
菲耶索莱
卡萨亚大道
阿诺河
佛罗伦萨
N
0 10km
罗马时代的道路
罗马时代的市区
中世纪
(13 世纪以前)
文艺复兴时期

罗马时代、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大图）及罗马时代的佛罗伦萨和菲耶索莱（小图）

古罗马时代，佛罗伦萨称为佛罗伦提亚（Florentia），是罗马人在起源于亚平宁山脉而注入第勒尼安海的阿诺河北岸建起的城市。此前居住在此地的是伊特鲁里亚民族。伊特鲁里亚人生性喜在不太高的山丘上建城，他们选择的居住地就是菲耶索莱山丘，这座山丘现在盖满了别墅。征服并同化了伊特鲁里亚人的罗马人喜欢在平地上建城。沿阿诺河而建的佛罗伦萨起源于罗马时代。公元前1世纪，苏拉首先把这里选做手下兵士退役后的落脚点。可是，这位勇将的前下属非但没有落下脚，反而因参与“喀提林阴谋”而全军覆没。后来尤里乌斯·恺撒让自己手下的退役兵士到这个眼看就要成为无人之城的地方定居。据说从这时起，“花都”之意的佛罗伦提亚就成了这个城市的名字。后来以“文艺复兴之都”驰名的佛罗伦萨，其实在一千五百年前就已存在。卡萨亚大道（Via Cassia）现在是国道2号线，至今仍发挥着作用，这条大道连接着首都罗马和佛罗伦萨。

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扩展到了阿诺河南侧。但在罗马时代，佛罗伦萨只在河的北侧，是夹在阿诺河河岸和“圣母百花圣殿”之间的一个四边形地方。现在出了市区直接走上缓坡就能到达菲耶索莱山丘。可是在罗马时代，佛罗伦萨与菲耶索莱相距甚远，其间广阔的平原都是耕地。两者之间的距离在古代比在文艺复兴时代要遥远得多。拉达盖苏斯率领40万人翻过亚平宁山脉之后，开始进攻佛罗伦萨，这片广阔的耕地就成了他们的“野营地”。

斯提利科放出了侦察兵，他知道“时机”已到。他的军营在北意大利的帕维亚，他一边瞄着拉达盖苏斯的动向，一边保持着距离，将3万人部队选择别的大道，从意大利北部插到了意大利中部。他们知道，敌人终于为进攻佛罗伦萨而集结在了佛罗伦萨与菲耶索莱之间的这块平原。

斯提利科来到菲耶索莱背后，先与全力以赴进行防御的佛罗伦萨取得了联系。蛮族原本不善于进攻围着城墙的城市。佛罗伦萨又面对阿诺河，蛮族的包围也是漏洞百出，与市内取得联系并非难事。

斯提利科向佛罗伦萨的居民要求提供食物和人手。“食物”是供给他带来的3万名兵士，“人手”是用于他构思的土木工程。佛罗伦萨的居民意识到靠自己的力量无望抵御蛮族，所以高兴地响应了斯提利科的要求。菲耶索莱居民的食物已经被蛮族抢劫一空，只剩下了一条命，但他们仍然高兴地响应了提供人手的要求。这样，用栅栏和壕沟把佛罗伦萨与菲耶索莱之间的开阔地全部围起，把蛮族赶进去，宏伟的战略态势便告形成。

当然，罗马人经常需要派兵击退那些看到这个工事而来进攻的蛮族，但因此损失的士兵数量与和10倍之敌正面作战的损失相比实在是九牛一毛。对那些看到了工事而逃跑的蛮族也不用派兵拦截。人看到危险就会朝自己人所在的方向逃去。用栅栏和壕沟包围敌人，断绝其供水与食物的战斗，就在这盛夏的骄阳之下同时进行。

佛罗伦萨四周被丘陵包围，夏天不仅炎热，湿度也大。它位于罗马北面，但夏天比罗马炎热，冬天比罗马寒冷。佛罗伦萨与菲耶索莱之间的平原是典型的盆地，夏季尤其闷热，到了8月实在无法忍受。住在平原的佛罗伦萨人在周边丘陵地带建有别墅，也是为了躲避夏天的这份炎热。在盛夏的阳光下，这40万人已经断水绝粮，宛如被赶进围栏里的羊群，不断有人倒下、死去。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将近一个月，斯提利科并不着急。那些刚从高卢过来成为他属下却并不了解意大利的蛮族士兵，那些一下从奴隶变成士兵的各族人等，没有一个人随意行动，简直就像斯提利科从小培养并在他手下作战多年的士兵，完全膺服于这位汪达尔人出身的罗马武将，这情形令人不可思议。

即使坐视对手因饥渴而倒毙，40万众也不知何时才能死完。于是8月过半，斯提利科把西侧包围圈撕开一角，故意让还能移动的蛮族朝

阿诺河方向逃跑，然后派兵从背后压向疯狂求水冲向阿诺河的蛮族。这个计谋逼使饥渴的蛮族人不是倒在剑下，就是被水淹死。

然而，这个暑天断水断食的战役只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假设：不足两个月的时间里不可能置20万人于死地，这并没有任何现场记录做根据。一直崇拜斯提利科、相当忠实地记录这位蛮族出身武将言行的克劳狄安，从两年前开始就什么也不写了。这位比斯提利科年长几岁出身于埃及的诗人，在公元404年以后退出了历史舞台，无人知晓他是亡故还是患病回乡。后来成为圣人的奥古斯丁曾经提到过以“菲耶索莱战役”之名著称的这场战役。他当时在北非做主教，通过传闻知道了发生在意大利中部的这场战役。

由此可见，这场“菲耶索莱战役”虽然没有丰富的史料记载，但显然是历史事实。

8月23日，栅栏壕沟的围歼战开始尚不到两个月，战役就以生者投降而告结束。活下来的人数不详。不过，有人说沿阿诺河到比萨，有10万人逃往法国南部。当初率领40万人入侵意大利的拉达盖苏斯在逃亡途中被捕，押解到斯提利科面前被迅即斩首。投降的人当中年轻力壮的1.2万人被编入了斯提利科率领的罗马军队。除此之外的所有人均被出卖为奴。由于数量过多，奴隶价格下跌，据说3个月前还是奴隶的士兵有生以来第一次买得起奴隶了。

从公元405年到406年，蹂躏意大利半岛北半部、使首都罗马颤抖的拉达盖苏斯及40万蛮族，在夏日的太阳下来到菲耶索莱丘陵之麓便似蒸发了一般，踪影全无。

这是斯提利科的完美胜利。等待战机一举定乾坤，这个做法让人想起四百五十年前尤里乌斯·恺撒的“阿莱夏攻防战”。元老院得知“阿莱夏攻防战”的胜利，登上卡匹托尔的山冈，感谢以朱庇特为首的诸神。而在四百五十年后的罗马，长久以来一直保佑罗马人的诸神已然

成为邪神。但是，如此巨大的欣喜怎么能不向谁表示感谢呢？这是人之常情。于是，公元5世纪初叶的善男信女们倾巢出动，来到圣彼得大教堂和圣乔万尼大教堂，把感谢奉献给了基督教之神。北非教区得知胜利消息后，圣奥古斯丁也说，这是神的恩宠创造的奇迹。

然而，意大利的人心完全没有因此倒向斯提利科一边。由于禁止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在罗马元老院议员中，不少人表面上装做基督教徒，内心却依旧对罗马传统诸神感到亲近。但这些“隐性异教徒”倒也并未在自己家里偷偷地感谢诸神。有句谚语叫“好了伤疤忘了疼”，他们早忘记了整整半年的恐惧。同样忘记恐惧的还有21岁的皇帝霍诺里乌斯，他身兼执政官却不知道身先士卒、冲向敌人是执政官之责任。这帮人不但忘却了刚刚过去的恐惧，甚至开始责难斯提利科。他们以斯提利科让10万蛮族逃往高卢为口实，谴责他靠牺牲高卢来解救意大利。

只有46岁的斯提利科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也没有因这些非难而动摇。他虽然成功地捕捉到战机，一举获胜，但这一胜利毕竟不似恺撒那样，是在远离意大利的敌土之上取得，而是在蛮族入侵深入意大利半岛之后才取得的。他深知二者之间的不同。这还不能说作为与皇帝霍诺里乌斯共同担任的执政官，自己已完成了职责。现在已不可能完全阻止蛮族对罗马帝国西部的侵犯，但至少得阻止蛮族对本土意大利半岛的入侵。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忘记与意大利接壤的高卢的防卫，尤其是高卢南部的防卫。这个想法逐渐占据了斯提利科的大脑。对高卢的担心在菲耶索莱战役胜利之后不到4个月即成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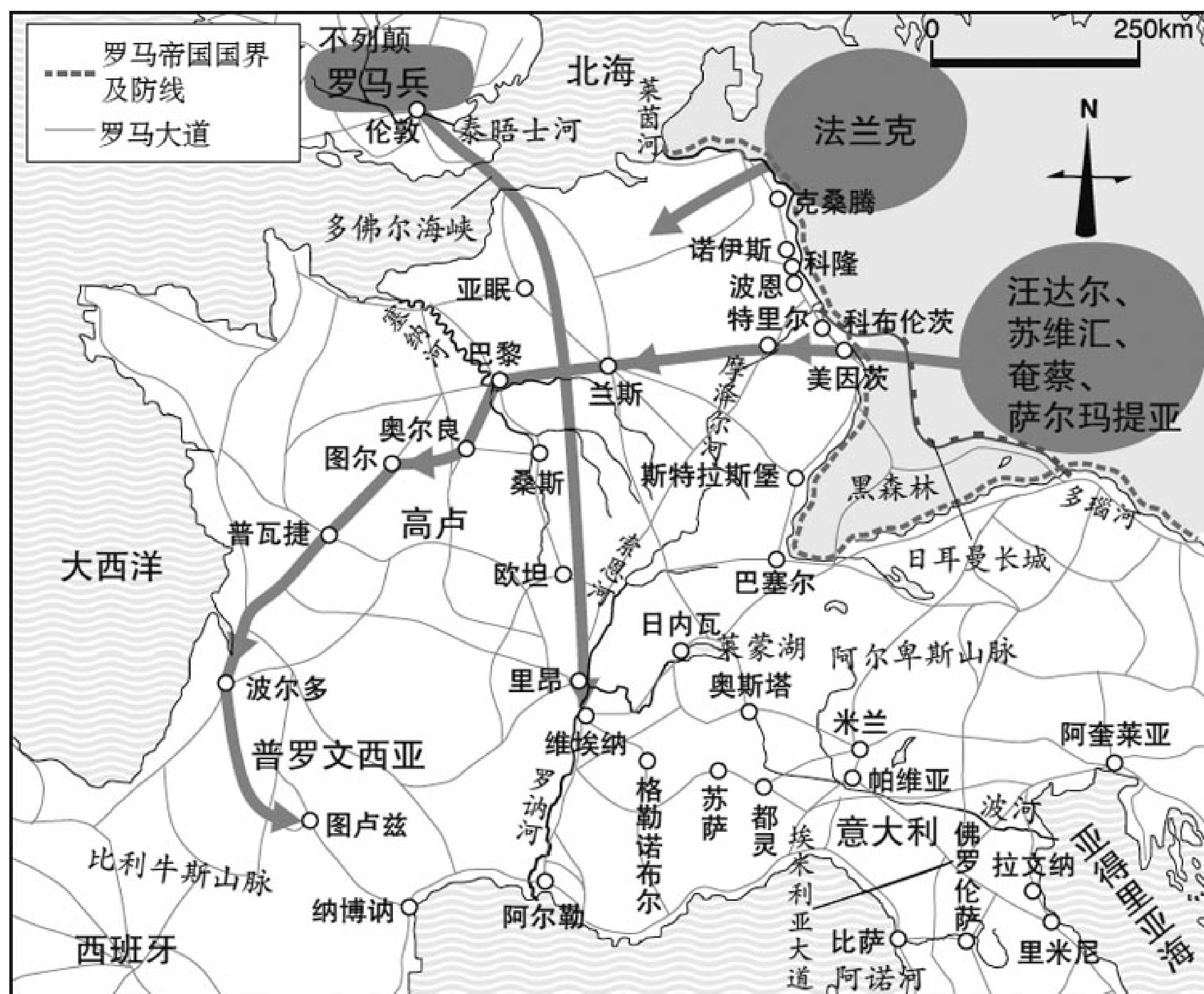
高卢的现实

公元406年12月，日耳曼系蛮族再次群起渡过莱茵河涌入高卢。这次也是由汪达尔、苏维汇、奄蔡、萨尔马提亚等各部族遭到匈奴人驱

赶，大队人马侵入罗马境内。这与一年前拉达盖苏斯的情形相似。由于莱茵河下游已被法兰克人占领，为回避与同为日耳曼系蛮族但更为强大的法兰克人正面冲突，他们选择在莱茵河中游渡河。

15万被匈奴人驱赶无家可归的大群难民手执武器奔袭而来。过去的军团基地现在已无力防御，连像样的抵抗都没有就一个接一个地陷落了。这次的蛮族集团由各部族组成，其中强大的部族有4个，但没有像拉达盖苏斯那样的统帅。

莱茵河畔的美因茨陷落了，特里尔被占领了，敌人转眼逼近兰斯。兰斯陷落后的下一个目标是巴黎，随后是奥尔良。图尔、普瓦捷被攻占后，轮到了波尔多。蛮族的先头队伍已经到达图卢兹，比利牛斯山脉挡住了去路，他们这才停下脚来。蛮族如同狂暴的飓风从东北向西南横扫高卢全境，给高卢造成了重大损失。与飓风所不同的是，横扫之后蛮族并未离开，而是到处落脚。这个时代，蛮族来犯已经不是抢劫之后再回到莱茵河对岸，而是就地盘踞。给高卢居民造成灾难的还不仅是北方蛮族。



5世纪初叶的高卢

自元首制时代起，罗马就在不列颠长期驻有3个军团。随着时代的推移驻军逐渐减少，进入5世纪时已只能勉强维持一半的兵力。这一半的兵力北边要抵御越过哈德良长城入侵的斯科特人，东边要面对渡过北海入侵的盎格鲁和撒克逊蛮族。4世纪末，罗马帝国东西分治之后也没有正式放弃不列颠，但事实上，来自帝国的关照几乎让驻扎在那里的士兵感到自己已被皇帝遗忘。帝国已经腾不出手照料位于边境的不列颠了。

思想上感到被遗忘，军饷也经常停发，敌人却一刻不停地袭来。驻扎在不列颠的罗马军队中有人号召“到高卢去”。此人不过一介兵士，却能言善辩，士兵们拥他为皇帝，似乎是在向遗忘了自己的皇帝

泄愤。这人被拥立为皇帝之后改名与君士坦丁大帝同名，号称君士坦丁三世。在他的率领下，驻扎在不列颠的罗马士兵全体渡过多佛尔海峡，攻占了高卢。



君士坦丁三世

高卢居民从东北到西南遭到蛮族蹂躏，家园也遭侵占，正处绝望之时。他们像大旱之望云霓一般地迎接君士坦丁和他的不列颠士兵。擅自称帝的君士坦丁是篡皇位之贼人，但人们已顾不上这些了。

5世纪初叶，高卢的情况不可能用图准确地表示。日耳曼系各部族渡过莱茵河到达这里，他们所盘踞的地带从东北到西南呈带状延伸。君士坦丁及其士兵渡过多佛尔海峡从不列颠来到这里，一边击溃遭遇到的蛮族，一边向东南挺进。拉达盖苏斯残部也逃进了高卢南部。如此混战状态，图示只能表示概貌。高卢唯一安静的地方是已有法兰克人定居的北部。斯提利科认为，意大利半岛防御的必要条件是高卢南部的防御。但这种想法既不现实，也无法一蹴而就。这就是公元407年的高卢现状。

然而，对支撑霍诺里乌斯皇帝的斯提利科而言，危险与其说是盘踞在高卢的北方蛮族，不如说是僭称皇帝的君士坦丁。

第一，既然霍诺里乌斯是皇帝，那么另一个皇帝就是皇位篡夺者，不可对此人置之不管。

第二，这个皇位篡夺者得到了高卢人的支持，所以隐含着高卢全境从西罗马帝国分离出去的危险。

第三，从西北向东南进攻高卢的君士坦丁决定以维埃纳为根据地。维埃纳位于里昂稍南，从那里沿罗讷河的大道南下，可以直插斯提利科确定的罗马军队在高卢的根据地阿尔勒，取道向东则可翻过阿尔卑斯山脉到达意大利。

公元407年秋，斯提利科要求元老院宣布皇位篡夺者君士坦丁为“国家公敌”。罗马元老院议员也反对两皇并立，这点得以顺利通过。紧接着，斯提利科让在手下参加过菲耶索莱战役的萨罗率领一队人马翻越阿尔卑斯山脉，进入高卢。萨罗出身于哥特人，英勇善战，击毙了两个号称君士坦丁左右手的将军。萨罗未能攻陷维埃纳，再次翻越阿尔卑斯山脉回到了意大利。尽管如此，他让君士坦丁领悟到觊觎意大利绝无好下场。

然而，高卢的现状并未得到改善。斯提利科手下包括蛮族和奴隶出身的人在内也只有3万人。靠这样的战斗力能不能完成意大利半岛的防御尚且是个疑问，根本没有余力再出兵高卢。

蛮族、奴隶在当时罗马社会均是虎狼之辈，他们在菲耶索莱战役之后仍能留在斯提利科麾下，这点非常不可思议。同时代人从下面的情形中找到了原因，这些同时代人大半在后来都反对斯提利科的政略。连反对派也赞赏，这原因也许就更可相信。

这个原因就是，斯提利科在任何事情上都非常公正。他对部下要求严格，不论是罗马公民、蛮族出身，还是原来的奴隶，完全一视同仁。他奖罚分明，不仅是获得赏罚的当事人，连没有受到奖惩的人也都心悦诚服。他虽然是西罗马帝国实际上的最高当权者，却没有一次中饱私囊的行为。

皇帝及其身边的人模仿东方专制君主一味奢华，高级官僚们滥用职权聚敛财富，就连基督教的主教都过着奢侈的生活，心存良知的人们为之侧目。在这样的时代，人们称颂斯提利科的清白廉洁，连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的美德。他给部下分配战利品不仅宽松，甚至不会忘记考虑每一个士兵的情况。他对士兵们的伙食比对自己的更加上心。也许，斯提利科这种一贯的作风吸引了前来投奔的无亲无故的蛮族和原奴隶出身的士兵们。总之，斯提利科是能得到属下将士全部信赖和忠诚的将军。然而，仅有3万人，能做的事情毕竟有限。

以毒攻毒

根据史学家吉本的说法，斯提利科与西哥特人君王阿拉里克的秘密交涉从公元404年就已开始。果若如此，时间应该是第二次打败阿拉里克在罗马举行凯旋仪式之后不久。

那年夏天，斯提利科与阿拉里克以意大利北部为舞台展开战斗。在战斗中，阿拉里克的妻儿被俘。敌将的妻儿在凯旋仪式上是不能缺少的角色，否则民众不答应。一直期盼的示众节目不能因此而减少。俘虏在罗马人的凯旋仪式上示众之后一般不会被杀。只有被视为极危险的人物、被认为活着将对罗马造成严重危险的人才会被杀。敌将的妻儿不是敌将，并不在此列。

说不定在凯旋仪式结束之后，斯提利科就指示将阿拉里克的妻儿秘密地送还给他。败给斯提利科逃回来的阿拉里克藏身于亚得里亚海对岸达尔马提亚的某处，离意大利是一昼夜的海路距离。狂热的凯旋仪式之后不久，斯提利科便冒险做了如此举动。阿拉里克对落入敌手的妻儿已经绝望，又忽然重逢，他的心情也许起了变化。无条件放还妻儿，开启了极端秘密的交涉。

假设斯提利科与阿拉里克的接触从公元404年即已开始，那么公开这一交涉就花了4年的时间。大概斯提利科并不急于求成。在此期间，斯提利科致力于强化防御体系，采取等待时机的策略，一举击败了拉达盖苏斯的40万蛮族入侵。斯提利科的立场也不断强硬起来。在自己力量不断增强的时期不急于妥协，这是铁定的法则。但这也有到顶的时候。这个“时候”不就是公元407年到408年这段时期吗?

而阿拉里克方面想要与斯提利科在平等立场上交涉，4年是绝对需要的。阿拉里克两次与斯提利科对决都被彻底打败，只得仓皇逃回伊利里亚。收拾残兵，东山再起，4年时间并不嫌多。

为什么斯提利科选择的交涉对手是西哥特人的阿拉里克，而不是其他北方蛮族的族长呢？法兰克人反复从莱茵河下游地区入侵高卢并已在高卢北部定居。罗马帝国与之虽然不是同盟关系，但也不是敌对关系。那么为何选择连达尔马提亚之战在内已有4次交锋的阿拉里克呢?

因为阿拉里克是曾经交手且次次被打败过的对手。斯提利科确信只要愿意随时可以将其击败，所以选择了阿拉里克。阿拉里克虽然每每被斯提利科灌以苦酒，但作为凝聚、指挥属下的蛮族领袖非常能干。斯提利科打算让阿拉里克去收拾混战中的高卢，让同为日耳曼系的蛮族前去镇压正在祸害整个高卢的蛮族。

“以毒攻毒”的战略在罗马绝非这时才第一次使用。对罗马国家而言，不论是共和时代还是元首制时代，这都是长年惯用的政略和战略，实例不胜枚举。

公元前3世纪接近尾声时，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盘踞意大利半岛达16年之久，罗马每战必败。年轻的西庇阿看破了汉尼拔胜利的重要原因在于其骑兵的战力，从而使战局逆转。使用重装步兵作为主战力已是罗马军队的传统，罗马军团没有强大的骑兵。所谓传统，就是只要能支撑下去就不可以改变的事物，非传统就是纵令改变也无法期望获得多大效果的事物。西庇阿没有要求自己手下的步兵骑马，而是把迦太基的邻国、同处北非且有骑兵传统的努米底亚收编过来。汉尼拔是古代首屈一指的名将，“扎马会战”是他的唯一败绩。在这场战役中，西庇阿与努米底亚国王马西尼萨并肩作战，取得了完胜。

事实上的帝政创始人尤里乌斯·恺撒在所有领域里都是玩弄“以毒攻毒”的高手，无论是政治、军事，甚至在个人举债方面。我们看他8年征服高卢的战后处理，就能明白他为什么会被一千八百年后的历史学家蒙森赞誉为罗马史上唯一的独创性天才。

恺撒不但承认了昨天还是敌人的高卢部族长们以前的地位和权力，还授予他们罗马公民权，甚至煞有介事地给予他们罗马元老院议席。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成为罗马的行省，支付行省税，而高卢的防御则由罗马军队承担。战后处理完毕，他离开了高卢。但这随即引发了与元老院的对立，罗马陷入内战。内战持续了4年，其间高卢没有参战。恺撒与元老院派的战斗是在远离高卢的希腊、北非和西班牙展开的。

当时的高卢人有足够的时间向罗马举起反旗。这4年是高卢人恢复独立的绝好时期，可是，高卢没有发生过一起叛乱。相反，他们甚至响应正在西班牙作战的恺撒之命为他送去了军粮。元老院派能从希腊、埃及筹集军费，恺撒却经常军费不足。而高卢却能一直按照恺撒

确定的数额送来税款，令人不可思议。这也许是因为恺撒确定的“罗马宽松的统治”对高卢人并无不妥。高卢被誉为罗马化的典范并非没有道理。

恺撒之后的历代罗马皇帝，在利用他人之力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点上，都是他的忠实继承者。

后世史学家把这种关系名之为“缓冲”，罗马人自己却称之为“朋友”（amicus）。罗马人的“防线”就是罗马帝国的国界。罗马帝国一贯重视与居住在国界线外侧的人们建立友好关系。其对象，在帝国的东边以王国居多，在帝国的西边以蛮族居多，但罗马把它们都变成了“朋友”，由朋友进而形成“缓冲”。

这是一种紧密环绕罗马帝国的大的战略关系。要长期维持这种关系，就必须平等受授。帝国“授予”东方“同盟者”的是，在其受到周边强大国家进攻时，罗马承担防御责任；“授予”西方蛮族的是，向他们开放罗马境内的市场，购买他们的特产皮革和裘皮。毋庸赘言，罗马方面“接受”的是综合安全保障。平日里常与罗马人接触的蛮族一变而为手执武器的入侵之敌，这种概率是很低的。

直到元首制时代，罗马帝国的国境因为上述原因成为“开放的国境”，就连围着栅栏、开着壕沟的日耳曼长城都开了为数众多的城门，不光有罗马巡逻兵出入，近郊蛮族也可以进来逛市场。

“以毒攻毒”的战略是一种赌博，而且是极其危险的赌博。罗马因为自身的强大能够一直赌赢，也没有多少必要害怕被“毒”，受到侵犯。斯提利科选择阿拉里克不也是为了规避这种危险吗?

进入最后一个世纪的西罗马帝国对士兵的渴望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要解决这个难题，只有让蛮族加入同盟。用蛮族抵御蛮族，这即使是一种奇谈怪论，也只能如此。

转年到了公元408年入春时节，斯提利科首次公开了与西哥特人族长阿拉里克的同盟交涉。他召集元老院开会，在会上提请承认与阿拉里克的同盟协约。

任命阿拉里克担任西罗马帝国的“大元帅”，承担防御之一翼，使阿拉里克及其部下的西哥特人都担当起帝国的防御责任。作为报酬，按照阿拉里克的要求支付给他4000罗马磅金条。

元老院议员们摇摆不定。自古以来，罗马的元老院就以其讨论混乱而闻名。往好里说是活跃，往坏里说就像被捅的马蜂窝。这次的讨论也是一样。只不过高声发言者都是反对的议员，赞成的议员都神色凝重，沉默不语。

阿拉里克为什么不要苏勒德斯金币而要求用黄金支付呢？一个世纪前，君士坦丁大帝把帝国的基本货币由元首制时代的第纳尔银币改成了苏勒德斯金币，希望通过把银本位变成金本位来阻止通货膨胀带来的货币剧烈贬值。尽管苏勒德斯金币的重量只有元首制时代奥勒留金币的一半，但没有改变百分之百足赤的纯金质地。日常使用的银币和铜币因浮动制而被弃置不用，作为帝国基本货币的信用都押在了苏勒德斯金币上。

此后过了还不到100年，蛮族就索要佣兵费4000罗马磅，即1500公斤金条，而不要相应的37.5万枚苏勒德斯金币。是理应纯金的苏勒德斯金币中掺有杂质吗？阿拉里克20年前曾在狄奥多西皇帝麾下从军，并领取以苏勒德斯金币支付的俸禄，他为什么会特意提出要求，指定用金条支付呢？这也许是我们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想多了。但我仍然不禁想到，假如产油国不要美元、欧元或者日元，而是要求以黄金支付石油货款的话……

阿拉里克索要4000罗马磅黄金，根据残缺不全的片断史料推测，似乎大大超过其他“同盟者”的要求。不过也可以想象，这个要求已经

考虑到了对方的支付能力。

西罗马帝国有没有这个支付能力呢？连征召3万名士兵尚且千辛万苦，我们可以说国家没有这个能力。那么个人呢？关于西罗马帝国的富裕阶级，研究者们提出了以下推测值，同样用以罗马磅为单位的金条数量来衡量。

大规模农庄主几乎都是元老院议员。假定元老院议员维持在元首制时代的数量，应该是300人。研究者们定为“大富豪”的人都是年收益总额超过4000罗马磅金条，定为“中富豪”的人年收益在1000到1500罗马磅金条。

这些“大富豪”、“中富豪”究竟有多少人呢？参考元老院议员长年在这方面的比例来看，300人中有3到5人是“大富豪”，20人左右是“中富豪”。此外的大半元老院议员可称为“富裕者”，至少也是“过着充裕生活的人”。代代相承的元老院议员很多，所以元老院议员不一定都是富人。

研究者们又说：仅就大中富豪而言，罗马元老院议员的财力就是君士坦丁堡元老院议员的两倍。我想，这原因恐怕在于财富积累程度上的差异。从推行王政开始，罗马元老院也已延续了400年以上，而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只有100年的历史，而且议员完全是专制君主下的名誉职务，“积累程度”产生差距亦属理所当然。

因此，罗马元老院议员的整体财力高于帝国的任何一处。我们可以看看一个属于“中富豪”的议员的生活。此人名为西马库斯，是《罗马人的故事14·基督的胜利》接近末尾时叙述过的、与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展开论战的西马库斯的儿子。西马库斯家族是名门，家族中曾有人被誉为“异教罗马古老荣耀的最后一簇火焰”。虽然富裕程度处在中游水平，西马库斯在罗马元老院中却是备受尊敬的议员之一。

我们再看看这位西马库斯家中的资产。他在首都罗马市内拥有3处宅邸，在整个意大利拥有15处别墅。每处别墅都附属有大片农庄，都是作为农业基地极为适合的典型罗马式别墅。这15处别墅产生的年收入相当于1500罗马磅黄金。

西马库斯家在意大利半岛脚尖前方的西西里岛上也拥有别墅。被认为属于他家的这座别墅，位于地中海最大岛屿西西里中心的恩纳附近，现在仍在发掘调查中。人们已经知道，这座别墅建于4世纪初叶，一直使用到6世纪末。

这是一座田园别墅，占地甚广，有30个房间。家人生活空间“内庭”长36米，宽30米，周围排列着圆柱。东侧走廊宽5米，长60米。浴场宽敞明亮，温水浴室中配备有热浴室和冷浴室，显示出沐浴在罗马式生活中不可或缺。接待客人用的大客厅有12米宽，24米长。此外还有一间大厅，是一个21米见方的客厅。从里面辟有3处半圆形空间看，墙面上肯定装饰着很多雕像，堪称“雕塑厅”。

残留在各个房间地面和墙壁上的镶嵌画美观漂亮，反映出了主人的情趣。这些镶嵌画中看不到基督教方面的主题，描绘的都是田园收获和狩猎生活。通向浴场的走廊长21米，里面的镶嵌画描绘了罗马“大竞技场”最有人气的战车比赛的场面。

别墅的豪华程度甚至超越了罗马鼎盛时代，生活在其中的却是基督教时代的人。怎么会有如此浓厚的异教色彩呢？在罗马自古以来的传统宗教被打成邪教的时代，如果还悄悄对其心怀亲近，就会成为“隐异教徒”。但既是出自名门的元老院议员，又是“中富豪”，也许没有必要刻意隐藏，何况此处地处西西里岛深处，远离基督教天下的米兰和罗马。

另外我还想到，为了维持这座别墅，需要数十个用人；为了耕种别墅周围广阔的农田，需要数百个农奴。如果这是“中富豪”，那么“大

富豪”过的又是怎样的生活呢?

的确，这个被认为属于西马库斯家族的别墅位于意大利南部，尚未遭到北方蛮族的进攻。但即使考虑到这一点，帝国进入最后一个世纪后，西罗马帝国也是财富雄厚，不过感觉上是国穷民富，与帝国鼎盛期元首制时代完全相反。但罗马并不缺少财力雇用阿拉里克及其属下的10万名士兵。

面对斯提利科要求通过的与阿拉里克的同盟协约，元老院一片混乱。也许元老院议员的本意是不想出钱。以前，斯提利科在做道路修缮工程时，曾经要求在工程附近拥有农庄的元老院议员捐出其收入的三分之一。也许他们厌恶重复这种事情。

但是以钱说事，事关他们自认为是帝国精英的名誉。于是他们把罗马帝国的传统推到正面进行反驳。一个名叫兰帕迪乌斯的议员说道:

> 与阿拉里克的协约不是带来和平的协约，而是导致奴隶化的协约。

很多议员对这个发言表示赞成，但斯提利科并未退却。他解释道，给阿拉里克及其属下西哥特人的4000罗马磅黄金，并非是作为年贡金来换取阿拉里克不再入侵意大利，而是给他们的从军报酬。也许有不少议员虽不是出自真心也不得不赞成斯提利科，元老院以多数赞成，承认了与阿拉里克的同盟协约。

但是，人们常常会憎恶那些把自己不想看到的现实摆在自己面前的人，憎恶的原因只在于这人这样做了。投反对票的议员自是当然，那些不得已投了赞成票的议员看斯提利科的眼神也与以前不一样了。那看着自己联军总司令的眼神，好像是现在刚刚想起斯提利科也是蛮

族出身一般。而且，他们为自己感到气恼，因为他们不得不在另一个蛮族人的说服下，同意与一个曾经企图入侵意大利的蛮族结为同盟。

狄奥多西皇帝也曾不但给昨天还是敌人的蛮族居住的土地，还支付了佣兵费。但是狄奥多西是皇帝，父母又都是罗马人。如果斯提利科是罗马人的皇帝则情况不得而知。然而，斯提利科虽是联军总司令，但他出身蛮族。由他说教只有与蛮族共同奋斗才能拯救罗马帝国，而议员们却不得不同意，这种现实也是苦涩的。这个现实把议员们推向憎恨斯提利科的一面去了。议员们的感觉是，你一个蛮族，怎么知道罗马精英的心情?

可是，只要稍稍一想就可以知道，这点根据也相当薄弱。5世纪的罗马元老院议员中没有一个出身于元首制时代传承下来的门第。西马库斯家族被认为是4世纪到5世纪间的名门贵族，在100年前的3世纪也并不出名。这位称协约将导致奴隶化而反对到底的兰帕迪乌斯，也是这时首次登上罗马史的舞台，也许是最近刚刚进入元老院。

在罗马，不论是共和时代还是元首制时代，在元老院的发言并不是以“各位议员”开头的，惯例是以“各位父老，各位新人”开始的。相当于现代国会的元老院不会由被王政时代尊为建国之父的300个家族的后代所独占，是向“各位新人”敞开门户的。这样可以经常给容易僵化的统治阶级注入新鲜血液。5世纪的元老院议员中加入新人的概率也相当高。

元老院议员和斯提利科都是帝国统治阶层的新加入者，这一点他们之间没有不同。他们与当时很多罗马人一样，体内流淌的血液或许有一半是蛮族的，但元老院议员们的父亲是罗马人血统，而斯提利科虽然母亲是罗马人，但父亲是汪达尔人。这是他们元老院议员与斯提利科之间仅有的不同。这就像即使是与用人所生的孩子，只要父亲是君王，他就是王子的情况一样。把《圣经》译成拉丁文的圣哲罗姆那样的有识之士把斯提利科称为“半蛮族”（semi-barbarus），以区别于其

他蛮族。但在普通人看来，这个“半蛮族”，也是“蛮族”。如今，元老院议员们第一次苦涩地体会到，自己已经被这个“蛮族”事实上统治了长达13年之久。

孤立

投向斯提利科的敌意不只充斥在元老院的会场之内。斯提利科的妻子赛妮娜这个时期也逗留在罗马。近来，这位赛妮娜也开始反对丈夫。赛妮娜是先帝狄奥多西的侄女，被狄奥多西收为养女后嫁给斯提利科。夫妻二人育有二女一子。在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宫廷里，因嫉妒而起的反斯提利科的阴谋犹如家常便饭，但都被赛妮娜用稳健的手段收拾在了萌芽状态之中。这看上去很理想的一对，也在婚后第25个年头出现了分歧。也许作为皇室的一员，赛妮娜认为，丈夫试图把蛮族纳为伙伴的政策就是蔑视帝国的政策。与身为天主教徒却一次都不曾镇压过异教异端的斯提利科不同，赛妮娜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信徒。而丈夫试图与之结盟的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却是信奉阿里乌斯派基督教的。这一教派被天主教派定为异端。这也许就是赛妮娜突然变心的真正原因。

较之于罗马，明确反对斯提利科、主张免谈与异端联手一事的是比任何地方都狂热的天主教城市米兰。也许是安布罗西乌斯生前的说教在这里起了作用吧。更糟糕的是，米兰居民的反斯提利科情绪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内心想法上。



斯提利科（右）与他的妻子和儿子（左）

“联军总司令”斯提利科指挥的罗马军队在意大利的营地位于意大利北部的帕维亚。从帕维亚到北面紧挨着的米兰，距离不过30公里。给帕维亚驻军基地运送军粮的是米兰商人，士兵们在假日欢娱的去处也是米兰。认为与可憎的蛮族结盟就是反对基督教义的气氛在整个米兰弥漫开来。这种气氛侵袭到帕维亚只是时间问题。

斯提利科受到元老院阶级的敌视，又被妻子反对，还被占下属士兵半数的罗马兵说成是卖国贼。但那些蛮族和奴隶出身的士兵一如既往地对他奉献着忠诚。他们的营地在博洛尼亚。公元408年春天，留在斯提利科身边的自己人就是宿营在博洛尼亚的这些士兵和帕维亚军营的将官。身为军队高官平常却都在最前线，从他们身上人们已经看到了西罗马帝国防御力量的极限。



霍诺里乌斯

可是，在公元408年春天的这段时期，皇帝霍诺里乌斯究竟怎么看斯提利科还不明了。霍诺里乌斯已经23岁，但一直待在拉文纳闭门不出。他即位已经13年，事事按照斯提利科所说的行动。正因为如此，

找遍了当时的记录，人们没有发现一句接近于他的想法的记载。也许他原本就没有什么想法。

不过，对斯提利科不利的状况已经出现。斯提利科的长女玛丽亚嫁给了霍诺里乌斯，但没有生子就去世了。之后，次女晋为妃子。玛丽亚是公元408年去世的，长女与次女的交替也一定是在这年春天完成的。霍诺里乌斯皇帝根本不愿与这位新妃同床。不过他并没有疏远新妃的父亲斯提利科。终于，有件事使霍诺里乌斯表明了态度。

东罗马帝国皇帝阿卡狄乌斯于5月初去世的消息传到了西罗马帝国。霍诺里乌斯和斯提利科在7月份得知了这一消息。

阿卡狄乌斯肉体上、精神上都很孱弱，身为皇帝却不能治人，反而受治于皇后及宫廷里的官僚。他也和弟弟霍诺里乌斯一样，只是一位坐在虚位上的皇帝，31岁便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但是，优多克西娅是一位干练的女性。她不单是个妃子，还正式取得了皇后的称号，并早早地确立7岁的儿子继承皇位。她自己则决定成为7岁的狄奥多西二世的摄政者。一切落实之后，这才把东罗马帝国皇帝去世的消息通知西罗马帝国。

接到消息，霍诺里乌斯难得地表明了自己的想法，主张去君士坦丁堡，帮助年幼的外甥进行统治。不过这只是表象，真实的意图是趁皇帝年幼，把东罗马帝国的皇位据为己有。

斯提利科反对这样做。反对的理由是，西罗马帝国正遇时艰，关键时刻皇帝不可不在。这个主张合情合理。但这也是表象，其本意在于当今反斯提利科的气氛甚嚣尘上，唯有霍诺里乌斯具有使斯提利科得到承认的力量。

皇帝能够维持皇位而与其能力无关，靠的是皇权神授说。正如君士坦丁大帝所洞察的那样，让谁即皇位乃神的意志而非人的意志。正

因为如此，君士坦丁才承认并竭力振兴基督教。由于皇帝对凡人而言是“不可接触者”，无能的皇帝也能维持皇位的理由才会成立。不过，因此规避了皇帝更迭带来的政局不稳也是事实。由于这个原因，不管谁当皇帝都能成为“关键”人物，而与其能力如何并无关系。

然而，互相不说出本意而只靠面上的理由去应付对方，这样的人际关系即使能够解决问题，却不能不留下隔阂。斯提利科以理来驳，霍诺里乌斯不得不收回自己的说法。但他开始憎恨从10岁起就一直保护着自己的斯提利科。他原本懦弱，在有生以来第一次的主张遭到反对后反倒强硬起来。这13年来一直处于良好状态的皇帝与联军总司令的关系，突然冷却了下来。而这个变化，把机会和能量赐给了皇帝身边的宫廷官僚们，他们开始进攻长年难以对付的斯提利科。

计谋

单凭奥林庇乌斯这个名字，就知道他有可能出身于希腊，是奴隶出身的宦官。这人以前的经历全然不为人知，不知何时成了霍诺里乌斯宠幸有加的心腹。为了彰显自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还特别热衷于慈善事业，受到被天主教徒尊为“教父”、后来被列为圣人的圣奥古斯丁的热情赞誉。这个奥林庇乌斯向皇帝的耳朵里吹风说，斯提利科致力于西罗马帝国的防御并不是为了保卫霍诺里乌斯，而是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当皇帝。

23岁的皇帝想起了前几日的事情，斯提利科请求为自己的儿子迎娶皇帝同父异母的妹妹加拉·普拉西提阿为妻。依稀的疑惑已经变得肯定。数日后霍诺里乌斯离开罗马北上，经博洛尼亚去帕维亚。皇帝出发时公布的此行目的是前去激励博洛尼亚和帕维亚两个罗马军团基地的士兵们。联军总司令斯提利科与皇帝同行到了博洛尼亚。奥林庇乌

斯主张，其后的帕维亚之行皇帝可以单独前往，霍诺里乌斯也表同意，斯提利科便留在了博洛尼亚。

皇帝霍诺里乌斯虽然意志薄弱，但不是坏人，没有迹象表明他事先知道在帕维亚等待他的是什么，也不像是他知道一切后才去的帕维亚。这些一定都是以奥林庇乌斯为首的宫廷官僚们设下的计谋。

5世纪初叶那个时期，意大利中部主要城市之一博洛尼亚（罗马时代的名字是博诺尼亚）是非正规军的宿营地。从那里沿埃米利亚大道向西北走，就能到达意大利北部的帕维亚（罗马时代的名字是提契努姆），这里是正规军的宿营地。这样的配置源自斯提利科首先在意大利北部迎战北边入侵的蛮族，接着在意大利中部将其完全击破的战略。所以，博洛尼亚的军队由斯提利科指挥，帕维亚的军队则由深得斯提利科信任的将军指挥。

这是霍诺里乌斯即位13年来首次访问军营。在帕维亚，从司令官到每个士兵都已万事俱备，整装以待。

兼任军队最高司令官的罗马皇帝访问军营，都要有高官随从左右，各部队将士以分列式行进，走过皇帝面前接受检阅。检阅完毕后，皇帝要向列队的将士训话，进行鼓励。这已成为惯例。霍诺里乌斯坐在高坛上的御座里，左边站着宫廷高级官僚，右边站着军营的司令官和大队长。

士兵们很快开始行进受阅。检阅到中间时，正在一边敬礼一边行进的一队士兵突然混乱起来，单手持剑，向并排站在皇帝右侧的司令官和大队长们袭来。

军队高官们身上穿的不是实战用的防御功能完美的甲胄，而是更加重视美观的仪式用甲胄。在这场众多士兵发起的出乎意料的袭击中，军官们受到利剑突袭，无人能够护住自己的身体。骑兵总司令倒

下了，步兵总司令也横在了血泊之中。军营的兵站最高首领也成为血祭者，甚至连基地的财务官也遭到杀戮。帕维亚军营的高级军官全部被杀。这些人可个个都是斯提利科从小培养起来的。在其他士兵目瞪口呆根本无法出手的瞬间，在面色惨白、跌坐在御座上发抖的霍诺里乌斯面前，清洗斯提利科派的行动便已大功告成。然后，奥林庇乌斯面对士兵，替因恐惧而发不出声的皇帝传达了圣旨，他表示，被肃清的高官们正在策划暗杀皇帝的阴谋，打倒这些重罪犯的士兵受到赞赏。士兵们近来一直耳闻天主教徒非难斯提利科，听了奥林庇乌斯转达的圣旨，心里开始接受这样的事实。

这一事变立即被报告到了相距200公里的博洛尼亚。这一定是斯提利科派的某位队长成功逃脱，快马加鞭前去报告的。斯提利科越晚知道事变的情况，对奥林庇乌斯及其同党就会越有利。

我们完全不知道斯提利科得知这一消息后有怎样的感慨。以记录斯提利科言行为己任的诗人克劳狄安已经不在，斯提利科自己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仅从反斯提利科派留下的片断记载推测，事情进展是这样的：

博洛尼亚军营的非正规军将士是蛮族出身的雇佣兵和奴隶出身的士兵。这些将士一致决定站在斯提利科一边。他们派出代表去见斯提利科，在难掩悲痛表情的斯提利科面前明确表示，如果与帕维亚军队作战，哪怕对手是皇帝的军队，他们也将在斯提利科手下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斯提利科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听着，默默地回去。这位年届48岁、蛮族出身的罗马将军有生以来第一次直面重大问题。

帕维亚的部队清除了斯提利科派以后，已经群龙无首。如果斯提利科亲率博洛尼亚的军队前往，是很容易取胜的。但是，如果他贸然行事，那他就不是罗马人了。

底线

13年前，斯提利科被悟到死期即至的狄奥多西皇帝叫到床边，受托保护身后17岁的阿卡狄乌斯和不满10岁的霍诺里乌斯。斯提利科向弥留之际的皇帝发下誓愿。如果现在向皇帝霍诺里乌斯进军，就将违背当时的誓约。对属于领导层的罗马男人而言，遵守誓约是超越法律的“道德”（moral，词源是拉丁语“mores”）问题。当时，道德的重要性似乎已经下降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可是，斯提利科视为楷模的不是与他同时代的罗马人，而是昔日的罗马人。

而且，作为部下，向自己曾起誓效忠的皇帝引弓，他就不成其为罗马武将了。罗马人最重视遵守誓约，因为他们相信，即使地位有高低之差，武将之间严守誓约是罗马军队区别于其他任何民族军队的特质。尽管这种情况也已经成为过去，但对斯提利科而言，这一点儿也没有过时。

紧跟其后的第三个问题对斯提利科而言尤感强烈，因其父亲是北方蛮族汪达尔人。

在身为罗马人母亲的身边接受罗马式教养，刚刚20岁出头，年纪轻轻就得到狄奥多西皇帝的提拔，此后25年如一日，他一直都是作为“罗马人”（romanus）度过的。在狄奥多西死后的13年中，他一面守护着幼小的皇帝，一面致力于西罗马帝国的防御。他认为，自己比同时代任何罗马人还要“罗马人”，一直守护着他的罗马帝国。如果他现在举兵，就是要推翻罗马帝国。这意味着他不再是“罗马人”，这是“蛮族”的所作所为。这一点他不能容忍，他不能忍受在做了48年“罗马人”之后再回去做“蛮族”。

可是，如果不就此奋起，自己就将毁灭。是不奋起而灭亡，还是奋起而作为蛮族活下去呢?

人总有一条绝对不可让步的底线。底线因人而异，没有客观性可言，既不能用法律去约束，也不能通过宗教去说教。这是每个人自认为好的生存方式，而不是探求普遍真理的哲学。用拉丁语说，这是“stilus”（范儿），也就是意大利语的“stile”、英语的“style”。有些东西在他人看来并不重要，但在自己看来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一旦他想改变这些东西，那他就不再是他自己了。

尤里乌斯·恺撒在他命运之日的3月15日以前一个多月，就已经知道自己已处于一种阴谋之中，只是不知道这个要推翻自己的事件会在何时何地发生。他在参加由他召集、定于3月15日开会的元老院会议时，没有采取任何自我防卫措施。元老院议员参加会议不佩短剑，在罗马是自古以来的传统。

在自己身边配备卫士，或对每位前来元老院的议员一一搜身，这些都是怀疑承担罗马国家职责的元老院议员人格的行为。况且，自己是绅士，就要把别人也当做绅士对待。与此相反的行为，即便是保护自己，尤里乌斯·恺撒也是绝对不会做的。

然而，就是在那一天，布鲁图和他那一派的14位元老院议员在镶有表示元老院议员身份的红边白色托加下暗藏了短剑。这14个人用短剑袭击了恪守罗马元老院传统而毫无防备的恺撒。据说14人中，有人因兴奋而不小心砍到了自己的手，也在恺撒身上留下了多达23处的伤口，但其中只有一刀是致命的。

作为武将，恺撒当即就意识到那是一刀致命伤。倒下之前他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用托加下摆裹起自己的身体，他不愿在倒下时露出自己的肉体。

这就是即使到了最后时刻，也不忘保持体面、保全自身品格之人的行为。

恺撒指定的继承人是罗马帝国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他的统治时间是恺撒的10倍，参加元老院会议的次数数不胜数，但他没有一次是单独到会的。他没有让“SP”（警卫）跟随左右，也没有让人对到会的议员进行搜身检查。他尊重罗马元老院的传统，只是没有数位对自己绝对忠诚且身强力壮的元老院议员的簇拥环绕，他绝对不到会。

恺撒在为数众多的人才中选定奥古斯都为接班人，是因为恺撒在尚未建功立业的年轻人中见出了奥古斯都所具有而他人所没有的天资。而且，奥古斯都也实际证实了自己是恺撒最好的接班人，证明了恺撒对自己的提拔不谬。说他们二人创立了罗马帝国是不会有错的。

这二人天赋相同，但“范儿”有所不同。我甚至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与其说在于天资，不如说在于范儿，在于“如何生活下去的姿态”。正因为如此，“姿态”才是一个人的魅力所在，好似亚历山大大帝的魅力就在于他短暂却充实的活法。

死亡

是作为罗马人而死，还是回到蛮族而生？斯提利科难以抉择，苦恼不已。在得知皇帝霍诺里乌斯已经离开帕维亚回到了拉文纳后，他决定赌上一回。斯提利科自皇帝幼小时就十分了解他，无论如何不能想象霍诺里乌斯参与了在帕维亚清除斯提利科派的行动。斯提利科决定去拉文纳见霍诺里乌斯。

从博洛尼亚到拉文纳距离上虽然很远，但沿埃米利亚大道到里米尼，再从那里沿亚得里亚海北上，是用时最短的道路。斯提利科打算只带平时的卫兵前去，但将军们不同意，执意一同前往。这样，进入拉文纳就会引人注目。也许是担心刺激宫廷，斯提利科抵达拉文纳后

没有回家，乞宿在教堂附属的主教馆舍，并派出了请求许可面见皇帝的使者。

使者带回的答复让人迷惑，究竟是许可面见霍诺里乌斯皇帝，还是单单许可进入皇宫。总之，似乎得到了许可，但条件是只允许斯提利科一个人进宫。

斯提利科来到皇宫，自己解下佩剑交给宫中仆人，这是以前13年中重复了无数次的动作。然而，那天在他的面前，皇帝房间的大门紧闭。

23岁的皇帝根本就没有打算接见48岁的忠臣。奥林庇乌斯出现在斯提利科面前。这位宫廷官僚冷冰冰地宣读了皇帝下达的死刑诏书，理由是斯提利科犯有与蛮族共谋推翻罗马帝国罪。叛国罪在元首制时代会有辩护人参加审判，但到了帝政时代后期已经不允许这样做，一律判为立即执行的死刑。公元408年8月23日那天，斯提利科被执行了斩首刑。

斯提利科的一生就这样终结了。他的遗体去向不明，也没有坟墓。后世一位史学家写道：在霍诺里乌斯长达28年的治世生涯中，这位皇帝自己决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处死斯提利科。

空白

奥林庇乌斯被任命担任因斯提利科死去而成为空缺的“联军总司令”。得知这一消息，斯提利科派的将士们认为，在罗马军队中已经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便集体离开军营。斯提利科的长子如果还在的话大概会相伴而行。然而，霍诺里乌斯皇帝在对他的岳父斯提利科执行死刑后，便早早派人杀掉了这位与自己一道成长又是学友的年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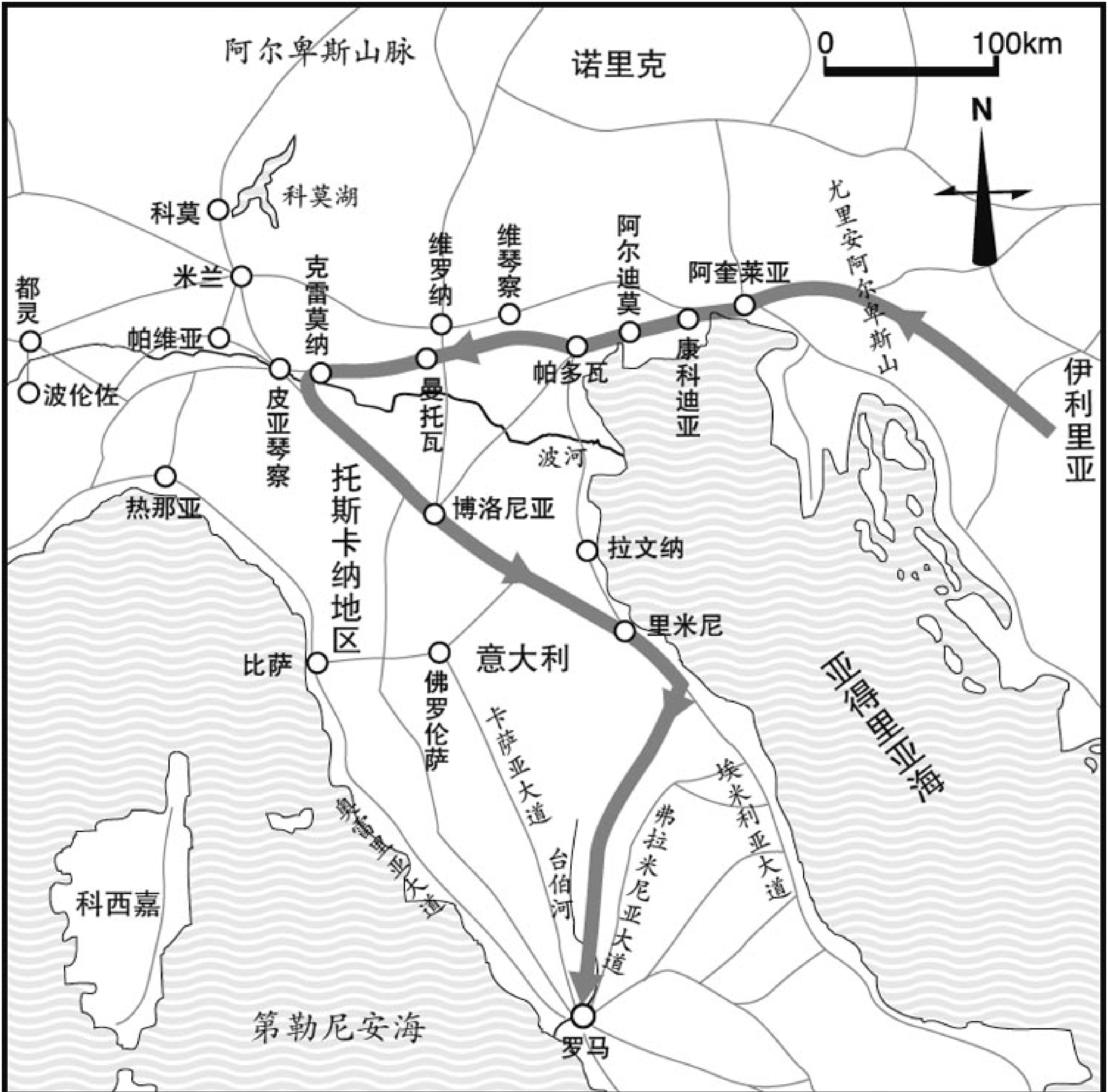
斯提利科组建并与他共同作战的由蛮族和原奴隶组成的非正规军团，在斯提利科死后烟消云散。跟随斯提利科来到拉文纳的人，以及在博洛尼亚待命的士兵，在那天早晨全作鸟兽散，一人不剩地全部离去。

他们到哪里去了呢？自然是到欢迎接受自己的地方去了。他们投奔了西哥特人的阿拉里克。也许，他们不能让步的底线就是不能为杀害自己仰慕的斯提利科一方而战。

斯提利科死后一个月，阿拉里克开始行动。加上前来投靠的原斯提利科的将士，他不过拥兵3万，作为蛮族入侵，规模并不算大。但是，他们唯一害怕的人已经不复存在。

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人和其他士兵构成的混合军队翻过隔开意大利和巴尔干的阿尔卑斯山脉，入侵意大利半岛东北部。由于有在斯提利科手下积累了作战经验的老手参战，阿拉里克军队的战法也更加合理。他们首先进攻意大利东北部的重镇阿奎莱亚。他们并不想完全占领城市，如果那样就不得不打持久战，他们抢得必需品后便移向下一个目标。阿拉里克的目的在于威慑，而不在于占领。

实际上，在攻陷阿奎莱亚之后，他们又一举攻克了康科迪亚，再过阿尔迪莫到达帕多瓦（罗马时代名为Patavium），从这里沿波比利亚大道再往南便可到达拉文纳，但因为无事需要找皇帝，他们甚至没有向拉文纳派出先头部队。他们没有继续南下，而是转而向西，在克雷莫纳（罗马时代也叫此名）渡过了波河。



公元408年阿拉里克入侵意大利

阿拉里克在克雷莫纳派出使者给罗马的元老院送去一封信。信中要求履行元老院半年前通过的与阿拉里克结盟的协约，即要求罗马按协约规定支付4000罗马磅金条。元老院通过这一协约后拖了半年还未履行，其原因是这半年的时间里，提议与阿拉里克结盟的斯提利科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元老院认为斯提利科被处死，这份同盟协约就成为一张白纸。可是，既经元老院通过，那就是国策，就不能为提议者之

生死所左右。要想推翻协约，必须在元老院重新表决。这时，道理在蛮族阿拉里克一方。

阿拉里克和他的军队渡过了波河，似乎是在附近等待元老院的答复。如果是这样，他们应该宿营在离帕维亚的罗马军营不到70公里的地方。可是，帕维亚的罗马军队明知此事却并未行动。顶替斯提利科被任命为罗马军队总司令的奥林庇乌斯和身在拉文纳的皇帝霍诺里乌斯也同样屏息不动。而阿拉里克因答复不至而不耐烦，便再次开始行动。阿拉里克仿佛根本未把帕维亚的罗马军队当回事，抛开他们朝里米尼进发，从那里经弗拉米尼亚大道一路直指罗马。已经没有任何罗马人可以挡住他们的去路。

恐吓（一）

罗马曾被敌人直逼城下。那是在六百二十年前第二次布匿战役中，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兵临城下，宿营在距城墙只有四五公里的地方。但这种经历仅此一例。汉尼拔后来也打消了进攻罗马的念头。占领城市非经持久的包围战不能成功，但打包围战他又兵力不足。

仅被阿拉里克和他的3万兵马近逼，罗马没有必要动摇。但这次罗马恐慌起来。靠3万兵力不可能合围近20公里的城墙。阿拉里克实施的不是围攻，而是封锁。他在比较重要的12处城门重点布兵，使城里人不能出城。同时，他还派兵到周边之地，让他们抢夺运往首都途中的物资。他还在南北两头封锁住流经市内的台伯河。不过，围绕着罗马全城的城墙上总共开有18座城门，此外还有不少因内外地势形成的不难通行的地方。

与帝国鼎盛时期的2世纪相比，罗马城的人口已经锐减，但进入5世纪后人口仍不少于30万。况且，元首制时代建造的仓库群仍在发挥

作用，罗马城有很高的粮食储备能力。这样，只要预测到最坏事态，作好相应的准备，建立相应的组织，罗马城是经得住持久守城战的。所以，有无抵抗力不在物质方面，而在于居民的精神方面。

罗马人在城墙上扎堆儿观看逐渐挤满城下的蛮族。他们的心情与其说是“恐惧”，不如说是面对未曾预料的事态所感到的“惊愕”。不过惊愕过后，随之而来的不是“精神上的准备”，而是“愤慨”，觉得小小蛮族，竟敢封锁永恒的罗马，简直是胆大妄为！

然而，惊愕之余，发生了粮食不足的情况。上市的粮食减少，价格暴涨，穷人最先受到冲击。

历史上没有留下封锁始于何时的史料。但从时间推移想象，阿拉里克的封锁战最短一个多月，最长也不过两个月。因为曾几何时的“世界之都”没有坚持到两个月。

元老院终于决定派两位议员去见阿拉里克，请求解除封锁，并愿意为此支付4000罗马磅黄金，亦即1500公斤黄金，这个数量与元老院通过斯提利科提议的同盟协约时相同。这回阿拉里克可不答应了，也许他认为，作为“永恒之都”，罗马的赎金太便宜了。实际上，蛮族族长阿拉里克与两位元老院议员谈判的已经不是支付给同盟者的佣兵费，而是给恐吓者的赎金。

阿拉里克说道：“罗马城内的所有金银，不管是国库中的还是在私人家中的都要统统交出来。金银以外的所有贵重品也必须拿出来。并且要解放在城市公共机构和私人家中劳作的所有日耳曼裔奴隶。”

两位议员哑然，并回答说：“如果这是您的要求的话，那您给我们留下什么呢？”

西哥特人族长若无其事地答道：“给你们留一条命！”

不过，这两位元老院议员赢得了到元老院讨论通过为止这段时间的休战。台伯河和12座城门都解除了封锁。罗马居民可以松一口气了。这期间，难掩忧虑表情的元老院议员不断讨论并反复派人去阿拉里克营地交涉。但那都不过是讨价还价而已。

接近年底时双方达成协议，阿拉里克终于作出承诺。交换条件如下：

5000罗马磅（1875公斤）黄金；

30000罗马磅（11250公斤）白银；

4000件用从东方进口的丝绸做的长袍；

3000匹绯红色手织薄外衣料；

3000罗马磅（1125公斤）印度进口香料。

当然，日耳曼裔奴隶也成为自由之身。不过他们似乎并未全部抛弃罗马投奔阿拉里克。

罗马人如此高昂的代价，只换来解除封锁。阿拉里克并没有同意成为罗马人的“同盟”，来担任罗马防御之一翼。这让人不禁想起阿拉里克向斯提利科索要的只是4000罗马磅黄金而已。

阿拉里克虽然在战斗中打不赢斯提利科，但在统率士兵方面强而有力。也只有斯提利科能想到利用阿拉里克。为了等待“赎金”，西哥特人拔寨而起，出发北去，整个过程真可以说有条不紊。罗马居民甚至感到惊讶，这时往往会发生零星的暴力行为，而他们却丝毫没有受到这种暴力的损害。但是，阿拉里克及其3万人的军队并非是撤退到阿尔卑斯山脉那边去，只是退到托斯卡纳地区，从那里可沿卡萨亚大道直逼罗马。他们要在那里过冬。

在阿拉里克撤退后的罗马，不论是元老院议员还是一般市民，都受到了难以名状的屈辱感的重击。这让他们想到若是斯提利科还活着的话……人们还不禁联想到，罗马被封锁，皇帝霍诺里乌斯竟一直龟缩在拉文纳作壁上观！这使人们将不满对着了皇帝。直到这时，拉文纳的皇宫才第一次发表了处死斯提利科的正式理由。想把死刑正当化，自然应该在行刑之后的8月末将原因公之于众。过了4个多月才公布，其本意遭到猜疑也无可奈何了。

皇帝主张把斯提利科作为“国家公敌”处以死刑，定罪依据是以下理由：

一、违背君士坦丁堡皇帝之意，反复采取行动，恶化东西罗马帝国之间的关系。

二、身任西罗马帝国公职却与敌人阿拉里克秘密勾结出卖国家。斯提利科生前享受之权力和财富均为与蛮族共谋所获得。

三、秘密策划使其子篡夺皇位。

既然是体现神意的皇帝明确所说，基督教教会便不遗余力予以支持。皇帝的诏书刚刚发布，天主教会就发出了弹劾斯提利科的布告，将斯提利科定为无信仰之徒，说他身为天主教徒却袒护信仰异端阿里乌斯教派的阿拉里克，图谋灭亡天主教国家罗马帝国。

斯提利科被世俗的权威皇帝弹劾为卖国贼，又被宗教的权威教会弹劾为无信仰之徒。但事情并未因此而结束，“记录抹杀刑”还在等着他。这是罗马的一种抹消相关人等所有记录的刑罚。公文自不必说，刻有此人功绩的碑文、为颂扬此人功绩而建于古罗马广场上的立像也都会被破坏。总之，关于此人的一切记录和记载都将被抹去。这就是“记录抹杀刑”。这个刑罚一直被珍视名誉的罗马人视为比斩首还要

不名誉的惩罚。元首制时代被处以此刑的有卡拉卡拉、尼禄、图密善诸位皇帝。他们被打成恶帝。斯提利科也被处以与他们同样的刑罚。

历史的救赎就在于同时代人和我们后世的人中都会有人抱有怀疑，他们会问：为什么对这些人的恶评竟至于此？这些人也会留在历史中，但被破坏了的雕像则是无法复原了。由于这个原因，印有斯提利科面容的物件，存世的只有一块刻有他头像的小象牙板，收藏于米兰以北10公里的小镇莫迪查（现蒙扎）的教堂里。这物件看起来就像立在书桌上的照片架一样，制作时代是5世纪，很可能为同时代的某人所拥有，说不定还是斯提利科的妻子赛妮娜的藏品呢。

不过，赛妮娜做遗孀的时间也很短。赛妮娜离弃斯提利科后移居罗马皇宫，在公布丈夫斯提利科为“国家公敌”而处以死刑的理由之后不久，她也被打成“公敌”处以死刑。赛妮娜是皇帝的义妹，在丈夫被处死后并未被立即问罪，但现在也只能把头伸给了侩子手。

斯提利科的次女已是皇妃，但以未与霍诺里乌斯结婚为由，被迫隐居修道院。基督教不承认离婚，只能以未婚处理。

恐吓（二）

只要屈服一次，恐吓就会变本加厉。阿拉里克因恐吓罗马元老院得到了丰厚的资金而名声大振，蛮族闻讯纷纷从各地而来。在公元408年到409年短短的时间内，阿拉里克的兵力就从3万人激增到了10万人。阿拉里克非常懂得如何使用暴增的军队。

公元409年春天，阿拉里克的使者造访罗马元老院，捎来了阿拉里克的话，称去年同意的是解除封锁的代偿金，而不是和平的代偿金。

使者还带来阿拉里克的意向。怎样才能使之也成为和平的代偿金呢?阿拉里克希望自己被认做是罗马的朋友，是和平的朋友。

西哥特人族长的意向实在具体，他甚至规劝元老院将此方案拿到拉文纳去，请霍诺里乌斯皇帝批准:

一、正式任命阿拉里克为西罗马帝国的大元帅。

二、约定每年提供固定数量的金条和小麦作为阿拉里克及其士兵为罗马从事军务的报酬。

三、割让达尔马提亚和诺里克两个行省给阿拉里克，作为属下士兵和家属的定居地;把意大利半岛东北部的威尼托地区分让给阿拉里克，作为其根据地。

四、把作为战略要地建在意大利北部到多瑙河地域的城寨要塞全部划归大元帅阿拉里克管辖。

这足以使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在从北意大利到多瑙河一带建立独立王国了。

与蛮族头目一同前往拉文纳说服皇帝与蛮族结盟的，不仅有元老院议员，还有一位主教。霍诺里乌斯虽然与元老院关系淡薄，却是一位信仰笃深的天主教徒。

可是，这位主教担心去拉文纳途中的安全，拒绝同行。元老院为了让主教能够安心前往，请求阿拉里克负责途中安全。罗马人在自家意大利旅行，却需要哥特人士兵来保护。

迎接元老院议员和主教的拉文纳皇宫上下一片混乱，旁观者都觉得可怜。宰相兼联军总司令的奥林庇乌斯认为阿拉里克的要求过分，主张全面拒绝。可是阿拉里克在托斯卡纳地区陈兵10万。霍诺里乌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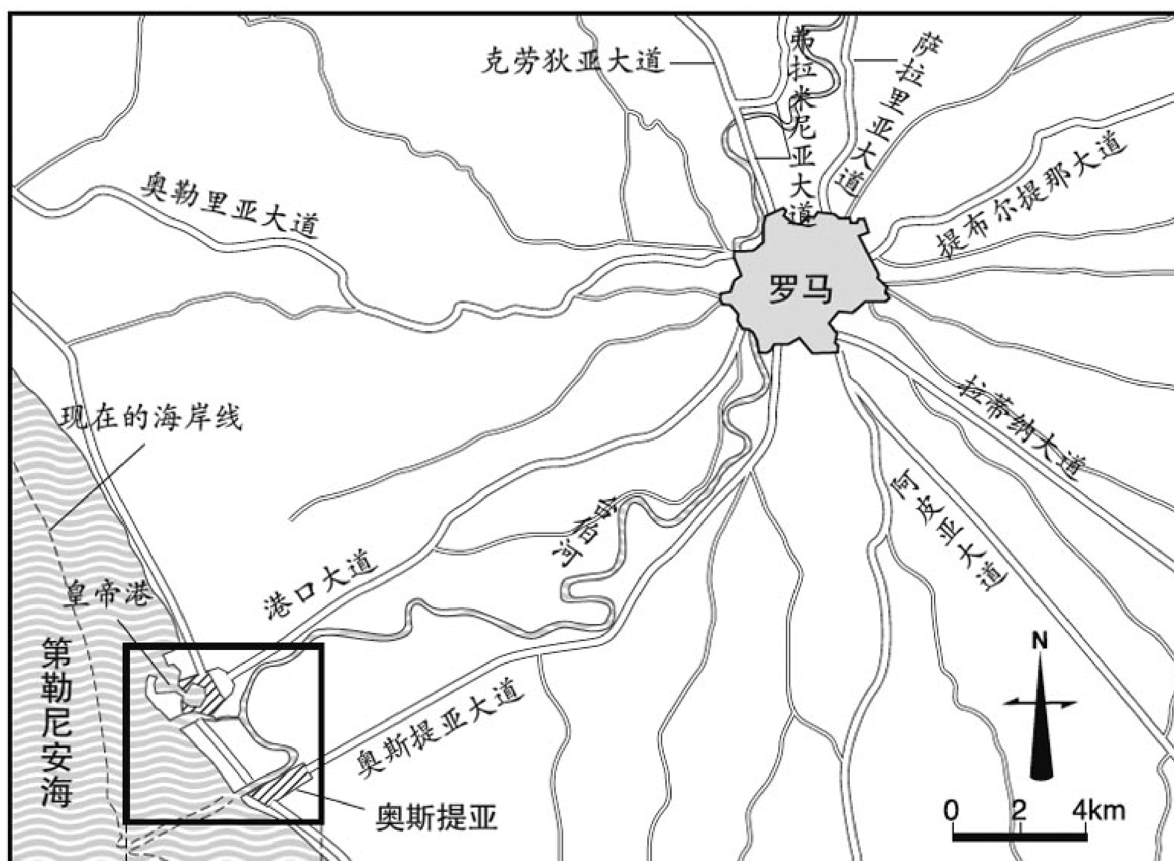
皇帝虽已24岁，但仍无主见。他所能想的，只是如何从拉文纳取海路逃往君士坦丁堡。遭到反对后，他居然说要雇用1万名匈奴兵，使人愕然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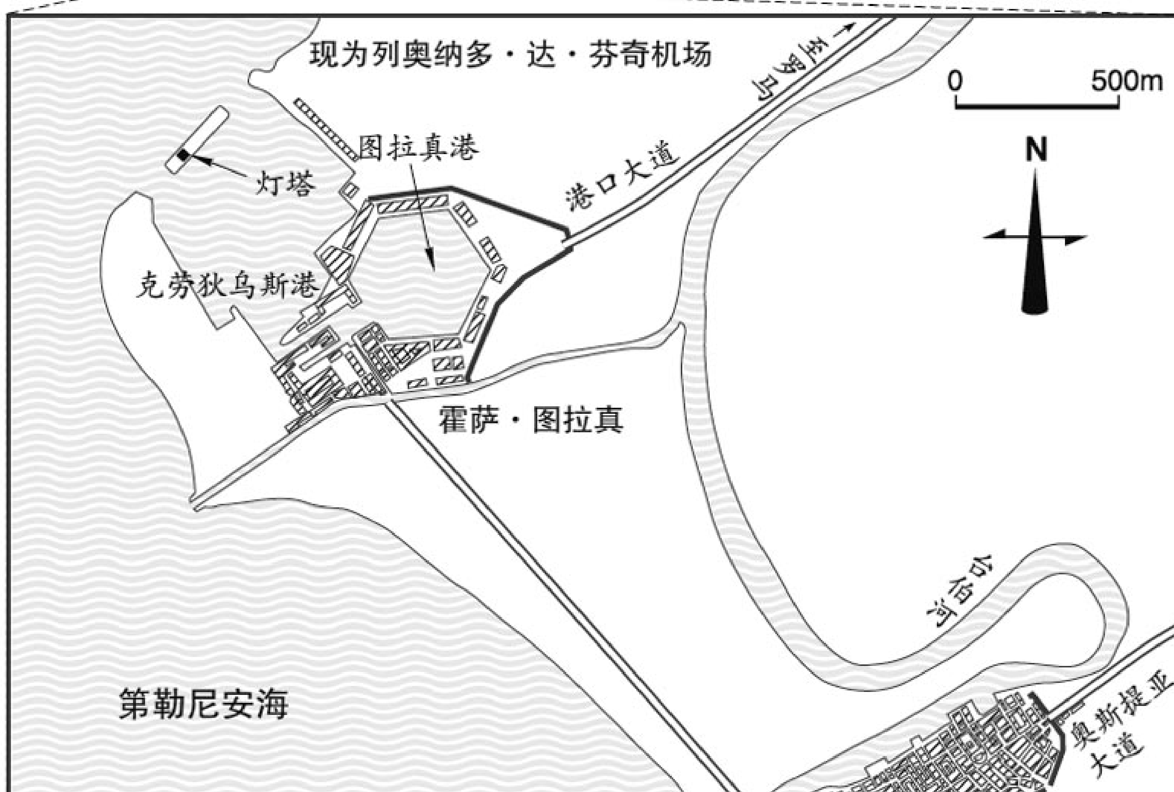
对阿拉里克的要求不知所措也在情理之中。这厢刚公布斯提利科犯有与阿拉里克共谋罪，不到3个月，那厢就要把阿拉里克迎进门来，这无论多么厚颜无耻也不能轻易办到。霍诺里乌斯皇帝为此而狂乱发飙，处死奥林庇乌斯后才好不容易把心绪稳定下来。处死奥林庇乌斯的原因没有公布。然而，就在拉文纳持续混乱期间，阿拉里克发起了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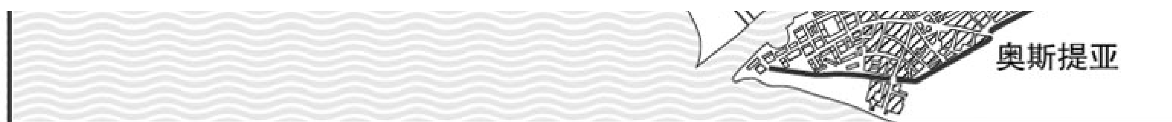
公元409年夏天，阿拉里克第二次围攻罗马。与第一次不同，这次他改变了封锁的方式。阿拉里克没有像去年那样去封锁12座城门，而是改变方针，占领了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沿卡萨亚大道南下而来的西哥特人没有围攻罗马，而是绕城一圈后，直扑奥斯提亚。

这样的战法就不是封锁了。罗马居民也许以为从北边和东边都能得到粮食补给。但那只是生鲜食品，对主食小麦一直依赖进口的罗马却不是这样的情况。这就是元首制时代的皇帝们长年致力于完善奥斯提亚港的原因所在。他们非常重视来自罗马世界的两大小麦产地——埃及和北非的小麦船队能够安全进港，高效卸货。虽然从君士坦丁大帝建都君士坦丁堡的一百年前开始，埃及产小麦就转而运往君士坦丁堡，但罗马至今仍是北非产小麦的主要出口地。北非运来的小麦在奥斯提亚卸货，阿拉里克把奥斯提亚握在了手中。他即使不在每个城门布兵，也能卡住首都罗马的脖子。

满载粮食的船只不断驶入港口。阿拉里克把港口捏在手里，兵员增加到10万人，也不用担心食物。阿拉里克盘踞了下来，他甚至没有沿连接奥斯提亚和罗马之间的两条大道派兵威胁首都居民，而是做出了更加嘲弄罗马的行为。


克劳狄亚大道
弗拉米尼亚大道
萨拉里亚大道
提布尔提那大道
奥勒里亚大道
罗马
拉蒂纳大道
现在的海岸线
阿皮亚大道
台伯河
港口大道
皇帝港
第勒尼安海
奥斯提亚大道
奥斯提亚
N
0 2 4km


现为列奥纳多·达·芬奇机场
至罗马
0 500m
图拉真港
灯塔
港口大道
N
克劳狄乌斯港
霍萨·图拉真
台伯河
第勒尼安海
奥斯提亚大道



罗马及周边道路网（上图）以及经图拉真皇帝大规模改造后的奥斯提亚港（下图）

管理奥斯提亚港的长官由一个名为阿塔卢斯的人担任。阿拉里克任命阿塔卢斯为西罗马帝国的皇帝。阿塔卢斯被拉到士兵面前，蛮族士兵以剑击盾，以这种罗马的方式表示赞同他即位。然后，阿拉里克为阿塔卢斯配备了西哥特兵卫队，把他送进了罗马。阿拉里克甚至还让他给元老院带去了推荐信，称希望元老院与这位皇帝合作，统治首都罗马。

阿塔卢斯随着哥特兵卫队穿过古罗马广场，走进矗立在广场一角的元老院会议厅，议员们起立迎接他的到来。这真是一出拙劣的闹剧。民众没有让他身陷咒骂声之中，而是用不可名状的表情看着这一切。

拙劣的闹剧不会有结果。阿拉里克试图通过阿塔卢斯间接统治罗马的企图彻底落空。这位西哥特人的头目十分恼火，他把阿塔卢斯抓来，附上一份书状，说他篡夺皇位，请随意处置。然后把他送往拉文纳的霍诺里乌斯那里。可怜的奥斯提亚长官从此不知所踪。公元409年在闹剧中结束了，阿拉里克和手下10万之众一直盘踞在离罗马只有20公里的奥斯提亚。

转眼到了公元410年上半年，应当有相当多的人从罗马逃逸。朝北的大道自不用说，就连朝南的阿皮亚大道和拉蒂纳大道也都畅通无阻，不会遇上敌人。即使不属于富裕阶层，没有大片农庄围绕的别墅，罗马人自古以来有着第二居所的置业习惯，这第二居所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自给自足。可以想象，这些罗马人每月两次离开都市去享受田园生活，对离开罗马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抵触感。

但是也有很多人与第二居所无缘。此外，还有很多人虽然有地方可去，却根本不会想到罗马会被占领。奥勒良城墙建于公元275年，从那时计算，135年间罗马从未遭到敌人的践踏。大概很多人会想，过去没有的事，今后也不会发生。虽然从奥斯提亚运不进粮食，但食物并没有断绝。敌人已经近逼眼前，但还是有很多人留在了首都罗马。这些人不是无处可去，就是仍在做梦。

“罗马浩劫”

首都罗马落入敌手已经是时隔八百年的事了。我真以为敌人围城激战后方能入城，敌人占领全市也是壮烈巷战以后的事。可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公元401年8月24日清晨，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先头部队通过自罗马向北的萨拉里亚大道上的城门潜入了罗马。这很可能是市内有内应的结果。很快，萨拉里亚门左右6座城门都被打开。蛮族潜入了这座永恒之都的北部和东部，而居住在市中心的人们并未发现他们。

罗马建国于公元前753年，至今已经度过了1163年。自古以来罗马人不能忘却的不幸事件是公元前390年凯尔特人对罗马的占领。

凯尔特是希腊人起的名字，罗马人称之为“高卢人”。公元前390年，居住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高卢部族入侵罗马，那时共和政体尚未确立。

罗马的抵抗失败，传说由7座山丘组成的罗马只剩下一座卡匹托尔山，其余全部被高卢人占领。所幸当时的敌人在抢掠后即撤离退去，罗马并未成为高卢的首都。这次“凯尔特入侵”成为罗马人不可忘却的

不幸事件，被记入了罗马历史。王政时代构筑的“塞尔维乌斯城墙”自然也因此得到了加固。

然而，公元前390年以后一直守护罗马的“塞尔维乌斯城墙”在公元前45年遭到破坏。这不是因为敌人的入侵，而是罗马人自己破坏的。这个时期的最高当权者尤里乌斯·恺撒考虑扩建罗马的大脑和心脏——古罗马广场，并付诸实施。城墙的一部分阻碍了这项工程。是改变计划，还是拆去城墙，这一问题摆在了恺撒面前。他自然选择了后者，而且也没有在外围构筑新的城墙。

他毁弃了王政时代塞尔维乌斯王建造的城墙，这座城墙七百年来一直守护着罗马。他明确说明了他的理由：首都罗马的安全应由“防线”（国界）来保卫，而不该用围绕首都的城墙来保卫。这条理由后来逐渐演变为罗马帝国的基本防御战略。

后来在公元275年，奥勒良皇帝建造了一直留存至今的“奥勒良城墙”。这样，罗马有310年时间一直生存在没有城墙的环境中。如果有人问“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起于何时终于何时，我会这样回答：那就是首都罗马没有城墙护卫的那段岁月。

公元275年奥勒良城墙建成后，罗马也有很长时间未遭兵燹。奥勒良皇帝知道帝国防御力量的现实，帝国已无余力向多瑙河以北布防，甚至撤出了达契亚（现罗马尼亚）。修筑保卫首都的长城，一定是他未雨绸缪的慎重对策。实际上，在后来长达135年的时间内并无敌人兵临城下。

敌人一旦迫近，城池瞬间陷落。这只能让人想起恺撒的观点，防御敌人靠的不是城墙。帝国首都罗马刚想着城墙防卫，瞬间便陷落了。

无论如何，公元410年的“罗马浩劫”是历史上著名的“大事件”。阿拉里克事先向属下士兵发布过这样的命令：

一、不杀不抵抗者。

二、不碰基督教教堂。

这样，就占领军众达10万人这点而言，其暴虐的程度还是相对较低的。这也是因为城内根本没有防守兵力。四处逃散的人群得知教堂安全，纷纷逃入教堂。尽管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属于被天主教视为异端而遭到排斥的阿里乌斯教派，但毕竟也是基督教。而罗马的很多教堂和为数众多的信徒也都是天主教派基督教徒，这一教派被尼西亚公会议定为正统基督教，主张三位一体说。不过，一般认为阿里乌斯教派要比天主教派对“异端”更宽容。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把罗马的天主教堂及其教徒都视为基督教徒，没有向他们动手。

然而，阿拉里克率领的并不仅是西哥特人。这短时间内由3万人激增到10万人的士兵当中，也有很多人信奉日耳曼民族的传统宗教，还混有亚细亚人种的匈奴人。这些人根本不问什么基督教，只要是建筑物和人，一概都是掠夺的对象。

蛮族都知道仅仅恐吓一下，罗马就拿出了5000罗马磅黄金。他们断定，只要是罗马人，无论谁家都藏有金条。蛮族会闯入并非豪宅的一般市民的公寓，抓住什么人就逼他交代藏匿财宝的地方。很多人根本没有财宝，威胁、拷问也无从交代，因而被发怒的蛮族杀害。称410年为“罗马浩劫”之年绝不会有错。的确发生了蛮族的暴行、掠夺和杀戮，还发生了很多强奸妇女的事件，甚至修女也被侮辱。当时任北非主教的圣奥古斯丁在其著作《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中写道，被强制而未经同意的性关系不构成犯罪。

公元410年的浩劫历时5天。这场浩劫时间如此之短，可能是因为这10万之众干得干净利落，而无人抵抗恐怕也是这场掠夺得以高效进行的重要原因。潜入罗马城后的第6天早晨，阿拉里克和他的10万名士兵裹挟着所有能拿的东西，南下而去。货车和无尽的人流挤满了阿皮亚大道。

离弃罗马的不光是蛮族。蛮族还裹走了他们认为可获得高额赎金的有身份之人和富有之人，其中元老院议员也不在少数。捕囚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是皇帝霍诺里乌斯的妹妹加拉·普拉西提阿的身影。

八百年未曾陷落的、长久以来被赞颂为“世界之都”的罗马遭到浩劫，这在当时也是世界性的新闻。“罗马浩劫”对远在巴勒斯坦致力于把《圣经》翻译成拉丁语的圣哲罗姆也是一个沉重打击。他不但是基督徒，而且出身于意大利本土，凭着在修道院的虔诚行为和翻译《圣经》的功劳被奉为圣人。他当时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 西方传来了令世间恐怖的消息。罗马被围，人们被迫交出黄金以换取生命。被浩劫后再遭进攻，不光一无所有，甚至丧失生命。现在我正在口述此信，声音因悲痛而颤抖，泪如泉涌，咽喉哽咽，出声不得。
>
> 这座称霸世界、把全世界置于自己统治之下的城市，如今却屈膝在蛮族面前。啊，上帝啊！无信仰的暴徒把手伸向了您的遗产，冒渎了您建设的神殿！

没人知道阿拉里克离开罗马后会去何处。蛮族沿阿皮亚大道一路南下，沿途不断抢掠。在加普亚离开阿皮亚大道，去了诺拉。也许他们打算沿第勒尼安海到意大利南部，渡海前去盛产农产品的北非。



圣哲罗姆（列昂纳 多·达·芬奇画）

然而，时间已经不允许阿拉里克这样做了。他与斯提利科同辈，公元410年也应有五十开外。他一路南下，沿途观赏着呈现在右边的第勒尼安海，却在途中突然病倒，死神降临。据说他的埋葬是按照对待日耳曼民族酋长的方式进行的：截断河流，在河床上挖坑，安放装有遗体的棺材，埋葬后再使河水复流。当然，截流和挖河的俘虏们在下葬后统统被杀，这是北方蛮族的风俗。

阿拉里克死后他的一位叫阿道法斯的亲戚继承了他的位置。这位阿道法斯似乎与罗马元老院之间有秘密交涉，制定了“打开僵局的政策”。也许罗马方面又付了钱。西哥特人的新头目阿道法斯停止向意大利南部挺进，带着属下人马掉头去了法国南部。在折回的路上，许多捕囚交付赎金后恢复了自由。但阿道法斯唯独没有放走皇帝的妹妹——加拉·普拉西提阿。进入高卢南部之后，他与这位公主结婚。不知何故，这位哥特人新郎是穿着罗马托加出席的婚礼。

离开罗马的人们

公元410年的“罗马浩劫”也使幸存的人下决心离弃罗马。纳马提安努斯也是其中之一，他决定回到自己的故乡高卢去。

后世只知道鲁提利乌斯·纳马提安努斯是位诗人，他留下了一篇题为“回故乡”（*De reditu suo*）的长篇诗歌。他是行省出身的高卢人，来到罗马后曾任重要公职，是一位“公共人物”。他甚至出任过首都罗马的最高行政长官——“首都长官”（praefectus urbi）。他的情况并不算例外。行省出身者来到首都，历任公职，进而形成国家新的领导层，这在罗马帝国是自元首制时代以来的传统。

实际上，5世纪前半叶西罗马帝国的权势人物艾妮希亚家族和西马库斯家族都是“新贵”（homo novus），在此前一百年的罗马史中尚未

登上历史舞台。艾妮希亚家族被认为是5世纪罗马首屈一指的富豪。传说只要他把储藏的小麦和葡萄酒卖掉，就会每年得到6000罗马磅的金条。只要他愿意，在斯提利科提议时，以此收入可以全部雇用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与艾妮希亚家族相比，认为年收入约1500罗马磅黄金的西马库斯家族属于中等富豪也大体不错。而西马库斯家族在教养方面堪可代表罗马。这两个人都是元老院议员。当过“首都长官”的纳马提安努斯理应也是元老院议员。说到财力，人们只知道他在高卢拥有大庄园；说到年龄，人们也只知道他40岁上下。

长篇诗歌《回故乡》如今只留下一些残篇，一读之下就知道作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隐异教徒”。此诗创作于公元416年，在确定基督教为唯一宗教、其他均为邪教之后已经过去了20个年头。《回故乡》不惜笔墨讴歌了对罗马帝国的爱，却看不到基督教的一丝影子。这位高卢出身的精英，对自己是罗马人坚信不疑，并以此为荣。

鲁提利乌斯·纳马提安努斯留下的长诗*De reditu suo*具有“异教拉丁文学绝唱”的价值。诗歌名定为“回故乡”，是因为这首长诗是作者在回故乡的船上，怀想着消失在身后的罗马和意大利而创作的。还未到引退年龄的鲁提利乌斯回故乡去，是为了重振他因西哥特人入侵而遭受巨大灾难的农庄。此时此刻，他对再见罗马只会感到绝望。《回故乡》成为罗马人对罗马帝国的最后诀别之歌。让我给大家介绍几个残留的片段吧：

> 啊，罗马哟！你长久以来就是世界的女王。你是诸神之母，是众多优秀罗马男儿的母亲！
>
> 你崇高伟岸的身影，永远不会在人们心中消失，就像太阳永不消失一样。你赐予人们的文明，遍及罗马世界的每个角落，就像阳光普照大地一般。灼热的沙漠，冰冻的北海，不能遮挡你的光芒。无论何方，只要有人居住，罗马都会浸润其邦。

罗马哟！你统合了众多民族和部落，形成一个国家；你教会他们享受法律带来的公正。的确，当初我们被征服，可不久我们就切实感到生活在罗马的好处。你军力强大却不穷兵黩武，你更懂得如何有效地使用军力。居住在罗马帝国的人们，在罗马的法度之下，保持着自己的固有风俗，同时学会了与不同文化的其他民族共存共存。罗马帝国是汇集多民族的联合国。

古往今来，几多帝国诞生灭亡。只有罗马帝国留给后世的伟大卓尔不群。罗马带来的和平，不是忘乎所以的自信所赐。罗马的荣耀不仅源于个人，而且源于整个帝国的才智。罗马成为统治者，是因为她具有统治的资质。

罗马在不久以前已无法从苦恼中站起。然而，有朝一日，罗马必将伤愈，力量必将重回四肢。逆境是兴盛的前奏，废墟是复兴的前夜。

罗马的敌人已然在高奏凯歌，但他们落魄的一天终将到来。连那汉尼拔，终究也只能叹息自己的成功不再。

敌人也许想使罗马永为废墟，但终有一日罗马会涅槃般地获得重生。曾经丰饶而今荒芜的莱茵河畔哟，总有一天人们将回到你的身旁。尼罗河沿岸出产的小麦终将重新运往西方。那时节，意大利甚至全欧洲都会盛产葡萄美酒，质优而量多。

公元416年秋，诗人从奥斯提亚上船，一路经停奇维塔韦基亚、比萨和热亚那，驶向高卢南部。在航行的旅途中，这位四旬壮年汉子胸中思绪无限。诗人在高卢登陆后便不知所踪，杳无音讯。



第二章
罗马帝国的灭亡

（公元410—476年）

进入罗马的11条水道桥之一的克劳狄亚水道桥

发生于公元410年夏天的“罗马浩劫”，震惊了西起不列颠、东至巴勒斯坦的整个罗马世界。当时的人们把这个事件感知为罗马帝国事实上的崩溃。“浩劫”过后，霍诺里乌斯皇帝立即向驻扎在西罗马帝国全境的全体总督、军队指挥官和法务官送去了如下内容的诏书：

> 阿拉里克及其属下的蛮族不仅烧毁了首都罗马辉煌的纪念碑，还实施暴行，抢走了居住在罗马的人们手中的一切。
>
> 因此，帝国已经没有经济和军事力量回应行省的请求。从今以后，各行省可以依赖的只有自己。朕相信，你们自有力量完成使命。

“罗马浩劫”刚过皇帝便立即发诏，这只是一种说法，至今没有发现史料可以确证此事。这也许是当时流布的一种传闻。但是，如果在当时那个时期确实发出了这份诏书，那问题将非常严重。果若如此，从公元410年开始，西罗马帝国就已经不复为帝国了。

霸权国家的职责

帝国并不是因为拥有可以统治其保护伞下各民族的军事力量才成其为帝国的。只有尽到保卫伞下人民的职责，人民才会接受帝国的统治。无兵无钱，国家不能再尽保卫人民的职责，今后让人民自己保卫自己而抛弃人民，那么国家就不再是帝国了。西罗马帝国的崩溃是在公元476年，但在公元410年时实际上就已经崩溃了，生活在公元410年

的人们大概已经感觉到了。正因为如此，即使离罗马很远的边远行省的人们也感同身受，为这“永恒之都”的不幸而悲叹。

在800年的漫长岁月里，敌人未曾踏入罗马城一步，而这正是罗马帝国强大的象征。

公元3世纪以后，“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不再发挥作用，帝国范围内的主要城市，不论是叙利亚的安条克，还是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帝国西部则不论是不列颠的伦敦，还是高卢的巴黎、里昂，亦或是日耳曼西部的波恩、科隆，都有过敌人侵袭市内、百姓涂炭的经历。东部被波斯和沙漠游牧民、西部被北方蛮族践踏暴虐的例子不一而足。在帝国本土的意大利，阿奎莱亚、米兰、维罗纳也无不受到伤害。建都不足百年的君士坦丁堡也曾受到因撕毁佣兵合同而暴怒的蛮族短暂侵略。只有罗马在公元410年之前的800年间一路走来，未受伤害。

进入帝国的最后世纪5世纪以后，罗马的人口也减少到2世纪鼎盛时期的五分之一。帝国的国境“防线”已是千疮百孔，几乎全被消灭，只有“世界的首都”还在延续着安全神话。

公元410年浩劫之后不久，不少外出逃难的人回到罗马。大概他们认为，震惊世界的“罗马浩劫”只是单独偶发的事件。可是，不论是北方蛮族，还是本该是同胞的东罗马帝国，都成为敌人，一次次打来掠夺。到了这种时代，罗马城市的人口开始锐减，终于减少到了鼎盛时期的十分之一。

这时，“罗马浩劫”已经不再是世界新闻，而成为地方性新闻。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会有一个时间过程。公元410年后不久的罗马人，还似乎认为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对“永恒之都”的暴行是不幸的偶然事件。阿拉里克死后接班的阿道法斯和西哥特人已经离开意大利到法国南部去了，至今还未见到他们之后有蛮族南下的影子。

从处死斯提利科到“罗马浩劫”的两年中，皇帝霍诺里乌斯明知蛮族的洪流滚滚而下，直指罗马，却躲在拉文纳作壁上观，这时他也积极行动起来，要重建浩劫后的首都。

他首先决定紧急从北非进口小麦，供应给住在自己的城市却已成为难民的人，并立即付诸实施。

其次，在城内各处开始重建被破坏的公共建筑。但现在全体市民都是基督教徒。所谓的公共建筑重建工程，除了修补直接影响市民安全的城墙和城门之外，优先重建的是教堂及其附属宗教设施。

首都罗马采取了针对公元410年损害的复兴措施，这些做法也扩大到了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经过的意大利中部和南部。

帝国决定对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人5年内免征特别税。尽管帝国末期税制混乱，无从明确何为特别税，但毕竟免税了。地租税和人头税等一般税种则在5年内税率减至五分之一。

此外，还允许邻近的农民耕种因主人未归而被闲置的耕地。这件事表明，蛮族所经之处有不少人失踪。

另外还决定，不再追究与阿拉里克军队合作而遭到谴责的人的罪责。这大概是受到武力胁迫不得已而与蛮族合作的人数量太多的缘故。

霍诺里乌斯皇帝本人在“浩劫”的两年之后，于公元412年访问了罗马。但他的访问不是为重建打头阵，而是为了接受元老院议员和市民对皇帝关心重建的感谢。

据说至少花了7年时间，罗马才从阿拉里克留下的惨状中重新站立起来。从公元410年到417年的7年间，霍诺里乌斯的皇位得以安泰，并不是因为霍诺里乌斯从26岁成长到32岁，改变了心态，尽到了皇帝的

职责。一句话，这是因为比其他蛮族对意大利半岛安全威胁更大的高卢与入侵的蛮族之间形成了自相残杀的局面。

不断发展的蛮族化

高卢于四百六十年前的公元前1世纪被尤里乌斯·恺撒征服，以后长期被称为罗马化的优等生，文明不断发展。可是进入公元5世纪以来，高卢一再被蛮族入侵，事实上帝国的统治鞭长莫及。莱茵河长期以来一直发挥着帝国“防线”的作用，现在却没有一个能够迎战蛮族入侵的军团基地。在波恩、科隆、美因茨、斯特拉斯堡，曾经挤满罗马兵的兵舍现在杂草丛生。入侵的蛮族对这些帝国边境城市不屑一顾。与其说是“不屑一顾”，还不如说是“无法一顾”更合适。他们也是被匈奴人这个新来蛮族逐出后才向西入侵的，如果渡过莱茵河就在附近落脚，就有再次被匈奴人轰赶之虞。于是，他们入侵高卢，把所有障碍全部毁掉，把一切能抢的东西全部抢走，然后向高卢纵深挺进。日耳曼民族系各部族都是如此。他们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渡过莱茵河后，便在高卢内部发生了冲突。

从莱茵河下游入侵高卢的法兰克人把势力扩张到了整个高卢北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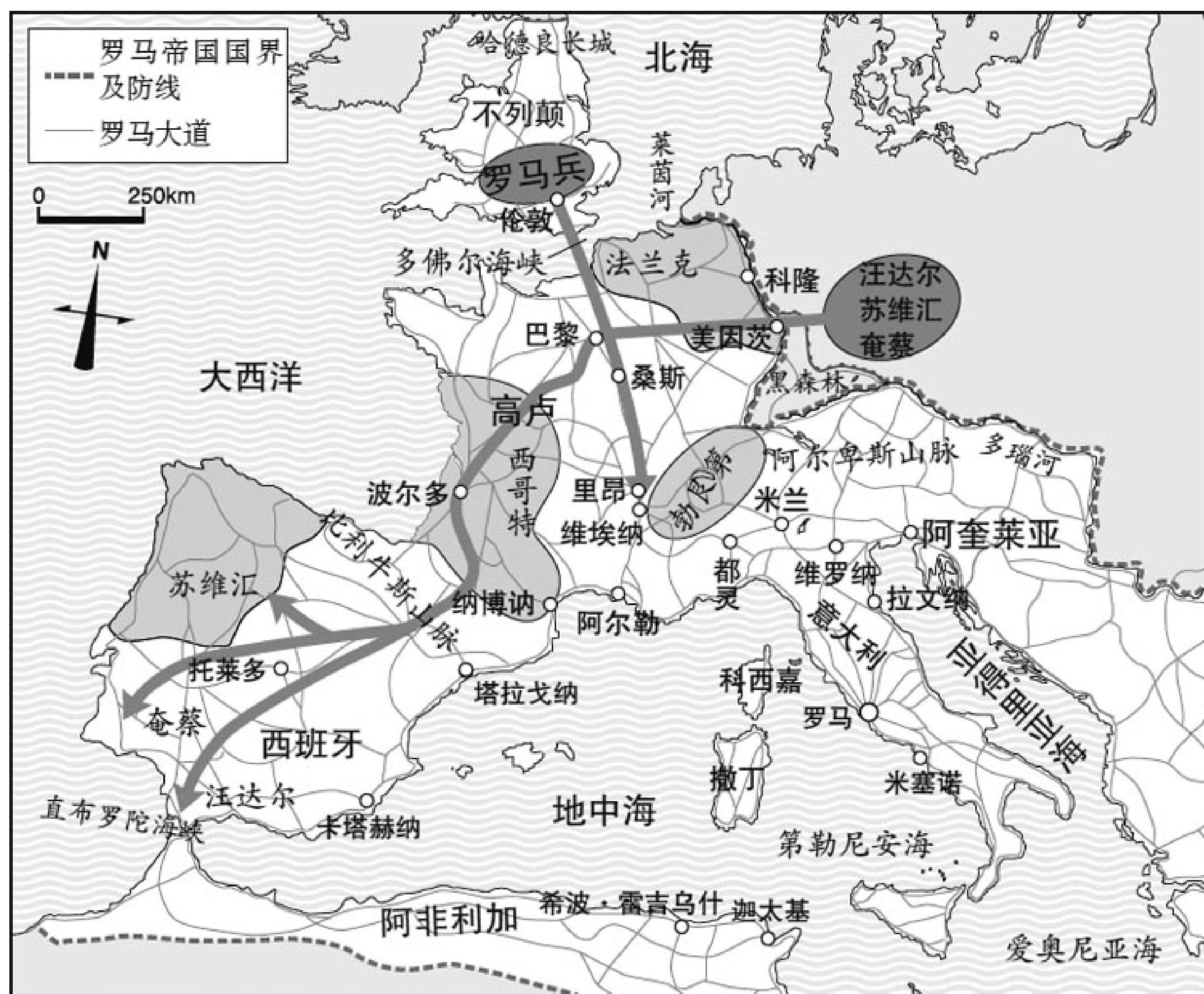
汪达尔人从莱茵河中游入侵高卢后，在广袤的高卢大地，从东北向西南横扫，边抢边走，终于翻过了高卢和西班牙分界线的比利牛斯山脉。

只有同样从莱茵河中游入侵的勃艮第人自知人数有限，在高卢东部落脚，就此定居下来。勃艮第地区的地名也许来源于此。

苏维汇人居住在日耳曼，自元首制时代就以蛮族而闻名。他们在5世纪的蛮族大入侵的浪潮中也不甘落后。这个部族从莱茵河上游入侵罗马帝国境内，斜穿高卢，烧杀抢掠，与先到的蛮族之间发生了武力冲突。他们打败就逃，翻过比利牛斯山脉，来到了西班牙西北部。

稍稍一看便知，5世纪初叶的高卢充斥着蛮族，南部还遭到西哥特人的入侵，这个部族因"罗马浩劫"而名声大噪。阿拉里克死后的族长阿道法斯在纳博讷与罗马皇帝的妹妹加拉·普拉西提阿举行了婚礼。纳博讷在罗马时代称为纳博。高卢南部被后代称为普罗旺斯，西哥特人是那时的统治者。不过他们在普罗旺斯落脚并不轻松。丰饶的法国南部对从气候严酷的德意志入侵而来的北方蛮族而言，就像意大利一样充满着诱惑。

阿道法斯想要比其他蛮族占据优势，请求霍诺里乌斯皇帝承认他与公主加拉·普拉西提阿的婚姻。身在拉文纳的霍诺里乌斯断然拒绝。他担心皇统通过西罗马帝国的皇妹转移到蛮族。与蛮族结婚的公主生了一个男孩。可这位拥有皇统的男孩夭折了，这让霍诺里乌斯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西罗马帝国皇帝霍诺里乌斯年届三十却无子嗣。霍诺里乌斯先后把斯提利科的两个女儿纳为妃子，却无福得子。他在斯提利科死后便一直单身。



公元410年的西罗马帝国及蛮族分布

在帝国末期的高卢，罗马皇帝已力不从心。混杂于此并拥有独立军事行动能力的蛮族部族却有5个：法兰克、汪达尔、勃艮第、苏维汇、西哥特。所谓的混杂，不是混杂定居，而是指不断变动位置、相互争霸的混战局面。

此外，来自不列颠的罗马军队也掺和进来，情况愈加复杂。驻扎在不列颠的罗马兵面对渡过北海入侵而来的日耳曼系蛮族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已力不能支，便打着把高卢从蛮族入侵中解救出来的旗号，在身在拉文纳的霍诺里乌斯未曾下达任何指令的情况下，渡过多佛尔海峡，进犯高卢。这些罗马军的一兵一卒都由僭越称帝的君士坦丁所率领。而对拉文纳的霍诺里乌斯而言，这位君士坦丁是个篡夺皇位

者。尽管不列颠来的罗马兵在蛮族混杂的高卢格外善战，这些兵仍是贼军。

不过，还有方法使他们不再为贼军。归还皇位就是这个与大帝同名的僭越者的一条出路，但是他的条件是霍诺里乌斯正式承认其高卢方面罗马军队大元帅的地位。跟随他离开不列颠的士兵中也有不少人不满皇位篡夺者的统率，只要霍诺里乌斯愿意，这样做还是有可能的。

可是，占据霍诺里乌斯大脑的只有自己这个正统皇帝被无视的屈辱感。于是，罗马军队中唯一在高卢与蛮族真刀真枪战斗的来自不列颠的士兵们，便作为贼军一直留在了高卢。帝国方面错过了利用他们的机会。如此这般，君士坦丁终于被爆发出不满的部将所杀。这是“罗马浩劫”一年之后的公元411年冬天发生的事情。

这个时期，蛮族各部族相互混战，不列颠来的罗马兵又插上一脚，高卢已然变为战场。这种状态之下，“罗马浩劫”后的意大利自然会享受到哪怕是短暂的和平。蛮族自相残杀，也许根本没有想到要进攻意大利。由于霍诺里乌斯根本不关心重建军队，意大利半岛等于没有设防。如果这个时期进攻意大利，就可以轻易称霸。

然而，这一惨状可能因为一个人的出现而得救。这个人与不列颠的皇位篡夺者一样，是从一介士兵熬出头的武将。

此人名叫君士坦提乌斯，与因承认基督教而名垂青史的君士坦丁大帝一样，出生于塞尔维亚境内的尼什。从尼什出境后往东南方向便是保加利亚的首都索非亚。罗马时代尼什叫做纳伊苏斯，地处斜穿从多瑙河到君士坦丁堡的巴尔干中心的交通干线上。君士坦提乌斯出身低微，可能带有那个地方并不罕见的蛮族血统。不过，尽管他的母系情况不详，但至少父系是罗马人。斯提利科事件以来，霍诺里乌斯一直对任命带有蛮族血统的人担任罗马军队大元帅极度神经过敏，这次

却毫不犹豫地把罗马军队交给他，把他送到了高卢。霍诺里乌斯大概是想用由正统皇帝从意大利派来的罗马军队填补皇位篡夺者被杀后的空白。他的另一个目的是把君士坦丁从不列颠带来的士兵吸收到正统罗马军队中来。

我们不知道西罗马帝国把君士坦提乌斯派到高卢托付了多少兵力给他。意大利依然如同没有设防。即使真想托付，也无兵可托。但这位熬出头的巴尔干人仍然行动积极。不列颠来的罗马兵多数都被吸收到了这位将军的麾下。但君士坦提乌斯的兵力似乎并没多少，起初的两三年没见什么效果。

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高卢内部蛮族的自相残杀是罗马的运气。西哥特人在“罗马浩劫”以后掉头北上，把进攻方向改为法国南部，此时所受的打击比其他部落更重。君士坦提乌斯盯上了他们。他采用了从海上封锁其根据地纳博讷及其周边地区、断绝粮食来源的战略。

北面受到其他蛮族的攻击，南面受到海上封锁，西哥特人站不住脚了。不要忘记，他们要关心数万人的粮食供应。族长阿道法斯为娶到西罗马帝国的皇妹为妻而得意，却无法缓和手下士兵的不满。身在拉文纳的霍诺里乌斯非但不承认他与皇妹的婚姻，甚至对阿道法斯请求与西罗马帝国缔结“同盟”一事也不予理睬。阿道法斯进退维谷，终于翻过比利牛斯山脉，企图转移到西班牙。然而，汪达尔、苏维汇、奄蔡等部族已经渗透到了伊比利亚半岛。

最终，西哥特人杀掉了族长阿道法斯，谋求与罗马改善关系。

西哥特人的族长成功换人。阿道法斯被手下杀死，瓦里亚取而代之。罗马方面是否参与其事人们不得而知，这位瓦里亚提出了条件，把丈夫已死的加拉·普拉西提阿还给意大利，作为交换，罗马帝国向西哥特人援助粮食。从北非运来大量小麦到达的同时，西罗马帝国皇帝

的妹妹出发去了意大利。公主在“罗马浩劫”后一直生活在蛮族中间，睽别意大利已达5年之久。

西哥特人利用这个机会成功地成为罗马帝国在高卢的“同盟”。协约规定，他们在帝国境内受赐土地得以定居，而他们要追随罗马与蛮族作战。这个协约没有留存下来。我们现在只知道，他们受赐的定居地是罗马帝国行政区划中的阿奎塔尼亚II，这里位于高卢西部，西临大西洋。所谓“同盟”协约，换个说法就是佣兵关系，照理也应该有佣兵费的协议内容。由于没有留下任何记录，这方面的情况全然不详。

这样，西罗马帝国崩溃后与蛮族的共存体制——“三分之一体制”便登上了历史舞台。根据这个体制以往曾在高卢实施的记录，我认为还可能做这样的想象：此次西罗马帝国与西哥特人之间的协约就是其中的一例。

“三分之一体制”

所谓“三分之一体制”，只是我为了方便叙述而起的名称。这原来是斯提利科每次从高卢北部和中部撤军时使用的烟幕。尽管说给蛮族定居的地方，但既然在罗马境内，那里就已经住有罗马人。不可能把罗马人赶出去让蛮族住进来。如果强行这样做，必然招致帝国上下的反对。

不要忘记，公元212年颁布通称为“卡拉卡拉敕令”，正式名称为“安托尼努斯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的敕令以后，住在行省的所有人，只要不是奴隶，都拥有罗马公民权。所以，无论是高卢还是北非，住在那里的都是“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

于是斯提利科想出了一个体制：凡居住于被定为罗马“同盟者”的蛮族居住地的罗马人，一律将其所拥有的资产，实际就是耕地的三分之一分给新来的蛮族居民。一旦这个体制推广开来，仅凭被统治者支付给统治者的地租，罗马人就不必支付大家所反对的“佣兵费”了。拿出资产的三分之一以后，罗马人得到了抗击蛮族反复入侵的防御力量。当然，这所谓的防御力量也是蛮族。这是一种“以毒攻毒”的做法，其目的是通过让蛮族定居、稳定其生活基础来淡化这个“毒”。

可是，斯提利科不仅被处以死刑，还被处以“记录抹杀刑”，关于他的记录多被抹消，无法证实这个体制的真假。不过，如果与西哥特人的“同盟”协约是基于“三分之一体制”的话，协约中没有关于佣兵费的规定也就好理解了。称呼新成为邻人的蛮族为“客人”（hospitalis）的习惯，似乎是从这时开始形成的。这明显是伪善，但有时人也是需要伪善的。



君士坦提乌斯

公元415年达成的这个协约中还有一点令人深思。罗马并不认可把后世称为法国南方的高卢南部划给西哥特人作为定居地，而是指定了

高卢西部。划给西哥特人的定居地是分布在罗马时代称为波图斯、南奈图斯和波尔蒂加拉，即今南特和波尔多之间的地域。

罗马人不想放手的只是高卢南部。西班牙也同高卢一样为蛮族所渗透，但罗马势力还在其东部坚持着。北非还留在帝国境内。这样，意大利半岛和法国南部、西班牙东部和北非等地区仍在罗马势力范围内，这些地区包围着地中海的西半边。不列颠、高卢大部和西班牙西半部已被日耳曼系蛮族占领。但这些地方都在大西洋一侧。罗马人仍是地中海的子民。

回到罗马人身边不久，皇妹加拉·普拉西提阿与将军君士坦提乌斯举行了婚礼。霍诺里乌斯皇帝不仅承认这桩婚姻，还利用这个机会让出身低微的将军变成了贵族。公元419年，加拉·普拉西提阿生下了一个男孩，并取祖父瓦伦提尼安一世皇帝的名字为名。霍诺里乌斯皇帝没有子嗣，这个孩子迟早会当上西罗马帝国的皇帝。

君士坦提乌斯从贫农发迹，并迎娶了皇妹，还有了一个将成为皇位继承人的儿子。他的身份大变，的确是社会成功人士。但人们无法衡量他究竟具有多少军事才能。蛮族在高卢和西班牙忙于巩固各自的地位，腾不出手来染指意大利，君士坦提乌斯没有机会发挥军事才能。这个时期的意大利享受着和平。这可以归功于经常征战于高卢和西班牙、牵制了蛮族势力的君士坦提乌斯。猫在拉文纳从不出来的霍诺里乌斯似乎也明白这一点。这位生于巴尔干地区的贫农之子在公元421年出人头地，成为共治皇帝，地位与霍诺里乌斯相同，取得了所谓“奥古斯都”的身份。然而，共治皇帝只当了8个月，当年秋天，君士坦提乌斯突然死亡。并非死于暗杀或谋杀，他是自然亡故。

君士坦提乌斯没有出类拔萃的才能，却也忠诚，野心不大，领导着原本须由皇帝担负责任的军事行动。他的死，似乎使年已36岁的霍诺里乌斯失去了平静。意志薄弱的人这时会变得焦躁，听不进周围人的劝说而失去正常判断力。皇帝的这种情绪就要影响到已故将军的2岁

幼子瓦伦提尼安。曾为蛮人之妻、积累了人生经验的妹妹原本就不信任这位异母兄长。自己身为蛮族俘虏期间，这位兄长只是用信函要求蛮族归还妹妹，此外再未做任何事情。她对这位兄长并无多好的感情。加拉·普拉西提阿担心2岁的儿子，抱着他逃往君士坦丁堡，向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求救去了。

皇妹和她的儿子没能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里长住。不到两年，公元423年初秋，西罗马帝国皇帝霍诺里乌斯去世的消息传到了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霍诺里乌斯享年38岁，属于自然死亡。他10岁登基成为西罗马帝国皇帝，尽管几乎未做任何对他人有用的事情，却也在位28年。

新皇帝的继位应该没有问题。对死去的霍诺里乌斯而言，血缘最近的人就是外甥，其父亲君士坦提乌斯还当过“共治皇帝”，尽管在位仅有8个月时间。

但问题是新皇帝只是个4岁的幼童。霍诺里乌斯不能像父亲狄奥多西把自己托付给斯提利科那样，无人可以托付幼年登基的新皇帝，他甚至没有想到托付的事。

如果没有监护人，替新皇帝摄政的角色就是母亲加拉·普拉西提阿。霍诺里乌斯身边的宫廷官僚中似乎有不少人对此事有抵触，以至于东罗马帝国甚至需要动用军队把新皇帝和他的母亲护送回西罗马帝国。但这也是在两年之后才好不容易实现的。

这样，西罗马帝国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的统治并非从先皇霍诺里乌斯去世的公元423年，而是从两年以后的425年开始的。即使这样，新皇帝才6岁，母亲的监护必不可少。据传，加拉·普拉西提阿生于公元390年，儿子当上皇帝的那一年，她才35岁上下。虽说西罗马帝国只领有环西地中海的带状地方，但毕竟成了女人统治的国家。不过，由女人统治国家却是始于东罗马帝国。

东罗马帝国

自狄奥多西去世的公元395年起，罗马帝国事实上就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罗马帝国尽管日益变为天主教国家，但更像其东方的专制君主国家。了解这两个国家的商人都认为，君士坦丁堡皇宫的奢华胜过波斯王的王宫。担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之职的约翰·克里索斯托写下了如下的话语，较之元首制时代的皇帝，人们会想，这是同一个罗马帝国的皇帝吗?

皇帝出现的时候，头上总是戴着嵌满昂贵珍珠和宝石的皇冠。这顶皇冠和裹在身上的紫色皇袍，只有坐在神意所授的圣位上的皇帝才有权力穿戴，其他人不论再富裕，也禁止享用。披在衣服外面的大斗篷也是真丝织成，紫色质料上用金丝绣着巨龙。皇帝的御座由黄金制成，中间灌满了金子，想要挪动它，一个人是绝对拿不起那重量的。

皇帝绝少出现在民众面前，一旦出现，总是有大群的大臣、宫廷仆人和侍卫随从。大臣和宫廷仆人的服装争华斗艳，就连在外围簇拥着他们的卫兵，也不输豪华。士兵们手持的枪和盾，他们身上穿的盔甲和护胸，一色地金光闪耀。就看那只盾牌，中央雕刻着漂亮的浮雕，周围一圈打着人眼形状的装饰钉。

牵引皇帝御辇的是没有一点杂色的纯白大马，两匹马都裹着金色的马衣。御者的衣服也是金色的，垂在马车左右随风飘动的帘子是薄薄的黄金色面料制成。民众惊叹，探出身子想一睹薄薄帘子后面身着紫衣的皇帝的尊容。随着御辇的晃动，黄金、各色宝石以及鲜艳的丝衣反射着阳光，更增辉煌。

这是皇帝的真身。与肖像画上描绘的皇帝本质上没有丝毫不同。蓝色的背景前，端坐在金色御座上的皇帝，面容与出现在民众面前时一样苍白而毫无表情。所不同的只是皇帝由骑在马上的一队卫兵簇拥，皇帝脚下跪着一群打了败仗被铁链锁在一起的波斯兵。

如此讽刺地描写皇帝的主教克里索斯托出身于安条克的上流社会，年轻时学习希腊哲学，是当时从“异教徒”变身为“基督教徒”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学识精深，是一位在信徒中人望很高的神职人员。但是几年以后，他被赶下了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宝座。东地中海世界非常“宗教化”，老百姓热衷于基督教的教理论争。这位知识分子主教下台的原因，除教理论争以外，还有宫廷内的阴谋。东罗马帝国的宫廷，不仅外观酷似东方专制君主的宫殿，内容也越来越相似。唯一的不同大概就是没有伊斯兰王室的后宫。拥有特权的人们会更加封闭，这是人性的宿命。在封闭的空间里，没有公权资格的人只要接近有公权的人便可以拥有权力。封闭状态对皇帝的近亲，尤其对女人是一种理想的状态。

女人与权力

西罗马帝国皇帝霍诺里乌斯的亲哥哥阿卡狄乌斯连续做了13年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于公元408年去世。事实上，他的当政时期止于法兰克人出身的将军女儿尤多克西娅成为皇后之时。继承阿卡狄乌斯皇位的是他们的儿子狄奥多西二世。这位皇帝一直统治到公元450年，长达42年。在此期间，统治东罗马帝国的是皇帝的姐姐普尔喀丽娅。到后期，狄奥多西二世的妃子也参与其事。

一生独身的普尔喀丽娅似乎是一位相当有智慧的女人，她没有排斥新登场的“情敌”皇后，相反把她变成了自己人。据说，受到狂热天主教徒普尔喀丽娅的影响，皇后平常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每天都在祈祷中开始，又在祈祷中结束。皇帝穿戴得奢华无比，皇后却日日过着低调的修道院式的生活。这样的两极分化，对他们似乎并不是什么矛盾。

公元395年，帝国东西分裂以来，可以说是女人和辅佐她们的宫廷官僚一直统治着东罗马帝国。到了公元425年，西罗马帝国也成此状况。加拉·普拉西提阿以儿子瓦伦提尼安三世年纪尚幼需要辅佐为由登上了政治舞台。



普尔喀丽娅



狄奥多西二世

至此，东西罗马帝国都成为女人统治的国家。不知何故，在女人掌握实权的国家，男人都软弱无力。狄奥多西二世的统治从公元408年到450年，长达42年。瓦伦提尼安三世的统治从公元425年到455年，长达30年。这两人都是六七岁登基，但统治都很长久。可是要问他们在位期间做了什么，回答是什么都没做。实际统治国家的是姐姐、妻子或母亲。在位达28年的霍诺里乌斯没有子嗣，狄奥多西二世去世时也没有儿子。真不知是因为女人意欲强烈使得男人软弱无力，还是因为男人无能使得女人活跃。但在罗马史上，这种现象无论是在鼎盛期的共和政体时代，还是在稳定发展期的元首制时代，都不曾见过。这一点明白无疑。

女人掌握权力没有任何不好，只是这女人必须具有行使权力的正当资格。皇帝的生母或监护人等并无此资格。不具资格的情况会给帝国的统治带来不可忽视的问题。

罗马的皇帝，其名称“imperator”的本义是指率领军队承担保卫“国家”（res publica）职责的人。如字面所示，这个职责首先在于国家的防御。马可·奥勒留是一位知识分子，被称为哲人皇帝。他连续驻留多瑙河前线达10年之久，最终死在那里。他准确地理解了罗马皇帝存在的理由。

但是，罗马皇帝名副其实的时代，在狄奥多西一世时已经结束。他的儿子阿卡狄乌斯和霍诺里乌斯到了可以率兵作战的年龄也不上战场。皇权为神意所授，应该让这神圣的存在身居安全的深宫之中，而把危险的战场指挥交给将军，这样的时代已经到来。史学家们称罗马帝国最后的一个世纪为“大元帅们的世纪”，因为“大元帅”（magister militum）代替皇帝征战沙场。这种情况源于斯提利科。

于是，皇帝就没有上战场的义务了，女人以皇帝的名义行使权力也无不便了。不过，不论是否上战场，罗马皇帝是罗马全军的最高司令官，这点丝毫未变。这就是说，统率手下众多的大元帅也是皇帝的职责。

女人行使权力的问题即出于此。她们被要求具备才能去统率这些大元帅，为了帝国防御的大目标而善于调遣他们。身为女人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女人不能为皇帝，也就成不了最高司令官，不具有统率大元帅的公权资格。正因为如此，她们被要求具备相应的才能。

东罗马帝国先有阿卡狄乌斯的女儿，后有登上皇位的狄奥多西二世的姐姐。狄奥多西二世未留子嗣去世之后，则由姐姐普尔喀丽娅继任。她先把自己嫁给马利基安，再把他放上皇位。她们似乎在这方面都颇具才能。她们不仅实质上统治东罗马帝国长达40年以上，而且在此期间成功地防御了东方大国波斯的入侵。如此难事，不能调遣好众多的大元帅是不可能办到的。

加拉·普拉西提阿从公元425年开始统治西罗马帝国，直到450年去世，她真的有这样的才能吗?

大元帅们

加拉·普拉西提阿在这个时期可调遣的两位将军是波尼法提乌斯和埃提乌斯。这两人都在战场上崭露头角，而不是靠躲过宫廷阴谋而出人头地的。如果以加拉·普拉西提阿掌握实权的公元425年计算，两位武将都是35岁。35岁左右的女人能否驾驭同龄的两个男人，这本身就饶有兴味。这是关系到能否抵抗住潮水般入侵而来的蛮族，保卫好西罗马帝国的大事。

人们不知道波尼法提乌斯出生何处，父母是何许人也，只知道他大约生于公元390年。在公元414年与进攻马赛的西哥特人的战斗中，他是迫使阿道法斯率领的西哥特人放弃马赛、改攻纳博讷的功臣。年方24岁他便脱颖而出。后来，他似乎在守卫法国南部的罗马军队中停留了一段时间，于32岁那年在西班牙与汪达尔人作战。此后不久，他渡过古代被称做“赫丘利之柱”的直布罗陀海峡，来到了北非。在这片土地上，他与向罗马举起反旗的毛里塔尼亚人战斗。在这个时期，他结识了后来被奉为圣人的天主教会首屈一指的理论家奥古斯丁。这次邂逅似乎给以前一直驰骋沙场的波尼法提乌斯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本来就是天主教徒，这时甚至想扔掉武器遁入修道院。

可是，他还有另外一次邂逅。那位女性也是基督教徒，但却是一位被天主教派斥为异端的阿里乌斯教派的教徒。波尼法提乌斯与她结婚，把新生女儿的洗礼托付给了阿里乌斯教派的祭司。他似乎对宗教上的正统与异端并不敏感，大概天主教教理的旗手圣奥古斯丁一定会对此失望吧。

他也在这时认识了加拉·普拉西提阿。她与哥哥霍诺里乌斯关系恶化后，带着孩子逃往君士坦丁堡，波尼法提乌斯给了她资金援助。对在罗马军队从军的波尼法提乌斯而言，霍诺里乌斯不仅是皇帝，还是他的最高上司。即使如此，他还是毫不掩饰地公开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在各方面都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汉子。

皇帝霍诺里乌斯去世后，他当然积极出力帮助加拉·普拉西提阿返回拉文纳。不少宫廷官僚和军队高官反对她辅佐年幼的新皇帝，从而掌握实权。加拉·普拉西提阿花了两年时间才把这些反对意见打压下去，返回拉文纳。仅此一点，波尼法提乌斯对加拉·普拉西提阿而言意义重大。

加拉·普拉西提阿成为皇宫的主人之后，立即任命波尼法提乌斯担任“近卫队队长”（Comes Domesticorum）的重要职务。同时还任命他为“阿非利加方面大元帅”（magister militum per Africa）。这样，波尼法提乌斯的活动舞台仍在北非，与霍诺里乌斯时代一样。

波尼法提乌斯被认为是加拉·普拉西提阿派。与此相反，执掌西罗马帝国实权的母后与大元帅埃提乌斯的关系则属于敌对关系。

埃提乌斯出生在位于后来保加利亚的多瑙河下游。他是罗马人称之为“罗马化的蛮族”，父亲是率领罗马军队骑兵军团的武将，名字叫高登提乌斯，母亲是意大利本土出身的罗马人。这点与汪达尔人出身的父亲和罗马人出身的母亲所生的斯提利科相似。单听姓氏就知道斯提利科是蛮族，而埃提乌斯有着罗马式的姓氏。较之斯提利科的父亲是“罗马化”的第一代，埃提乌斯的父亲也许是“罗马化”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不过，斯提利科年纪轻轻就得到皇帝的拔擢，其一生生活在帝国上层。而埃提乌斯则不同，他的人生从小就波澜迭起。

守卫帝国边境的罗马军队高官，不管是战时还是平时，因职务关系有很多接触蛮族的机会。而且，媾和与休战时，双方都要互换“人

质”。这在与蛮族的力量对比逆转后的5世纪，也还司空见惯。骑兵团长的儿子埃提乌斯作为“人质”再适合不过。一开始，他被送到西哥特人族长阿拉里克身边，接着在连日耳曼系蛮族都害怕并称之为“蛮族”的匈奴人那里，作为“人质”生活了10年之久。

乍听“人质”，往往会想到在严酷的环境中被迫过着悲惨生活的捕囚。然而实际情况绝非如此。

“人质”对将其作为人质的一方来说，在种种意义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他不仅起着保证对方遵守协约的作用，对增加自己的同情者也很重要。被认为是领导人后备队的上层出身的青少年“人质”最受欢迎。一旦“人质”被解放，回到祖国，还可通过他们构筑良好关系。罗马帝国是利用“人质”方面的高手，蛮族大概也是向他们学来的。

埃提乌斯成人时已对罗马的敌人蛮族的实态了然于胸。他在匈奴人那里做“人质”的岁月漫长，与匈奴人尤其亲近。匈奴的语言自不待言，传说他还与阿提拉相识，此人不久以后就令罗马人恐惧，提到他甚至连孩子都会吓得不敢哭出声来。



加拉·普拉西提阿（右）和她的孩子

埃提乌斯从“人质”解放出来以后，一直没有断绝与长期做“人质”的地方的联系。他成人后在罗马军队中从军，并未断绝与蛮族中的蛮族匈奴人之间的关系。成人后的埃提乌斯一直在与被匈奴人驱赶入侵高卢的日耳曼系蛮族作战，年过三十才被委以一个军团的指挥重任。

不独32岁的埃提乌斯，罗马军队的所有指挥官都没有料到霍诺里乌斯皇帝会在公元423年去世。霍诺里乌斯才38岁，在拉文纳闭门不出，很多军官连皇帝的面都没有见过。继承皇位的新皇帝只有4岁，就是不说，人们也知道何人在统治。那些不愿意被女人统治的男人试图推举某个自己人当皇帝，以此阻止儿皇帝登基。埃提乌斯也参与了这种事。为了帮助某人登基，埃提乌斯去匈奴借兵。但是当他率领借到的匈奴兵回来时，被推上皇位的人已经死去。起来反对新皇帝的高官也借此机会全部倒向幼帝和母后。看来埃提乌斯也不得不与他们一样，在加拉·普拉西提阿面前低头悔过了。可是，埃提乌斯不是那种人。

埃提乌斯以带来的匈奴兵力为后盾，通过宣示武力进行要挟，要求得到“大元帅”（comes）的地位。加拉·普拉西提阿也知道不能使高卢成为真空状态，并且，也没有其他合适的将领可以托付高卢防线。35岁的埃提乌斯并未低头却也获得了正式的罗马军大元帅的地位。接受埃提乌斯要求的条件是解散由匈奴兵组成的军团，埃提乌斯同意了。当上正式的大元帅之后就不再需要这些匈奴兵了。他给即将回多瑙河北边去的匈奴士兵足够的报酬，为的是以后也与他们维持良好关系。

经历了两年不安定状态之后，加拉·普拉西提阿终于立起了6岁的儿子瓦伦提尼安三世，也总算在良好的状态下开始了自己的统治。在关系到意大利半岛防御的高卢有埃提乌斯，在意大利半岛粮食来源的北非有波尼法提乌斯。他们都30多岁，年富力强，又都是打仗高手。加拉·普拉西提阿的摄政可圈可点。

有一句俗话叫“一山难容二虎”，是否能使不能并立的两员勇将并立建功，正是是否具有领导才具的试金石。然而，两年以后，加拉·普拉西提阿暴露出了女人经常会有的缺陷。

“大元帅”波尼法提乌斯

现在的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在罗马时代叫做“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突尼斯和利比亚西部称为“阿非利加”（Africa）。整个北非西部地方，在罗马帝国东西分离之后属于西罗马帝国管辖。基本上与布匿战争之前的迦太基领土重叠。现在的利比亚东部和埃及由东罗马帝国管辖，也就是罗马时代的“利比亚”（Libya）和“埃及”（Aegyptus）。拥有辉煌历史的埃及以及利比亚，再加上塞浦路斯岛，这些地方属于东罗马帝国管辖可以说是理所当然。

毛里塔尼亚和阿非利加划归了西罗马帝国。这一带，旧迦太基人与罗马人已完全同化，全然没有必要再去担心旧迦太基人还会成为霸权者罗马的敌对势力。布匿战争的殊死搏斗距今已有350年，旧迦太基人中曾经出过罗马皇帝，还有很多旧迦太基人成为帝国要人。罗马帝国时代称呼“迦太基人”就像现代意大利人称呼米兰人。这样的“迦太基人”中有一位弗龙托，是五贤帝时代罗马屈指可数的知识分子。他是元老院议员，同时还是马可·奥勒留皇帝少年时代的家庭教师。他曾经在元老院作过演说，题目是“对元老院迦太基人政策的谢词”。

于是，除埃及以外，北非全境的防御只需要一个罗马军团（6000人），加上数量相当的辅助兵。这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这个军团取创始人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为名，叫做“第三奥古斯都军团”。仅此一个军团就保障了北非安全长达200多年！这个军团的基地位于现在的阿尔及利亚的龙柏斯。基地面南而建，以防御敌人来袭。他们的敌人不是国内之敌，而是外敌，在北非就是沙漠游牧民。

公元3、4世纪，随着帝国国力的衰退，北非的安全保障也发生了变化，频繁亮起红灯。基督教的普及使这一切变得更加致命。城市型宗教基督教从北非的行政、经济中心迦太基市向地方扩展。在当时的阿非利加基督教中，很多主教既有坚强信仰又富于智慧，其势力之盛

甚至不输于君士坦丁大帝下气力抓振兴的罗马。但这反倒成为境内抗争的导火索。

在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大帝召开的尼西亚公会议上，主张三位一体说的天主教派被确定为正统基督教。此外的各教派均被打成异端，一概受到排斥。阿里乌斯派被打成异端，以倡导者多纳图的名字称呼的“多纳图主义者”也被打成异端。在北非，这个“多纳图派”的势力却十分强大。

基督教普及以前，北非的罗马行省社会也与其他行省一样，分为上中下三个阶层。不过与帝国其他地方一样，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很强，社会差别并不固定。然而，基督教普及之后，社会被分成了正统天主教派和被打成异端的多纳图主义者，并且固定下来。这样一来就丧失了社会阶层间流动的动力——自由竞争的精神，社会差别的原因已经不再是能力和运气，而是信仰的不同。

而且，信仰与阶层的关系在感觉上变成了天主教徒为上中层，多纳图主义者为下层。由于阶层的固化，反体制运动也必然抬头。阿非利加的多纳图派不仅成了基督教内部的起爆剂，而且也成为北非社会的起爆剂。圣奥古斯丁将其热情更多地奉献给了反对多纳图主义者的运动，但靠这位被誉为“教父”的人的学识和热情，并不能轻易说服在宗教和生活方面有着诸多不满的北非多纳图主义者。

在公元5世纪，仅靠一个常驻军团就能保障安全的时代早已过去，北非的统治由于上述原因变得非常艰难。而波尼法提乌斯却巧妙地统治着这样的北非。坦率地说，他对宗教的灵活态度，不过就是“不往心里去”。但他的这种态度，在情绪激昂的天主教派与多纳图派之间也许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此外，他用兵巧妙，兵力在他指挥下形成的阵势颇有震慑效果。波尼法提乌斯30多岁，精力旺盛，处理任何事情都是快刀斩乱麻，从不浪费时间。

总之，在他统治下的北非，不需要身在拉文纳的8岁皇帝和他的母亲加拉·普拉西提阿有任何担心。然而，能够巧妙地统治这件事本身，在专制君主之下会引起嫉妒和猜疑。

波尼法提乌斯图谋让阿非利加分裂独立的谣言开始充斥幼帝瓦伦提尼安三世及其母亲加拉·普拉西提阿居住的拉文纳皇宫。位于波河河口的拉文纳被纵横交错的运河网阻隔，完全可以防御来自陆地的进攻。面向亚得里亚海的军港装备完善。进攻拉文纳，不仅要突破陆地上的运河网，不施行海上封锁也不可能成功。姑且不论如何突破运河网，要封锁海港，海上战斗力不可或缺。而北方蛮族还不具备海上战斗力。所以，与米兰和罗马相比，拉文纳最适合防御缺乏海上战斗力的北方蛮族的攻击。

然而，完善的防御容易导致社会的封闭。西罗马帝国拥有从元首制时代起就有的军港，照理这军港也会发挥与外部的“出入口”的作用，可是西罗马帝国却与东罗马帝国一味疏远。而且，港口仅是港口而已，并无商业港的历史和传统，所以也并未从商人这种情报转接手那里得到情报方面的益处。拉文纳由皇帝居住的宫殿、皇帝身边宫廷官僚的住宅和支撑他们日常生活的用人们的集体公寓所构成，作为罗马时代的城市，一直是中等规模。这样，即使原本容易封闭的皇宫不那么封闭，城市本身也只会成为封闭的社会。

而且，事实上统治着西罗马帝国的加拉·普拉西提阿即使了解共同生活了5年的西哥特人，也不了解居住在北非的罗马人；即使了解君士坦丁堡和法国南部，也不了解北非。

只凭自己的经验思考的人，即使做上官，也成不了政治家。政治家需要用知识和想象力去“把握和理解”——用罗马人喜欢说的话，就是“comprehendere”——自己不曾经验过的事物。为此，情报也不可或缺。情报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这也是对情报的硬性要求。可是，拉文纳比意大利半岛的任何地方都不适合于满足这个要求。

人常常会对厚待他人而他人并不领情的事情感到失望和愤怒。随着这种情绪越发严重，许多正常的考虑便会被挤出大脑。加拉·普拉西提阿对厚待波尼法提乌斯并且任命他为阿非利加方面大元帅的懊悔和委屈，使自己成为了瞎子。

母后以8岁儿子瓦伦提尼安三世的名义向波尼法提乌斯发出了召回命令。召回令是报到的命令，召回只是命令受遣在外的人回来而已。并没有解除阿非利加方面大元帅的记录，这也许只是命令波尼法提乌斯回到本土而已。但是，这次倒是波尼法提乌斯起了猜疑。

不管是自己主动还是应召返回，去拉文纳的皇宫而不带军队就可能遭遇危险，这不用想斯提利科的先例便能知晓。波尼法提乌斯似乎编造了一个什么理由，没有响应以皇帝名义发出的召回令。

加拉·普拉西提阿更为愤怒。她既未花时间去冷处理，也未尝试从其他方面打开僵局，就突然向阿非利加派出了讨伐军。

面对两股军队的进攻，波尼法提乌斯遍布北非的防御网岿然不动。讨伐军被轻松击溃，逃回了意大利。加拉·普拉西提阿仍不改做法，再次派出了讨伐军。这次派出的是哥特人出身的将军率领的以蛮族兵为主体的罗马军队。

要成大事光有热情和精力是不够的，更要有冷静的态度。但是热情与冷静更多时候往往不能兼顾。波尼法提乌斯似乎也是热情有余而冷静不足。缺乏冷静性格的人常常会行动不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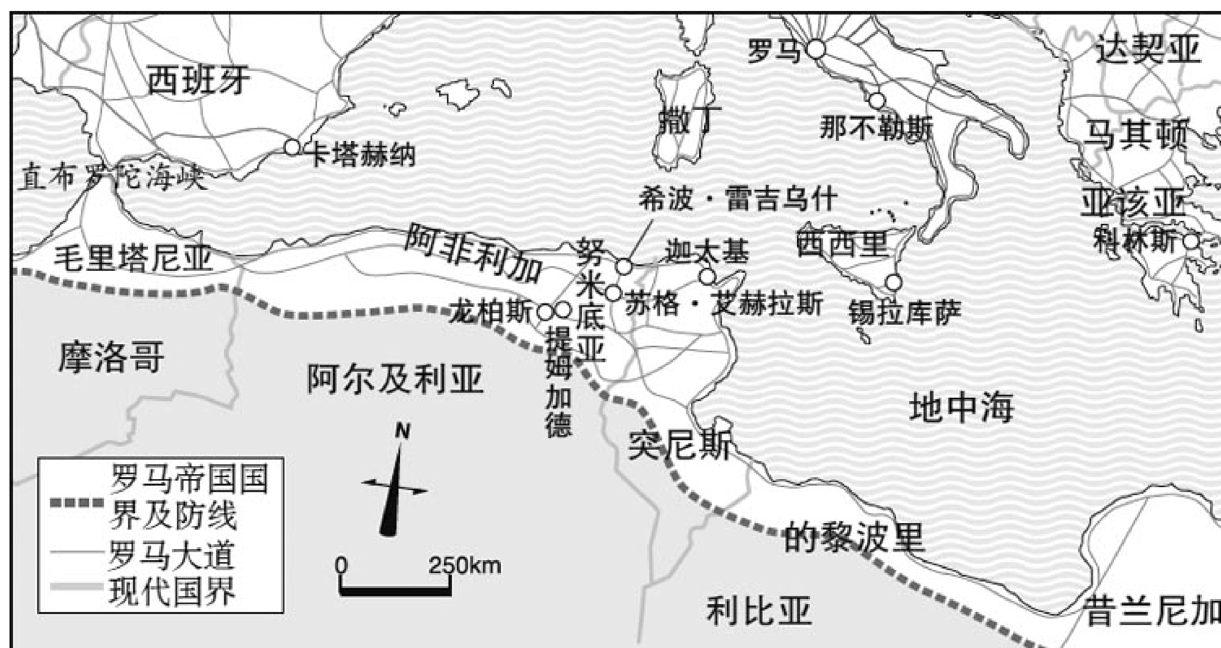
对哥特人出身的将领率领的第二次讨伐军，波尼法提乌斯选择了怀柔而不是击溃的方针，并获得成功。但加拉·普拉西提阿并不想善罢甘休。波尼法提乌斯考虑加强自己在北非的力量，便请求在西班牙的对手汪达尔人派来士兵。波尼法提乌斯的意图几乎可以肯定，他只想像埃提乌斯向匈奴人借兵一样，借用一支部队而已。

可是，汪达尔人接到请求后，却表现出了在与其他蛮族争夺中受到压制时的相反心态。汪达尔人族长根西里克以整个部族，而不是一支部队，来响应西罗马帝国阿非利加方面大元帅波尼法提乌斯的借兵请求。他把这看成了汪达尔人放弃形势不利的伊比利亚半岛，在北非寻求定居之地的绝好机会。

汪达尔人

距离再短，要渡过直布罗陀海峡，而且是带领全体部族成员渡海，也需要相当数量的船只。但是北方蛮族汪达尔人并无海运能力，没有罗马方面提供船只就无法渡海。波尼法提乌斯似乎未能提供船只，是居住在西班牙的罗马人向汪达尔人提供了船只。在他们看来，侵犯自己长期居住之地西班牙的蛮族，哪怕只是一部分去到其他地方，也都是再好不过的。既然帝国不能保障他们的安全，就只能自己保卫自己。

在公元5世纪的罗马帝国，大型船停泊在港口的情形已难得一见。但在临海之地，小船却是要多少有多少。把号称10万人的汪达尔人全部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去，花些时日并不是办不到。



北非及其周边

居住在欧洲北部草莽深处的日耳曼民族之一汪达尔人，曾经渡过莱茵河，横穿高卢，翻过比利牛斯山脉，进入西班牙。公元429年春天，他们又马不停蹄地渡过直布罗陀海峡，登陆北非。对西罗马帝国来说，这就等于允许北方蛮族入侵与意大利关系密切而无比重要的“阿非利加”。

不愧是波尼法提乌斯，他注意到此事事关重大。于是他率领麾下部队，会合曾经讨伐他却被他怀柔的哥特人出身的将领和属下蛮族兵，全体出动前去迎击刚刚登陆的汪达尔人。但是，这时发生了波尼法提乌斯不曾料想到的事态。

被天主教打成异端而遭歧视和排斥的多纳图教派的基督教徒决定加入根西里克率领的汪达尔军队。汪达尔人也是基督教徒，但信奉的是被天主教派打成异端的阿里乌斯教派。在多纳图主义者看来，汪达尔人的入侵是异端抗击天主教徒的好机会。

这样就形成了反体制运动。这种气氛扩散开来，因不是基督教徒而受到二等公民待遇的毛里塔尼亚人，即摩尔人以及近来在临海城市常见到的沙漠游牧民柏柏尔人等都投奔了汪达尔人。

从这个时期西罗马帝国军队的规模推测，波尼法提乌斯可用之兵至多也只有1万人上下。靠这点兵力，波尼法提乌斯即使再英勇善战，也无法战胜异端异教的联合军队。居住在北非的罗马人也没有带头志愿承担防御的力量和意愿。与遭到北方蛮族入侵的欧洲不同，北非过去没有遭受过蛮族入侵，因而不适应与蛮族作战，没有悟到尽早奋起迎击蛮族的重要性。

根西里克的汪达尔人军队渡过直布罗陀海峡之后，立即控制了毛里塔尼亚，接着迅速东进，转眼间逼近希波·雷吉乌什（Hippo Regius）。希波·雷吉乌什又叫伊波纳，是座濒临地中海的海港城市，与北非最大城市迦太基相距150公里，有一条罗马式大道相连接。波尼法提乌斯决定以希波·雷吉乌什为后盾，阻止汪达尔人军队前进，在这里展开了长达14个月之久的攻防战。

现今阿尔及利亚城市博纳（Bona）西南2公里左右的地方留存了古代希波·雷吉乌什的遗迹。公元430年，那里是居住着很多人口的城市。持续了14个月的攻防战期间，很多人一直待在城里。他们中间就有后来被奉为圣人的奥古斯丁，他是这座城市的主教。40岁的波尼法提乌斯统率士兵，指挥防御战。76岁的主教曾在几年前鼓励他保卫北非，现在又在安慰恐惧绝望的信徒们。他这样说教：入侵的北方蛮族破坏和杀害的是地上的国家，我们基督教徒的安住之地是死后去的神的国度。

圣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在基督天主教中非常重要，是被称为“教会之父”、被赞颂为“教父”的人物。他也是出身于北非的罗马人，一生中留下了许多著作，其中特别著名的作品是《忏悔录》和《上帝之城》。这两部著作都有日文译本出版。

用一句话来说，《忏悔录》是一部真实坦白自己在觉悟到真正的信仰之前是如何任性游乐，真实描写自己何时受到谁的启发而觉悟，后来生活又是如何改变的作品。

《上帝之城》据说是受到公元410年“罗马浩劫”的冲击而写的作品，告诉人们现实直面的地上国度的惨状不过是通往上帝之城途中的过程而已。异教徒认为，罗马帝国之所以沦落如此，是罗马人抛弃传统宗教改信基督教的缘故。《上帝之城》就是针对这种责难的反驳。我在读后感到，这本书的写作目的是让对“地上国度”的惨状感到绝望、对基督教的信仰有所动摇的人们着眼于“上帝之城”，从而使这些善男信女坚定信仰。很多关于信仰的书籍往往使没有共享这种信仰的人感到枯燥。然而，这些书籍在一千六百年之后的今天仍在刊行，这不仅是因为这是天主教最伟大的理论家所写，还因为奥古斯丁的文章卓越。他自孩提时代起就接受了曾为罗马精英必备条件的素质教育（artes liberales，英文为liberal arts）。

他于公元354年生于北非地方自治体之一的塔加斯特，这种自治体受中央政府派遣的行省总督统治。这座城市如今在阿尔及利亚境内，名为苏格·艾赫拉斯。罗马时代的“municipia”，指被罗马征服而成为行省的地方城市，因此，奥古斯丁很有可能有迦太基人的血统。他的父亲是这座城市的地方议会议员，据说直到死前几年还在信仰罗马传统诸神，是一位异教徒。虽然那时君士坦丁大帝承认了基督教，但还远未到离狄奥多西确定基督教为唯一宗教而其他均为邪教的4世纪末期。所以，奥古斯丁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基督教得到承认但也可以自由信仰其他诸教的时代度过的。

奥古斯丁按照良家惯例，在父母身边接受初等教育后，自中等教育开始便早早离家，去了20公里外的另一座城市学习。少年时代，奥古斯丁的兴趣在拉丁文学，尤其喜好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时代的叙事诗人维吉尔。后来，奥古斯丁去迦太基留学，学习雄辩术这种说服与自己想法不同的人的技能。可是在这座大都市里，他没有投身于学问，而是将时光抛掷于享受人生，不满18岁便成为未婚父亲。这可是使虔诚的基督教徒母亲莫妮卡深深哀叹的不吉之事。

不过，他并未荒废学业，在完成了迦太基留学的3年学业以后，他于20岁时返回了故乡塔加斯特。在故乡教授文法，并开设了相当于中等教育的私塾。但对这位刚满20岁、多愁善感、又体验过大都市迦太基生活的年轻人而言，内陆小城市的生活太过枯燥。作为未婚父亲，他与女伴的关系并未断绝，两年之后又回到迦太基。此后连续7年的岁月中，他在迦太基靠教授雄辩术为生。

他决定放弃在迦太基的生活去罗马的理由也很有趣，并不是为了究求学问，而是因为讨厌学生。迦太基的学生闹哄哄的，根本不听年轻老师的话。于是他想，在传统悠久的罗马接受素质教育的学生肯定要强些，便决定去了罗马。

可是，罗马的学生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多人不但不集中精力学习，还会在支付月钱之前跑到别的“私塾”去，这对靠月钱生活的老师来说真是令人绝望。他虽然来到了曾经的“世界之都”，却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当时的首都长官西马库斯向年轻的奥古斯丁伸出了援手。

西马库斯是元老院有实力的议员，还担任着“首都长官”。他亲自为奥古斯丁当推荐人，劝奥古斯丁参加“讲座资格”考试。

“讲座”一词来源于希腊文的“kathédra”，原意为“椅子”，转为拉丁文后写作“cathedra”，意思是具有教授学生的教席资格。这个词直到现

代仍在使用。奥古斯丁顺利通过这个“讲座资格”考试，首都长官甚至要为他在米兰觅到一个职位。

西马库斯这年44岁，正是他在公元384年与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展开了史上留名的争论。他以一直处于攻势的基督教势力为对手，阐述罗马传统宗教存在的理由，被称为“异教罗马古老荣耀的最后火焰”。他也许见出了30岁的奥古斯丁是这把“火”的继承人。后来成为天主教首屈一指的理论家的奥古斯丁，这时不过是一位失业的年轻古典学者。

前往米兰，为奥古斯丁的人生带来了一大转机。这个时期的米兰正处在主教安布罗西乌斯的绝对影响之下，我一直认为，这位主教是天主教会首推第一的实干家。一直以希腊罗马经典为教材教授雄辩术的奥古斯丁竟为将希腊罗马文明打成异教文明的基督教所痴迷。主教安布罗西乌斯的说教给了32岁的奥古斯丁以雷击一般的冲击。

他放弃了教师职业，断绝了与带着儿子的情人的长期关系，拒绝了母亲安排的婚姻，决心把以后的人生奉献给神。翌年，即公元387年4月，32岁这年的春天，奥古斯丁接受了洗礼，好像主教安布罗西乌斯也参加了他的洗礼。



圣奥古斯丁（波提切利画）

奥古斯丁回到家乡塔加斯特，当起了一介修道僧。这位学识丰富的年轻修道僧无法不对周边产生影响。弟子们开始聚集在他的周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修道院。这个时期，他的私生子去世了。

奥古斯丁的修道院生活持续了9年。公元397年，已经43岁的奥古斯丁被选为希波·雷吉乌什主教。他原想一辈子做一名修道僧，但想到这也是神的意旨，便从修道院搬进了主教宅邸。

奥古斯丁当上主教以后，开始在成为天主教教理旗手的路上突飞猛进。在希波·雷吉乌什，曾经召开过几次公开会议来调整教理解释方面的差异。奥古斯丁当上主教后在教理方面极富战斗性，集中攻击被打成异端的多纳图主义者。以前，北非基督教徒中多纳图主义者占多数，但在天主教派的攻势面前一落千丈而成为少数派。这应归功于主教奥古斯丁。正因为如此，信奉多纳图派基督教的人们对他更加憎恨。公元430年，多纳图派基督教徒与北方蛮族汪达尔人共同行动，逼近希波·雷吉乌什。也许，奥古斯丁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必要相信，真正的安居之地不在地上，而只能在“上帝之城”。

波尼法提乌斯放弃了希波·雷吉乌什城的防御。载着他和手下士兵的船队从港口出发去了意大利。这座城市的命运由此决定。在城墙倒塌的轰隆声中，奥古斯丁76年的人生落下了帷幕。这天是公元430年8月28日。

尽管如此，这也比活着落入一直被视做异端的阿里乌斯教派和多纳图派人手中幸运。过去曾经有些天主教徒为与奥古斯丁的说教保持一致而有过过激行为，杀死过主教，焚毁过教堂。如果奥古斯丁活着落入多纳图派之手，必定会被大卸八块。

大概是害怕发生这种情况，信徒们悄悄把奥古斯丁的遗骸装上船，运到撒丁岛上去避难。到了中世纪，遗骨被袭击该岛的撒拉森海盗抢走，得花“赎金”才能要回。有人付了赎金，遗骨回到了信徒手中，后被作为圣物保存在意大利北部帕维亚的教堂中，直到今天。

波尼法提乌斯抛弃了北非，也抛弃了以前所仰慕的奥古斯丁，回到了意大利。可是，身在拉文纳皇宫的加拉·普拉西提阿既没有批评也

没有责备这位阿非利加方面大元帅。她打算利用这位年届四十的武将，打掉活跃在高卢却与拉文纳皇宫保持距离的埃提乌斯。令人不解的是，北非正在不断失去，皇宫为什么却还要削弱高卢的罗马势力。40岁的母后只是因为埃提乌斯经常不服从自己的命令便认定他图谋把高卢从西罗马分裂出去。这与当初怀疑波尼法提乌斯图谋把北非分裂出去而派兵讨伐一样，只是对手从波尼法提乌斯换成了埃提乌斯。

且不说他们实际上是否图谋分裂，没有力量图谋分裂的人也没有能力防御，这在帝国的最后一个世纪，不论北非还是高卢都是一样。只有能够操纵具有这种力量的人，才配当最高司令。可是，代11岁皇帝掌控西罗马帝国的加拉·普拉西提阿不具备这种能力。

人们不知道波尼法提乌斯个人是否有意与同辈埃提乌斯竞争。总之，回到本土的波尼法提乌斯不仅没有被问放弃北非之罪，而且再次被任命为“大元帅”，还被授予“贵族”（patricius）之位。但是这次没有明确记载是负责哪方面的大元帅。也许加拉·普拉西提阿与波尼法提乌斯两人之间已经有了默契，战胜埃提乌斯后任命波尼法提乌斯担任高卢方面大元帅。

就这样，西罗马帝国失去了罗马军队已经撤出的不列颠，失去了高卢北部和中部，失去了东部沿海地区之外的西班牙大部，又失去了北非，目前仅有迦太基城及其周边一带还在罗马人手里。在这样的状态下，西罗马帝国又要开始浪费所剩无几的力量。被浪费的不光是人和钱，还有时间。埃提乌斯与波尼法提乌斯这两位罗马军队“大元帅”之间的这场内战，直到两年之后才结束。

公元432年，埃提乌斯的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脉进入意大利，与正等着他们的波尼法提乌斯的军队在里米尼附近的平原相遇。里米尼离少年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和母后加拉·普拉西提阿所在的拉文纳不到50公里，其近郊成为罗马军队内战的战场。

虽说是罗马军队，但实质上蛮族兵居多。指挥他们的人都在42岁左右，年富力强。他们二人的军事才能也可以说是旗鼓相当，激战一场接着一场。不过，战况的进展却常常是波尼法提乌斯占据优势。波尼法提乌斯是优秀的战略家，也是优秀的战术家。

另一方面，埃提乌斯与其说是战术家，毋宁说是战略家，看到战况进展如此，便看准波尼法提乌斯的脾性改变了方针。

埃提乌斯提议两位大将进行决斗，以此决定战斗的胜负。

波尼法提乌斯瞥了一眼使者送来的提议当即决断——同意。当晚，双方在各自的营寨里准备明天的决斗。侍者们忙于为主人加工武器。埃提乌斯的随从遵照主人的密令，对决斗的武器进行改良，加长了长矛。

决斗开始，两军士兵定睛注视着，大气不敢出。两位将军驱马飞奔，胜负已在激烈对冲的瞬间决定。波尼法提乌斯左腹部被长矛刺穿，倒栽葱跌下马来，动弹不得，5天之后死于枪伤。埃提乌斯获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波尼法提乌斯属下的将士编入自己的军队。哥特人出身的将军桑吉巴努斯趁此机会投向埃提乌斯。他原先被派去北非讨伐波尼法提乌斯，后来在波尼法提乌斯的怀柔下一直与其共同行动。在里米尼战斗中，他是波尼法提乌斯的副将。这样，除了死去的波尼法提乌斯，埃提乌斯收编了所有波尼法提乌斯的军队。完成这一切之后，埃提乌斯开始向加拉·普拉西提阿摊牌。

这实在是巧妙的“摊牌”。埃提乌斯率领军队来到拉文纳，让部队在拉文纳郊外待命，自己只带少数的几个将军进入皇宫，向由母亲陪伴着接见他的少年皇帝乞求原谅。

罗马人打败了罗马军队，埃提乌斯为此乞求原谅，这实在是荒唐可笑之事。但加拉·普拉西提阿并没有笑。皇帝拉住埃提乌斯的手让他

站起身来，原谅了他，并正式任命他为“联军总司令”。

这个时期的埃提乌斯要想取代少年皇帝大约是很轻松的事，他一定会从陆上和海上两面夹攻拉文纳。但他连试也没试。这并不是因为他没有野心。埃提乌斯自己是天主教派的基督教徒，但娶了阿里乌斯教派的哥特人女人为妻，并且坦然生子。废掉被视为奉基督教的神意而坐上宝座的皇帝，并由自己取而代之，在埃提乌斯看来并不会刺伤他的宗教信仰。他之所以打消了实现野心的念头，是因为吃不准东罗马帝国会如何行动。

这个时期的东罗马帝国皇帝是狄奥多西二世，他虽然已过而立之年，却仍不热心于亲政，由姐姐普尔喀丽娅独揽大权，统治着东罗马帝国。东西罗马帝国均由女人统治，但统治才能有明显差距。东罗马帝国在普尔喀丽娅的领导下，与大国波斯维系着较为良好的关系，同时把北方蛮族入侵的祸水引向西罗马帝国，成功避免了两面受敌的事态。只要能够阻止外敌入侵，国内和平就能得到保障，自然国力也会增强。埃提乌斯害怕东罗马帝国把正规军派到西罗马帝国。那样他就会受到蛮族和罗马军队的两面夹击。

为了避免这种状况，他打了胜仗却向战败的一方乞求原谅，以换取皇帝正式承认他作为事实上的西罗马帝国全军最高司令官的地位。

“联军总司令”埃提乌斯

公元432年开始了持续22年的埃提乌斯时代。这意味着加拉·普拉西提阿走下了政治主角的宝座。

加拉·普拉西提阿是东西统一时代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狄奥多西的女儿，是帝国东西分裂后西罗马帝国皇帝霍诺里乌斯的妹妹，曾经

是蛮族族长的妻子，后来又是从一介士兵当上共治皇帝的君士坦提乌斯三世的妃子。她是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的母亲，统治西罗马帝国达7年之久，42岁时被迫隐退。她仍跟从前一样继续住在拉文纳的皇宫里，为刚满13岁的皇帝摄政的地位也没有变，但埃提乌斯的力量超出了她所能掌控的水平。

加拉·普拉西提阿后来又活了18年。这期间她做了两件事：完成了自己的儿子——西罗马帝国皇帝与东罗马帝国皇帝的女儿之间的婚事以及把对埃提乌斯的憎恨灌输给儿子，挑起他复仇的念头。婚事在瓦伦提尼安三世成年的公元437年完成，复仇也将在她死后4年实现。但让这位只有母后身份的加拉·普拉西提阿担心的不是皇帝儿子，而是女儿霍诺丽娅。霍诺丽娅是皇帝的姐姐，这位公主胆大妄为，给西罗马帝国带来了诸多不安定的因素。也许在西罗马帝国的宫廷里，女人的血质比男人更富不安分的性质，尽管这从未有过好结果。

不少人拿西罗马帝国天字第一号的实力派人物埃提乌斯与30年前的头号实力派人物斯提利科相比较。这二位都认为不吸收蛮族就不能保卫西罗马帝国。然而，我却认为他们两人本质上是不同的。乍一看两个人似乎都采用了“以毒攻毒”之法，但其内容并不一样，甚至可以说是恰恰相反。

斯提利科虽是蛮族出身，但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体内流淌的是母方罗马人的血。在他看来，必须保卫的毕竟是西罗马帝国，而蛮族之“毒”无论再有用，终归是“毒”。“以毒攻毒”只是达到保卫西罗马帝国这个目的的手段。于是，好用便是最重要的条件。正因为好用，是否抛弃不用也就取决于自己的需要。

斯提利科把目光盯在统率西哥特人的阿拉里克身上，也是因为自己曾4次打败过他，而且可以说放就放，收放自如。

这种心理作用不仅经常使阿拉里克感到压力，对其手下的西哥特人也是一种持续的压力。这种情况对与西哥特人并肩作战的罗马士兵也产生了一种良好影响。即便是并肩作战，罗马与西哥特人的关系也并不对等，罗马方面是强者，西哥特人方面是弱者。这样，“毒”的作用只局限于进攻其他的“毒”，而不用害怕它“毒”害母体。

埃提乌斯所用之“毒”是匈奴人。他选择匈奴人是基于个人的亲近感，他在匈奴人中间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他与匈奴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依存关系，有事相求即可借兵。

但从结果上看，事实是在公元432年以后埃提乌斯大权在握的20年间，他的确守住了西罗马帝国。不过，在他的做法中看不出一以贯之的政略，只是权宜之计。比如，这次与这个蛮族联合打击别的蛮族，下次却又与被打的蛮族联手攻击上次的盟友。推测一下埃提乌斯的想法，我想他大概是想让从北方侵袭而来的蛮族在高卢和西班牙自相残杀的现状长久持续下去。

可是，埃提乌斯的战略蕴藏着巨大危险。在依靠大将埃提乌斯对情况的判断而不断变更敌我，集中精力玩走钢丝一般的游戏时，罗马军队自身的力量却发生了决定性的衰退。人一旦习惯于依赖别人，自己也就站立不住了。那已不仅是“以毒攻毒”，连母体也为毒所攻了。自以为掌握着主动权，而主动权却在不知不觉中转移到了蛮族一方。

然而，埃提乌斯还是暂时延长了西罗马帝国的寿命。埃提乌斯时代在西罗马帝国持续20年之久的原因有三：

第一，尽管后来成为敌人，但在此之前一直被埃提乌斯引为盟友的匈奴人，是所有北方蛮族都害怕的蛮族中的蛮族。

第二，北方蛮族各部族都在高卢、西班牙和北非为确保自己的领土而腾不出手来，没有余力入侵意大利。

第三，拉文纳的宫廷和罗马的元老院都无力威胁埃提乌斯的地位和权力。他们藏起自己的无能而把天下许给埃提乌斯的理由只有一个，与父亲是蛮族出身、母亲是罗马人的斯提利科不同，埃提乌斯父母都是罗马人。

可是，后世史学家都把蛮族出身的斯提利科写成“最后的罗马人”，却未把罗马人的埃提乌斯评价为“最后的罗马人”。也许他们认为，是不是罗马人不光要看结果，在导致结果的过程中的姿态也必须是“罗马人的”。“以毒攻毒”的方法本质上就是持续掌握主导权，这实在是一种罗马式的战略战术。

在帝国最后一个世纪公元5世纪接近中叶时，东西罗马帝国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使人觉得，仅仅半个世纪前还属同一帝国的事实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在东罗马帝国，持续了42年之久的狄奥多西二世的统治行将结束。皇帝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甚至传说他要把首都君士坦丁堡的皇宫改成修道院。除此之外，并无其他谈资来谈论这位皇帝。不过，取而代之掌控帝国的皇姐普尔喀丽娅的操舵水平却差强人意，东罗马帝国的内外安泰得以保障。

东罗马帝国也并非没有受到蛮族的威胁。在5世纪接近中叶的时期，最急迫的问题就是匈奴人。稍早前匈奴人的族长去世，与稳健的兄长性格相反的弟弟阿提拉取而代之成为头领。

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统治西罗马帝国也长达30年。虽然皇帝的宝座还算稳定，但实情大不一样。东西罗马帝国的皇帝都形同虚设。不过，在西部辅佐皇帝的母后加拉·普拉西提阿早早地退出了前台，实权转到埃提乌斯手中之后也将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埃提乌斯酷似走钢丝的做法，使蛮族从北方入侵的威胁有所减弱。这使得埃提乌斯将注意力集中在了欧洲。罗马时代，意大利半岛与北非的关系较其与高卢和

西班牙所代表的欧洲之间的关系要深厚得多。可是，北非在埃提乌斯的关心之外。真相也许是不去关心和无力关心各占一半。波尼法提乌斯如果还活着也许能有点作为，但他被西罗马帝国自己葬送了。

瓦解

即使10万人的部族倾巢出动去侵略，人数也绝对不会超过被侵略地的居民人数。现代人无法想象罗马时代的北非是何等地绿色盈野。正如“罗马粮仓”所表示的那样，那里是一片人口众多的鱼米之乡。北非最大的港口是迦太基港。这个港口与罗马外港奥斯提亚之间的航线，可能是地中海上交通最为繁忙的海上干线。即便是在现代，两地之间的海底因海难而沉没的船只遗骸也是鳞次栉比，排列成一条海底大道。近年来已取得长足进步的海底考古，也因为这一带海洋太深而离目标尚远。人们在2000多年后还能发现海底泥沙中露出身影的众多的海难沉船遗骸，可以想象出罗马时代北非与意大利的密切关系。

罗马与迦太基，这两个西地中海世界中数一数二的大都市之间的物产往来盛极一时，人员交流也十分频繁。特别是罗马帝国基督教化以后，天主教派在西方的中心就是罗马和迦太基。教会资产丰厚，靠着这些资源，宗教活动也十分活跃，主教中优秀人才辈出，仰慕他们的信徒人数日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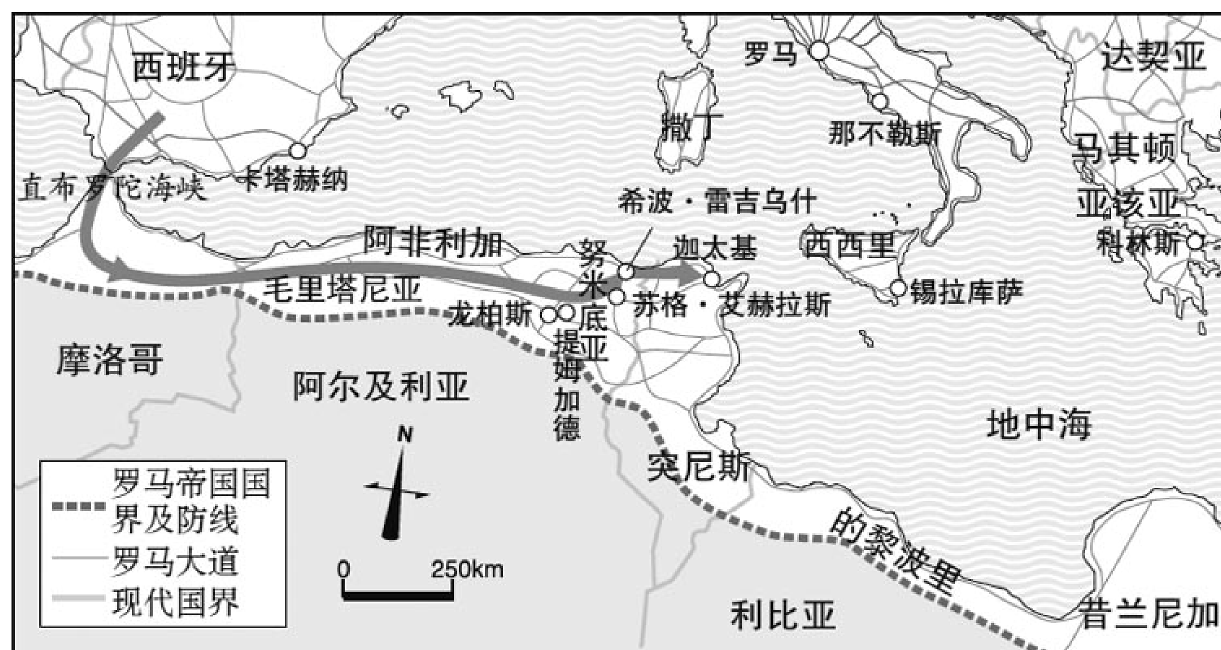
中心城市的繁荣离不开附近强有力的“卫星城市”的支持。这个卫星城市对罗马而言，就是米兰，圣安布罗西乌斯任此地主教长达23年；对迦太基而言，就是希波·雷吉乌什，圣奥古斯丁在这里的主教宝座上也坐了33年。

事实上，罗马人称霸北非，也只限于靠近地中海的地方，而没有涉足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这是事实。与后世的帝国主义国家不

同，罗马起源于城市国家，转变为领土型的帝国之后，仍旧喜爱居住在他们称之为“内海”（mare internum）的地中海附近地方。罗马大道的网络在北非的分布情况如实地反映出了这一点。罗马大道所到之处，就是罗马人的罗马世界。

罗马人的传统做法是并非任何事情都要自己亲自去做。他们可能认为，如果想要沙漠南面出产的物产，与其征服那些地区纳为行省，不如坐等当地人运来更有效率。征服也是需要人和钱的，征服后的行省化则需要更多的人和钱。因此，即使在自己成为最强民族的时代，刺激罗马人征服欲的也只限于他们认为防御上的必需之地。

这样的历史过程使得罗马时代的北非，居民和财富都集中在接近地中海的带状地域。其中，行省总督官邸所在地迦太基一直起着“中枢”的作用。公元429年渡过直布罗陀海峡登陆北非的汪达尔人也是一路东进，穿过毛里塔尼亚、努米底亚，一年后便逼近迦太基。波尼法提乌斯离开希波·雷吉乌什后，北非就可说是处在无防御状态中了。汪达尔人的兵力加上摩尔人和多那图派的基督教徒人数不过5万，但北非引以为豪的丰沛财力和能干的人才并不能形成防御力量。蛮族征服北非完全就像是刀切面包的感觉。



汪达尔人入侵北非

公元439年，在蛮族渡过直布罗陀海峡登陆北非的第10个年头，北非中枢迦太基终于陷落了。

在高卢和西班牙，进而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意大利，少数征服者统治多数被征服者时，不得不在某些地方寻找相互共存的妥协点。胜利者少说也要统治数量10倍于己的失败者。蛮族的入侵也不再是打过来抢了东西就走，而是抢掠后就地定居。但汪达尔人入侵北非有所不同。多那图派的基督教徒加入了征服大军可能是这不同的主要原因。

多纳图派虽然同为基督教徒却被打成异端，一直受到镇压。对他们而言，天主教徒是不共戴天之敌。天主教徒社会及经济地位优越，他们对多纳图派的鄙视不只是在宗教方面。如今，天主教徒成为失败者。汪达尔人在北非的入侵和征服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残酷，其原因就在于基督教化之后的北非所具有的这种特殊情况。

多纳图派在北非广为普及，也一直是被北非天主教徒敌视和镇压的对象。汪达尔人信奉的是阿里乌斯教派的基督教，在天主教徒看来也是“异端”。不过，从阅读众多史料中得到的感觉是，严厉对待“异端”的是天主教徒，而阿里乌斯教派则宽容得多。所以，如果征服北非的只是汪达尔人的话，我想，就没有必要将圣奥古斯丁的遗体移到撒丁岛避难去了。圣奥古斯丁生前是著名的弹劾多纳图派的旗手，转移他遗体的天主教徒很明白这一点。他们一定会预料到，一旦自己敬爱的人的遗骸落到多纳图派教徒之手，其下场将会如何。

这种情况使得汪达尔人对北非的占领比在其他任何行省都更加残酷，出现大量难民就是具体的表现。

迦太基港与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之间的航线可说是运输干线，航行其间的船只越多，熟知这条海路的乘客也就越多。从迦太基到那不勒斯附近的商港波佐利的路程，顺风是两天；即使因为地中海风向多变不能经常遇到顺风，也就5天；根本不走顺风运，全靠橹手划船，也只需10天。如果不登陆意大利半岛，到西西里仅需一昼夜的路程。这时的汪达尔人还不具海上战斗力，没有掌握制海权，他们的威胁尚未达及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和撒丁岛。

刚才提到的大量难民都是北非罗马社会的上层人士。处在社会中层的匠人、店主、自耕农等则无力远走他乡。而下层的农奴在老主人逃亡意大利后，只能在取而代之的新主人手下，过着比过去更加艰辛的劳作生活。留下来的这些人，连坚持天主教信仰都成为奢侈。

天主教会的中下层神职人员留了下来。他们只能在彻底变为多纳图派天下的社会里，过着忍受镇压、屈辱和欺凌的日子。不光是圣奥古斯丁的遗体，连这位著名主教的著作——当时还是手抄本——也被制成卷轴，随同难民逃难去了。北非的天主教事实上已经崩溃。

汪达尔人最近30年一直居住在北欧的草莽深处，与罗马帝国的接触只限于像斯提利科的父亲那样在罗马军队服役的少数人。他们渡过莱茵河入侵高卢以后步伐迅速，从高卢翻过比利牛斯山脉，进入西班牙，如今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占领了北非。尽管他们初到北非，但对北非的统治颇成体系。几乎可以确定，这是因为接受了多纳图派人士的进言。迦太基等城市周边的大规模农场无一例外全被接收。居住在城市房屋里的人也被悉数赶出，动辄沦为奴隶。基督教不允许把信仰共同的“兄弟”变成奴隶，但信仰不同的人则不为“兄弟”。这样，不仅异教，就连异端也都成为信仰不同的人了。

被允许生存下去的不同信仰的人有士兵和中下级行政官僚。当然，士兵要接受汪达尔人的指挥，官僚也要对新主子唯命是从。此

外，匠人、店主也被允许生存下去。不论社会如何变化，他们的职业总是需要的。

也有一些大农庄主没有背井离乡。他们的农庄都位于远离地中海沿岸的内陆深处。但无论如何，加上多纳图派，胜利者也是少数，不可能把居住在北非全境的所有人统统换掉。不过，内陆农庄出产的农产品已经不再运往意大利。汪达尔人不是农耕民族，霸占了大城市周边的耕地以后，产量远不及以前。在北非这个罗马时代丰饶的农耕地带，被征服者仅能养活征服者。

汪达尔人还把地中海南岸沿岸成串的海港城市几乎全部攫取到手，尽管它们并非“罗马粮仓”。北方蛮族汪达尔人控制海洋运力只是时间问题。蛮族控制海洋运力之后，会百分之百地用于海盗业。这样的海盗不只会袭击在海上遇到的船只，他们每到一处，就纷纷下船，摇身一变成为陆地强盗。他们乘船溯河而上，袭击沿河城市和乡镇的事情也屡见不鲜。

居住在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的人们，开始因遭受化为海盗的汪达尔人的袭击而发出哀鸣。拉文纳对此不能不闻不问，便向君士坦丁堡求援。东罗马帝国闻讯派来了一支称不上是部队的队伍，表现出了东罗马帝国对西罗马帝国的疏远。这支部队与汪达尔人稍一遭遇，便在被杀或被俘之前早早撤回了君士坦丁堡。

西罗马帝国的皇帝终于向汪达尔人族长根西里克派去了请求媾和交涉的使节。这意味着西罗马帝国正式承认自己身上的一块重要部分被人切走。媾和于公元442年达成协议，离汪达尔人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入侵阿非利加只过了13年。

罗马在布匿战争中降服大国迦太基占领北非以来经过了600年的岁月。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罗马曾有过战败，但他们以胜利者罗马的身份去同化曾经是迦太基领土的这片地方，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超越迦太

基统治时代的繁荣昌盛。现在，这个时代也终于结束了。从此开始的世界，不论统治者的人种和民族如何变换，再也不会有胜利者与失败者同化的事情了。

匈奴人

一切不幸，都源于匈奴人所播下的种子。

尤里安努斯皇帝被基督教教会弹劾为“叛教者”。阿米阿努斯·马尔塞利努斯将军在这位皇帝的治下，转战南北。皇帝去世后，他便隐退开始了写作生涯。他在100多年前的4世纪中叶就注意到了匈奴人的威胁。他是出身于叙利亚大城市安条克上流阶层的希腊裔罗马人。这个阶层的人们都从事祖上传下来的工商业，而他却选择了在罗马军队中从军，这实属罕例。也许这种年纪轻轻就开始了征战的经历把他从一个善于抽象思维的希腊人变成了一个具象思维不在任何人之下的罗马人。重复这种具象思维，就能洞见以后的事物。在刚刚进入4世纪后叶的时期，罗马帝国不但没有与匈奴人有过直接接触，甚至鲜有人见过匈奴人。匈奴人还在离罗马帝国“防线”即国界十分遥远的彼方。

阿米阿努斯也和其他许多罗马人一样并没有亲眼见过匈奴人。但是只有他注意到了与匈奴人有直接接触的日耳曼系蛮族的动荡，他看到了他们背后受到匈奴人挤压的实情。所谓情报，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它会以某种感觉作为头绪，将诸多信息像磁石一般地吸引过来。正因为阿米阿努斯没有亲眼见过匈奴人，他才会热心于通过已经认识的北方蛮族收集有关匈奴人的情报。

他这样描绘匈奴人：

与其说他们是用两脚走路的人，不如说他们是野兽。他们骑在马上，用马背和两腿夹运生肉，不烧就吃。扁平的面孔上嵌着两只小黑点一样的眼睛，胡须稀少，个子矮小但体格健壮。他们栖息于森林，身上裹着用麻绳把多张鼠皮连在一起的衣服。这衣服从来不洗，一穿到烂，总是散发着恶臭。鞋子也是用麻绳缝合起来的未经鞣制的羊皮做成，难以行走，不适合长时间步行。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不管去哪里，干什么都是骑马。在战场上他们也极度讨厌下马作战。不过，骑在马上的匈奴人人马一体，就像钉在马上一样，可以发挥出惊人的突击力。

他们住在两轮牛车里，在车棚里吃喝、交媾、生子，做所有的事情。也许因为在最本质的意义上他们是游牧民族，土地再肥沃，他们对耕作也完全没有兴趣。

连蛮族都害怕这样的匈奴人，而称之为“蛮族”。他们不但具有出类拔萃的骑马能力，还有在马背上一箭中的的高超技能。不过，在我看来，下面五项“无”字将他们区别于其他蛮族，这也是匈奴人强悍的原因：

一、无目的，无目的地。这就允许他们采用随机应变的战法。

二、对拥有房屋无兴趣。这显示出他们对财产和积累财富不感兴趣。但他们嗜好黄金和黄金制品。不仅是黄金，只要是发亮的，都喜欢。

三、无法律。因此，上面人的命令就是圣旨。

四、无家族守护神。这表现出他们没有家族观念，因而人质这种担保形式对他们不适用。

五、无确保未来食物的观念。只要有机会，不论何时何物，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抢夺。

阿米阿努斯的警告没有被当时的当政者听进去。半个世纪后的5世纪，罗马帝国终于也与匈奴人有了直接接触。被匈奴人驱赶的日耳曼

系蛮族入侵罗马境内，就地盘踞。匈奴人出现在作为罗马边境的多瑙河也就顺理成章。这里几乎与现在的匈牙利相重叠，成为匈奴人的新根据地。

与匈奴人的正式接触是东罗马帝国先开始的。罗马帝国东西分裂后，多瑙河中下游归入了东罗马帝国，而匈奴人的新根据地正位于多瑙河中游。这就使得当时的东罗马帝国拥有的关于匈奴人、尤其是关于其头目阿提拉的情报绝对多于西罗马帝国。不过，西罗马帝国“大元帅”埃提乌斯曾在匈奴人中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

纵观匈奴人对东西罗马帝国的做法，我们可以知道，以公元444年为界，其前后截然不同。以前，阿提拉一直推兄长为族长，自己居于其次。公元444年，他替代了遭雷劈（传闻如此）而死的兄长，开始一个人统率匈奴人。公元444年以前的匈奴人对被其驱赶的日耳曼系蛮族而言非常可怖，但对东西罗马帝国而言，还是容易抵御的对手。

东罗马帝国与阿提拉的兄长贝里达之间缔结了“同盟”协约，东罗马帝国每年向匈奴人支付700罗马磅（合263公斤）金条。名目上是佣兵费，实质上是不再渡过多瑙河入侵东罗马帝国的“代偿金”。

西罗马帝国与匈奴人之间的关系则完全建立在埃提乌斯与匈奴人的个人关系上，匈奴人可以响应埃提乌斯的请求借兵给他。由于没有正式的“同盟”协约，人们不知道埃提乌斯为此支付了多少报酬。

一般人认为，匈奴人对报酬还是基本满意的。因为根据留存的记录，到公元444年为止，匈奴人曾4次借兵给埃提乌斯：公元429年与竞争对手费利克斯作战、公元432年与波尼法提乌斯及其背后的加拉·普拉西提阿决战、公元437年对勃艮第人作战、公元439年对西哥特人作战。可见，决定埃提乌斯在西罗马帝国国内地位和权力的战斗几乎次次都有匈奴人参与其中。不过，与埃提乌斯个人亲近的是匈奴人重要

人物之一，名叫阿斯帕尔。他与现在匈奴人族长的阿提拉似乎关系不特别密切。

阿提拉

在组织不成熟、又没有法律约束的匈奴人社会里，族长的命令具有绝对的权威。阿提拉是最适合于这种组织的领袖。

匈奴人在相当于今天匈牙利的多瑙河中游一带立足下来，阿提拉登上前台，再次开始行动，矛头直指南面广阔的东罗马帝国领土。阿提拉统率的匈奴人首先占领了罗马时代称为维纳契姆，即今天的科斯托拉茨热。在这附近，有征服达契亚时图拉真皇帝让人建造的全长超过一公里的石桥连接多瑙河南北两岸。

石桥其实只有桥墩是石头建造的，上面的桥梁却是木造的。3世纪后叶，罗马帝国从多瑙河北的达契亚撤退时，桥梁遭到破坏。不过，排列在河里的20根桥墩却依旧屹立，显示着罗马人的高超技术。只要在桥墩上铺上木板变成临时桥梁，人马通行便绰绰有余。阿提拉把科斯托拉茨热作为第一个目标，也是因为匈奴人修复了这座桥梁，从这里渡过了多瑙河。无论造多少筏子，把人马全部渡过大河多瑙河，风险既大，费时也多。

阿提拉和匈奴人占领了科斯托拉茨热后，接着占领了距此向西不到100公里的辛吉杜努姆（现在的贝尔格莱德），然后又占领了锡尔米乌姆（现在的米特罗维察）。阿提拉的想法是，渡过多瑙河后迅疾占领这一带的重要据点，解除后顾之忧后再度南下。

多瑙河在被称为“罗马帝国防御力量测量表”的时代，沿河军团基地、城寨和要塞以及用于监视的碉堡连绵不断，形成了罗马帝国的北

面“防线”。其中，从上游顺流而下，后世称为雷根斯堡、维也纳、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的这四个地方被视为重要基地，得到巩固强化。这四地中间有三处后来成了“中欧”国家的首都。古代罗马人在城市建设中的布局感之灵敏令人惊叹。这四大重要基地与帝国各地之间自然都有大道连通。四地之中位于重要“防线”多瑙河最下游的贝尔格莱德，有通往帝国东部的干线大道。这条大道一路向东南，经过君士坦丁大帝出生的纳伊苏斯（现在的尼什）、塞尔迪卡（现在的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菲利波波利、哈德良皇帝建设的哈德良堡（现在的土耳其埃迪尔内），到达曾经被称为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现在的伊斯坦布尔），斜贯巴尔干地区。阿提拉现在就挺进在这条大道上。



阿提拉（16世纪制作的浮雕）

阿提拉率领的匈奴人不光是行军挺进。他们就像狂怒之神一样袭击、掠夺、破坏、焚毁，然后离去。给他们起的绰号“上帝之鞭”很快便在罗马帝国基督教徒中传开。传说在匈奴人退去之后，已听不见狗

吠。不便带走的人已经悉数被杀，离去的匈奴人后面拖着长长的俘虏队伍，也是常见的景象。

匈奴人一路狂飙，离君士坦丁堡只有不足100公里了。从那里向东罗马帝国的皇帝送去了他们的要求：

一、把根据以前的“同盟”协约支付的每年700罗马磅金条提高两倍，每年支付2000罗马磅（合787.5公斤），另付临时金6000罗马磅（合2.25吨）金条。

二、归还匈奴人军队的开小差者。

三、如果希望恢复被匈奴人俘虏的罗马人的自由，每个人头支付12枚苏勒德斯金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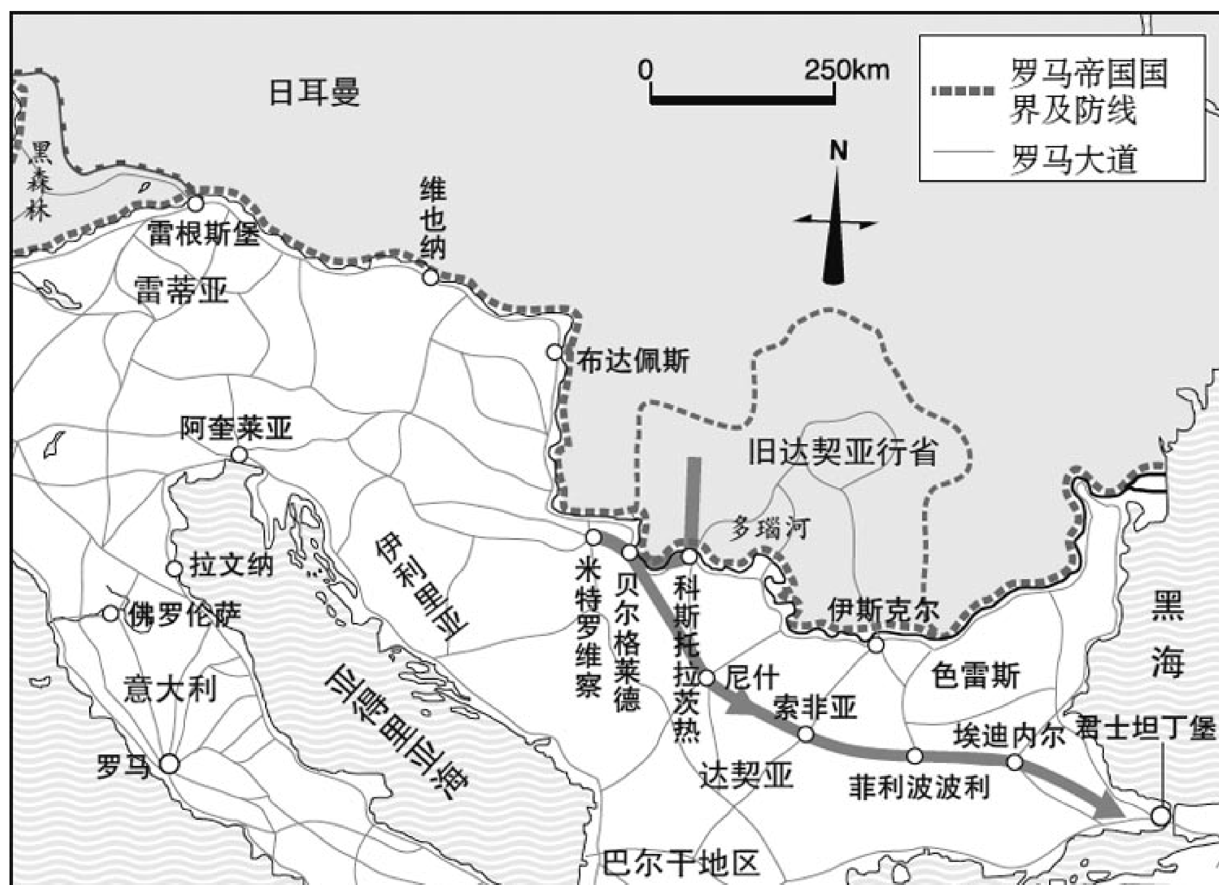
面对这些要求，年已46岁的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只是全身颤抖。东罗马帝国实际统治者皇帝的姐姐普尔喀丽娅起初只想接受第二个条件——归还逃兵。

可这些逃兵却不是匈奴人。匈奴人把败给自己的日耳曼系蛮族男人也编进自己的军队。这些人不习惯匈奴人的生活，也不习惯匈奴人的残虐行为，纷纷投降了东罗马军队。阿提拉要求归还他们。东罗马帝国接受了这个要求，他们便成群地跟着东罗马将士回到了匈奴人的阵营。

阿提拉迎接他们的行动也很迅速。他命令这些人全体趴在地上，在他们身上盖上帐篷布，让匈奴人士兵骑着马一边欢呼一边在帐篷布上跑了好几个来回，把他们全部踩死，让目睹这一行径的东罗马将士哑然失色。

面对这一暴行，君士坦丁堡的宫廷吓得发抖，但也激起了敌意。与西罗马帝国军队一样，东罗马帝国军队中也有很多日耳曼系的蛮

族。被匈奴人的马蹄残杀的士兵也是他们的同胞。这时，主战派终于占了上风，向阿提拉派出了部队。然而，日耳曼骑兵哪里是匈奴骑兵的对手，一触即溃。东罗马帝国只得与阿提拉缔结“同盟”协约，接受了他的全部条件。



匈奴人入侵巴尔干

可以说这是对亚细亚系蛮族匈奴人的无条件投降。送些豪华纺织品就能软化匈奴人的乐观看法被击得粉碎。君士坦丁堡派往阿提拉方面的使节任务已经不是交涉，他们成了忠实履行协约的单纯行政官员。

阿提拉竟然对使节的人选挑三拣四。其理由是，自己拥有统合罗马人以外所有民族和部族创立帝国的意志，与罗马帝国的皇帝平等，东罗马帝国派遣的使节也应具有相应地位，以便与和皇帝具有同等资

格的人交涉。君士坦丁堡连这一条都接受了。元老院议员和基督教教会主教等在东罗马帝国具有崇高地位的人成了派往阿提拉的使节。

这样做产生了另外一个出乎意料的作用。过去关于匈奴人及其酋长阿提拉的情报都只是通过第三者的传闻，现在自己成了当事人，所说之言成为现场证人的证言。既然使节都是地位崇高的人，肯定会有见多识广的秘书官与他们同行。

有一位人物，名字叫普里斯库斯，不知是使节之一还是使节的秘书官，他以教授修辞学为业，文章也写得好，著有《拜占庭帝国史》一书。该书有部分片断残留下来。他是公元449年被派往阿提拉处的。东罗马帝国与阿提拉的“同盟”协约缔结于公元447年，他的派遣表明协约的履行并非易事。阿提拉的要求没完没了，甚至要求东罗马帝国承认从纳伊苏斯到北多瑙河的整个地区为匈奴人的领土，这意味着要吞并达契亚和色雷斯两个行省。

公元449年普里斯库斯被派往阿提拉处，他这样描写当时的情形：

> 我们一行进了纳伊苏斯（现在的尼什）城。这座城市是君士坦丁大帝出生的地方，也是干线大道经过的地方，现在已为匈奴人的侵袭破坏殆尽，除了几个人在已是废墟的教堂聊避雨水霜露外，全城已是无人之境。纳伊苏斯附近流淌着摩拉瓦河，大道也沿着这条河通向西北。我们一行沿着摩拉瓦河，行进在大道上。
>
> 大道周边尽是无人地带，许多被匈奴人杀死的人已成白骨，死者无人掩埋，被弃置在被害之处。
>
> 行走在大道的途中，伊利里亚军团的大元帅在等着我们，把5个逃兵托付给我们。这5个人将按皇帝在协约里约定的那样引渡给阿提拉。带着这5个人，我们一行渡过多瑙河，进入了阿提拉的根据地。

从渡过多瑙河开始，匈奴人的卫队就一直跟着我们。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走了大约13公里，来到了阿提拉的大本营。在交割了5名逃兵后，我们得到许可会见阿提拉。

很多蛮族人麇集在阿提拉的帐篷周围。我们进入帐篷后马上认出了坐在木凳上的阿提拉。因为其他人都站着，只有他坐着。

我们站在离那张粗糙御座老远的地方，只有马克西米努斯走上前去，向阿提拉致意，转达了皇帝祝阿提拉和匈奴人更加繁荣的话，递上了皇帝的亲笔信。蛮族头领也祝愿皇帝和罗马人繁荣。

阿提拉在帐篷里被几名高官和武将围在中间。坦率地说，我对阿提拉本人衣着之朴素感到很震惊。与他不同，高官和武将们个个都穿着质地优良、色彩丰富的华丽服装，上面绣着大片花鸟，一定是从中国人和波斯人那里抢来的。

在这位把从莱茵河到多瑙河的大片土地置于自己统治之下的部族酋长的帐篷里，没有一件值钱的家具和有艺术价值的摆设。帐篷里也没有床，只有可能还值点钱的毛皮扔在地上，另有几张粗糙的木制椅子。阿提拉把弓和斧立在身旁，此外就再没有别的武器了。

阿提拉个头虽矮，但体格强壮。他面色暗黄，几乎没有胡须，脸型扁平得近乎奇妙。他两眼斜视，凹陷的黑眼睛像看稀罕物件似的盯着我们。

好像他吃饭、睡觉、见人都在这顶帐篷里。虽然没有餐桌，但有餐具，都是用金银做成，无疑也都是抢来的。

阿提拉是一个不停行动的人。我们尽管跟他保持着一定距离，也还是得骑马跟他各处行走。渡过几条河之后，终于到了他定为首都的城镇。与其叫城镇，不如说这只是个村庄。阿提拉木造的房子周围只围了一道根本起不到防卫作用的木栅栏。匈奴人二把手奥涅格西姆斯的略小一点的房子建在阿提拉的房子附近，周围也围着木栅栏。

阿提拉刚一进村，一群姑娘就唱着歌迎了出来。有几个人戴着白色面纱，其他人捧着面纱跟在后头。这时，奥涅格西姆斯的妻子

带领着大群女奴出现了，向阿提拉奉上了食物和酒。这是匈奴人最高敬意的表示。

阿提拉从臣下们献上的银盘中捏起食物来吃，喝下了女人们献上的酒杯里的酒。整个过程他都骑在马上。

这就是公元449年时阿提拉与东罗马帝国之间的关系。这离阿提拉在兄长死后成为匈奴人的头领以来只不过5年时间。照此态势发展下去，东罗马帝国也许要比西罗马帝国先被阿提拉统率的蛮族联军所灭。可是，这种情况在第二年的公元450年因下面的两个原因发生了骤变。

公元450年7月28日，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去世，享年50岁。他没有做一件皇帝应该做的事情。虽然如此，在罗马帝国变为基督教国家以后，皇帝是依神意而定的。靠着这个对统治权世袭非常有利的规矩，狄奥多西二世仅因为是先帝之子就享受了长达42年的统治。也许是因为心里明白这一点，这位皇帝是一位热心的天主教徒，甚至传说他要把皇宫变成修道院。在没有留下男孩的皇妃死后，他对传宗接代也毫不热心。一直替弟弟掌管国家的姐姐普尔喀丽娅还得决定由谁来当下任皇帝。

她是一位天主教徒，虔诚程度不亚于弟弟，甚至被传为是住在皇宫里的修女。在目前情况下，人们通常会选择对自己的权力不会形成障碍的无能之辈充任下任皇帝。然而，她没有这样做，长年统治帝国的经验似乎没有白费。

君士坦丁堡元老院议员马利基安即位东罗马帝国皇帝。4世纪后，罗马元老院议员已不再看其是否具有军事经历了。但君士坦丁堡元老院则不同，议员是授予退役将军的，具有很强的名誉职务的色彩。元老院在罗马建国当初即已存在，到这时已有1300年的历史。君士坦丁大帝130年前建都于君士坦丁堡。这位大帝以自己的名字命名首都，并

要有像罗马一样的“元老院”（senatus）。君士坦丁堡元老院即按此意而创设。时间一长，便会产生祖辈皆为元老院议员这种意义上的元老院阶层。但君士坦丁堡没有这个阶层。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议员是武将和高级官僚退役后的一种名誉职务。

新即皇位的元老院议员马利基安也在东罗马军队中积累了资历。他出身于多瑙河下游色雷斯地区（现保加利亚）。这一带历来以盛产良马和优秀士兵而为世人所知。他非名门出身，也未受过高等教育，且已年过六旬，但惯于征战。



马利基安

罗马帝国在成为基督教国家之前，凭此即能当上皇帝。而成为基督教国家以后，能否做皇帝不凭“人意”而凭“神意”，“神意”成了比什么都重要的必要条件。于是，已故皇帝的姐姐、先帝阿卡狄乌斯的女儿普尔喀丽娅这位与“神意”有缘的人便嫁给马利基安，从而使他得以即位。普尔喀丽娅提出的唯一条件是，因为自己是向神起誓的贞洁之身，所以不能同床。她已是年过五旬的女人，马利基安一定不会感到有什么不合适。

不愧是军人出身，马利基安万事积极。他登基后立即断然地全面毁弃与阿提拉的协约。根据与这个匈奴人头领的“同盟”协约，阿提拉的领土南起巴尔干地区的要地之一纳伊苏斯。这样，不仅一直被作为东罗马帝国领土的达契亚，就连连绵到其东面的色雷斯的大部分都成了匈奴人的领土。对色雷斯出身的马利基安来说，仅此一点就是一种屈辱。

新皇帝老当益壮，通知阿提拉毁弃协约的决定，同时着手加强东罗马军备，而且宣布自己统率军队。东罗马帝国皇帝连续两代连出君士坦丁堡都很罕见，相隔半个世纪之后也换成了征战沙场的皇帝。即使足不出首都，罗马皇帝也是军队的最高司令官。马利基安宣布自己要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司令官，并付诸行动。

马利基安皇帝把强化后的东罗马军队几乎全部投入到西面的多瑙河流域。那时与波斯王国的关系大体处于良好状态，东面的幼发拉底河靠常规的防卫军即已足够。

阿提拉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变化。就在这时，对阿提拉来说，好消息从天而降。

西罗马帝国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的姐姐霍诺丽娅，她的父亲是共治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三世，母亲是先帝狄奥多西一世的女儿加拉·普拉西提阿。霍诺丽娅公主皇统正宗，然而，自从罗马立帝国成为基督教国家以后，公主在罗马帝国并不自由。既是先皇的女儿，又是现皇帝的姐姐，她就不能与“神意”无缘。她不能随便与人结婚。虽然不是现代的“核扩散”，但任何事物一旦“扩散”，其所具有的力量就会弱化。所以，公主结婚只能是政治婚姻。可是，帝国认为可以让公主出嫁的对象并不常有。



霍诺丽娅

接受“神意”者的女儿结婚生的孩子也能继承“神意”。皇女所生子女的“神意”继承分量与皇子所生子女并无多大差别，这很容易成为皇室内部纠纷即家庭纷争的原因。罗马帝国在成为基督教国家之前，皇帝的女儿也被用于政治婚姻。但因为没有“神意”干涉，并不存在没有合适的政治婚姻对象就不能结婚的情况。实际上，皇女可以很轻松地嫁给父亲属下的将军等。这一切在罗马帝国变成基督教国家之后完全改变了。先皇的女儿、现皇帝的姐妹没有合适的政治婚姻对象就终身不能结婚。最适合至死不婚的职业是把一生奉献给神的修女。没有政治婚姻对象的公主最终的去处只有修道院。

霍诺丽娅也是如此，30岁还未能结婚，她也不想进修道院。恰巧就在此时，压制她内心不满的母亲加拉·普拉西提阿去世了。霍诺丽娅有了自作主张的条件。

公主霍诺丽娅把身边一个颇得信赖的宦官偷偷地派到阿提拉那里，让他带着书信和一看便知是属于公主所有的昂贵戒指。信中写道，如果娶她，作为嫁妆阿提拉将得到西罗马帝国领土的一半。

阿提拉打算利用这个机会。东罗马帝国皇帝换成了马利基安，他采取了强硬路线，先头部队早已接近多瑙河，只等马利基安亲率的大军一到，决战即在眼前。

阿提拉派使节去西罗马帝国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那里，请求与皇姐霍诺丽娅结婚。瓦伦提尼安大惊失色，对姐姐处以监禁处分。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与身在高卢的联军总司令埃提乌斯讨论后，皇帝拒绝了阿提拉的请求。可是，阿提拉的目光已从东罗马帝国转向了西罗马帝国。匈奴士兵也开始从根据地多瑙河中游地区向莱茵河移动。

西罗马帝国就这样成了阿提拉的目标。埃提乌斯这位西罗马帝国军队事实上的统帅不得不开始把以往长期处于亲密关系的匈奴人当做敌人。

香槟会战

阿提拉仅仅恣意横行了10年便留名于古代末期的西方历史上。他胆大妄为，一旦决定便毫不犹豫。他有卓越的统率能力，而且无论属下的将军如何沉迷于奢侈生活，他个人却没有这方面的欲望，是最适合做蛮族头领的人物。但要如他自己所说，要统合日耳曼系蛮族在北欧创建一个大帝国，他还缺乏冷静透彻的合理战略。换句话说，他走哪算哪，并无规划。我甚至认为，这样的人能够青史留名，或许是因为基督教徒恐惧他，说他是“上帝之鞭”。

阿提拉不时做出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姿态来威胁东罗马帝国，从而攫取了巴尔干地区的大半地区。尽管3年后被新上台的强硬派马利基安皇帝打得措手不及，但证明了以军事力量作为威慑，巧取豪夺的战略行之有效。如果这种方法也适用于西罗马帝国，就应该首先把军队从多瑙河中游移驻到上游，在那里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领土，然后一路

南下，翻越阿尔卑斯山脉，入侵意大利半岛北部，迅速包围皇帝所在的拉文纳。

拉文纳并非易守难攻，城市规模很小，只要实施海陆封锁，稳扎稳打，必可攻陷。因为蛮族不擅长海陆持续封锁的持久战，所以只有对手是蛮族，拉文纳才易守难攻。

阿提拉并无必要攻陷拉文纳。如果攻击皇帝所在的拉文纳，瓦伦提尼安三世必然会命令身在高卢的埃提乌斯返回。西罗马帝国军队总司令埃提乌斯既不能拒绝，也不能充耳不闻。虽然并非得已，他也得回来救驾。

埃提乌斯在高卢不败，并不是因为他统率着一支强大的罗马军队。他的胜利靠的是向少年时代就亲密交往的匈奴人借兵，或是因为成功地将某个在高卢自相残杀的北方蛮族化敌为友。可这样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在意大利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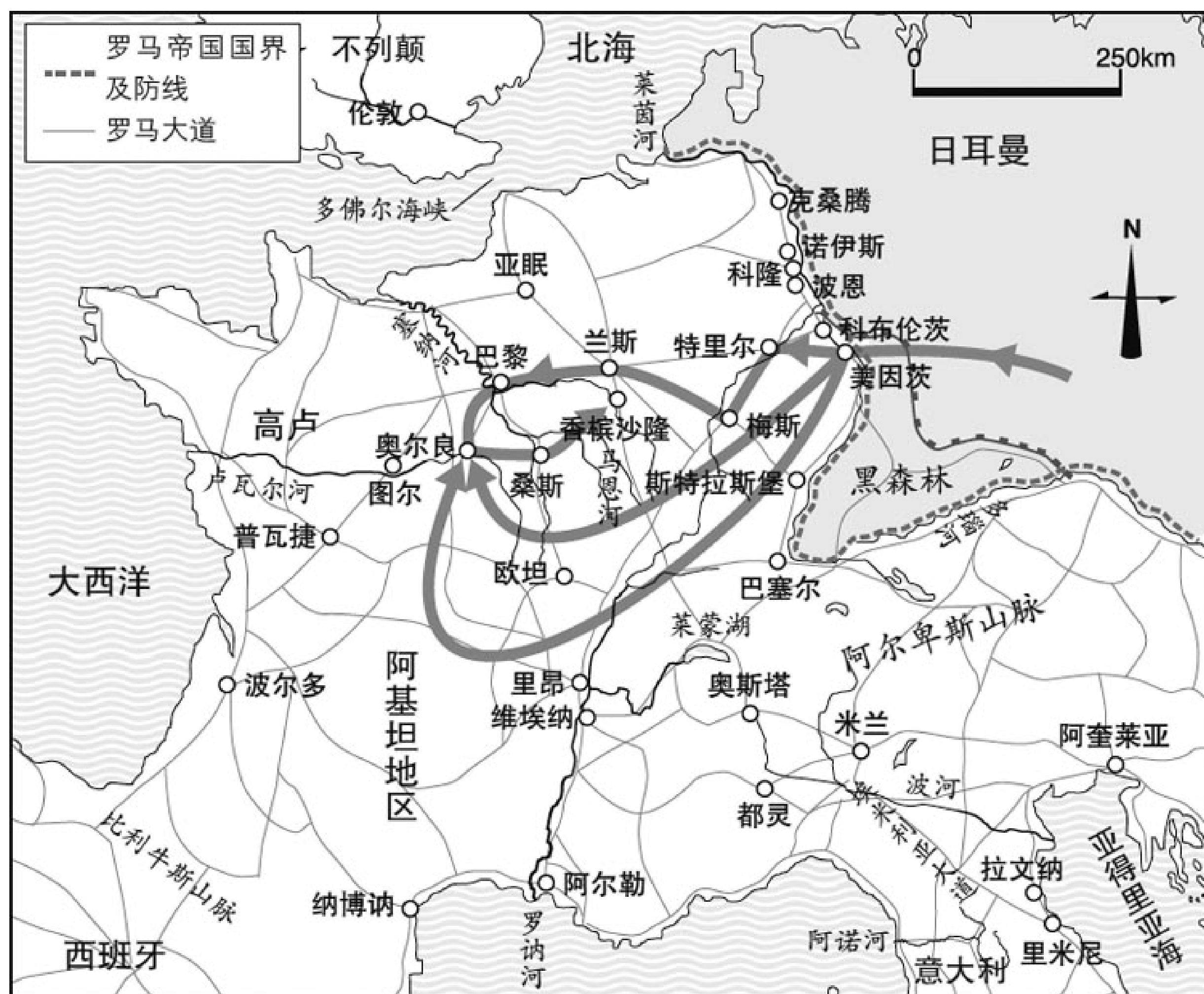
首先，匈奴人如今已成敌人而不能依靠。其次，不可能从高卢带某个蛮族来。他们正在高卢为保卫领土而针锋相对，对意大利并无兴趣，如果接受埃提乌斯的邀请去了意大利，就等于允许其他蛮族在他们不在时占领自己的领地。最终埃提乌斯只能率领自己直接指挥的士兵前来。

罗马军队也只是个名分，实质上不过是蛮族佣兵的乌合之众，有着佣兵固有的弱点。他们并不是在战场上会被迅速打垮，而是一见形势不利就逃之夭夭。与手下尽是这些士兵的埃提乌斯不同，阿提拉的匈奴士兵只要能抢到值钱的东西，就是挨刀劈也不会倒下。司令官个人的战术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多大效力。因而，进攻拉文纳时，即使埃提乌斯回来，阿提拉也稳操胜券。况且，身在拉文纳的皇帝并没有面对不利形势坚持下去的坚强意志，惊慌之余，会轻易地把从多瑙河到意大利北部之间的土地拱手相让。

然而，阿提拉并没有渡过多瑙河剑指意大利，而是渡过莱茵河进入了高卢。据说这起因于下面这件事，真令人无语。法兰克人族长死后，其长子和次子兄弟阋墙，兄弟二人分别向阿提拉和埃提乌斯求援。阿提拉为此去了高卢。这不仅让拉文纳的皇帝松了一口气，也使身在高卢的埃提乌斯立场变得强硬起来。

原本日耳曼系蛮族是因为遭到匈奴人驱赶才入侵高卢并在那里建立自己领地的。他们在高卢寻求定居之地，也是因为匈奴人统治了日耳曼，自己已经回不去了。他们自然会把匈奴人入侵高卢看做关系到自己存亡的危机。阿提拉入侵高卢并无确定的愿景，他居然允许埃提乌斯的罗马军队与日耳曼系的众多蛮族结成了统一战线。

公元451年4月初，阿提拉率领匈奴人从莱茵河中游的美因茨附近渡过莱茵河涌进高卢。匈奴人士兵号称有3万人，但其中有他们带去的被打败的其他蛮族，因而实际战斗人员总数不得而知。他们渡过莱茵河就与法兰克人汇合在一起，战斗人员总数也许有10万。



匈奴人入侵高卢

他们进入高卢后兵分三路，使人感到军势浩大：

第一路军由阿提拉率领从美因茨向特里尔进发，经梅斯到兰斯，再经巴黎逼近奥尔良。他们沿罗马大道一路挺进，不到两个月就迅速突入了高卢中心部位。

第二路军沿着第一路军行军路线南边的大道行进，直指奥尔良。第三路军往南绕道，插向高卢中部，然后向奥尔良迂回包抄而去。他们没有伤害高卢北部，那里是法兰克人的领地。三路军队边走边烧杀抢掠，沿途所过，不论城市还是乡村，一概不能幸免。这是名副其实的“侵略”（invasion），英语这个词语的词源是拉丁语“invāsio”。顺便

说一句，拉丁文的这个词据说产生于帝国后期。这大概是因为不论是在可称为高度成长期的共和政体时代，还是在可称为稳定发展期的元首制时代，罗马人都不需要靠这个词生存。

埃提乌斯是一位生活在“侵略”已是家常便饭的时代的罗马人。他这时在高卢南部的阿尔勒，那里是他的根据地。他得知阿提拉入侵高卢后，便马上向西哥特人的族长提出共同作战的请求。西哥特人正在西邻法国南部的阿奎塔尼亚地区（现在的阿基坦）不断扩张势力，这里尚在罗马的势力范围之内。年迈的西哥特人族长狄奥多里克送来了同意的答复。埃提乌斯同时还请求其他日耳曼系蛮族也一同参战。公元451年6月，埃提乌斯实现了这个反阿提拉联军的构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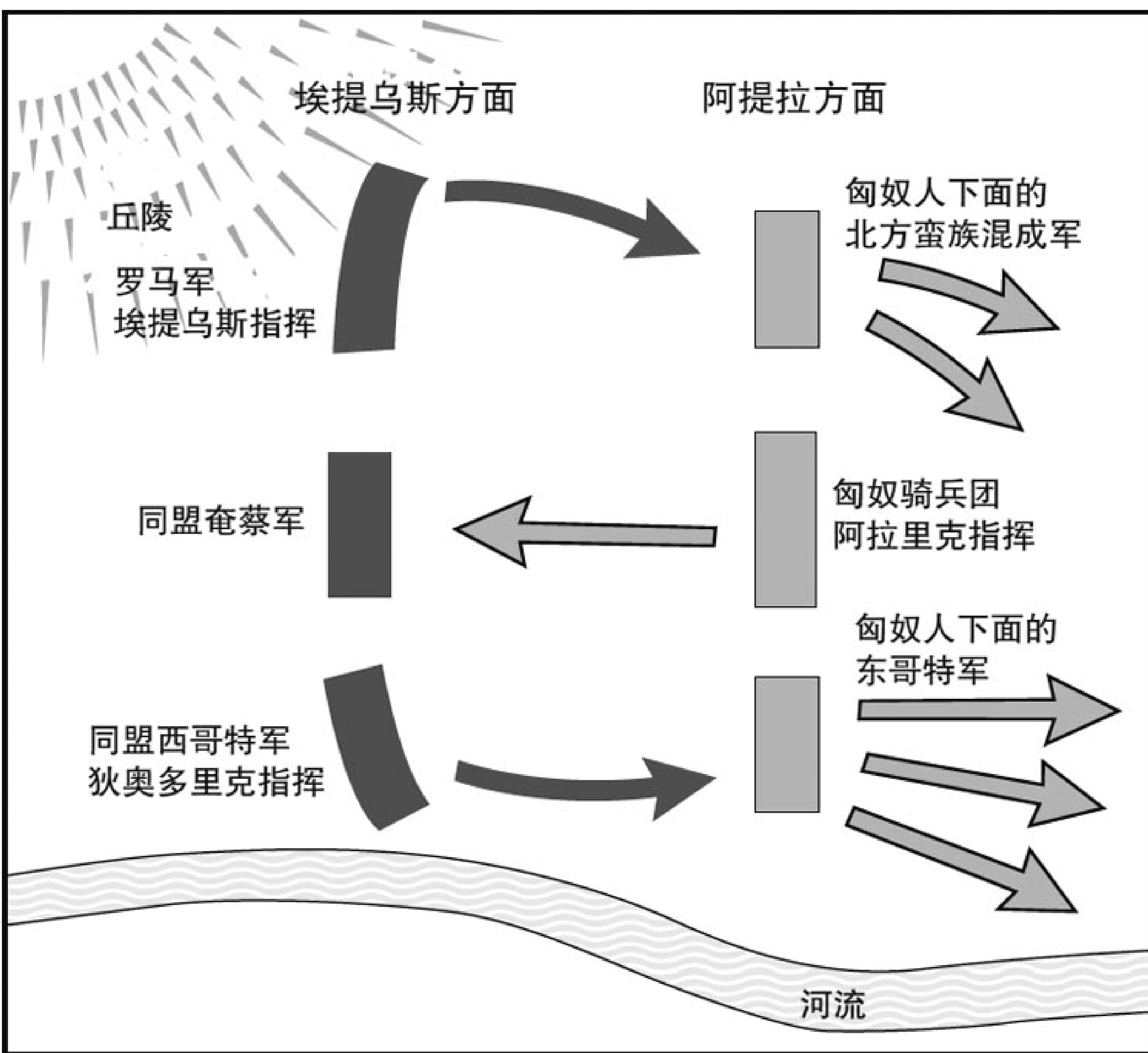
反阿提拉联军从南面和西面奔赴阿提拉正在进攻的奥尔良。蛮族并不擅长必须打持久战的城市攻坚。在罗马时代，奥尔良被称为凯纳布姆（Cenabum），是高卢中部的重镇，地处卢瓦尔河沿岸，围有坚固的城墙。我们不清楚阿提拉为什么会瞄上进攻起来明显棘手的奥尔良。阿提拉包围奥尔良果然久攻不下，这给了埃提乌斯准备反击的时间。

阿提拉在得知埃提乌斯已经逼近，决定解除对奥尔良的围攻后撤退。为何会考虑撤退也无人知晓。我们只知道，阿提拉似乎打算再次渡过莱茵河回日耳曼去。但这样在半道上就会被埃提乌斯追上。我们知道他们从奥尔良到了桑斯。之后他们大概想走两个月前来时的路回到兰斯、特里尔，然后在美因茨渡过莱茵河。可是，他们在到达兰斯之前就被埃提乌斯追上。

这一带在罗马时代被称为“坎帕尼亚”（Compania），后世称为“香槟”（Champagne），是沿马恩河两岸展开的平原地带，位于罗马时代汇集了7条大道的大都市兰斯以南40公里左右的地方。

阿提拉被追上后在这里掉转方向，准备会战。他相信自己的骑兵天下无敌，只要以平原为战场，就能充分发挥骑兵的战斗力。

公元451年6月24日，是阿提拉与埃提乌斯以香槟平原为舞台展开会战的日子。这场会战在历史上留下了“卡塔洛尼平原（Campi Catalaunici）会战”之名。“卡塔洛尼”是高卢未被罗马化之前居住在这一带的凯尔特民族中一个部落的名字，用这个名字命名的“卡塔洛尼”城就是现在的香槟沙隆。所以，后世也把这次会战称为“沙隆会战”。



卡塔洛尼会战

埃提乌斯大概想降低匈奴人骑兵的速攻力，在山丘和河流之间的地带布下阵势。

老狄奥多里克率领的西哥特军队布在可以眺望到河流的右翼，中军集中了其他蛮族兵，埃提乌斯亲自率领的左翼则在山脚下布阵。全军呈弓形阵势。

阿提拉的军队左中右翼成直线排列，左翼的是东哥特人，他们可以望见河流。与埃提乌斯对阵的右翼是与东哥特人一样投靠阿提拉的蛮族兵。中军是阿提拉率领的匈奴骑兵团。

从这个阵形可以看出，埃提乌斯的战术是即使中军被压制，僵持时左翼和右翼可以击退敌人的左右两翼，孤立中军的骑兵团。

而阿提拉的战法是用最具攻击力的骑兵击破罗马方面的中军，把敌人一分为二，再由自己军队的左翼和右翼分别收拾。但是，这个战术要想成功，阿提拉的左翼和右翼必须敢打敢拼，骑兵的猛攻也必须压制住埃提乌斯的中军。

只看布阵，那简直就是共和政体时代罗马军队战术的翻版，使人觉得这场会战打得宛如图上画的那样合理完美。然而，两军都为布阵耗费了太多工夫，时间流逝，战斗直到下午3点才终于打响。这哪里是什么玩弄战略战术的会战，简直就是一场比拼力气的混战。埃提乌斯和阿提拉的战术都未能奏效。

担任罗马军队右翼的西哥特人英勇善战，敢打敢拼，甚至拼到老族长狄奥多里克战死沙场。埃提乌斯指挥的左翼也把山丘围得铁桶一般，从敌人侧翼发起进攻，消灭了敌人的右翼。可是，埃提乌斯的中军没有经得住匈奴骑兵团的猛攻。很明显，阿提拉方面也只有配置在中军的骑兵团打得如愿，左右两翼都已彻底崩溃。

战斗变成了混战，变成了白刃战。两军都未能按自己的战术作战，最终成为一场伤亡惊人的会战。太阳落山时分，阿提拉分割罗马军队的意图失败，他完全被压制住了。阿提拉回到自己阵地时神情沮丧，脱口说出干脆一把火烧掉阵地，跳进火里死了算了的话来。

想起来，如此令人畏惧的匈奴人也在正规战斗打响的瞬间败北，直让人觉得蛮族只是在袭击手无寸铁的民间百姓时才能逞强。

如果埃提乌斯愿意，让“上帝之鞭”的阿提拉在这场会战中化做香槟平原上的露水无影无踪。西哥特人因老族长战死反倒燃起了战斗意志，老族长狄奥多里克之子托里斯蒙扬言，要马上攻进敌人阵地，不待明日。

埃提乌斯阻止了他，他劝这位西哥特年轻人说，要先回领地，重整老族长死后的西哥特人。战死的老狄奥多里克有4个儿子，托里斯蒙是其中之一。他担心父亲死后会有哪个兄弟出来独领全族，便听从了埃提乌斯的忠告，带着西哥特的士兵回阿基坦去了。他们走后，埃提乌斯光靠自己手下的士兵便无力追击阿提拉。

一度想自杀的阿提拉就这样安然渡过莱茵河，回到了日耳曼，看上去像是埃提乌斯救了他。

为什么要放走阿提拉？当时就有许多人抱有疑问，是不愿意毁灭从少年时代起就亲密以待的匈奴人，还是怕消灭了匈奴人，西哥特人在高卢的力量过强？

没有人知道这时埃提乌斯的内心想法。但阿提拉和匈奴人受到重创、逃脱覆灭则是事实。令人恐惧的阿提拉在正规战斗打响时即告败北，入侵高卢不足3月就再次渡过莱茵河，逃往东方。一般想来，不可一世的阿提拉会老实一阵了。可是事情并非如此。第二年他们就又来进犯意大利了。上次入侵高卢的理由是应法兰克人请求，而此次来犯

的理由是为了与公主霍诺丽娅结婚。既然送来了戒指，那就是婚约，他要求实现这个约定——结婚。

要从多瑙河中游地区进军意大利，最妥当的路线是从自西向东环抱北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脉的最东端进入。阿提拉率领匈奴人就从这条路线进入了意大利。他们首先进攻了像绊脚石一样挡在路上的阿奎莱亚。但是，和其他蛮族一样毫不例外，匈奴人也不善于打攻城战。香槟平原的会战结果也传到了意大利。从现在残留的遗迹根本无法想象，罗马时代的阿奎莱亚是位于亚得里亚海北端的意大利东北部首屈一指的海港城市。这里有防御力量常驻，居民的自我防御意识强烈。这已够阿提拉为难了。比攻占阿奎莱亚更优先的是如何保障数万士兵的粮食和满足他们掠夺的欲望。

阿提拉只分出部分兵力参加阿奎莱亚的攻防战，而把剩下的大半兵力放出去掠夺整个意大利北部。匈奴人在意大利北部充分表现出了他们恣睢暴戾、狂暴无度的特点。康科迪亚陷落了，帕多瓦、维琴察，继而是维罗纳、克雷莫纳、皮亚琴察、帕维亚、米兰……惨剧上演了，可以说所有城市都被匈奴人的马蹄蹂躏，无一幸免。

每座城市都有高高的城墙围绕，但还是一个个地陷入敌手。其原因是居民没有选择抵抗，而是开门揖敌。帝国末期的罗马人，已经不再指望只要顽强抵抗，皇帝的部队就会马上赶来救援。

威尼斯诞生

阿提拉向身在拉文纳的皇帝要求实现与公主霍诺丽娅的婚约，但未向拉文纳派兵。这也许是优先采用了他的惯用伎俩，首先让意大利北部全境陷入恐怖之中。但居住在意大利半岛北部的人们认为这正是上帝挥来的无情之鞭，直接导致了后来中世纪时代以海洋通商国家闻

名于世的威尼斯共和国的诞生。在25年前出版的《海洋之都的故事》一书中，我这样起笔道：

……

阿提拉要打过来啦！

匈奴人要冲过来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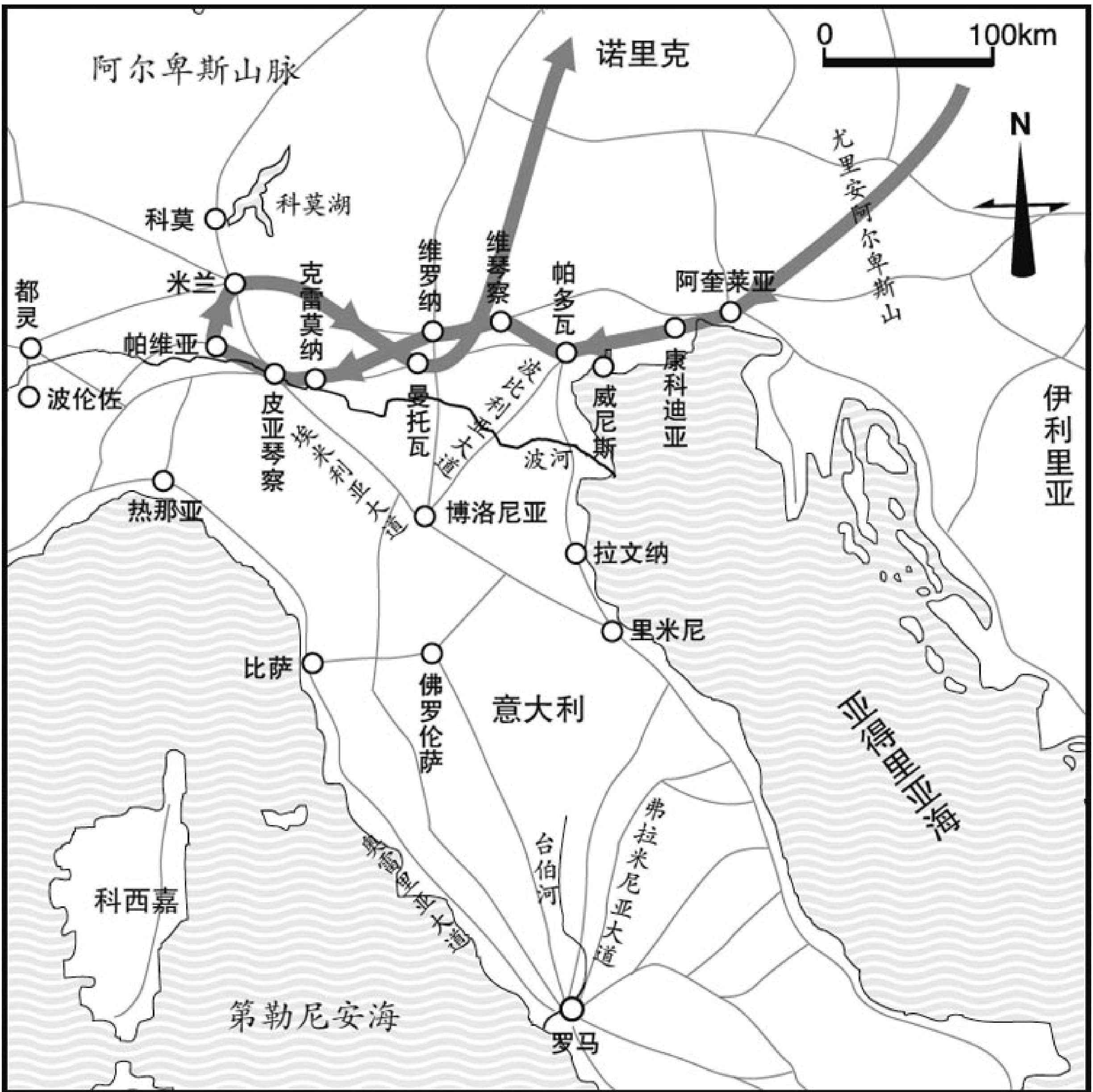
阿奎莱亚遭到火攻。

听说连女人孩子也全都被杀光！

蛮族可怕，抵抗与否统统被杀，献出财宝也不能幸免。匈奴人扫荡之后，寸草不留，满目疮痍。消息如旋风般传播开去。

这已到了罗马帝国的末期。这是蛮族反复入侵、人们已坠入恐怖深渊的时代。阿提拉的匈奴人暴戾无比，较之其他任何蛮族都更加令人恐怖。居住在意大利东北部威尼托地区的人们，听说他们的主教教堂所在地阿奎莱亚遭到可怕的匈奴人袭击，大为惊慌。

“逃到哪里去呢？”



匈奴人入侵意大利

没有一个人想逃往山区。这一带是由多条流入亚得里亚海的河流冲击而成的平原，如果要逃到对面很远的山里，恐怕还没跑到就会被追杀。这谁都看得见。那么沿亚得里亚海海岸南下，逃到帕多瓦，或者更南面的拉文纳行不行呢?

可是，说这话的人马上就把话咽了回去。蛮族一定是冲着拉文纳或者罗马去的。在他们行进路线的前方想逃脱是不可能的。被人请示

的牧师也说不出任何话来。牧师仰天举起双手，与其说是在向神祷告，不如说是在诉说无可奈何的绝望。

就在这时，天上传来一个声音：

“登上塔去，从那里看大海！你们的所见之处，便是你们今后的家园！”

人们登上教堂的钟楼，从上面可以看到正好在退朝时现出的一片片沼泽地带。潮浸的土地上长满了繁茂的芦苇，却不见树木的影子。

神有启示啦。不论穷富，不论男女老幼，人们在牧师的带领下向那片土地移去。其他地方的人都带着财物和家具逃难，而这些人却得带去建造住屋用的木材。在他们的新天地里，除了鱼之外一无所有，但至少命保住了。

上面所说的其实是威尼斯早期编年史中的所谓传说。实际上神大概什么都没说。不过，传说也许对研究历史科学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可取的价值，但想象当时民众的心情，对那些希望在身边感受到神的人来说，却是不能轻易无视的史料。

现代的威尼斯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一定有许多外国人也认为可以在那里落户。但是，在距今1500多年前的古代，那些拥有高度文明的罗马帝国的子民不得不迁居到芦苇丛生的沼泽地，对他们而言，即使是为了躲避匈奴人的暴行，也需要非常之决心。如果不用神的启示这种想法让自己心悦诚服，大概是无法决然行事的。只有在种种不适合人居条件的土地上，他们才能保全性命。

根据编年史记载，这件事发生在公元452年。24年之后，西罗马帝国灭亡。

……

从公元452年春天一直到秋天，整整半年时间，阿提拉的匈奴人在意大利北部极尽暴虐。这期间，埃提乌斯一直在高卢南部，没有任何行动。他是无法行动。高卢的蛮族对去意大利没有兴趣。结果，他并未能“以毒攻毒”，只是证实了他玩“毒”于股掌之间的巧妙技能。

罗马行动了。由两位元老院议员和罗马主教利奥三人组成了一个交涉团，去见身在曼托瓦的阿提拉。所谓交涉，实际上就是请求“付钱给你，请你回去”。交涉的中心也只是所付钱款的金额。大概是因为交涉太不体面而未留下记录，所以我们不知道妥协金额为何。于是阿提拉按照承诺，翻过阿尔卑斯山脉，回多瑙河对岸去了。

按我的想象，阿提拉这次轻易同意，可能出于以下三个理由：第一，他需要一大笔钱来满足部下；第二，他自己也已在肉体上疲惫不堪；第三，他在精神上也已厌倦。阿提拉已经完全丧失了坚持下去的意志。

这时一个传说流传起来。这与其说是民间传承下来的传说，不如说是基督教教会一开始就有意散布的宣传。传说主教利奥得到圣彼得和圣保罗的神助，鼓起勇气，当面谴责阿提拉的暴虐，说教此后超脱和慈悲的重要。阿提拉被利奥的热情雄辩说服，离开了意大利。这个故事中没有一字提到付钱之事，只是强烈而深刻的信仰把基督教社会从蛮族的暴虐中拯救出来。西方天主教势力的两大领袖之一迦太基主教现已不复存在，罗马的基督教教会需要强调幸存的罗马主教。从这时起，罗马主教开始被称为罗马教皇，成为全体西方基督教徒的支柱。

顺便一提，至今仍能在罗马梵蒂冈名为“拉斐尔画室”（Stanze di Raffaello）的一室中看到拉斐尔的壁画,描绘着教皇利奥一世说服阿提拉的情景。

半年以来使北意大利全境陷入恐怖深渊的阿提拉和匈奴人终于撤退而去。公元452年是以阿提拉的袭击开始，又以阿提拉的退去结束的一年。这一年，33岁的瓦伦提尼安三世蛰伏于拉文纳，而罗马帝国军队实际的最高负责人埃提乌斯也未曾离开法国南部一步。居住于意大利半岛的人们看此二人的目光自然逐渐冷淡下去。

公元453年，阿提拉的死讯与春天一起到来。听说这位匈奴人的王者——不仅他自称为王，其他蛮族的族长也都开始纷纷称王（rēx）——在一次宴会上突然大量吐血而亡。葬礼非常壮观，归入匈奴人旗下的日耳曼系蛮族的族长们都参加了葬礼。埋葬也按照匈奴人的传统方式进行，挖掘墓穴的奴隶随后立即被全部杀掉。

接班人之争旋即开始，匈奴人四分五裂。以前因抗不住阿提拉不得已接受其统治的其他蛮族见状纷纷借机离去。匈奴人将莱茵河到多瑙河的辽阔地域置于自己统治之下，逞强一时，这时也随着阿提拉之死灰飞烟灭。回想起来，匈奴人称雄尚不满10年。



教皇（左边头戴三重冠骑马者）说服阿提拉从罗马撤兵（拉斐尔画）

不只是居住在意大利半岛的罗马人因阿提拉的死讯而欢欣鼓舞，这对正在高卢建立自己领地的其他蛮族也是喜报。阿提拉死后，在高卢全境以及与高卢只有比利牛斯山脉一山之隔的西班牙，北方蛮族各部族的势力更加发展。对他们而言，除去匈奴人的威胁，就再没有什么其他可怕的了。罗马帝国已经不值得害怕了。

自毁

第二年，即公元454年，瓦伦提尼安三世大概认为因阿提拉之死和匈奴人的消散已天下太平，便访问了首都罗马。这时，埃提乌斯也从高卢南部赶来，他有求于皇帝。

西罗马帝国的皇帝和西罗马帝国的联军总司令，在皇宫的一个厅里见面了。这座皇宫建在帕拉蒂尼山上，是元首制时代皇帝们的办公场所和住宅。那天也跟往常一样，皇帝有宫廷官僚跟随左右，而埃提乌斯只带了随从。与皇帝进行的是私人会晤，埃提乌斯并未身着戎装，而是一身托加打扮，连短剑都未佩带。皇帝因为地位关系佩带了一把剑，但那只是一把一次都不曾使用过的装饰着宝石的剑。

皇帝一定认为，联军总司令此次前来是为两年前阿提拉在意大利北部恣意施暴时自己置之不顾之罪祈求饶恕的。在那半年里，皇帝自己也躲在拉文纳，大气都不敢出。在不履行职责这一点上，皇帝与总司令同罪。在阿提拉于意大利北部极尽暴虐的半年里，更强烈地感受到恐怖的人，不是身在阿尔卑斯山脉彼侧法国南部的埃提乌斯，而是身处北意大利拉文纳的瓦伦提尼安。后世史学家吉本称他为“肉体成熟而头脑不成熟”的皇帝。尽管他完全没有尽到皇帝的职责，但坚信不疑地认为自己是皇帝，埃提乌斯只是臣下。所谓“神意”就是这样，让接受了它的人比其他任何人都固执地认为自己为“神意”所钟，绝不等同

于自己任命的臣子。所以，臣下不仅要向神祈求饶恕自己的罪过，还要向受了“神意”的皇帝祈求饶恕。这样说也有它的道理。

可是，60岁的埃提乌斯并没有这么做。也许埃提乌斯认为，当时就已经解释清楚了，根本没有考虑组建一支军队派往意大利，自己已经尽到了职责。于是，他并没有谢罪，而是请求皇帝把公主嫁给自己的儿子。

正因为胆小，反倒容易翻脸。神经总是紧张，只要稍加外力，极易绷断。而4年前才去世的母亲加拉·普拉西提阿曾长年向瓦伦提尼安灌输对埃提乌斯的仇恨。这时，皇帝下意识地从腰间拔出了短剑，发出异样的叫声扑向埃提乌斯。虽说是装饰用剑，剑锋仍很锋利。剑深深刺入身着托加的埃提乌斯的胸部，鲜血很快浸湿了雪白的托加。埃提乌斯一句话也没能说出就瘫倒下去。

是皇帝个人的想法引发了惨剧，还是哪个宦官设下的阴谋，当时众说纷纭。无论如何，22年中基本阻止了蛮族入侵的埃提乌斯被刺身亡。



瓦伦提尼安三世

翌日，皇帝来到元老院，说明这次杀人是为了匡扶正义不得已而为之。一位元老院议员听后对瓦伦提尼安说道：

> 陛下，我不知道陛下的想法。但连我都懂得，您这是用左手砍下了右手。

新年来到，公元455年3月16日，正在圣乔万尼大教堂前广场上检阅军队的瓦伦提尼安皇帝，被突然离开队列冲过来的两名士兵刺杀。这两个人是蛮族出身的士兵，长年在半年前被杀的埃提乌斯手下从军。

公元408年，斯提利科被霍诺里乌斯皇帝处以死刑，退出了历史舞台。这导致了公元410年西哥特人发动“罗马浩劫”。公元454年瓦伦提

尼安皇帝亲手杀害了埃提乌斯，又导致了公元455年6月汪达尔人发动的又一次“罗马浩劫”。蛮族似乎比罗马人更了解西罗马帝国失去得力左右臂的意义。

瓦伦提尼安三世没有留下子嗣，下一任皇帝的人选便任由元老院决定。元老院以多数赞成选出了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穆斯。他是一位元老院议员，出身于贵族阶层，属于号称罗马首富的艾妮希亚家族。年龄适中，不年轻也不太老，看上去是完美的罗马精英。他曾有两度担任执政官、三度担任首都长官的公职经历，尽管每一次的任期都是一年。他行事认真，便携式计时用滴漏不离手，以确定时间，开展工作，让人联想起五贤帝之一的安敦尼·庇护。如果是在罗马帝国运行良好的时代，他一定能够作为一个好皇帝而终其一生。可是，5世纪后半叶已然不是2世纪后半叶了。



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穆斯

罗马时代的西班牙（现在的西班牙）和毛里塔尼亚（现在的摩洛哥）之间，仅仅隔着一道罗马时代称为“赫丘利之柱”的直布罗陀海峡。两岸相距14公里，只要有船就是一步之遥。公元前3世纪，迦太基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败给罗马，放弃了因战败而被罗马接收的西西

里，把西班牙变为自己的领土，并建设了一座城市（现在的卡塔赫纳）作为中心，取名为“迦太基·诺瓦”（新迦太基）。在后来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历经苦战才最终战胜名将汉尼拔，得到了整个西班牙。于是，罗马把目光投向北非。这是地缘政治学的当然归结。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中，罗马终于灭了迦太基，使古代人的梦想成真，让古希腊神话英雄赫丘利的左脚踏在了伊比利亚半岛，右脚踏在了北非。

在古代人的头脑中，欧洲南部和非洲北部是连为一体的。乍一听到后人所起的名字“直布罗陀海峡”，就给人一种强烈的两地隔离的印象，而且现今两岸的基督教国家与伊斯兰教国家仍在对峙。不过，在那尚未有这种对立关系的时代，人们航行在地中海上，头脑中会驰骋着这样的想象，左脚立在南欧、右脚立在北非的赫丘利正在保佑着他们。

生于古代终结之时的日耳曼系蛮族继承了古代地中海人的这种感觉。当初他们从生养自己的面临北海的日耳曼渡过莱茵河入侵高卢的时候，日耳曼与高卢的差别令人印象深刻。可是，自从南下高卢、西班牙，渡过“赫丘利之柱”，直到登陆北非，他们一定再也感觉不到什么区别了。两根“赫丘利之柱”中的任何一根都属于罗马世界这一共同的文明圈。

汪达尔人渡来北非是公元429年春天的事情。到了第二年，即公元430年的夏天，希波·雷吉乌什陷落，汪达尔人再有一口气就能直逼迦太基了。可是，蛮族不擅打包围城市的攻坚战。结果，汪达尔人在现在的摩洛哥到利比亚一带称霸10年之后，才于公元439年拿下这里的最大城市迦太基。

这10年给北非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罗马的色彩在以迦太基为中心的北非被一扫而光。首先，以农庄主为主体形成的“罗马时代的北非”的上层都逃难去往西西里和意大利了。正因为农庄过去有机高效的经营，北非才得以成为罗马帝国的粮仓。现在，尽管耕地和气候与以

前相同，即自然环境并没有发生变化，但北非也已经不再是有能力出口农作物的农业地区了。

北非遗迹


剧场（大莱普提斯，现利比亚）


朱庇特神殿（斯贝特拉，现突尼斯）

圆形竞技场（艾尔迪约姆，现突尼斯）



北非出土的罗马鼎盛时期的镶嵌画



吹角笛的海神特里同



狩鹿的女神戴安娜



诗人维吉尔与两位缪斯

从船上卸货的人们



第二是天主教派基督教的衰退。汪达尔人是阿里乌斯派基督教徒。在排斥北非天主教方面，同为异端的多纳图派基督教徒更加热心。作为异端，他们长年遭受天主教迫害，心怀仇恨。

但是，北非天主教会的衰退不仅仅是宗教界的问题，与这里知识分子的衰退也有关系。一直影响到后代的基督教天主派论客几乎都出身于北非，更不用说《罗马人的故事12 ·迷途帝国》卷末介绍的迦太基主教居普良和本卷介绍的希波·雷吉乌什主教奥古斯丁了。这些高级神职人员中的许多人在被汪达尔人抓住之前就逃到意大利去了。这也导致了北非知识分子阶层的衰退。地中海对岸传来的声音，又一次影响不到欧洲的天主教徒了。丧失了拥有经济实力的人和拥有智慧的人，是北非没有发生罗马人反对新统治者汪达尔人的抵抗运动的真正原因。

社会的上层人士可以逃走，但没有避难地的中下层人群无从逃跑。他们要么放弃天主教，要么作为隐蔽的天主教徒活下去。他们中间不能忽视的是造船的匠人们。

这里一天到晚面对大海。迦太基曾经是西地中海第一号的海运国家。到了后来的罗马时代，又一直受到罗马的奖励，北非居民的造船技术也就一代代地传承了下来。这使得刚脱离森林、不知利用大海的汪达尔人开始亲近大海。和渡过北海入侵不列颠的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一样，汪达尔人也了解乘船出海的作用了，尽管航行操纵要交给其统治之下的迦太基系罗马人船员。

出海也有两种方式：从事渔业或贸易，或者选择海盗业。罗马人和迦太基人都是前者，而汪达尔人却选择了后者。他们渡过莱茵河之后在高卢、西班牙一直过着袭扰掠夺的生活，登陆北非后仍旧掠夺原住民。也许出海并不能改变他们袭扰掠夺的生活习惯。

居住在意大利半岛的罗马人刚刚因为阿提拉之死摆脱了北方匈奴人的威胁，马上又受到南来的汪达尔人的威胁。海盗不仅袭击在海上遇到的船只，抢人掠货，这只是他们工作的一小部分。海盗的主要工作是乘船沿海岸或溯河而上，袭击城镇村庄，杀人越货。袭击动态中的目标不如打击不动的目标更有效率。他们与山贼和盗贼的区别只是在于来自陆地还是来自大海，在袭击破坏、杀人越货方面毫无二致。

丧失制海权就是没有海军力量来压制海上的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横行霸道的行为，就意味着只能处于坐视的状态。听到制海权，往往会以为这仅限于军事方面。然而，失去制海权后最先受害且受害最深的通常都是一般人群。丧失制海权表示“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在地中海也已完全成为陈迹。

然而，汪达尔人如果没有一位能力很强且长期掌权的领袖，他们就不会在登陆北非后25年、统治北非全境后15年这样短的时间里，使自己的势力发展到如此程度，也许已经像其他蛮族一样难免内讧，四分五裂，最终被北非的罗马社会所吸收。

汪达尔人的族长根西里克是一位有能力、很强势，而且长寿的领袖。光是动员10万之众放弃西班牙并把他们带到北非，就显示出他不是一个平庸的领袖。在北非登陆后，他通过反对北非罗马势力，把多纳图派基督教徒、非基督教徒的摩尔人、甚至未被罗马同化的沙漠游牧民柏柏尔人都成功地召到了自己的麾下，与之共同战斗。而且他还成功地大体抑制了多纳图派的疯狂信仰、摩尔人独立擅行的倾向和柏柏尔人的狂暴个性。说“大体抑制”，是因为完全抑制这些情况对汪达尔人垄断统治权并非有利。

他还致力于改善与东罗马帝国的关系。这完全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而是为了避免不遗余力排斥阿里乌斯派的东罗马帝国派兵打到北非来。北非自汪达尔人入侵以来已逐渐变成了阿里乌斯派基督教国家。不过根西里克未能成功地改善与东罗马帝国的关系，不是

因为他缺乏外交技能，而是东罗马帝国对北非动向的兴趣现已大为淡薄。

汪达尔人的王者根西里克虽然强势，却也是一个无道之人。汪达尔人离开伊比利亚半岛去了北非之后，西哥特人便在伊比利亚半岛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势力。虽然只是一海之隔，身在西班牙的西哥特人对直布罗陀海峡彼岸的北非并不感兴趣，这点对正在北非建立势力的根西里克极其重要。

根西里克请求西哥特人国王把女儿嫁给自己的一个儿子为妻。这样，汪达尔与西哥特两族便结成了姻亲关系。然而，自从与先王关系极差的人成为西哥特人国王以来，这种关系却变得十分不利。于是，根西里克把儿媳妇退回了娘家。在送回时还不是单纯的遣返，而是事前把她的鼻子割掉才送走。结果，西哥特与汪达尔两族之间的关系更胜从前。这个时期，西哥特人正与苏维汇、奄蔡等蛮族抗争，争夺伊比利亚半岛的统治权。这样，才未发生直布罗陀海峡被大量运送蛮族的船只所挤满的情况。

第二次“罗马浩劫”

到了公元455年，根西里克率领的汪达尔人并未突如其来地出现在罗马城下。对从北非要地迦太基出港的船只而言，最近的陆地是西西里岛和撒丁岛。当然还有其他小岛。但不管是潘泰莱里亚、马耳他，还是兰佩杜萨，都不过只要一天便能抢完。与这些小岛相比，西西里和撒丁才是地中海数一数二的大岛,不愧岛的称呼。汪达尔人的海盗就专门祸害这两座岛，但也没能入侵到岛的深处。汪达尔人已经把北非置于统治之下，没有更多的领土欲望，也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入侵到岛的内部。在地中海世界里，财富都集中在临海城市。军事力量有限的海盗集团，通常只打那些袭击效率高的地方。

因此，汪达尔人一直挨家挨户地袭击西西里和撒丁的临海城市和村镇。然而不久以后，海盗们扩大“战场”的意识高涨起来。罗马，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从居住在西西里的人们那里传来的情报显示了汪达尔人的这个动向。居住在罗马的人们，尤其是在西西里拥有农庄的元老院议员们不会不知道这一情况。然而，人总有一种倾向，只愿意看自己希望看到的事物。这个时期罗马人的眼睛只看着阿提拉和匈奴人。看北面的时间长了，视线都不愿往南面转一下。这种情况使得根西里克率领的汪达尔人在奥斯提亚登陆，形成了对罗马人的突然袭击。印在罗马人脑海里的蛮族，是策马驰骋从陆上袭来的野蛮人，他们不会乘船渡海而来。

三年前阿提拉亡故，两年前匈奴人灰飞烟灭。西罗马帝国方面，一年前皇帝亲手杀死了“右臂”埃提乌斯。到了今年，皇帝也被埃提乌斯的两个旧部刺杀，马克西穆斯继位才两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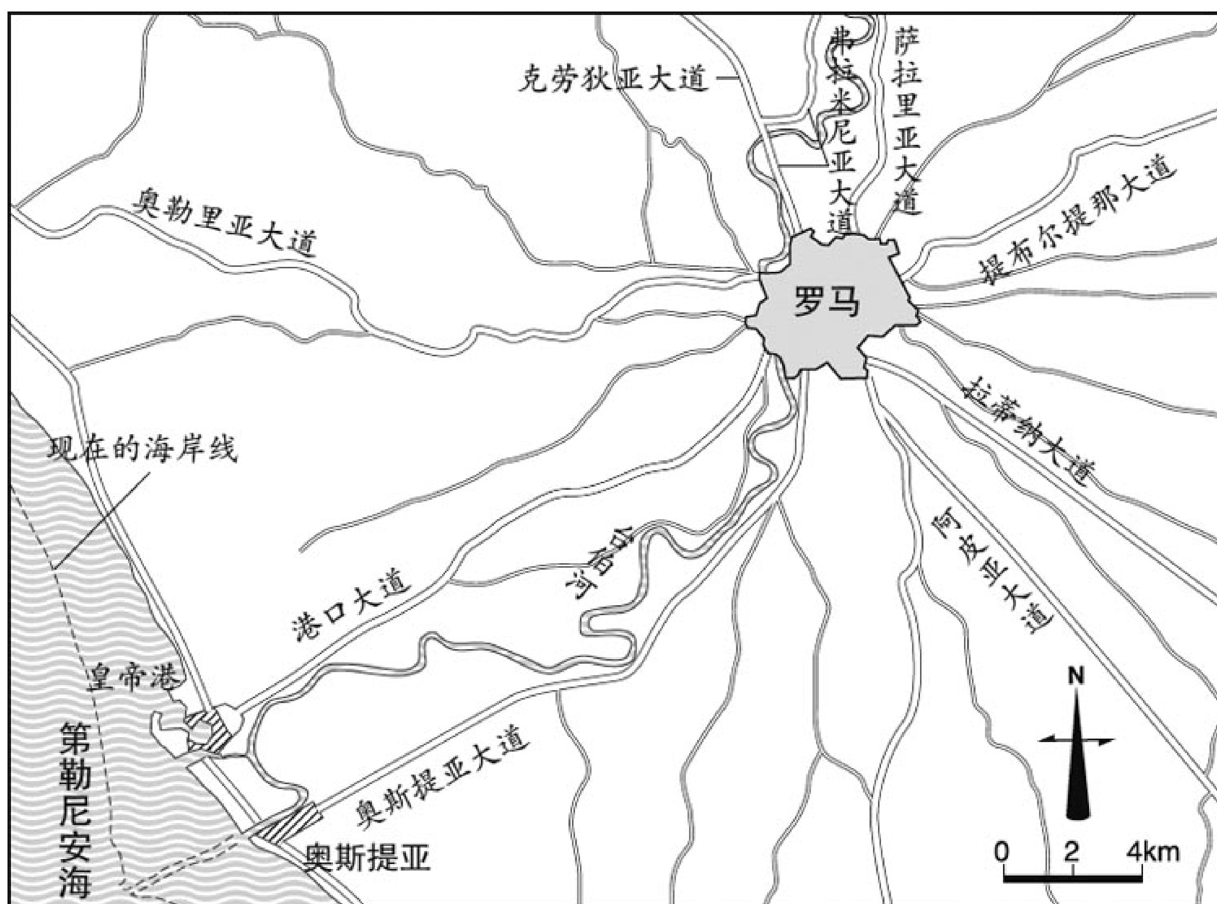
根西里克肯定对这些了如指掌，尤其了解西罗马帝国失去了“右臂”。把蛮族摆布于股掌之间的埃提乌斯在高卢活动的时间长达20年，不仅会匈奴人的语言，也懂其他蛮族的语言，在蛮族中赫赫有名。总之，公元455年由汪达尔人发动的“罗马浩劫”，并不是偶然因素积累造成的不幸。

有段时期，我对把“浩劫”这个词用于公元455年汪达尔人发动的“罗马浩劫”是否恰当感到疑惑。词典里对“浩劫”的解释是，威胁掠夺、并不惜杀戮的行为。于是我想，被袭击的一方大概是作了抵抗的。

公元410年阿拉里克率领西哥特人发动“罗马浩劫”时，将罗马包围了三次。所以，罗马是作了抵抗的。而公元455年根西里克率领的汪达尔人发动“罗马浩劫”时，罗马未作任何抵抗。可是人员物资照样被

抢，杀戮也照样发生，尽管情况没有上次浩劫那么厉害。从离罗马市内20公里的外港奥斯提亚登陆，溯台伯河而上进入罗马，或者经由奥斯提亚大道（Via Ostiensis）和港口大道（Via Portuensis）逼近罗马都很容易。即使看不见敌兵的影子，这种威胁也是存在的。

公元455年5月，根西里克在奥斯提亚登陆，立即占领了这座港口城市。但他并不着急。他把乘来的许多船停泊在皇帝港（Portus Augustii）里以免遭风暴。这个港口因克劳狄乌斯皇帝建设、图拉真皇帝扩建而得此名。根西里克带来的士兵以汪达尔人为核心，顶多也只有1万人。尽管第一次“罗马浩劫”以来人口外迁加剧，罗马市内的人口少说也有20万之众。可是他们知道蛮族在奥斯提亚登陆后大为惊恐，纷纷准备外逃。



从罗马到奥斯提亚

两个月前当上皇帝的马克西穆斯企图让动摇的人们镇定下来。可是，民众也清楚，没有军事力量的皇帝起不到任何作用。马克西穆斯徒劳了一个月之后，被过于恐惧而激愤的民众所杀，在位尚不足三个月。此后皇位虚空达两个月之久。蛮族只是在外港登陆，罗马市内便激烈动荡，甚至无法考虑谁来继位。这何止是没有危机管理，指挥系统也都完全瘫痪了。

这时仍在行动的是罗马的主教利奥，他已被称为罗马教皇了。在天主教徒的传说中，利奥于3年前的公元452年前往阿提拉的营地，让无信仰的蛮族阿提拉放弃了进一步侵略意大利的意图。这位利奥教皇在公元455年的这个时候，又前往奥斯提亚去见根西里克了。于是，罗马教皇利奥与蛮族族长根西里克之间就如何进行“罗马浩劫”达成了如下协议：

一、不把基督教教堂及其相关设施作为掠夺对象。

二、不杀不抵抗者。

三、不拷打俘虏。

公元455年6月15日到29日的两星期内，“世界之都”罗马实际上遭到了有系统的掠夺。溯台伯河而来的船只一艘接着一艘靠上码头，装满预先运来集中于此的各种物品之后，成行成队地回到皇帝港。在那里，再把货物从内河船倒到海船上。汪达尔士兵甚至没有必要监视市民。主教传达了神意，主教的命令就是神的命令。市民们都是基督教徒，他们遵从利奥教皇的命令。

装上船的不仅仅是金币和珠宝首饰。青铜像自不必说，就连镂空雕刻的铜制桥栏杆、大门、门扇，也都统统被卸下运走。矗立在卡匹托尔山上的主神朱庇特神殿屋顶上的镀金铜瓦，也被拆下装船运走。

这些拆、卸、运、装的工作都是罗马市民自己做的。汪达尔人士兵只是在罗马市内转悠，时不时闯进房屋，喝三吆四，发号施令。

就这样，罗马被劫夺一空，但很少有人被杀。而不幸被杀的，不是想阻止掳走儿女的人，就是被误认为抵抗的人。与公元410年阿提拉率领西哥特人发动“罗马浩劫”时5天里牺牲的人数相比，在公元454年根西里克率领汪达尔人发动的长达14天的“罗马浩劫”中牺牲的人数则少得惊人。

教皇利奥通过献出与基督教没有关系的罗马，包括个人的住宅和集体公寓，拯救了居民的生命。但他没能阻止住汪达尔人对地位高的人或有钱人的绑架，这些人被认为能换取赎金而被拉上了船。教皇为了神职人员和修女不被带走已经精疲力竭。汪达尔人尽管属于阿里乌斯派基督徒，与天主教徒是宿敌关系，但没有对天主教堂动手，遵守了与利奥教皇的约定。

以索要赎金为目的被带走的人中，还有先皇瓦伦提尼安的妃子和两个女儿。根西里克让两个公主中的一个与自己的儿子乌内里克结了婚。罗马帝国的公主与蛮族的族长或其儿子结婚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

公元410年的“罗马浩劫”是一个大新闻，甚至惊动了地中海的东岸。与之相比，公元455年的“罗马浩劫”甚至连新闻都不是。当时的有识之士中，竟没有一个人因此受到强烈打击，留下文字，哀悯“永恒之都”罗马的命运。难道因为这是第二次“浩劫”吗？因为这次是掠夺与被掠夺双方合作完成的“浩劫”吗？不管因为什么原因，被掀掉顶瓦的朱庇特神殿在半个世纪以前便已经空空如也了。

最后20年

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者经常更迭，就像一个病痛难忍在床上不断翻身的病人。为什么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东罗马帝国仍能继续存在呢？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尽在下面的表中。不是东罗马帝国没有问题，它的问题与西部一样多，但处理问题的人能够冷静对待，这点益处颇大。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政局稳定。在现代，保障在选举中选出的总统和总理有5年到7年的任期，大约就是为了这一点。

掠夺来的财物多得把船都压得东倒西歪。汪达尔人带着这些财物回到了北非。一个月后，下任皇帝终于确定。他是一个罗马时代称为“高卢系罗马人”的人，出身于高卢，在埃提乌斯手下积累了从军的资历。但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他在奥弗涅地区拥有广阔的农庄，说起来是行省高卢的实力派人物。

如今的高卢事实上已经处在蛮族的统治之下。在高卢，可以根据蛮族如何对待逐渐握有统治权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即罗马帝国的既有阶级，将其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把上层人士也和社会中下层一样当做被征服者对待，就像北非汪达尔人那样。第二种则是把那些既有阶级当成合作者，在自己的统治之下予以保留。当时的高卢，法兰克人正在北部逐步确立势力；西哥特人正在西部努力打拼，同时入侵西班牙。两个蛮族相互争霸。西哥特人属于第二种情况。为建立针对阿提拉匈奴人的共同战线，阿维图斯也曾在西罗马帝国军队总司令、自己的上司埃提乌斯与西哥特人族长狄奥多里克之间积极活动。

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皇帝一览表

西罗马帝国	东罗马帝国
霍诺里乌斯 (395—423)	阿卡狄乌斯 (395—408)
瓦伦提尼安三世 (425—455)	狄奥多西二世 (408—450)
佩特罗尼乌斯 · 马克西穆斯 (455)	马利基安 (450—457)
阿维图斯 (455—456)	
马约里安 (457—461)	利奥一世 (457—474)
塞维鲁 (461—465)	
安特米乌斯 (467—472)	
奥利布里乌斯 (472)	
格利西里乌斯 (473—474)	
尤里乌斯 · 尼波斯 (474—475)	芝诺 (474—491)
罗慕路斯 · 奥古斯都 (475—476)	

最后的二十年

西罗马帝国灭亡

395 400 405 410 415 420 425 430 435 440 445 450 455 460 465 470 475 480 485 490

当地实力派人物是逃出还是留在蛮族统治之下的地方，体现了第一种做法和第二种做法之间的区别。汪达尔人征服后的北非有很多上层难民，而在西哥特人统治的高卢西部却看不到同样的现象。



阿维图斯

阿维图斯在公元455年“罗马浩劫”后当上了西罗马帝国的皇帝。他不是在意大利，而是在高卢被拥立为皇帝的，并且不是由罗马军队士兵，而是西哥特人的国王推举为皇帝的。所以，阿维图斯皇帝在即位后过了半年多的第二年——公元456年才进入意大利。

皇帝一旦成为绝对专制的君王，在他的官邸、公邸，即皇宫工作的名为宫廷人员的官僚阶层便拥有了权力。他们根本不可能欢迎在高卢由蛮族推举当上皇帝的阿维图斯。阿维图斯到达意大利时，悲惨的结局也就到来了。起初他只是被强迫退位，最终却被杀死。蛮族推荐的皇帝就这样被除掉了。

拉文纳的宫廷官员们推选的下一任皇帝是位名叫马约里安的蛮族出身的军人。他也曾有过在埃提乌斯手下从军的经历。与阿维图斯不

同的是，他是纯粹的军人，而且出身蛮族，宫廷官僚可能以为他容易操纵。可是，这位新皇帝刚一即位就表现出了主动积极的性格。这可违背了宫廷官僚的初衷。宫中的官僚们已经形成既得利益阶层，而新皇帝马约里安开始实施的所有政策都触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

第一项政策是大赦。其实这是一项关于税收的政策，要一笔勾销未缴纳的税金，并承诺今后将公正地进行征税业务。没有什么比征税业务更能让官僚从中捞取好处的事情了。

第二项政策是恢复地方自治体。具体来说就是，原先的地方自治体（Municipia）在征税额不足中央规定的额度时，议会议员有义务自掏腰包填满不足额度，而今后将免除这一义务。因为这项义务的存在，越来越没有人想当地方自治体的议员。在罗马时代，地方自治体的要职按规定是由在议会中拥有议席的人兼任。

马约里安皇帝甚至还设立了一个直译叫做“都市护卫”的新机构。

城市，在罗马人的语言拉丁语中称作“civitas”，对起源于城邦的罗马帝国来说，一直是重要的核心。即使施行帝政之后，向主要由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居住的“城市”和被罗马征服的人居住的“地方自治体”授予权力，是历代皇帝的重要政策。换言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绝妙和谐才是元首制时代民心安定的真正原因。马约里安皇帝的地方分权政策就是纠正戴克里先皇帝以来过于偏向中央集权的帝国之“轴”，使之回归到城市和地方自治体，从而恢复平衡。在这一点上，这个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自从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大帝把方向舵扳到中央集权路线上来以后，已经过去了200年。即使政策正确，时代也不再接受。纵令没有皇宫官僚的反对，也不能指望收到什么效果。

皇帝也许为此着了急，宣布要远征北非。作为政策，这也是正确的。汪达尔人海盗暴行日益严重，就连濒临亚得里亚海的遥远的意大利南部，受到来自北非危害的城市也在不断增加。进攻这些海盗的根据地北非，把人们从对海盗的恐惧中解放出来，有着充分的道义名分。

但是，这个政策并不符合时代要求。远征所需的费用如何筹措？高卢、西班牙和北非已经不向西罗马帝国纳税。在这样的状态下强行远征，不可能没有重大困难。

马约里安皇帝决定即便有“重大困难”也要远征。他以意大利南部的米塞卢姆（现在的米塞诺）军港和伊比利亚半岛的海港迦太基·诺瓦（现在的卡塔赫纳）两地为中心，开始造船，数量多达300艘。一俟完成，将从意大利南部和西班牙西部两个方向进攻北非。

马约里安是公元457年当上皇帝的，同年开始在这两个港口建造船舶。进攻北非是马约里安皇帝悲壮的宏愿。他自己也经常前往卡塔赫纳，甚至到造船工程一线亲自指挥。



5世纪中叶西罗马帝国及其周边

根西里克身在北非，以往所了解的西罗马帝国总是行动迟缓，因此对这次的变化似乎很震惊。根西里克向拉文纳派出了使节，请求北非汪达尔王国与西罗马帝国缔结建立友好关系的协约，理由是儿子乌内里克将要成为汪达尔人的下任国王，而他的妻子是瓦伦提尼安的女儿，两国之间建立友好关系顺理成章。拉文纳的宫廷官僚都劝谏接受这个请求，但马约里安皇帝断然拒绝了。

遭到拒绝后，根西里克改变了策略。他统率多达10万人之众的蛮族长达35年之久，率领他们完成了渡海到达北非的艰苦卓绝之大业。他还在和平状态下完成了被称为“罗马浩劫”的大掠夺，没有损失一兵一卒。文艺复兴时代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弗利说，领袖需要兼具狮子

和狐狸的资质。这位汪达尔人的国王在这点上一定是合格的。知道敌人建造了为数众多的船舶，他却没有加强防御，严阵以待，而是想出了与此完全迥异的对策，并付诸实施。他也一定掌握了卡塔赫纳比米赛诺造船更多的情况。

夏季的地中海，微风轻抚，海面平静。公元461年7月的一个夜晚，海面风平浪静，即使小船也可渡海。暗夜无月，没有人注意到几叶小舟像小黑点一样前行。小舟组成的船队潜入卡塔赫纳港后迅疾向四面八方散开，朝停泊在那里的每一艘船上射出了点着了火的箭矢。

哨兵发现时，所有的船上都已火舌缭绕。正在那里逗留的马约里安皇帝也只能当一个茫然的看客。3年的努力化做泡影。为此勉强凑出的经费也无半分回报。西罗马帝国的国库已经空空如也，令人绝望。

灰心沮丧地返回了意大利的皇帝甚至没能回到拉文纳的皇宫。一贯反对他的势力——宫廷官僚派来的士兵，正在由西班牙经法国南部进入意大利的路上等着他，并且抓住了他，杀害了他。事情发生在公元461年8月初。

一个名叫塞维鲁的人被立即推上皇位取而代之。他完全是宫廷官僚领袖里西默的傀儡，在位4年，我们却完全不知道他做了些什么，也许他什么都没做。他于公元465年去世，据说也是被里西默下的毒。

里西默这个人物，父亲是苏维汇人，母亲是西哥特人，自己在埃提乌斯手下的罗马军队中崭露头角。公元454年埃提乌斯被瓦伦提尼安皇帝杀死之后，他仍然留在罗马军队中，却不知道何时巧妙进入了拉文纳的宫廷之中，通过保护宫廷官僚的既得利益而获得了权力。据传马约里安之所以当上了皇帝，就是因为里西默看到自己是不折不扣的蛮族出身因而当不上皇帝，便满足于自己执宫廷之牛耳，让自己的朋友登上了皇位。

然而，“皇帝”却尽干些与“皇帝制造者”意愿背道而驰的事情。这种时候，既得利益阶级并不跳出来公开反击。他们一边暗中对皇帝的政策消极怠工，一边等待对手的失误。既得利益者有着等待所需要的“体力”。



马约里安



塞维鲁

船队在卡塔赫纳遭到火攻，给了皇帝制造者更换皇帝的绝好机会。于是马约里安被杀害，塞维鲁取而代之。可是这个塞维鲁，4年后也变得碍手碍脚。西罗马帝国要向东罗马帝国求援，“西”的皇位就得由“东”所希望的人来坐。蛮族出身、如今已然成为西罗马帝国第一实力派人物的里西默领悟到，西罗马帝国仅靠自己已经做不了任何事情，只有与东罗马帝国共同奋斗才是生存之道。尽管里西默是北方蛮族出身，在中饱私囊方面不会输给任何人，但洞察时代潮流也许还是有点眼光的。

东西罗马帝国最后的并肩战斗

西罗马帝国转变方针，东罗马帝国也予以响应。但那不是因为希望西罗马帝国恢复元气。对“东”而言，“西”到底不过是比自己实力弱

小的弟弟，罗马不可以超过君士坦丁堡。然而，让“西”作为一个实力略逊的国家继续存在下去，对“东”来说是件好事。

第一是军事上的理由。对“东”而言，“西”位于其与北方蛮族之间，起了缓冲器或吸收器的作用。第二是宗教上的理由。因为“东”、“西”同为天主教派基督教国家，而“西”与信奉日耳曼原始传统宗教或阿里乌斯派基督教的蛮族接壤，这对“东”而言比什么都好。

东罗马帝国的皇帝马利基安于公元457年自然死亡，由利奥接任皇帝。“东”、“西”之间的共同奋斗在这位色雷斯出身的军人皇帝即位后顺利开始。

不受东罗马帝国承认的塞维鲁皇帝被毒杀之后，西罗马皇位虚空。西罗马请东罗马利奥皇帝安排他自己希望的人担任皇帝，利奥便让安特米乌斯去做了西罗马皇帝。安特米乌斯是君士坦丁堡宫廷高官的儿子，也有丰富的军事经验。他娶了先皇马利基安的女儿为妻，是皇室的一员。

东罗马帝国皇帝利奥给安特米乌斯配备了军队。安特米乌斯于公元467年初夏带着军队进入罗马。罗马教皇为他举行了加冕礼，他也得到了罗马元老院的承认。他经过正统途径做了基督教国家西罗马帝国的皇帝。

当然，西罗马帝国实权者里西默不会白白地献上这顿大餐。作为合作的报酬，他被授予“贵族”称号，还当上了执政官，尽管已步入老年却迎娶了新皇帝的女儿为妻。这样，第二年，即公元468年，成为东西两帝国正式共同承担西罗马帝国防御的第一个年头。

被视为敌人的是统治北非的汪达尔人。东西并肩战斗伊始便把这个蛮族视为敌人，这有两个理由：

第一是为了把濒临地中海的城镇村落从汪达尔海盗的掠夺中解放出来。汪达尔人的海盗船甚至已经在希腊的爱奥尼亚海出没，其活动已不仅限于意大利半岛西侧的第勒尼安海和东侧的亚得里亚海。

第二是出于宗教的理由。他们要攻击信奉阿里乌斯派基督教的汪达尔人——这一教派在尼西亚公会议以后一直被视为异端——从而把正统天主教徒从异端统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汪达尔人不是异教徒，但虽同为基督教徒，却是比异教徒更需要排斥的异端。明确标明“十字军”的军事行动发生在600多年之后的中世纪，但其精神早在5世纪中叶就已萌生。十字军敌视、排斥信仰不同的人，或者信仰相同但信奉方式不同的人。只有一神教徒才会产生这种思想。


安特米乌斯


利奥

从东西两个方向进攻北非的军队规模十分庞大，尽管尚未打上十字军的标签，但事实上已经是十字军了。希腊人留下的数字经常夸张，不能盲信，但因为没有反证史料，权且记录如下：

总费用：黄金13万罗马磅（约合48750公斤）。

军船、运输船总数：1113艘。

士兵总数：10万人。

光靠西罗马帝国，能不能筹到五分之一都成问题，一定是东罗马帝国负担了其中的大半。东罗马帝国还制定了下面的战略：

首先，希拉克略将军率部从东埃及向西进军，经昔兰尼加逼近迦太基。

另一方面，马尔塞利努斯将军率部从北面达尔马提亚乘船南下亚得里亚海，迫近迦太基。

安特米乌斯皇帝则率军进攻法国南部和西班牙西部，从汪达尔人手中夺回西地中海的制海权，同时切断他们的退路。

然后，远征军大部队的大舰队从君士坦丁堡出港，除最小限度地停靠其他地方之外，一路直奔汪达尔人的根据地迦太基，迅疾占领港口。

如此一来，兼具狮子勇气和狐狸智慧的根西里克也该觉悟到自己已经是口袋里的老鼠了吧。

然而，对这支庞大的远征军来说，致命伤是总司令的人选。瓦西里斯科斯被任命为总司令。他只是利奥皇帝妃子的亲弟弟，年纪轻轻，又无战场经验，且虚荣心极强，最喜欢别人觉得他好。

汪达尔人国王根西里克自公元428年兄长死后当上族长以来，已经统治了40年，是个老手。他的生年不详，无人知道公元486年时他年龄几何，但可以肯定当年他已年近70岁，因为他已在战场上出生入死40年了。

半岛在迦太基港口东面的广阔海面上伸向大海。半岛的顶端，从罗马时代起就建有锚地。瓦西里斯科斯率领的大舰队进入海湾前也在

这里停泊，等待从亚得里亚海南下的马尔塞利努斯军队。有来报说，马尔塞利努斯的军队已经离开了亚得里亚海，正在接近西西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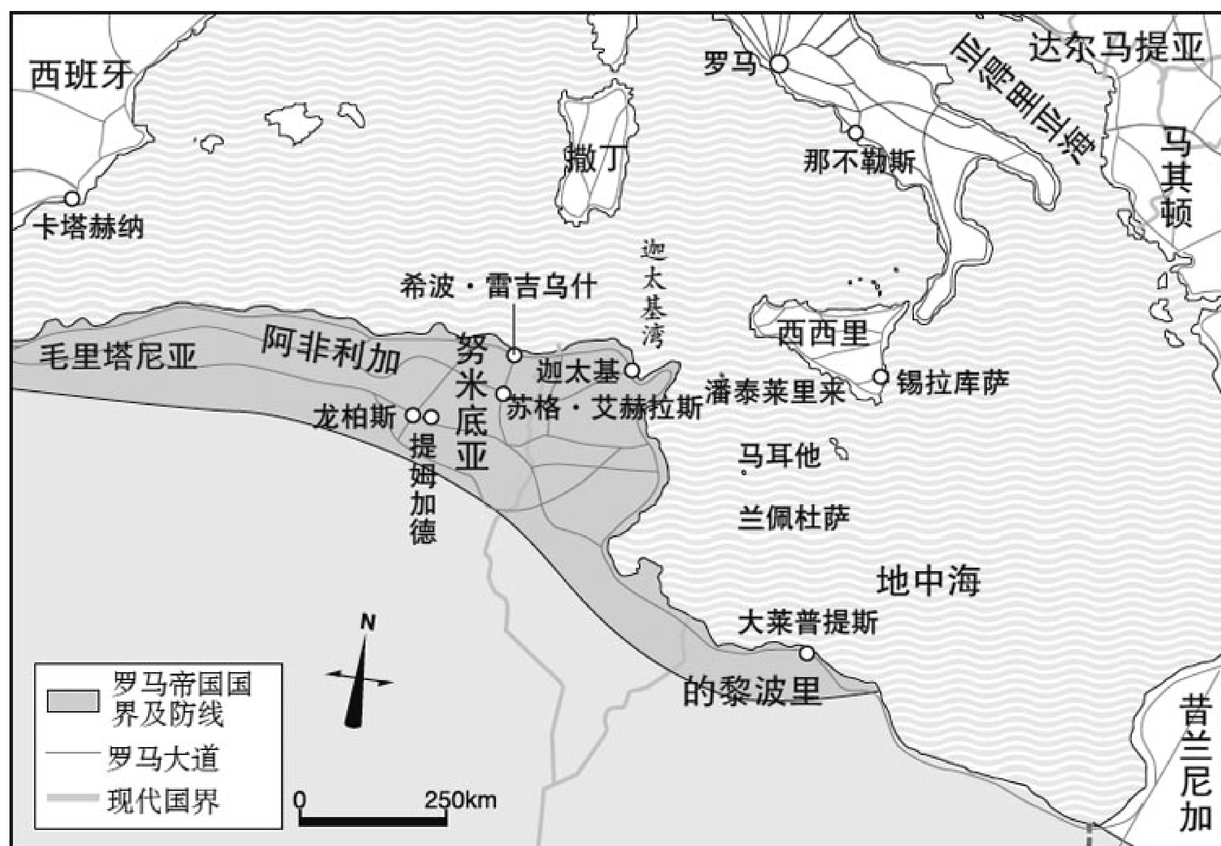
根西里克向瓦西里斯科斯派出使者，带着自己的亲笔信。信的内容为：

> 我有充分意愿通过和平谈判满足阁下远征阿非利加之目的，但需要时间说服部下，因而请允准休战5天。其间阁下船队可停泊在迦太基湾（现在的突尼斯湾）内。

总司令瓦西里斯科斯上当了。他没有战场经验，不战而达目的比什么都有吸引力。而且，不用麻烦从东面陆路逼近的希拉克略和从海路迫近的马尔塞利努斯即可获胜的想法刺激了他的虚荣心。瓦西里斯科斯同意休战5天，而且没有附加任何条件。他让舰队航行到迦太基湾内，停泊之后也未设特别警戒。

万事俱备，老狐狸根西里克逆转绝境便易如反掌。而且这次的舞台是在一切了然于心的自家院子里。于是，7年前在卡塔赫纳港上演的火烧船队的大戏，这次在迦太基湾又重演了一遍。

但这次船只数量更多，不过这毕竟是在自家院子里。罗马士兵见左右船只着火便抱头鼠窜，汪达尔士兵见势登上罗马船，把罗马士兵扔进大海，捕获殆尽。他们不光点火，摇身一变成了轻车熟路的海盗。



迦太基及其周边

船队仍有将近一半未被烧毁。但完全丧失战斗意志的总司令满脑子只想着如何逃回君士坦丁堡。听说他逃回君士坦丁堡后，一直躲在教堂，直到做皇后的姐姐消解了利奥皇帝的怒气。

马尔塞利努斯将军率领的军队在从西西里向迦太基进发的途中遭到变为海盗的敌人的攻击，只能逃回西西里。如前所述，登陆作战的也是海盗。火烧大船队后斗志正旺的汪达尔人登陆发起地面战。激战中将军也成为刀下鬼。马尔塞利努斯的部队全军覆没。

希拉克略率领部队从西面陆路进攻迦太基，也被迅疾出击的汪达尔人挡住去路。得知火烧船队的消息之后，希拉克略选择了撤退，而不是战斗。

如此这般，东西罗马帝国的联合作战，完败于北方的蓦尔蛮族汪达尔人。西罗马帝国皇帝安特米乌斯虽然全须全尾，但他是东罗马过来的人。公元468年，东罗马放弃了西罗马。因此，他在西罗马帝国国内处境恶化也就理所当然了。

这年年底，东罗马帝国皇帝利奥与汪达尔人国王根西里克缔结了媾和协约。虽然其内容不详，但有一点很清楚，汪达尔人在希腊海域的海盗行为并没有任何收敛。

西罗马帝国比东罗马帝国受到更多的掠夺。除了内陆地区的罗马人还能以罗马方式生活以外，西西里、撒丁等近海地区全部处在了汪达尔人的统治之下。失去了对确保制海权至关重要的这两个岛，意味着伊比利亚半岛西侧以及高卢南部已经不再是罗马人的领土了。

汪达尔人的君王根西里克于9年后的公元477年去世。此前一年，西罗马帝国灭亡。

罗马帝国的灭亡

被东罗马帝国放弃后，西罗马帝国最先发生的是皇帝安特米乌斯与蛮族出身的实力派人物里西默之间的关系恶化。东西联手收复北非的战役失败后的第4年，两人的对立发展到了武力冲突的地步。我们用列大事记的方式来看看公元472年这一年的情况：

公元472年3月，里西默为对抗安特米乌斯，立部下奥利布里乌斯为新皇帝。

7月，奥利布里乌斯和里西默联军在罗马市内与安特米乌斯的军队沿台伯河开战。在长达40多天的时间里，罗马城成了西罗马帝国士兵

自相残杀、血流成河的战场。拿着武器战斗的几乎全是蛮族出身的士兵，而四处逃散的则是罗马市民。

7月11日，安特米乌斯战死。

8月20日，里西默病死。

10月23日，奥利布里乌斯被暗杀。

此后，一个名叫格利西里乌斯的人当上了皇帝，但西罗马帝国远未脱离苦海。东罗马帝国不能弃置不顾，传过话来要让一位名叫尤里乌斯·尼波斯的将军当皇帝。



奥利布里乌斯



格利西里乌斯



尤里乌斯 · 尼波斯



罗穆路斯 • 奥古斯都

尼波斯将军当时是与意大利半岛仅有亚得里亚海一海之隔的达尔马提亚地区的大元帅。但是，地方长官不可能注意不到本国政府已放弃了西罗马帝国。也许是不乐意，尼波斯虽然当了皇帝，却根本不想到意大利来。

这就助长了里西默死后依然残存的意大利国内反东罗马帝国派的势力。奥列斯特就是这派中的一员。

如果只听奥列斯特的名字，就会想到他会不会是希腊人。其实他是生于罗马时代潘诺尼亚（即后世的匈牙利）的罗马人。长期以来，潘诺尼亚一直是罗马帝国最重要的“防线”之一，进入5世纪时被亚细亚系蛮族匈奴人占领。阿提拉上台后，这里便成为被惧为“蛮族中的蛮族”匈奴人的根据地了。奥列斯特的父亲是宁愿侍奉侵略者阿提拉也不愿当难民的罗马人之一。父亲死后，儿子也走了与父亲一样的道路。虽然是罗马人，奥列斯特却跟随阿提拉与罗马军队作战，进攻意大利，祸害意大利北部。

阿提拉死后，匈奴人灰飞烟灭。奥列斯特也失业了。失业后的奥列斯特自巴尔干南下，来到位于东罗马帝国的达尔马提亚，加入了罗马军队。不久便与在拉文纳侍奉西罗马帝国皇帝的高官的女儿结了婚，在西罗马帝国架起了一个向上爬的阶梯。可见他实在是一个投机取巧的处世高手。靠着这个婚姻，他迁到了拉文纳。又过了不久，他获得了“贵族”（Patricius）称号，那可是事实上相当于宰相的地位。

奥列斯特当上西罗马内部反东罗马派的头目，完全不是因为他有恢复西罗马帝国的意欲，而不过是因为他看透了自己与在达尔马提亚时的上司尼波斯将军之间关系恶化，只要尼波斯一直是西罗马帝国的皇帝，自己就没有出头之日。于是他出头当上了对根本不来意大利的尼波斯皇帝心怀不满的西罗马帝国高官们的领袖。

不过他没有自己觊觎皇位，而是企图把自己年纪尚幼的儿子罗穆路斯扶上皇位，自己掌握实权。

这位少年成了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代皇帝。他与罗马开国国王同名，不过是偶然的巧合。奥列斯特不过是给儿子起了一个与亡父相同的名字而已。越是住在边境的罗马人，越是喜好使用罗马史上名人的名字。不过，奥列斯特在把儿子罗穆路斯扶上皇位时，还给他起了另外一个名字。由此，西罗马帝国最后的皇帝便与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同名了，叫做罗穆路斯·奥古斯都。

公元475年10月31日，罗穆路斯·奥古斯都即位。罗马的元老院也承认了这位15岁的少年皇帝。尽管在与亚得里亚海一海之隔的达尔马提亚另有一位皇帝尼波斯。

反对的声音既不是来自尼波斯所在的达尔马提亚，也不是来自东罗马帝国皇帝所在的君士坦丁堡，而是来自附近的意大利北部。

这个反对的声音和改善与东罗马帝国的关系以及恢复西罗马帝国全然无关。反对源于在西罗马军队服役的蛮族出身的将军，他们要求得到可以自由处置的土地，但遭到了奥列斯特的拒绝。说起来这就像工会要求经营者改善劳动条件，而经营者拒绝了这个要求。于是，被拒绝的蛮族将军拥立奥多亚克为领袖，开始武力争斗。战斗打了两场，均以奥列斯特的失败而告终。在公元公元476年夏天的第二场战斗中，吃了败仗的奥列斯特被捕后当场被杀。当年9月，奥多亚克进入少年皇帝所在的拉文纳。罗穆路斯·奥古斯都被迫退位。奥多亚克虽然毫不手软地杀掉了奥列斯特，却对他的儿子很宽容。少年皇帝得到了每年6000枚苏勒德斯金币的保障，隐居于那不勒斯近郊的别墅，似乎是在那里结束的一生。

罗马帝国就这样灭亡了。没有蛮族攻来和随后激烈的防御战，自然没有轰轰烈烈的死。既没有火焰，也没有惨叫，无声无息，无人注意到她的消失。少年皇帝退位后，奥多亚克既没有取而代之登上皇位，也没有把其他什么人扶上皇位。只是没了皇帝而已。半个世纪前的公元410年，发生“罗马浩劫”时整个帝国发出了悲叹痛惜之声，而在公元476年却是一片寂静。

今天全世界的教科书都把公元476年明确地记为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年份。但是，不论哪本教科书，也不论哪位罗马史权威，即使记下了灭亡之“年”，却未记下“月”与“日”。原因很简单，无人知晓这“月”与“日”，充分发挥想象力，能说出9月也是极限了。

从被视为建国年份的公元前735年算起，1229年后罗马帝国灭亡了。相比于622年前迦太基于公元前146年的灭亡，这种终结方式是多么令人兴味索然啊！

《罗马人的故事2 ·汉尼拔战记》是以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叙述灭亡迦太基的罗马军队总司令小西庇阿（即西庇阿·埃米利乌斯）的文章结束的，在此我想再度回忆一下：

小西庇阿的目光久久没有离开展现在他眼帘中的迦太基城。这座城市开国以来经历了700年的沧桑岁月，长期极尽繁华。他望着这座城市陷落，望着她正在化为瓦砾之山。

700年的漫长岁月，迦太基把广袤的土地、众多的岛屿和辽阔的大海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由此迦太基拥有了庞大的武器、战舰、大象和财富，与人类迄今创造的任何强大国家相比毫不逊色。

迦太基因自己的勇气和气概而高于过去任何国家。她虽然屈于罗马的要求交出了所有的武器和战舰，但她经受住了罗马军队长达3年的进攻，直到现在。然而，现在她陷落了，毁灭了，行将从大地上消失。

小西庇阿因想到敌人的命运而流泪。

尽管他胜利了，他却不能不让思绪驰骋起来。他不能不想到，不仅是人，就是城市、国家乃至帝国，都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特洛伊、亚述、波斯、马其顿……历史展示给人类的是盛极必衰的图景。

不知是有意识地还是下意识地，这位罗马的胜将口中吟出了荷马史诗中的一句。这句话应该是特洛伊总司令赫克托尔所说：

“特洛伊终将也会随着普里阿摩斯国王以及他的战士一道灭亡！”

站在身后的波利比乌斯问罗马的胜将为何吟出这样一句，小西庇阿回头看着波利比乌斯，拉着这位希腊好友的手回答道：

“波利比乌斯，我们现在正在见证荣极一时的帝国灭亡的伟大瞬间。可是现在充满我心中的不是胜者的喜悦，而是终有一天我们的罗马也将迎来同样时刻的悲哀！”

罗马在长达两倍于迦太基的漫长岁月中，对迦太基所无法相比的广大地域，对生活在那里的无以计数的众多人民，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但没有这个“伟大瞬间”。

燃烧了，但不是火焰引起的。

灭亡了，但没有惨叫声相伴。

罗马无声无息地灭亡了，没有人注意到。

我甚至想，如果穿越时光隧道，回到公元476年秋天的罗马，把麦克风对着过往的行人问：罗马帝国灭亡了，您有什么感想？我会得到怎样的回答呢？

也许有人会表情惊讶地说：

“灭亡了？什么时候？”

也许有人会嘴角挂着讽刺的笑容回答说：

“她不是还活着吗？”

历史学家也许会说罗马帝国的灭亡不是在公元476年，而是在公元1453年。但我要说，公元476年时的罗马人理所当然不会注意到帝国的灭亡。的确，东罗马帝国也好，西罗马帝国也罢，这些名称都是后世史学家为了方便而起的名字。现在，东罗马帝国仍在维系，这也是事实。

然而，没有了罗马这座城市，就没有了罗马帝国。不论罗马遭到怎样毁灭性的破坏，罗马人都会坚决反对迁都。罗马国家起源于城邦。首都对于城邦和对于领土型国家，其意义是不同的。前者源于城市，而后者是先有领土，然后在适合统治的地方建设首都。

没有雅典城就没有雅典城邦。同理，没有罗马城，也就没有罗马帝国。首都在君士坦丁堡，那已经不是罗马帝国了，更何况那里的语言不是拉丁语，而是希腊语。

这种意义上的罗马帝国灭亡于公元476年。盛极必衰，我想，罗马在众多“盛者”中别具一格，没有“伟大瞬间”的灭亡会更好些，这种“必衰”的方式至少与众不同。

罗马与后来历史中出现的其他帝国在另一点上也是完全不同的。其他帝国的崩溃是由于其统治下的殖民地纷纷独立而引起，只有罗马不是因为行省离反而崩溃的。在怒涛般袭来的北方蛮族面前，行省一直与本土命运与共。后代的帝国本土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被严格区分为统治方与被统治方。与此不同，罗马人认为本土人民和行省人民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罗马人把这种关系称为“famil ǐa”，这个词语把他们的帝国观表现得淋漓尽致。罗马人认为命运共同体就是一个大家庭。

这个意义上的帝国灭亡了，说不出准确的时间，也没有“伟大瞬间”。



第三章
“后帝国”时代

（公元476年——）

西哥特人的族长奥多亚克作为降下罗马帝国历史帷幕的人物而名垂青史。罗马史结束于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而非公元476年这一主张也因他而起。他逼迫少年皇帝退位后，既没有让任何人哪怕是傀儡登上皇位，也没有自己登基，而是要求东罗马帝国皇帝芝诺正式承认他的地位。

具体说来，他要求得到“patricius”的称号。这个词按文字直译是“贵族”的意思。在罗马帝国末期，这个词大致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纯粹的名誉职务；第二个意味着宰相或代理，因此具有官方地位与实权。奥多亚克想要的就是第二种意义上的“贵族”称号。他要求正式任命他为“意大利地区皇帝代理官”。他这样做是承认东罗马帝国的权威。

不论是逐渐称霸高卢的法兰克人族长，还是在西班牙形成一大势力的西哥特人族长，亦或是已经领有北非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汪达尔人族长根西里克，都没有向东罗马帝国皇帝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各自称“王”。他们没有像奥多亚克那样逼迫西罗马帝国皇帝退位，也没有奥多亚克特有的弱点。

奥多亚克

活跃在帝政末期的蛮族出身的领袖可以大致分为三种人：

第一种，从父辈起就在罗马军队中从军，然后子承父业，在罗马军中获得晋升的人。最好的例子是斯提利科。他的父亲是蛮族出身，母亲是罗马人。这种人与出身的部族基本没有关系。“罗马化的蛮族”是这类人的总称。

元首制时代也是如此称呼，但那时没有歧视的意思。即使是“蛮族”（barbarus），一旦获得罗马公民权，立即就被认为是“罗马人”（romanus）。然而，到了帝国末期，歧视的意味越来越浓。丧失自信的人常常会感到强调差别可以找回自信。



奥多亚克

第二种，出身于部族的族长。公元410年发动“罗马浩劫”的西哥特人族长阿拉里克、法兰克人族长克劳德维克、率领汪达尔人称霸北非的根西里克都属于这一类。这些人出身于部族长家庭，成为族长不费什么事。

这些人都有率领部族突破罗马帝国“防线”、侵犯罗马领土的“前科”，但帝国作为善后对策，亦即作为仅仅保住体面的策略，更多的是让他们与帝国之间缔结“同盟”协约。所以，他们只是由侵略者变成同盟者，相对于皇帝，独立程度很高。总之，这些人的强势之处只有一点——统率着自己的部族。

第三种，蛮族出身的领袖，一言以蔽之，就像是一匹狼，在现代来说，就像是外国雇佣军的士兵。他们与第二种人同样是蛮族出身，但第二种人都是大部族的族长。相比之下，他们是小部族的族长，或是因某种原因离开部族，志愿参加罗马军队，并获得晋升。奥多亚克是这类人的典型，公元476年，他42岁那年，灭亡了西罗马帝国。此前20多年，他一直在西罗马帝国军队里积累着他的从军资历。既是一匹狼，又得到了晋升，实力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他没有可以指望跟随自己到底的部下。他没有这个福分。他靠自己的才能吸引忠诚的部下，而不是靠来自家族或父辈的继承。

我们甚至无法确认奥多亚克出身的部族，也许他只是蛮族出身的狼队的领袖。在他的立场上，他希望得到皇帝承认的正式地位并非过分要求。

东罗马帝国皇帝芝诺对奥多亚克的请求态度暧昧，没有接受，却也没有拒绝。既然我们派去的西罗马帝国皇帝尼波斯在达尔马提亚，应该向他请求授予“贵族”称号才是。芝诺皇帝没有责备他逼迫罗穆路斯·奥古斯都退位，没有把罪魁祸首奥多亚克当做帝国的敌人来定罪。



芝诺

采取这种暧昧态度的原因，不是芝诺皇帝同情尼波斯，在被派去当西罗马帝国皇帝却无勇气踏入意大利，因而未能巩固西罗马的皇位。原因实在很简单，芝诺因受国内争端影响于一年前被赶下台，在公元476年这一年刚刚重登皇位，目前正处在一个微妙的时期。他满脑子只想着自己的事，顾不上去管西罗马帝国。这件事充分表现了东罗马帝国对西罗马帝国的态度。“东”对“西”的关心只限于可能殃及自己的事情。

见君士坦丁堡态度暧昧，奥多亚克也作出了决定，与其抬出尼波斯，不如自己干。不过，他并没有除掉尼波斯自己来做“西边”的皇帝。他想象得出，如果强行其事，“东边”将如何出手。既然不能指望改善与尼波斯的关系，现实的做法是放弃意为“尼波斯代理人”的“贵族”称号。奥多亚克决定自己称“王”。“贵族”这个拉丁语词是与罗马帝国皇帝联系在一起的尊称。但“王”是源于日耳曼的尊称。他决定不当“意大利地区皇帝代理官”，而是称“意大利王”。

这样一来，与日耳曼系的“王”统治高卢、西班牙和北非一样，罗马帝国的本土意大利半岛也开始由日耳曼“王”统治了。东罗马帝国皇帝自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者，日耳曼的“王”要使东罗马帝国皇帝承认自己对罗马帝国本土意大利半岛的统治就会很困难。没有正式的承认，就容易被视为敌人。这一点也是奥多亚克相比其他日耳曼系国王的弱点。

共存路线

少数胜者统治多数败者的法则是保存已有的统治阶层。即使想改造现有的统治阶层，也应该从长计议，眼下必须做的首要之事是使现有统治阶层安下心来。败者知道自己败在军事力量上，因而对胜者的到来心里会有更强更深的恐惧感。

进驻这一瞬间很重要。因为这一瞬间将决定少数胜者对多数败者的统治是否成功。如果胜者强制推行增加败者恐惧感的政策，绝望的败者就会疯狂奋起，拼死抵抗。这样一来，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就将成为梦想，剩下的只是败者对胜者的顽强抵抗，胜者为镇压抵抗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而深陷泥沼。罗马史上有着防止这种状况的世所罕见的典范。

尤里乌斯·恺撒耗时8年征服了高卢全境，征服之后，却把保留现有各部族作为战后处理的基本方针。正是这些部族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抵抗了恺撒率领的5万罗马军队，失败后又再举反旗。而恺撒却不但完全原谅了他们，保留了他们，并且还承认了他们部族内部的自治，甚至同意他们像原来一样留在自己的根据地。同意保留根据地，意味着承认他们在那块地盘上长年培植起来的部族内部统治体系。更有甚者，恺撒把罗马公民权授予刚刚投降罗马的昨日之敌的族长，还把自己家族的门第称号“尤里乌斯”授予他们，让他们成为自己家族的一员，并把罗马元老院的议席授予其中有实力的部族族长。回顾罗穆路斯以来的罗马史，恐怕是史无前例。

高卢战役刚刚结束，恺撒与力挺庞培的元老院派的对立表面化。他渡过卢比孔河，罗马进入内战状态。结束这场内战花了4年时间。这期间，高卢没有罗马的一兵一卒。恺撒自己则转战在远离高卢的希腊、埃及和北非等地。这对刚刚被恺撒征服的高卢各部族摆脱罗马统治，是不可多得的好时机。然而，高卢各部族非但没有起事，还应正在西班牙与庞培派军队作战的恺撒之请，给他送去了军粮。我们只能认为，这里的原因是连同小部族在内的数以百计的高卢各部族族长们都接受了恺撒的统治哲学。

恺撒说服他们道：众多部族相互攻击的高卢迟早会投降日耳曼民族。你们是选择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严格区分开来的日耳曼式统治呢，还是选择以胜者与败者共存为目标的罗马式统治呢?

奥古斯都继承了恺撒的统治。他把用石板敷设的罗马道路网扩大到了行省。这个古代的高速公路网也铺到了高卢，把各部族的根据地相互连接起来。迄今为止的法国重要城市，几乎都是从恺撒在两千年前的古代征服的各部族根据地发展而来。罗马人建设的城市可能只有里昂。高卢有充分理由被称为罗马化的典范。



蛮族统治后的旧西罗马帝国领土

奥多亚克不是尤里乌斯·恺撒。对恺撒而言，征服高卢是为了罗马的防御，而不是为了确保罗马人的居住地。而对奥多亚克而言，占领意大利是为了给跟随自己而来的北方蛮族以定居之地。然而，奥多亚克却模仿了历史上以“恺撒的宽容”（Clementia Caesaris）而闻名的罗马帝国对外政策，并把它作为日耳曼人统治罗马人的政策。

当时，意大利的罗马人闻知了蛮族在不列颠、高卢、西班牙和北非等地的统治方法，他们担心、惧怕在奥多亚克的统治下自己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精神已被压垮。

“后帝国”（Post imperium）时代的不列颠

罗马帝国自公元410年起就从不列颠撤了兵。那一年，西罗马帝国皇帝霍诺里乌斯向常驻那里达360年之久的3个军团发去了诏书，命令他们撤退。诏书内容为：

> 罗马帝国皇帝致所有总督、所有大元帅、所有司法官：
>
> 蛮族阿拉里克发动罗马浩劫，不仅实施破坏、杀人放火，给首都带来极大灾难，还将帝国国库洗劫一空。帝国已无经济力量负担行省的防御和统治。因此，今后只能请诸位各自管好自己的事情。

所谓霸权国家，正是因为能够保障处于其霸权之下的地方和居住在那里的人民的安全才成其为霸权国家的。然而在不列颠，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半个世纪的公元410年，罗马帝国就已放弃了霸权国家的职责和义务。

不列颠在做了三个多世纪的帝国行省之后被抛弃了。罗马军团撤走以后，除了以前就跃跃欲试的北部苏格兰人之外，不列颠还受到了来自后来的德意志北部渡海而来的撒克逊人以及来自后来的丹麦渡海而来的盎格鲁人的更大威胁。罗马军团撤走以后，仅靠剩下的罗马化凯尔特系不列颠人已经抵抗不住外族入侵。他们只能逃往山地较多的威尔士和康沃尔。位于哈德良长城以南的原罗马帝国行省不列颠被日耳曼系的撒克逊人和盎格鲁人占领。不久，日耳曼系蛮族威胁到了康

沃尔。失去居住地的凯尔特系不列颠人渡过大海，移居到高卢西北部。这个地方被称为布列塔尼，也是不列颠人定居于此的缘故。

继续称呼罗马时代的名称不列颠已经没有意义，历史进入了“英格兰”时代，“英格兰”意为盎格鲁人居住之地。传说亚瑟王和圆桌骑士们也都是罗马军团撤出不列颠后的乱世所造就的英雄。也有说法认为，亚瑟王是在罗马驻不列颠军队中积累了军人资历的当地人，即罗马化凯尔特人。在不列颠，甚至没有人尝试一下胜者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与败者凯尔特系罗马人之间能否共存。

“后帝国”时代的高卢

高卢行省与不列颠只隔着多佛尔海峡。土地广阔的高卢，在公元454年瓦伦提尼安三世斩杀埃提乌斯之后，事实上也已与罗马帝国分离。马赛以东的普罗旺斯地区总算留在了罗马一方，除此之外的高卢全境则处于日耳曼系蛮族自相残杀的状态之中。其中一支蛮族法兰克人以高卢北部为基盘，不断扩大着自己的势力。法兰克人虽然与顽强留在高卢东部的勃艮第人时而并肩作战，时而相互争战，反复无常，但却成功地把一度在高卢西部颇成气候的西哥特人赶到了比利牛斯山脉以南。高卢进入了“法兰西”时代，“法兰西”意为法兰克人的居住地。

法兰克人居住在莱茵河下游东侧即罗马帝国“防线”之外的日耳曼。它不是拉丁民族，属于日耳曼民族。在日耳曼系北方蛮族大多抛弃祖传的日耳曼诸神、改信阿里乌斯派基督教之后，只有他们还在信仰日耳曼民族自古以来的传统诸神。在成为天主教派基督教徒近200年的罗马人看来，他们不是“异端”，而是“异教”之徒。

在信仰一神教的人中常见的现象是，他们最憎恨的不是异教徒，而是异端之徒。因为异教徒是尚未对基督的教诲有所觉悟的人，因而还有觉悟的可能。但是异端则已对基督的教诲有所觉悟但误解了基督的教诲，并且不承认误解，从而不信基督。既然坚信不疑，让他们对基督的真正教诲有所觉悟的可能便微乎其微了。

在高卢，胜者法兰克人是异教徒，而败者罗马化的高卢人是天主教派基督教徒。当然，在高卢也是胜者人少，败者人众。与不列颠不同，高卢地势变化小，必须向东或向西远行才有山地，败者无处可逃，只能留在原地。面对这样的高卢人，法兰克人在相当程度上行使了“胜者的权利”。抢夺败者的财物被认为是胜者的正当权利，所以尽管史料极度匮乏而脱不出想象的范畴，我们也可以认为，高卢人的财产遭受到了相当惨重的损失。

不过，对败者而言，也不是毫无有利之处。第一个有利之处就是，胜者毕竟人少，败者的人数占压倒性多数。即使胜者想把败者全部抢光，这点人也办不到；即使想把败者全部变成奴隶，如果监视者人数不足，也只能作罢。

第二个有利之处是，对蛮族而言，抢了就走的时代已经终结，盘踞扎根的时代已经到来。这样，统治者需要向被统治者传达大量的命令。这时就产生了统治的必要。这种时候法兰克人只能使用拉丁语，于是也就需要能写拉丁语文章的人。即使是收税，也需要有人决定，也需要完善征收系统，否则税金收不上来。法兰克人完全不具备这种行政方面的技能，也只能依靠败者。法兰克人不得不认识到掠夺与统治是不同的，他们只能延续罗马帝国时代的行政机构，只能继承罗马帝国人的语言拉丁语，在这方面也只能依靠专业化的败者。

第三个有利之处我认为在于宗教。法兰克人是日耳曼教徒，而高卢人是天主教派基督教徒，各自信奉不同的神祇，而不是对同一神祇的教诲解释不同。高卢受法兰克人统治之后，记录中也没有任何对天

主教派基督教徒的迫害和镇压的记载。处于异教徒而不是异端的统治之下，反倒使宗教得以共存，尽管这个结果是始料未及的。

虽说成为败者，却仍有有利之处，这其中的最后一点，不消说就是“安全”。高卢不必再为北方蛮族的入侵担惊受怕了。反复入侵的这个蛮族如今已换位到防守一方了。

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总体上进展顺利，我想这里的原因在于，败者一方认为安全是最令人欢欣的事。有谁能责备他们呢？对统治者而言，没有比保障“和平”更大的职责了。帝国的灭亡，是统治者已经丧失尽此义务能力的结果。

20年后，对居住在法兰克人所统治的高卢的罗马人来说，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改善。法兰克人自己改信了天主教。克劳德维克自公元481年至511年一直是法兰克人的国王，他于公元493年迎娶了勃艮第国王的女儿为妻。这个女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法兰克国王同意她所生的两个儿子接受洗礼。改信宗教的环境具备了，最后突破却花了3年时间。根据图勒主教的记载，奇迹发生在与阿勒曼尼人的战斗中。这个奇迹与发生在君士坦丁大帝身上的奇迹莫名地相似，令人苦笑。但奇迹毕竟出现。法兰克国王感激于这个奇迹，与手下3000人一起接受了洗礼。

从异教徒一变而为天主教派基督教徒，这是蛮族最早的基督教皈依。这使得东罗马帝国欣喜异常。因为这一事件，东罗马帝国与法兰西的关系便与其他北方蛮族国家不同了，具有了同一个信仰，变成了“兄弟之情”（fraternitae）。然而，统治者的这个变化对被统治者——居住在高卢的罗马人——来说是一件更加令人欣喜的事情。在胜者和败者的身份渐渐远去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这件事也给胜者与败者的共存带来了看不见的效用。顺便一提，克劳德维克是法兰克人最早的，也是北方蛮族最早的天主教国王。他还是最早把自己王国的首都定在巴黎的人。

“后帝国”时代的西班牙

除了居于西北部的苏维汇人、猫在比利牛斯山脉的巴斯克人之外，在罗马时代，伊比利亚半岛大部被称为西班牙，处于西哥特人的统治之下。西班牙成为罗马帝国行省的时间比高卢还要早200年。在罗马帝国全盛时期统治帝国的五贤帝中，西班牙就出了图拉真、哈德良、马可·奥勒留三位贤帝。战胜迦太基后，西班牙成为罗马帝国的行省，这里的罗马化历史，比不列颠和高卢还要长。与罗马帝国命运与共的时代如此之长，与其称那里的人为西班牙人，不如把他们当做西班牙的罗马人更为贴切。

日耳曼系的西哥特人入侵伊比利亚半岛后在那里定居下来。他们也是基督教徒，却是被天主派当做异端排斥的阿里乌斯派的基督教徒。

公元430年，蛮族已经开始统治这个地方，但几乎没有留下如何进行统治的记录。以面对地中海的西部为中心，罗马人奋起抵抗蛮族统治的次数不在少数。然而，直到灭亡，西罗马帝国也无力援助那里的同胞。

伊比利亚半岛地势复杂，与法兰西不同。法兰西一马平川，连滑雪都得去阿尔卑斯山脉。个人生活中都能实际感觉到在那里较易建立中央集权。可是比利牛斯山脉南边却做不到。可以想象，西哥特人的统治也不顺利，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还有信仰上的不同，关系一定持续紧张。

不过，在这里统治者也是少数，被统治者是多数。居住在高卢的罗马人在法兰克人统治下所有的有利之处，居住在西班牙的罗马人也同样具有。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安全”，不用再苦于蛮族的反复入侵

了。尤其是在知道了胜者汪达尔人正在直布罗陀海峡一海之隔的北非把败者置于绝对统治之下的强硬做法之后，感觉更是如此。

“后帝国”时代的北非

如前所述，汪达尔人在北非根本不想搞胜者与败者共存的统治。胜者如果仅是信奉阿里乌斯派基督教的汪达尔人，情况可能不会糟于西哥特人统治伊比利亚半岛的状况。可是在北非，胜者中还有遭受天主派迫害镇压长达100多年的多纳图派基督教徒。这使得成为败者的北非罗马人陷入了绝望的状态。他们是天主教派基督教徒，现在转变为被镇压、被迫害的一方。

高卢、西班牙基本没有出现难民，北非却有很多难民。在资产只限于耕地和房屋等不动产的时代，舍弃资产逃亡的人都在逃亡地拥有另外的耕地和房屋，在那里自然还是社会上层。即使没有耕地房屋的社会“中层”，但若有可靠的地方和人可以投靠，在能力上也属于“上层”。

一般常识认为，如果让这种人逃走，社会就会瘫痪，生产力也难免降低。但对某种一意孤行的人来说，这个常识行不通。因为有比阻止社会功能和生产力下降更优先的事要做。这件事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民族净化”。在汪达尔人统治的北非出现了类似的现象。

以上就是西罗马帝国灭亡，蛮族奥多亚克这位新统治者到来时，旧西罗马帝国的状态。奥多亚克是阿里乌斯派基督教徒。居住在意大利半岛的罗马人对他屏息以待自有道理。

“蛮族统治下的和平”（Pax barbarica）

奥多亚克并非出身于部族族长家族，所以自己没有部下。尽管如此，他却聚集了众多的蛮族狼，居然组建了一大集团，可见他拥有相当的政治能力。

公元476年，他为西罗马帝国历史落下帷幕。当时他手下聚集的蛮族号称10万之众。这是连妇女儿童都合计在内的数字，打起仗来，战斗人员只有2万人，最多也不会超过3万人。罗马帝国也只是受到这充其量两三万人蛮族军队的威胁而已，并未在战斗中败北，但走上了灭亡之路。真是情何以堪！

然而，摆在胜者奥多亚克面前的是要以10万人之力统治20倍以上的败者。

奥多亚克把这个根本性的完全与败者共存的方针确定为基本政略。这个政略是统治高卢、西班牙，自然还有不列颠、北非的蛮族所根本没有考虑过的。并且，奥多亚克没有止于提出问题，而是把这个政略化做具体政策付诸实施。

首先，他没有把蛮族与罗马人的关系定位为“蛮族”与“罗马人”，没有定位为日耳曼人与拉丁人，没有定位为胜者与败者，也没有定位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而是规定为“客人”与“主人”。主人热情款待来访的客人，还把客人留宿在家中。从胜者与败者的实际情况看，也算是伪善到家了。这样的情况在拉丁语中叫做“hospitalitas”（好客，款待客人），说的是对客人的待遇。定位为主客关系，还有多少缓释败者一方屈辱感的效用吧。尽管如今破落了，但毕竟意大利半岛曾经是罗马帝国的本土。

但奥多亚克还有部下，他必须保障他们的生计之道。于是他决定，把“主人”的资产拿出三分之一赠与“客人”。这个主意可以名之为“三分之一政策”，却并非奥多亚克首创。从前，斯提利科曾经决定拿出居住在高卢的罗马人财产的三分之一给蛮族，以此作为利用蛮族

保卫高卢的手段。这两个政策何其相似。但是，斯提利科被冠以逆贼的污名而处死，还被处以“记录抹杀刑”，他生前的业绩多被抹消，无法确认这一政策的情况。但是，奥多亚克实施了这个“三分之一政策”却是事实。

乍看上去，这个“三分之一政策”像是胜者加给败者的严厉处置。无论如何，败者要被强行夺走三分之一的财产。但在实施阶段，这种严厉程度打了相当大的折扣。因为居住在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的“主人”并非全部都得向“客人”提供三分之一的财产。首先，如果只拥有一间房屋或不很大的农庄，即使提供三分之一，得到这些资产的一方实际上也无法使用。手工作坊和街上的商店情况也一样。这样，拥有资产，但只是小规模生产手段的人就被排除在这“三分之一政策”的对象之外了。

如果“上层”是火车头，“中层”和“下层”所起的就是火车头赖以牵引车厢的车轮作用，是使社会发挥功能不可或缺的要素。保留社会中下层的政策确实是一项明智的占领政策。

但是，要保存社会“上层”的现有统治阶级，在意大利半岛就是要保留元老院阶级和天主教派基督教教会。这两者都是大规模农庄的所有者。前者是从祖先继承而来，后者是由信徒贡献和赠与而来，都是“三分之一政策”的绝好对象。不过这时，“胜者权利”的意味已大为缓和了。

奥多亚克以防御完善为由也住进了西罗马帝国皇宫所在地拉文纳。对他而言，最理想的就是部下也住在附近。而且，对他们这些日耳曼民族而言，希望在异国意大利扎堆居住也是人之常情。所以，在意大利半岛名副其实地实施“三分之一政策”的地方都集中在北部。

如此一来，意大利中部和南部都会被排除在“三分之一政策”的对象之外，从而有失公平。不公在道义上固然不好，作为统治方法也很

拙劣。于是，胜者采取了实际上以“地租”形式支付三分之一资产的方法。败者同样必须向胜者提供三分之一的资产，但实际上成为借用这部分资产的形式，败者可以通过支付“地租”后继续经营整个农庄。

由于没有记载，地租金额不详。这些租金似乎都付给了“意大利王”奥多亚克，成为他定期支付给属下士兵工资的财源。

可能有人会想，要支付以前不曾支付的“地租”，对大农庄主来说应该是经济上的打击。

请回想一下，以前由于西罗马帝国无力保护居民不受蛮族侵略，农庄主们只好自行组织自卫团自卫的事实。

如今，他们的安全由“客人”保障。虽然“地租”几何不详，但已无必要继续保留自卫团。即使保留自卫团，也并非针对大举来袭的大群蛮族，规模只要有能够应付人类社会时时处处都存在的盗贼就足够了。从目前已发现的史料来看，同样是大农庄主的元老院议员和基督教教会人士，没有一个反对“三分之一政策”。

再说说税制。奥多亚克统治以来，西罗马帝国时代的税制原封未动。然而，西罗马帝国时代常常听到悲叹重税的声音，这在奥多亚克统治下却听不到了。这也许是被蛮族统治之后税负再重也不许发出悲叹之声，也许是征税的蛮族文明程度尚低，离奢侈尚远，尚未横征暴敛。总之，在奥多亚克及以后的狄奥多里克蛮族统治时期没有听到重税的悲叹声，而在后来收复意大利后的东罗马帝国时代却再度响起了这种声音。这一现象在历史上意味深长。

这样看，日耳曼人奥多亚克成为“意大利王”之后对现存体制的保留是相当彻底的。

首先，他本人和部下是阿里乌斯派基督教徒，没有对信仰天主派基督教的意大利人进行任何镇压和迫害。居住在意大利半岛的天主教徒与北非的兄弟不同，没有必要为了守教而当难民。意大利全境的教堂自然和以前一样照样举行天主派的祭祀，天主派教堂并没有因为建设阿里乌斯派教堂而遭到破坏。

而且，奥多亚克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拉文纳的皇宫即现今王宫里的组织体系。以前的皇宫官僚改称王宫官僚便已足够。头目更迭，内部组织却保留了下来。官职名称也原封不动地使用拉丁语，甚至没有更换的必要。

首都罗马的行政仍由“首都长官”（praefectus urbi）负责处理，没有变化。“首都长官”以下各行政方面的公务员，直到下级官员，也都和从前一样继续着同样的工作。

至于元老院，岂止是得到保留，连长期被剥夺的铜币铸造权也得到了承认。帝政以后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规定，金币和银币的铸造权归皇帝，铜币的铸造权留给元老院。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元首制时代终结。

货币铸造权本身就是权力，拥有货币发行权也是权力独立的象征之一。元首制时代的罗马帝国把与“防线”接壤的国家称为“amicis”（朋友）。这些国家在罗马帝国与位于外侧的敌对势力之间起着缓冲的作用。在罗马帝国看来，他们不只是“朋友”，还是属国。但光嘴上叫“amicis”也是没有用的。于是，成为事实上的属国之后，其货币铸造权也得到承认。此外，雅典和斯巴达由于过去的辉煌历史，并入罗马帝国之后被称为“自由城市”，享受着特别待遇，她们也一直保持着独自的货币铸造权。货币发行权是自治权的象征。

因此，在元首制时代，罗马帝国的基本货币奥里斯金币、第纳尔银币和塞斯特斯铜币都是材料价值与面额价值完美统一的优质货币，

在罗马帝国全境有着为数众多的货币兑换店。这证明了罗马帝国不论自己的货币如何优质，也没有向其霸权之下的国家、城市和人民强制推行自己的货币。这与其说是尊重霸权之下的国家、城市和人民，不如说是因为尊重了这种自由会更加易于自己的统治。

但是，这样的罗马帝国在4世纪初叶以后彻底改变了。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两位皇帝开始强化中央集权，元首制时代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绝妙平衡已然成为过去。罗马帝国也与以前的元首制时代划清了界线，成为绝对君主专制国家。世道变了，货币兑换店也只能失业了。

又过去了250年，到5世纪后半叶，铜币的铸造权又回到了罗马元老院。铜币的背面明确铸有字母SC，证明是元老院发行的货币。很容易想象，元老院议员手拿刚从铸造厂运来的这些铜币会沉浸在怎样的感慨之中?

奥多亚克保留了农庄这个元老院阶级的经济基础，又给予元老院铜币铸造权，紧紧地抓住了败者中两大势力之一元老院阶级的心。同样，他通过保留农庄和手工业，保障信仰自由，笼络住了另一大势力天主教会。他还通过社会自上而下在全体败者中扫除对蛮族入侵的恐怖，抓住了败者的心。他把“蛮族统治下的和平”带给了因失去“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而痛苦的人们。

也许是因为奥多亚克对现存势力的保留太过彻底，罗马居民中甚至流传出一则笑话，说连贿赂官员的习惯也保留了下来。

分栖共存

奥多亚克毕竟不是罗马人，而是日耳曼人。他实施的少数胜者统治多数败者的政策不可谓不明智。但是，所有这些政策都是考虑与败者的“共存”，而并未想到“同化”败者。这一点清楚地表现在胜者日耳曼人与败者罗马人所承担的工作方面。

这一点简单说来，就是军事由蛮族负责，行政和经济等其他各领域都由罗马人负责。日耳曼系蛮族即使拿到土地也不会专司农业，而是领取固定金额的工资，处于随召随到的待命状态。胜者为了保障被统治者的安全，保持常备军事力量是绝对需要的。他们靠武力取胜，并不想放弃武力，也不打算与败者罗马人分享武力。

对这种分工败者一方也无不满。反正罗马帝国军队有名无实，实际上士兵都出身于蛮族，这样的时代已持续很久。在罗马人中，避讳军务的想法已经根深蒂固。胜者决定军事由自己管理，这在罗马人看来，就等于把自己的安全托付给别人。但5世纪的罗马人忘记了这个决定所意味的重要性，奥多亚克的决定反倒受到罗马人的欢迎。

在司法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也有不同的法律。蛮族之间使用日耳曼法，罗马人之间使用罗马法。只是法律上罗马法相当完备，实际上极少案例用日耳曼法裁判。

如前所述，行政完全交给败者负责。因为蛮族没有这种组织，不得不全部交出行政权。胜者在行政方面并不插嘴，一定起到了使罗马人忘记自己是败者的作用。

以上就是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胜者与败者“分栖共存”的实际情况。果若如此，共存就有可能。

可是，如果想起罗马人过去在共和政体时代实行的“同化败者”的路线，两者之间的区别就会令人印象深刻。罗马人让被征服者以辅助兵的名义，与正规军的军团兵一道参与军事，承担对国家来说最重要

的安全保障任务。辅助兵如果服役期满，退役时可以拿到罗马公民权。公民权是世袭权利，他们的儿子就可以报名参加只有罗马公民权所有者才有资格加入的军团兵。如果不选择从军，也可以享受与世代具有罗马公民权的人完全同等的权利。

而且，如果出身于部族长家族或有优秀才能，不必要等到服役期满退伍时才能获得罗马公民权。如果当上辅助部队队长，立即就会被授予罗马公民权，可以出席大元帅和军团长主持的作战会议。即使昨天还是敌人，只要敌对关系结束，就会被视为自己人，对其中的优秀人才，还会被给予与本国优秀人才平等竞争的机会。这样，仅在军事方面，同化败者做得就很彻底。罗马人在使用人才方面不分胜者败者。正因如此，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希腊人、以《列传》作者而闻名的普鲁塔克断言，罗马之所以强大的重要原因首先在于他们对败者的同化政策。

奥多亚克并非不懂利用败者的人才。在很多领域，西罗马帝国时代的组织和官员得到保留，亦即在这些领域工作的罗马人也在配合奥多亚克的统治。这与战败后日本当政者配合胜者美国的军政当局对日本进行统治的情况相类似。尽管双方为了在尽可能好的状态下“共存”而合作，但这并不是两者的“同化”。

这种不同似乎并不能归咎于奥多亚克一人。正如尤里乌斯·恺撒在《高卢战记》中所指出的那样，众所周知，自古以来，日耳曼民族的统治方式就是在自己与被征服的其他民族的居住地之间设置荒地隔离带，除最小限度的需求之外不进行交流。所以，他们原本就不适应罗马人所偏好的“同化”政策。话虽如此，我们很难一成不变地看待日耳曼民族，毕竟公元前1世纪恺撒时代和与罗马人接触已成家常便饭的公元5世纪情形已经大不相同。

但是，一个民族的本性不会轻易改变也是事实。我们权且认为不变的部分有一半吧。那改变了的另一半大约就是在公元5世纪时日耳曼

民族大多改信基督教这一点了。胜者奥多亚克及其部下信奉的是阿里乌斯派基督教，败者罗马人信奉的是天主教派基督教，两者都同为基督教这个一神教的信徒。

天主教派信奉神、耶稣基督、圣灵三位一体说。阿里乌斯教派则认为耶稣无限接近神性但不是神。两派之间的相互责难不是针对“异教”，而是针对“异端”。换言之，这不是信奉的神不同，而是对神的解释不同，是追随同一个神的方式不同。在200多年前的尼西亚公会议上，天主教派被定为正统，阿里乌斯教派被确定为异端。因为都相信自己的主张方为正统，形成了两派之间长期的敌对关系。

这样就根本没有可能“同化”。所谓信仰是各人内心的问题，或许只有多神教才有可能把信仰放在一边，在别的方面共同做点大家都能做的事。可以指望一神教徒的，也许“共存”就是极限了。在靠开放政策发展的时代，罗马人是多神教徒。普鲁塔克也是信奉多神教的希腊人，他积极地认可这种政策的效果。我在考虑，莫非“蛮族统治下的和平”远比“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短命也是因为这种差别?

尽管如此，“蛮族统治下的和平”接力的第一棒奥多亚克对意大利的统治持续了17年。奥多亚克自己没有兵力，只能召集蛮族出身的士兵。蛮族集中居住在拉文纳及其附近的意大利东北部，意大利半岛其他地方连蛮族兵的影子都看不到。在这样的状态下，奥多亚克的统治居然持续了17年。在此期间，没有发生帝国其他行省常有的被统治者的叛乱，也没有关于难民从意大利东部逃入东罗马帝国的实例记录。

日耳曼人与罗马人的“共存”成功了。历史学家给这个时期起了一个名字：“日耳曼——罗马王国时代”。对奥多亚克而言，敌人不在国内，他的敌人正在意大利半岛之外逐渐形成。

狄奥多里克

狄奥多里克于公元454年生于东哥特人族长之家。他与奥多亚克的不同不仅在于年龄相差20岁，还在于他生来就拥有自己的兵力。

东哥特人当时居住于现在的德国南部多瑙河上游地区，与东罗马帝国之间缔结了“同盟”协约。所谓“同盟”就是认可其居住地，但需承担居住地及其附近的防御作为交换条件的制度。缔结这种协约时，作为惯例需要交出人质以为守约的保证。从前，埃提乌斯作为人质在匈奴人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狄奥多里克从8岁到18岁的10年间，也是作为人质在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度过的。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虽是人质，却与大英帝国时代殖民地实力人士的儿子到英国留学没有什么两样。狄奥多里克也是这样，他学文习武，磨砺政治感觉，了解东罗马帝国内情，度过了8岁到18岁这段对人格形成有最重要影响的时光。不仅如此，他还学到了东罗马帝国政策的本质，这就是，尽管与西罗马帝国是同胞关系，但对西罗马帝国命运的关切也只限于不危及自身的情况，一旦发现这种关切将成为弊害，就会立即舍弃西罗马帝国。

他18岁那年回到故乡，并非因为东罗马帝国与东哥特人之间的“同盟”破裂，而是因为他的族长父亲以自己年迈为由向皇帝提出请求，让儿子回到身边。两年之后父亲去世。日耳曼系蛮族东哥特人便有了一位20岁的年轻领袖。

东哥特人的年轻族长在东罗马帝国的地位和以前一样，保持了与皇帝的“同盟”关系。狄奥多里克的父亲始终是东罗马帝国的忠实“同盟者”，而狄奥多里克却不同。他在与邻近蛮族的战斗中不断取胜，一点点地扩大地盘。他首先入侵多瑙河中游，再把手伸向下游，成为东罗马帝国皇帝也不能小觑的“同盟者”。芝诺皇帝一度被放逐，但仅用一年就得以复位。狄奥多里克为芝诺皇帝夺回皇位助过一臂之力。从

此，狄奥多里克的地位便更加巩固。芝诺皇帝因此功绩把“贵族”称号授予了年仅23岁的狄奥多里克。蛮族的年轻族长当上了东罗马帝国的“贵族”。听说皇帝还准许在首都君士坦丁堡建造狄奥多里克骑马雕像。

虽然年轻的族长对芝诺皇帝而言是优秀而忠实的同盟者，但也是一个不可掉以轻心的人。狄奥多里克甚至曾经率兵从居住地多瑙河下游斜贯巴尔干地区，威逼首都君士坦丁堡。对芝诺皇帝而言，他一步步地转变为一种麻烦。狄奥多里克也不再满足于这样的现状。

地位再高也不过是东罗马帝国皇帝属下的一个家臣。公元487年前后，狄奥多里克心中萌生了独立的念头，他在33岁时便早早看透了自己在东罗马帝国的前途。

进攻意大利

狄奥多里克想进攻意大利，打倒奥多亚克。这个想法深深地吸引了芝诺皇帝。他一直没有给予奥多亚克正式地位。虽然奥多亚克自称意大利王，但在东罗马帝国看来，他不过是没有得到帝国正式承认而僭坐王位之人。而狄奥多里克则是东罗马帝国的“贵族”，30岁就当上了“执政官”，还是负责后世称为巴尔干地区的东罗马帝国西部“大元帅”。狄奥多里克进攻意大利，是为了把西罗马帝国从蛮族统治中解放出来，是东罗马帝国承认的军事行动。说真心话，这件事的实质不过是狄奥多里克的“独立欲望”与芝诺皇帝要“赶走麻烦”的两相结合而已。但在表面上，这是把西罗马帝国本土意大利从蛮族统治之下解放出来的正义战争。

在日耳曼民族，最终的决定需要在部族集会上获得同意。公元488年，34岁的狄奥多里克得到了同意。东哥特人连同妇女儿童号称30万

人，他们舍弃了房屋，牵着家畜，把眼下的必需品装上货车，一齐离开多瑙河，一路向西。30万的总人数中能打仗的成年男子大概有五分之一吧。即使这样，与奥多亚克的兵力相比也多出一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蛮族有很高的生育率，在统治意大利的15年间，奥多亚克的士兵数量也有增加。双方兵力在数量上应该是势均力敌的。

进攻意大利定在第二年，即公元489年。进攻方狄奥多里克35岁，迎战方奥多亚克55岁。

狄奥多里克知道，只要打败了奥多亚克，整个意大利半岛就是他的。他还知道，奥多亚克的根据地在意大利北部。所以，他采取直捣意大利半岛东北部的打法。这种打法类似于只实施局部麻醉，并在麻醉的地方动刀的外科手术。这种战略显然也考虑到了将来胜利之后的情况。

两者之间最初的战斗发生于公元489年4月28日。阿尔卑斯山脉横亘在巴尔干与意大利之间，索查河从阿尔卑斯山脉的最东面流过。战斗在索查河两岸打响。获胜的是狄奥多里克一方。此战并不是决战，奥多亚克和他的大部分军队逃脱。

奥多亚克与其说是败逃不如说是撤退，他寄希望于在以维罗纳近郊为战场的第二场战斗中一雪前耻。可是，在一个月之后的第二场战斗中，奥多亚克又打了败仗。但他仍然没有遭到毁灭性打击，剩余兵力还很充足。

第二年，即490年8月11日，进行了第三场战斗，战场进一步西移。双方在发源于阿尔卑斯山脉、流经米兰注入波河的阿达河附近展开了激战。奥多亚克又一次败北。这样，狄奥多里克应该已经控制了从西向东横贯意大利北部的波河以北的地区。奥多亚克只能逃回离波河的亚得里亚海入海口南方50公里左右的拉文纳。他打算在防御完备的拉文纳坚守不出，继续对狄奥多里克作战。

说起来像是一种悖论，奥多亚克比来犯的狄奥多里克战斗力略处劣势，但在这时却有诸多有利条件。

首先，狄奥多里克是在敌人地盘上作战，奥多亚克却是在自己的领地内作战，不仅占有粮食等物资补给之便，还因统治时间长达15年之久而占有熟稔意大利北部全境地势之地利。

此外，奥多亚克不必担心罗马人会把狄奥多里克和东哥特人的入侵看做摆脱统治的好机会而在各地一齐暴动。罗马人已经满足于“蛮族统治下的和平”，在“蛮族”之间发生这场战争时，既不会在奥多亚克手下参战，也不会对奥多亚克举起反旗做有利于狄奥多里克的事。不仅居住在已沦为蛮族斗争战场的意大利北部的罗马人抱有这种态度，在风闻战争已经打响的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罗马人也抱这种态度。总之，如今即便是被统治者，居住在意大利半岛的罗马人人数也占绝对多数，他们的态度是静观其变。



意大利北部

拉文纳被沼泽和运河所包围，固若金汤。狄奥多里克攻进意大利后不到一年，便称霸意大利北部的北半部分。然而，狄奥多里克凭一己之力要在短时间内占领拉文纳希望渺茫。蛮族不擅长打包围后再行攻城的持久战。这种战斗必须从保障补给线开始，而蛮族重视兵站的思想尚不发达，如果包围战久拖不决，不利的是攻城方，而不是守城方。尽管如此，东哥特人仍然紧跟狄奥多里克。他20岁就成为首领，此后又不断证明了自己的领袖能力。

拉文纳的攻防战实际上超过了两年。现实不允许狄奥多里克只考虑攻占拉文纳。他还必须保障30万东哥特人每日的吃住。将满39岁的狄奥多里克改变了战略。

双方于公元493年3月开始媾和，充当中间人的是拉文纳的主教。奥多亚克与狄奥多里克的媾和达成如下协议：

由奥多亚克和狄奥多里克共同统治意大利全境。

狄奥多里克发誓结束过去4年的敌对关系，不动奥多亚克及其家属以及手下人一个手指头。作为交换，奥多亚克将狄奥多里克及其手下高官迎入拉文纳。

媾和成功！两个月后的5月5日，狄奥多里克只带了一队人马通过左右敞开的大门进入拉文纳市内。从第二天开始连日举行盛宴，庆祝双方的融合。然而，到了第10天，60岁的奥多亚克突然被杀。他的妻子、儿子、手下重要人物在一夜之间悉数被杀。正式公布的理由是奥多亚克阴谋杀害狄奥多里克。但奥多亚克他们是被当即处死的，连逮捕入狱的过程都省略了。奥多亚克的手下知道这个消息后，很少有人离去，几乎全部编入了狄奥多里克的军队。也许是他们多为蛮族出身的狼、无家可归的缘故吧。

对居住在意大利半岛的罗马人来说，这只是统治者变换。由于是“局部手术”，战场也只局限在意大利北部的东部地区，意大利半岛大部分地区没有遭受沦为战场的灾难。拉文纳被狄奥多里克原封不动地继续作为根据地，只不过是王宫的主人易人而已。

东哥特王国

从公元493年39岁除掉奥多亚克开始，到公元526年72岁去世为止，狄奥多里克的实际统治长达33年之久。他能够持续如此长的统治，是因为他虽然消灭了奥多亚克，却没有取消奥多亚克实施了10年以上的政策，而是予以全盘继承。这对居住在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的罗马人来说，意味着仍然会继续生活在“蛮族统治下的和平”之中。

狄奥多里克全盘继承了奥多亚克的政治，但是人变了，政治色彩也会随之变化。用一句话点评，也许就是政治手段更加精炼。

“客人”与迎进客人的“主人”，这种用“hospitalitas”一词来表现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没有发生变化。“客人”们围绕自己的头目狄奥多里克居住的拉文纳周围，扎堆居住的情况也没有改变。对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被统治者来说，统治者仍旧是远方地主，与自己的交集只是向其支付三分之一耕地的地租而已。难道还有比不与胜者频繁接触更能减轻败者罗马人心理负担的事情吗?

狄奥多里克比奥多亚克更严厉地禁止被统治者拥有武器，连护身用的剑也禁止携带，只允许保有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刀具之类。作为交换，狄奥多里克及其部下则要彻底保障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的安全。狄奥多里克重新整编军队，抛弃了纯东哥特人血统主义，大力接纳日耳曼系民族中其他部族出身的人。但与各部族出身士兵混杂的奥多亚克的军队不同，狄奥多里克军队的主体归根结底还是东哥特人。

所以，狄奥多里克会经常称手下人为“哥特人”，即使他不是哥特人出身。

一般情况下，“哥特人”士兵居住在分给他们的土地上从事畜牧和耕种。但因狄奥多里克平时也照常发饷，所以一旦发生情况，士兵有义务迅速参战。由于狄奥多里克保障了士兵的定居地和固定薪饷，且不采取纯东哥特人血统主义，当初不足6万人的兵力，10余年间就增加到了20万人。这可不是在无所事事之间的自然增长，出于巩固意大利半岛防御的需要，狄奥多里克把军队扩充到了西部、北部和东部。这20万的数字是已除去了在西至法国南部、北至瑞士、东起布达佩斯直到克罗地亚一线扩张霸权损失后又增长的人数。仅就军事力量和凭此力量得到的地盘看，狄奥多里克的东哥特王国已经拥有比末期西罗马帝国更大的力量，将更广阔的领土置于自己的霸权之下。问题在于靠什么去维持凭武力获得的领土。在这方面，狄奥多里克也显示出了相当的才能。



公元500年前后的旧西罗马帝国

狄奥多里克在意大利半岛的地位与奥多亚克一样，并未得到东罗马帝国的承认。除掉奥多亚克后不久，狄奥多里克也曾向取代芝诺登上皇位的阿纳斯塔修斯皇帝请求正式承认自己的地位。然而，东罗马帝国不希望意大利与自己分离而成为独立王国，但也没有拒绝狄奥多里克的请求。也许是看到了狄奥多里克是东罗马帝国的“贵族”，比奥多亚克温顺。但是，东罗马帝国依然没有承认狄奥多里克，所以他也只能和奥多亚克一样，僭称“意大利王”。

奥多亚克与东罗马帝国之间感觉上始终是相互无视，而狄奥多里克则一直对东罗马帝国皇帝采取尊重的态度。狄奥多里克在做人质期间就透彻地了解了东罗马帝国，他知道现在还不能小觑“东”的军事力

量，不能给“东”以行使武力的口实。东罗马帝国人民的天主教信仰，由于热烈而易转为狂热，一旦爆发连皇帝也莫能相逆。如果逆潮流而动，皇位也就岌岌可危了。狄奥多里克必须采取一切手段来规避这种风险，以防危机被转嫁到自己统治的意大利来。

也是这个缘故，狄奥多里克对与东罗马帝国的关系尤为费心。他在长达33年的统治期间发行过多种货币，尽管都是由狄奥多里克的王国发行，但几乎所有货币正面铸刻的都是东罗马帝国皇帝的头像。只有看了背面的文字才知道，这是狄奥多里克下令铸造的。铸有狄奥多里克自己头像的货币至今只有一种得到确认。



狄奥多里克

此外，在与天主教派共存方面，狄奥多里克比奥多亚克花费了更多的心思。他自己一直是阿里乌斯派的基督教徒，却迎娶了改信天主教的法兰克国王的妹妹为妻。当然，他没有要求妻子改信阿里乌斯派基督教。此外，狄奥多里克的亲生母亲也跟着儿子住在拉文纳，并在

那里受到主教的影响改信了天主教。对此，儿子也未加任何干涉。位于王宫的拉文纳主教宝座一直由天主教派占据。

表面做派一直像一个属于东罗马帝国的王国，对天主教派基督教徒也很宽容，这些都是狄奥多里克为了避免刺激东罗马帝国而采取的策略。这与奥多亚克没有得到承认后始终无视东罗马帝国的情况有所不同。

哥特人国王还注意建立与不断在旧西罗马帝国各地构筑独立王国的日耳曼系其他蛮族国王们的关系。他自己娶了法兰克国王的妹妹为妻，他的妹妹和女儿中的两个，甚至还有侄女，都嫁给了这些蛮族王国的国王或王子等为妻。这样，狄奥多里克筑就了与高卢的法兰克和勃艮第、西班牙的西哥特、北非的汪达尔之间的姻亲关系。换成现代话语，这就等于与各蛮族王国之间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而且每当这些蛮族王国之间发生龃龉，他都自告奋勇地承担协调的角色，而且协调大多成功。

狄奥多里克一边努力维持与东罗马帝国之间的良好关系，一边试图在西部集结日耳曼民族，形成可称之为日耳曼民族王国联盟的强大势力。为此，狄奥多里克甚至以放弃决定西地中海制海权的西西里、撒丁、科西嘉三岛中撒丁、科西嘉两岛的领有权为代价，与汪达尔王国缔结了和平协约。由于这个“互不侵犯条约”，那些居住在西班牙和法国南部及意大利沿海、长期饱受汪达尔海盗之苦的人们，也享受到了“蛮族统治下的和平”的恩惠。

利用败者

如前所述，奥多亚克统治的成功，是因为保留了既有势力。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狄奥多里克的统治之所以长命，原因就在于他不仅原

样继承了原有政策，而且执行起来更加彻底。

如果把王宫比做现代国家的首相官邸，那么，用现代话说，负责王宫内部组织的首脑就是日本的官房长官（相当于政府秘书长的官职。——译者注）。在狄奥多里克的整个统治过程中，这个首脑以及这个组织内部各部门的长官，都是由被征服者罗马人担任的。

意大利全境的行政首脑都由执政官担任，而执政官也一直由罗马人担任。于是，15个行省的长官都由罗马人担任，也就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了。当时已经允许地方自治，负责自治事务的从上到下全部是罗马人。总之，军事以外的所有领域，全都让被征服者罗马人去管理。这就是说，进入狄奥多里克统治时代以后，担任军事的日耳曼人和负责行政的罗马人并未混杂在一起，而是分离并存的。

但这既不是混合，也不是同化。其证据如下：在元首制时代的罗马帝国，罗马人士兵与日耳曼、高卢或西班牙的女子结婚并非罕见，他们之间生下的混血儿作为罗马人养育成人。但在狄奥多里克的统治之下，听不到哥特人男子与罗马女子通婚的事。哥特人与罗马人和平共处，互不侵犯，井水不犯河水。

也许这就是日耳曼人所认为的“共存”。在教育后代方面，狄奥多里克的态度与狂热的天主教徒毫无二致。

要提高解读能力、写作能力和理论能力，无论如何得用开发并完善了这些能力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所写的文章作为教材。但是，基督教徒中有很多人认为，孩子通过读这些异教精神产物的书籍学习有受到“污染”的危险。

但身为阿里乌斯派基督教徒的狄奥多里克并没有感到这种危险。狄奥多里克所感到的危险，可能是因接触希腊罗马的书籍，日耳曼的

民族精神会受到污染。他可能认为，为了规避这种污染，有必要扬“武”，因而牺牲“文”，这也是不得已之事。

狄奥多里克曾亲口说过这样的话：“很多哥特人希望被当成罗马人，却没有罗马人希望被当成哥特人。”

罗马人如今虽然成了被统治者，但他们从心底里蔑视统治者哥特人。狄奥多里克担心的是，如果哥特人子弟和罗马人接受同样的教育，他们就会变得罗马化，而非日耳曼化了。

就这样，东哥特人的子弟可以不用上学了。结果不难想象，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统治者”越来越多。于是，为了不签名也能办事，狄奥多里克开始允许备用其“印”。他亲自示范，在公文上不签名只盖印，甚至让人误解他也是文盲。

可是，因为这条禁令，统治者东哥特人变得更加需要被统治者罗马人了。这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离开能写文章的罗马人，哥特人什么事都办不成。历史的变化有时起因于只能付之以苦笑的无聊琐事。这里就是一例。

可见，罗马人在“蛮族统治下的和平”环境里的重要性，由于他们是败者而越发饶有兴味。卡西多里乌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忠臣卡西多里乌斯

卡西多里乌斯，生于意大利半岛南端的卡拉布里亚地区，时间是西罗马帝国悄无声息地灭亡3年之后的公元479年。他的家族属于元老院阶级，是地方上的大农庄主，也是逼迫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奥多亚克决定保留的既有势力中的一员。从父辈开始，这个家族就已经接受奥

多亚克的旨意，为其统治提供合作。卡西多里乌斯的父亲在意大利北部的拉文纳王宫供职，长期没有回过位于意大利南部的家。

公元493年统治者变为狄奥多里克之后，卡西多里乌斯的父亲也没有改变与哥特王国合作的态度。他在狄奥多里克打退汪达尔人，确立在西西里岛的统治地位时开进西西里，全面重组了行政组织。以后，他继续配合狄奥多里克的统治，甚至担任了意大利南部的官选长官。

卡西多里乌斯出生时，西罗马帝国已不复存在。他有着那样的父亲，所受教育与罗马帝国时代的精英一样，学的是使用希腊罗马教材的“素质教育”。也许和当时许多青少年一样，他在首都罗马接受了成为精英所必需的教养。

对如此成长起来的卡西多里乌斯来说，蛮族统治的现实从降生起就司空见惯，而且父亲又是一位与蛮族合作的人。因此，从年轻时起，卡西多里乌斯对蛮族统治就完全没有偏见。不仅是他，可以认为当时很多居住在意大利半岛的人也都一样。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由谁统治，而在于如何统治。

公元500年，卡西多里乌斯20来岁，狄奥多里克的统治也进入了第7个年头。这年，狄奥多里克首次访问了首都罗马。元老院的议员们来到城门，迎接这位哥特人国王，市民们夹道欢迎，就像他们以前欢迎皇帝一样。

年已45岁的狄奥多里克也像是皇帝的做派。他向聚集在古罗马广场一角的元老院会议厅的议员们发表演讲，然后来到外面，站在讲坛上对聚集而来的市民发表演说。他使用的是拉丁语，尽管也许不如希腊语那样擅长。而且，在长达6个月的逗留期间，他住在建在帕拉蒂尼山上、当时还足可使用的皇宫里，精力充沛地遍游了曾经的“世界之都”。

狄奥多里克不仅游览了古罗马广场，还游览了皇帝们的讲坛、图拉真记功柱、庞培剧场、罗马竞技场等。尽管自己是基督教徒，他还参拜了建于卡匹托尔山上的主神朱庇特的神殿。当然，与其说是参拜，不如说是参观。他甚至远足郊外，参观水道桥。就像后世造访罗马的德国、英国的观光客一样，他充满了好奇心和探究心。

这些巡视不单单是走马观花，发表些感叹言论，在他认为有必要修复的地方，他便当场决定拨付所需经费。这些地方不是基督教的教堂，而主要是过去罗马皇帝都很重视的上下水道、港口、桥梁等基础设施。年轻的卡西多里乌斯受到感动。随着狄奥多里克在罗马逗留时间的流逝，一个地道罗马人当初对他的好奇变成了赞叹。

不过，过去的皇帝受到市民欢迎之后，要向市民提供以角斗士比赛、战车比赛等为主的娱乐节目。狄奥多里克十分想继承这些传统，但自一百年前基督教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以来，通常在罗马竞技场进行的角斗士比赛因过于残酷而不再进行。于是，他决定进行同样受老百姓欢迎的战车比赛。

但战车比赛也已经不似往日那样，是由豪华快速的四匹马拉战车赛跑定胜负的竞技了。到眼下这个时代，最好的也只是两匹马拉的战车了。地点也许像往日一样在大竞技场，也许在久已停止角斗士比赛的罗马斗兽场。卡西多里乌斯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人们不知道确切的地点。但战车比赛确实是在这二者中的一处举行的。这样一来，罗马老百姓对哥特国王的亲近感变得无以复加。

就在这一年，或是第二年，还只不过是年轻学子的卡西多里乌斯写了一篇赞美狄奥多里克的诗篇，赠给了这位国王。说白了，这就是一封“粉丝”写的信。狄奥多里克也许看到了这封信。狄奥多里克一打听，这人的父亲还是不遗余力与自己合作的人。不知是否与此有关，卡西多里乌斯30岁那年，狄奥多里克授予这位年轻人“贵族”的称号。形式上卡西多里乌斯位列“贵族”，但这强烈地意味着他被授予担任国

家要职的资格。于是，从这时起到狄奥多里克去世的17年间，卡西多里乌斯将自己30岁到47岁这一段男人最可宝贵的年华交给了大他25岁的狄奥多里克，为他的统治提供合作。在这17年中，卡西多里乌斯历任所有要职，包括担任执政官。

我们后世能够追溯卡西多里乌斯的任职经历，是因为他一直在狄奥多里克的身边担任秘书官。这个时期卡西多里乌斯的工作是记录哥特国王发出的种种口头指令并予公布。这些口头指令的日耳曼色彩太浓，需要通过改写，使之富于罗马色彩才能发布。卡西多里乌斯引退之后以“杂记”（*Variae*）为名把这些指令汇编成册，这才使我们在一千五百年后的现代得以追忆往事。阅读此书可以使我们了解到，统治者的命令往往语气严厉生硬，而在卡西多里乌斯的笔下，这些布告会变得如此稳重温和。

这不过是一条让人把亚得里亚海深处伊斯特拉半岛的农产品送到狄奥多里克所在的拉文纳的命令，经卡西多里乌斯之手后成为下面所引的样子。顺便一提，当时接受命令的一方是威尼斯共和国。他们一百年前从侵占意大利的阿提拉率领的匈奴人手中逃亡出来，不得不在浅滩上建起了自己的城市，后来却成了海洋国家之雄。

> 如所周知，今年伊斯特拉半岛获得了丰收。请考虑将那里出产的葡萄酒和橄榄油运到拉文纳来。你们拥有众多船只，一定能够安全运送伊斯特拉居民交来的农产品。你们可与他们对半平分这件工作所带来的收益。因为只有双方合作，这件事才能做好。
>
> 请你们马上开始这次短程航行吧。你们惯于远航，这次航行就像是在自己的国度，来往于各家各户之间。你们不一定要走海路。如果海里风大浪高，还有河川可走。根据你们的判断，选择你们认为更加安全的航路。
>
> 想到你们的家园是如何建成的，对我而言是多么美好的一种享受。威尼托地区过去（指罗马帝国时代。——作者注）曾以涌现出

许多才华横溢、品行高尚的人才而闻名。这里南接拉文纳和波河，东接亚得里亚海沿岸美丽的海滨。大海潮涨潮落，陆地时开时合。你们的家园就像水鸟，时而漂浮在海面，时而休憩于岩石之上。这些并非自然使然，而是人们努力的结果。

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所拥有的丰富食粮只有鱼儿，不分贫富，平等分食。你们的房子几乎都是同样的规模和造型。这些使你们远离羡慕邻居这样的世间之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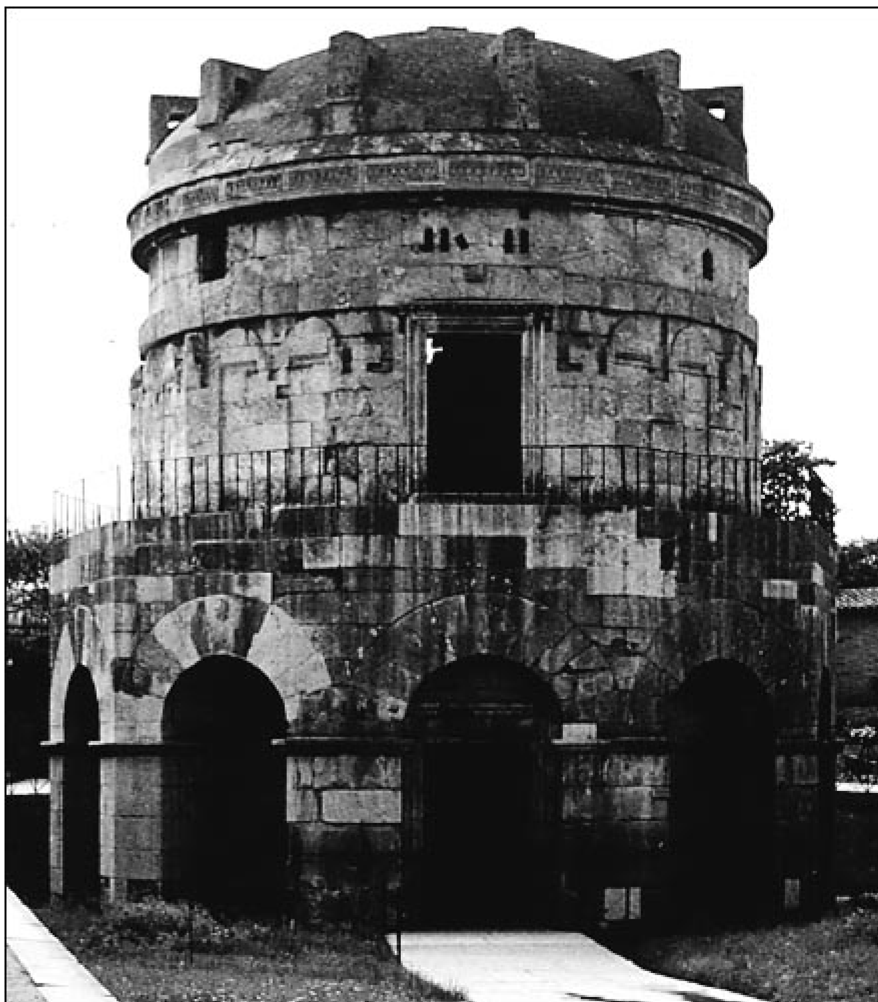
你们居住在威尼提亚（现在的威尼斯），开发盐田是你们的主业。别处的人们在田间挥锄舞镰，你们却是舂臼磨盐。没有黄金你们也能活下去。可是，谁都需要可以保存食物并使之鲜美的食盐。正因为如此，你们能够靠卖盐而换取其他必需品。

来吧，准备好你们的船只。把船拴在你们的家门口，就像把家畜拴在屋边一样。我已经派遣精于此事的劳伦提乌斯去了伊斯特拉。他收集好农产品后，就请你们开始运输，希望不会因为什么障碍和经费等原因而有延误。希望全体人员共同努力，把农产品早日运到拉文纳。

不论政治、军事还是行政，人世间许多事情都与“苦”字如影随形。所以，要求民众做事的为政者所必需的资质，不是把“苦”花言巧语地说成“乐”，而是要设法让民众在虽“苦”尤乐的心情中做事。我认为，卡西多里乌斯是狄奥多里克统治的最高发言人。相对少数的日耳曼民族的统治得以持续，而相对多数的罗马人没有发生过一次叛乱。这里不仅仅因为统治的内容好，还因为统治的表达也好。不仅是录用人才，使用人才的能力也是为政者不可或缺的资质。这种资质是一个人的美德（virtus），与他所属的人种、民族和宗教无关。

“蛮族统治下的和平”在奥多亚克统治下持续了17年，在狄奥多里克的统治下又持续了30年，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开始加起来已经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50年来，意大利半岛不再担心蛮族入侵，还能享受到

令人满意的善政，自然在各个方面恢复了生气。虽说失去了三分之一的资产，但支付租金就能继续使用。因为要付地租，就不能像过去那样荒废土地。人口是减少了，但正因为如此，才会想着用好现有的人。这样就搞活了意大利半岛全境的人和耕地这两个要素，自然提高了生产率，靠着“蛮族统治下的和平”，农产品的流通也得到了恢复，意大利的经济再度上升。就连不断减少的人口，也恢复到两个世纪前的情形，呈上升趋势了。这证明了“和平”才是人类社会最根本的基础。



位于拉文纳的狄奥多里克陵寝遗址

有一位名叫普罗科皮乌斯的人，与狄奥多里克是同时代人，但年龄要小50岁左右。他是希腊人，出生于巴勒斯坦的恺撒利亚。出生在

巴勒斯坦的希腊人属于东罗马帝国的国民。从普罗科皮乌斯的角度看来，始终与东罗马帝国保持着微妙关系的狄奥多里克是“敌人”。普罗科皮乌斯是东罗马帝国的官僚，还是天主教徒，对他而言，狄奥多里克不放弃异端阿里乌斯教派的信仰，在这层意义上他也是“敌人”。普罗科皮乌斯对狄奥多里克有下面的评价。

普罗科皮乌斯仰慕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自身也是一位重视历史叙述客观性的史学家。与其说他是6世纪拜占庭帝国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不如说他是古代的最后一位历史学家。他留下了《哥特战记》等众多著作。普罗科皮乌斯在狄奥多里克去世时这样写道：

> 东罗马帝国给他的名称只是专制君主，但实际上他可以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皇帝。他是一位比帝国后期登上皇位的任何人都有资格称为“皇帝”的领袖。他的统治富有人情味，不仅获得了同胞哥特人的信赖，而且获得了居住在意大利的罗马人的信赖。狄奥多里克去世时，不分统治者被统治者，也不分哥特人罗马人，大家都流下了哀伤的泪水。

狄奥多里克于公元526年8月30日在拉文纳去世，享年72岁，死后埋葬在事先建造的陵寝中，至今仍能供人瞻仰。

但是，在狄奥多里克统治的33年中，并非始终一帆风顺。晚年的数年中，没有预料到的不顺事件让年老的国王烦恼不已。所谓不顺，固然有狄奥多里克自身变得过度焦虑的原因，但更多的原因是连具有他那样德行的人也无可奈何的历史背景。

“东边”的长手

西罗马帝国存在的时候，和东罗马帝国一样是天主教派基督教国家。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统治者奥多亚克、狄奥多里克是阿里乌斯派，而被统治者是天主教派，这种情况已持续了半个世纪。从信仰正统与否的意义方面来看，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被打成“异端”而一直受到排斥的人一直统治着这里。

要把自己信仰以外的所有宗教都打成“异端”予以排斥的想法，天主教派基督教徒要比阿里乌斯派基督教徒更为强烈。阿里乌斯教派的奥多亚克、狄奥多里克对其统治下的意大利天主教徒的信仰未进行任何干涉。我认为，这里的原因是，虽然同为基督教徒，但阿里乌斯教派有肚量承认与自己不同的信仰。北非属于例外。天主教国度北非在被阿里乌斯教派的汪达尔人征服以后，一直受到天主教徒迫害的“异端”多纳图主义者加入到了统治者一边，这是一种特殊情况。

西罗马帝国本土意大利半岛，因为彻底贯彻了米兰主教圣安布罗西乌斯的振兴措施，居民成了清一色的天主教派基督教徒。意大利半岛在帝国灭亡后成为“异端”统治的国家。不过，在意大利，身为天主教徒的罗马人却不遗余力地配合阿里乌斯教派的“异端”蛮族进行统治。卡西多里乌斯也是一位身为天主教徒却一直与狄奥多里克合作的人。50年过去了，上至元老院议员、国家公务员，下至老百姓，并没有对这种“正统”与“异端”的共存感到任何不便，甚至有过这样的事情：在选举罗马主教（现已是教皇）时，候选人之间发生纷争无法收场，天主教派的罗马教廷请求狄奥多里克出面协调。于是，决定天主教主教的选举由于狄奥多里克的协调而得以顺利进行下去。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半个世纪里，意大利没有任何人觉得这有什么奇怪。尽管这是为了不刺激天主教派势力强大的东罗马帝国而采用的策略，但天主教派与阿里乌斯教派的共存是成功的。

然而，既然宗教、信仰之类是不属于理性范畴的事物，就必定会出现一些人，他们会认为仅仅“没有什么不便”的共存是违反神意的背

信行为，必须予以弹劾。对持有这种想法的人来说，接受异端阿里乌斯教派的统治就是背信行为，只有排除这种统治，回归到坚持基督教真正教义的天主教派的立场，才是接受神意的生活。

这种人在狄奥多里克统治的30年间一直存在，但没有一次成为多数派，在接受阿里乌斯教派统治的天主教会中一直处于孤立地位。这并不是因为意大利的天主教徒不听他们的主张，而只是因为东罗马帝国优先处理自己的问题，根本没有余力考虑打着打倒阿里乌斯教派的旗号进攻意大利。可是，到了狄奥多里克的统治接近尾声的公元525年前后，东罗马帝国的情况开始改变。现任皇帝查士丁的外甥、被视为下任皇帝的查士丁尼在东罗马帝国内部的势力越来越大。

有一位名叫波伊西乌斯的罗马人，和卡西多里乌斯一样不遗余力地配合狄奥多里克的统治，两人年龄也相差无几。但无论是出身还是资产，他都优于卡西多里乌斯。他属于罗马第一富豪艾妮希亚家族，与堪称罗马元老院阶级“门面”的西马库斯家族关系深厚。他早年丧父后一直由西马库斯家抚养，后来又娶了西马库斯的女儿。总之，在成为被统治者的罗马人中，他是一位“代表选手”。

此外，他还是一位拥有符合其身份的学识和教养之人。虽然身为天主教徒，却有着穷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强烈欲望，在这方面著述颇丰。他也和卡西多里乌斯一样，被狄奥多里克封为“贵族”以后历任国家要职，一直是狄奥多里克信赖的有能力的家臣之一。

自称“意大利王”的狄奥多里克重视在与自称“法兰克王”、“西班牙王”的日耳曼系蛮族出身的国王之间构筑友好关系。他听从波伊西乌斯的进言，选拔优秀的竖琴演奏家作为礼物送给法兰克国王，又挑选日晷和滴漏赠送给勃艮第国王。对狄奥多里克而言，波伊西乌斯是可胜任官房长官的重臣，同时也是负责外交的辅佐官。波伊西乌斯一方面协助这位蛮族出身的国王统治意大利，另一方面也花精力投入古典研究。卡西多里乌斯留有赞赏波伊西乌斯这方面研究成果的论文。对日

耳曼系的国王狄奥多里克而言，罗马人卡西多里乌斯和波伊西乌斯是不可多得的优秀而值得信赖的合作者。

可是，延续了20年之久的良好关系到了公元525年突然瓦解。那年，有一位名叫亚尔比努斯的元老院议员被告发，说他密通东罗马帝国皇帝，策划为把意大利的天主教徒从阿里乌斯教派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而进攻意大利。秘密调查者称发现了确凿证据。但证据及其真伪不详，甚至搞不清究竟亚尔比努斯只是在脑子里想过让东罗马帝国解放意大利的天主教会，还是已经与东罗马帝国有实际行动。

但是，由于事关元老院议员，就不能草草了事。狄奥多里克在统治意大利时把保留既有势力作为第一政略，而且坚信这一政略已获成功。对他而言，这个问题尤为重大。于是，全体重臣被召集到正在帕维亚的狄奥多里克身边，似乎要召开阁僚会议，讨论如何处理这一重大问题，而不像是要诉诸审判。事件就发生在这时。

当时有一个官名，叫“magister officiorum”，地位类似内阁官房长官。担任这个官职的是波伊西乌斯。我们不知道他究竟对这件事了解到什么程度，总之，这位波伊西乌斯在狄奥多里克面前为亚尔比努斯进行了大胆的辩护。他说：

> 如果亚尔比努斯有罪，那我也是同罪，全体元老院议员也都是同罪。而如果亚尔比努斯无罪，我和其他元老院议员也都无罪。

但是，波伊西乌斯接着说出了这样的话：

> 不过，就算我知道亚尔比努斯策划了这个所谓的阴谋，我可能也不会报告。

这句话激怒了年过七旬的狄奥多里克。我们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是因为他年老焦虑，还是因为被所信赖的人背叛，或是因为对过去30年一直避免刺激东罗马帝国的努力就要因为一小撮狂热分子前功尽弃而感到愤怒，也许这些原因兼而有之。尽管这只是一个名叫基普里安的间谍带来的消息而已，这时却被当成了可信度极高的情报。

然而，结果朝着出乎意料的方向发展。不仅亚尔比努斯获罪，波伊西乌斯也被定为同罪，被幽禁在帕维亚的一座高塔中，既未审判，也没有立即处决。幽禁持续了一年。在幽禁中，波伊西乌斯撰写了题为“哲学的慰藉”（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的作品。在他为数众多的作品中，这部著作最为读者所喜爱。

第二年，即公元526年，波伊西乌斯被处以斩首刑。这年8月末狄奥多里克就已去世，没有人知道对波伊西乌斯的死刑执行是在此前还是在此后。

45岁的波伊西乌斯思考着哲学的慰藉赴死，而狄奥多里克则是在33年的统治之后才走完了自己72岁的人生。可是，他死得安心吗？他步入老年还在担心东罗马帝国的态度。自己后继无人，这也在行将就木的狄奥多里克心中投下阴影。

狄奥多里克有女儿，却没有儿子。他把一个女儿阿玛拉桑夏嫁给一位同为东哥特人的男子，想把这个男子立为接班人。但这个名叫尤塔里克的男子偏好纯日耳曼血统主义，厌恶罗马人，且毫不掩饰。对靠与罗马人共存而生存的东哥特王国来说，他不可能是一个合适的继承者。这在一段时期里成了狄奥多里克的心病。幸而这位纯日耳曼血统主义者很早过世。可是，他与阿玛拉桑夏只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将继承狄奥多里克，但他年纪尚幼，实际统治只能由母亲阿玛拉桑夏代劳。然而，哥特人非常厌恶女人的统治。

继承人的重要性在于，他决定了以往成就的业绩今后是会发扬光大，还是会损失殆尽。可以想象到72岁去世时狄奥多里克内心的抑郁。他曾在君士坦丁堡做了10年的人质，尽管那时年纪尚幼，但已对东罗马帝国的一切了如指掌。正是这样，他也许早已看到了这只从东边渐渐伸过来的长手，尽管眼下还影影绰绰。这时，东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还只是一位对皇帝有影响的人。然而，狄奥多里克死后仅一年，他就正式登上了皇位。

“蛮族统治下的和平”的终结

卡西多里乌斯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不遗余力地协助狄奥多里克进行统治。随着狄奥多里克的故去，这一切也结束了。但卡西多里乌斯没有回意大利南部的故乡，而是继续留在了北部的拉文纳，为的是帮助继承王位的狄奥多里克10岁的外孙子阿萨拉里克及其母亲阿玛拉桑夏进行统治。这个决断在因狄奥多里克的死而声势日隆的天主教徒中，也是相当需要勇气的。

作为回报，少年国王和他的监护人母亲也把王国最具实权的地位给了卡西多里乌斯。这个地位就是我意译为“内阁官房长官”的“magister officiorum”。波伊西乌斯被处死后，这个位置就一直空缺。

狄奥多里克临死前在病榻上向东哥特人重臣们表明了要让10岁的阿萨拉里克继位的意愿，并让他们宣誓效忠。新国王在狄奥多里克去世的8月30日即位。这件事通报了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及西方各蛮族王国的国王，并得到了东罗马帝国皇帝的承认，条件是要臣服于东罗马帝国。这样，尽管阿萨拉里克只有10岁，但他的王位在公的方面完全没有问题，问题发生在私的方面。但在哥特人的实力派看来，国王的事根本不是私事。

狄奥多里克的女儿阿玛拉桑夏是新国王的母亲，她想让儿子接受罗马式教育。所谓罗马式教育，就是以希腊罗马的经典为教材的素质教育，是成为精英所必需的教养。然而，哥特人的重臣以狄奥多里克生前认为哥特人弟子没有必要上学为由，断然反对她这样做。他们认为哥特人国王只要习武就已足够，把孩子与母亲分开。10岁的少年国王被抛入了日耳曼式的蛮猛生活之中。也许是对这种生活的不适应和对母亲的依恋侵蚀了少年的心，不久，阿萨拉里克就得了心病，8年后便像被遗忘一般地死去。



阿萨拉里克



狄奥达图斯

尽管阿萨拉里克只是形式上的国王，可他一旦亡故，以他的监护人资格进行统治的阿玛拉桑夏便处境微妙。她成功地让哥特人的家臣们承认了她的女王地位。可以想象，她所依靠的也许就是卡西多里乌斯这种政权内部尽心尽力的罗马人。不过，在厌恶女人掌权的社会中，仅仅这样还不能让人放心。于是，阿玛拉桑夏与哥特人实力家族出身的狄奥达图斯再婚。

狄奥达图斯喜欢别人用罗马式的发音念自己的名字。在哥特人重臣当中，他是一位毫不掩饰自己喜好希腊哲学的罕见人物。据传，这就是38岁的女王阿玛拉桑夏选他为夫的原因。当时，38岁的年龄已不

能指望生儿育女。也许出于这个原因，阿玛拉桑夏不能完全信任这位丈夫而心怀不安，于是她便去接近东罗马帝国的皇帝。阿玛拉桑夏说不定也是从阿里乌斯教改信天主教的。狄奥多里克连自己亲生母亲改信天主教都没有当回事，对女儿改教可能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

自己的女王接近东罗马帝国招来了哥特人重臣的愤慨。狄奥达图斯对他们的愤怒再不能熟视无睹，便将东哥特王国的正式女王、自己的妻子幽禁在湖心的岛上，并指使人杀害了她。

很明显，这给已经即位的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提供了进攻意大利再好不过的借口。事前似乎未被告知的卡西多里乌斯赶紧忙于应对紧急事态。他说服了狄奥达图斯，让他派出急使，带去信函，发誓绝对效忠于东罗马帝国。卡西多里乌斯脑子里想的只是制止战争这一件事。为了使意大利半岛免遭兵燹之灾，他就像先前帮助阿玛拉桑夏一样，不遗余力地帮助杀害了阿玛拉桑夏的狄奥达图斯。

可是，哥特人内部对狄奥达图斯的非难四起。重臣们也都责难他腰杆不硬，士兵清一色地认为东罗马帝国不足畏惧。狄奥达图斯被逼退位，维提吉斯被选为东哥特王国的国王。维提吉斯一直并不怎么出色，但在士兵中拥有极高的人气。这一事件发生在公元536年秋天，狄奥多里克已去世10年。

学园

此后，卡西多里乌斯似乎退出了与拉文纳皇宫直接有关的公务活动。自从开始协助狄奥多里克统治的生涯以来，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这位出身于意大利南部的罗马人精英一直生活在意大利北部。他好像已经参透皇帝不会再让自己做什么事了，于是回到了意大利南端，那里的太阳慷慨地把自己的光热洒向大地。他即将年届六旬。

他原本出身于一个拥有广阔领地的家庭，罗马时代的庄园也是农牧业的生产基地。他有足够的财力在田园农庄里欢度自己的余生。可是，卡西多里乌斯没有选择像一位同僚在西西里拥有的那种奢华的田园生活。引退后，卡西多里乌斯只是让人在领地斯奎拉切的山丘上建造了一座面积仅够自己和志趣相投的几个人生活之用的小修道院，在离开不远的地方又建造了一所取名为“Vivarium”的学园。

“Vivarium”的词义为苗圃或鱼塘，但里面培养的并不是草木和鱼，而是人。大家同食共寝，学习的内容涉及以希腊罗马经典为教材的素质教育的方方面面。这些都是领会自由精神所必需的学问。城邦鼎盛时期的希腊人最早领悟到开办这种学园的必要性。拉丁语中的“schola”、意大利语中的“scuola”和英语中的“school”都来源于希腊语的“schole”。这个希腊语单词的原义，就是提高充分发挥每个人精神力量所需要的技能。

卡西多里乌斯设立“鱼塘”，其目的也是成为这个意义上的“学园”。所以，这里的学习重点是文学、哲学和音乐，而不是其他学校所重视的修辞学。也许是这里并未把培养能在公职社会中获得成功的人才作为目的的缘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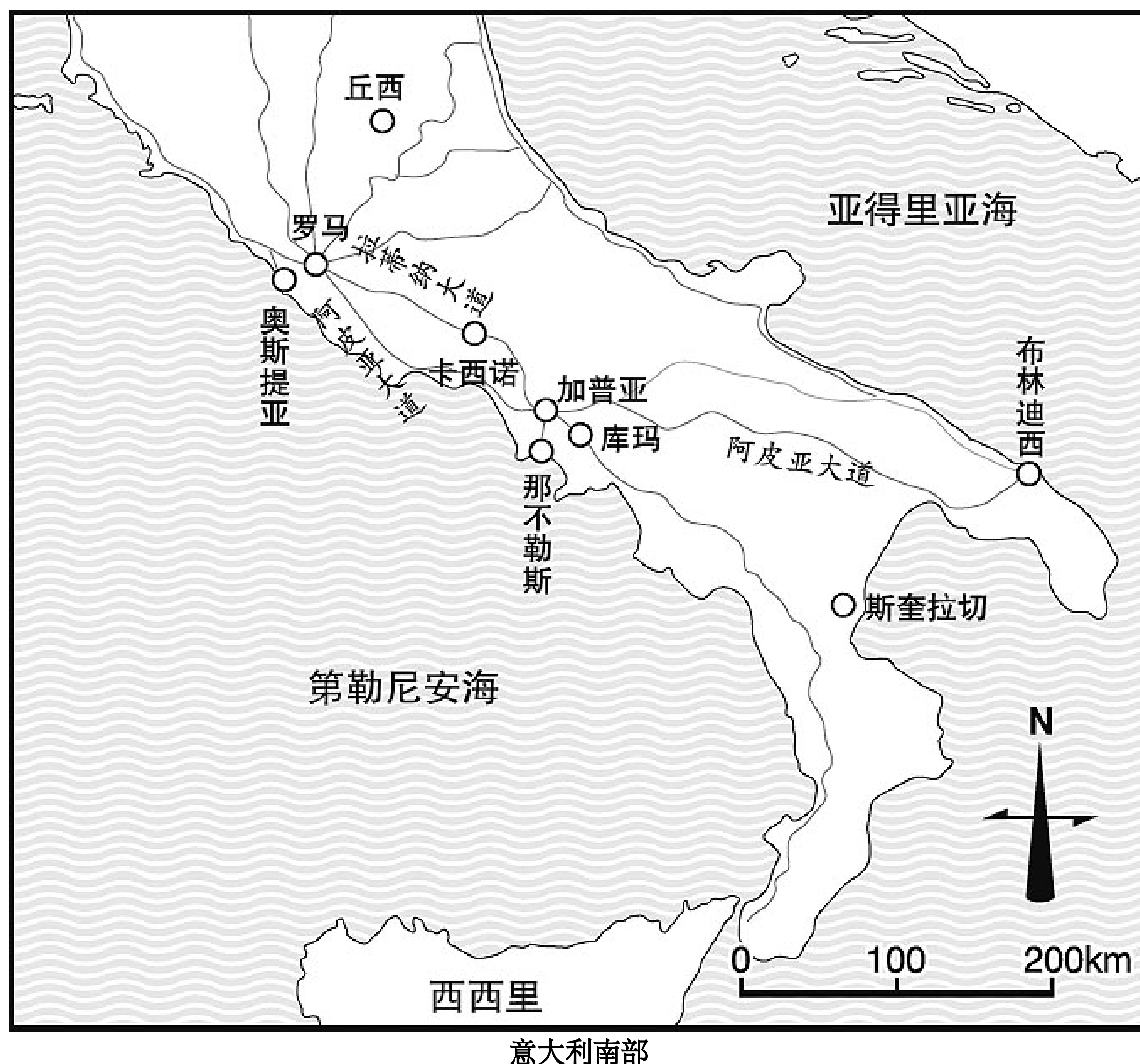
我们不知道在这里为什么医学会受到重视，要从希波克拉底学到盖伦、塞尔苏斯，就像一所培养有深厚教养的医生的学校。我甚至认为，这里是“universitas”（大学）发达以前，欧洲最早设立的医学院——“萨莱诺医学院”（Schola Medica Salernitana）的先声。顺便说一下，萨莱诺医学院里使用的语言有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教师学生均无宗教与民族之别。即使在黑暗的中世纪，其光芒也会照耀到每个角落。

既然是“学校”，在卡西多里乌斯设立的“鱼塘”里也有收藏卷轴的图书馆。在那个时代，只要有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书就足够了。卡西多

里乌斯投入了全部私人财产，创立了发挥这些设施的功能所不可或缺的财团组织。这也是度过了大半人生的一位实干家的创见。

修道院

在意大利中部，有一位出身于丘西乡下贵族家庭的人，名叫本笃，与卡西多里乌斯完全是同时代人。在历史上，他以“圣本笃”的名字广为人知。他年轻时就进了修道院。这意味着，即使在“蛮族统治下的和平”时期，他也可以不受妨碍地信奉天主教。在卡西多里乌斯设立“学园”的同时，本笃也在那不勒斯附近的卡西诺山上设立了修道院。不过，与卡西多里乌斯的“鱼塘”不同，这里是纯粹的修道院，在绝对服从的前提下，修道士们每天祈祷和劳动，过着集体生活。



意大利南部

本笃是革命的，他颠覆了人们以往所认为的整日冥想、与世隔绝的东方修道士形象，创造了积极与世俗接触的修道士形象。本笃认为，耶稣的十二门徒也重视劳动，各司其职，例如就有人以打鱼为业。他的这一认识也体现在修道院建于何处这件事上。

连接罗马与那不勒斯的大道有两条：阿皮亚大道和拉蒂纳大道。卡西诺山位于拉蒂纳大道沿线。如今，罗马至那不勒斯的普通列车仍然停靠卡西诺站。本笃把修道院建在沿干线公路的山丘上。后来，只要说到卡西诺山，意思就是本笃修道院。说是“山”，其实就是略高些

的山丘，那里原来建有供奉罗马诸神的神殿。罗马人从来不在与人界隔绝的地方建造神殿。他们认为，只有人们方便参拜才是神殿。本笃在神殿的废墟上建修道院意图很明显，在与人界接触的地方，神殿成为修道院的教堂，仅此而已。此外，要出售农产品这些劳动成果，也需要与人界接触。



本笃（卡西诺山修道院的普列斯科画）

本笃不仅描绘了修道院应有的样子，还确定了修道院的全天作息时间。黎明起到上午10点是劳动时间。10点开始到中午是扬声祈祷的时间。其后便是简单的午餐，休息到下午3点。在这段时间里也允许祈祷，但只可默祷。下午3点到日落时分又是劳动时间。日落之后是晚餐时间，然后就寝。在点灯很昂贵的时代，日落而息在宗教界和世俗界都是一样的。

“学园”和“本笃修道院”的日常生活都是禁欲主义的。但两处在几个方面有所不同：

第一是劳动。卡西多里乌斯学园的学生不靠劳动挣取自己的伙食费。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专门建立了财团组织。

第二是祈祷。在卡西多里乌斯的学园里，读书是名副其实的阅读书籍，而在本笃规定的修道院作息时间表上的“读书”，则是阅读以《圣经》为主的与基督教相关的书籍，必须出声朗诵。这与其说是“读书”，不如说是“祈祷”，就像高声诵读《古兰经》的少年，他们并不是在读书，而是在祈祷。

第三个不同是，本笃修道院集体生活的大前提是“绝对服从”，这与卡西多里乌斯“鱼塘”里的自由精神和在此基础上活跃的思想交流恰恰相反。

不过，本笃的这座修道院因有这些情况而特色明显，后来又把抄写希腊罗马的著作列为“劳动”，渐渐成为中世纪欧洲修道院的榜样。不仅在意大利，在欧洲各地也建了很多这样的修道院，成为中世纪时代精神的一大堡垒。

很多修道院一直延续到现代。与此相反，卡西多里乌斯的“鱼塘”却在不知不觉中销声匿迹。这是因为本笃的修道院与时代契合，而卡西多里乌斯的学园却与时代不相吻合。

就在卡西多里乌斯建立“学园”、本笃建立“修道院”的同一个时期，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于公元529年宣布废除位于希腊雅典的学园（Academia）。

这座由柏拉图创建于公元前4世纪的哲学最高殿堂，在罗马时代已成为地中海世界首屈一指的最高学府，名声显赫，地位从未动摇过。

就连罗马统治者的子弟也要去留学。现在，这座雅典学园也结束了它长达900年的历史。那种认为怀疑是人类“美德”的时代已经过去，历史已无可挽回地进入了服从的时代。被查士丁尼大帝废除的学园不得不等到一千年后的15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才由佛罗伦萨的科西莫·德·美第奇再次复兴。

查士丁尼大帝

假设伯父没有当上皇帝，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会不会成为被人称为“大帝”的历史人物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简单。可是，如果要问他是否充分利用了伯父成为皇帝这个幸运机会，答案却很简单。查士丁尼出身于巴尔干地区的农民家庭，但他不必像出身于同样环境中的其他许多年轻人那样，想要出人头地就必须从军或者当官。他只要为当上皇帝的伯父帮帮忙就行了。

伯父查士丁似乎是因在军队里勤奋尽职，结果皇位从天而降。这位并未建立辉煌功勋的人能够当上皇帝，是因为前任皇帝去世后候选人众多，这些高官之间的争斗不可调和。于是查士丁把皇位搞到了手，让人觉得他是钻了空子。称帝后，他立即把竞争者赶尽杀绝。

那年，侄子查士丁尼已经34岁。没有人知道他34岁之前的经历，很可能碌碌无为。他被刚刚称帝的伯父任命为可说是秘书官的“随员”（comes），从此，他在伯父身边如鱼得水。尽管查士丁的统治始于残酷杀戮全体竞争者，但他9年的统治安稳得出乎意料。据信这也有赖于侄子的谨慎照料。

查士丁尼是一位不可思议的人物。他没有从军经验，也毫无从政经验。他极不好动，可以说一步也不曾离开过首都君士坦丁堡。尽管如此，在必须对重要事件下决断时，他却能作出相当恰当的判断。伯

父查士丁的统治从查士丁尼34岁开始到他45岁，一共9年时间。且不说前几年，据说后面6年的实际统治都是皇帝的侄子所为。

此外，查士丁尼身上还有不拘传统习惯的一面。他爱上一个名叫狄奥多拉的舞女。东罗马帝国禁止元老院议员与下层出身的女人结婚。查士丁尼也是元老院议员，但他竟为娶到美丽好强、魅力四射的女子而修改帝国法律。当上皇帝之后，他依然我行我素，不仅把狄奥多拉当做妻子，还强行将她立为几乎与皇帝同等资格的皇后，使重臣们瞠目结舌。

尽管这样，皇宫里的重臣和元老院议员对查士丁尼评价颇好。公元527年春，查士丁皇帝病倒。元老院和皇宫联合向卧病的皇帝请求，让他的侄子查士丁尼担任共治皇帝。4月4日，查士丁尼成为共治皇帝。8月1日，查士丁皇帝去世，查士丁尼成为独立皇帝，这年他已经45岁。皇帝生涯的开始似乎晚了些，但查士丁尼活到83岁，其长寿在当时的领袖中实属罕见，他的统治长达38年。

查士丁尼看上去不爱好学艺，但对罗马的历史抱有强烈的兴趣，不过那是“查士丁尼式的罗马史”。伟大可以引起他的兴趣，但他对这种伟大构筑在什么社会结构之上毫不关心，这一点他不像元首制时代的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出生在欧洲与亚洲交会的巴尔干地区，以后也只知道君士坦丁堡，是一位东方式的皇帝。他脑子里的罗马帝国，终究是一个信奉天主教派基督教的所在。

罗马帝国的皇帝被后世尊称为“大帝”的只有君士坦丁、狄奥多西和查士丁尼三人。由于后世已是清一色的基督教时代，所以是基督教教会给了他们“大帝”的尊称。这意味着这三位皇帝都得到了基督教教会的喜爱和认可。

正如《罗马人的故事13 ·最后一搏》所述，君士坦丁是最早正式承认基督教的罗马皇帝。没有他所施行的众多优惠政策，就没有后来基

督教的飞速发展。

正如《罗马人的故事14 ·基督的胜利》所述，狄奥多西皇帝只把天主教派基督教当做正统，而把其他宗教统统列在“异教”名下加以排斥。他不仅把基督教中的阿里乌斯教派和多那图主义者的信仰作为“异端”，还要作为邪教加以排斥。在被认定为唯一正统基督教的天主教徒看来，狄奥多西有足够的资格被授予“大帝”的尊称。



查士丁尼

查士丁尼好像对这二人有着强烈的意识。但他们是罗马帝国东西分裂前的帝国皇帝。而查士丁尼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西边被割给日耳曼系蛮族的王国之后，于公元6世纪当上皇帝的，统治的不过只是帝国的东部而已。

高中的历史教科书中在提到查士丁尼皇帝的功绩时，一般举出下面三项：

一、建造圣索菲亚大教堂。

二、编纂《罗马法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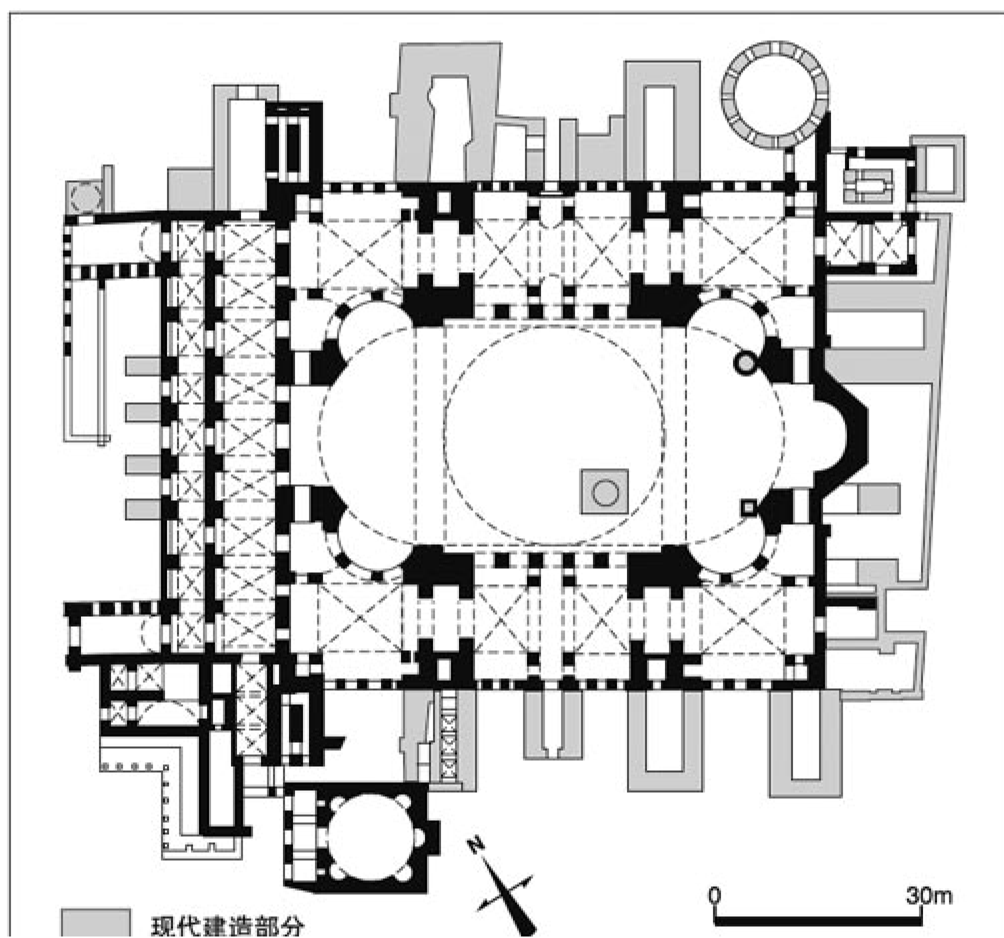
三、收复旧西罗马帝国领土。

建在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是献给圣母圣子的，其雄伟壮观为以往任何基督教教堂所不能比拟。据说其规模宏大、美轮美奂，就连君士坦丁大帝建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也大为逊色。15世纪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人征服后，圣索菲亚大教堂被改成了清真寺。如今，它所在的城市已更名为伊斯坦布尔，这里既非清真寺也非基督教教堂，而是历史遗迹，成为来到这座伊斯兰城市的访客必游之景。

在还是基督教教堂的时代，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墙面上镶满了金光闪耀的壁画。其中一幅描绘的是两位皇帝分别向圣母玛利亚和圣婴基督奉献的情景。站在右边的是君士坦丁大帝，他奉献的是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站在左边的是查士丁尼，他奉献的是圣索菲亚大教堂。两位皇帝都与圣母圣子一样头上画有光环。君主对基督教徒而言是世俗的，是受神的旨意统治人类世界的人。他们不像基督教化以前时代的罗马皇帝那样是第一号的肉身人，而是介于非肉身的神与肉身的人之间，却离神更近。所以，即使皇帝是肉身的，也可以用光环来表现。



圣索菲亚大教堂墙面的镶嵌画



圣索菲亚大教堂平面图

《罗马法典》

查士丁尼的功绩之二是编纂《罗马法典》。即使不是基督教徒，对他的编纂者身份恐怕也不会有异议。我认为，这项伟大事业是他留名后世的最大原因，他只有强烈意识到自己的罗马皇帝身份才能成就这项事业。耐人寻味的是，就在编纂对基督教帝国所需且有效的《罗马法典》的同时，查士丁尼下令废除了雅典的柏拉图学园。也许他认为，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需要法律，而不需要哲学。

《罗马法典》的正式名称是Corpus iuris civilis，很容易被认为是民法（iuris civilis）的总汇。但是，这部法典却是一部包罗了从刑法到所有法律的法律大全。关于编撰这部法典的意图，查士丁尼在亲自撰写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 以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我恺撒·弗拉维·查士丁尼·奥古斯都皇帝，愿对希望学习法律的年轻后世有所作为，决心着手编纂法典的伟大事业。仅诉诸战争不足以拓广皇帝的权力，和平时期的善政不可或缺。罗马皇帝不仅是战时的胜者，还应该是平时的统治者，而没有法律实现不了正确良好的统治。

查士丁尼就这样宣布了汇集迄今罗马人制定的法律的决定。从论述公法与民法意义的法律概论到实际审判的案例，他汇集了数量庞大的罗马法律。有趣的是，其中基督教化之前的罗马法律占据了大半。根据罗马法专家的说法，6世纪编纂的这部《罗马法典》的内容多为公

元2世纪制定的法律。如果是这样，四百年前，也就是昔日五贤帝时代，罗马帝国处于鼎盛时期，这些法律就是此时制定的。

《罗马法典》又称《查士丁尼法典》，实际编纂者是4位当时大名鼎鼎的法学家。但仅仅4人在6年的短时间里便完成了编纂工作，想必有助手协助。如果一一搜罗四百年来散失的法条，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大概不能完成这项工作，恐怕以前就有了汇总的法律集，编纂工作则以这些集子为中心展开。

首先，有一部名为《狄奥多西法典》的法律集，是5世纪前半叶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让人编纂的。这部集子汇集了君士坦丁大帝之后，亦即基督教化之后罗马帝国的法律。

还有收集基督教化以前罗马帝国法律的集子。这部集子是公元2世纪中叶哈德良皇帝让人编撰的，网罗了从共和时代到元首制时代的法律。

《罗马法典》的编纂仅靠4位法学家在短短6年时间里得以完成，大约是已有这两部相当完备的法律集的缘故吧。查士丁尼的《罗马法典》对法律专家自然有其作用，但像我这样与法律无关的人也不由得生出某种感慨。

第一，编撰法典的目的是汇集基督教化国家所需的法律，结果却是基督教化以前时代制定的罗马法居多。这个事实表明，社会由人集合而成，只要重视充分发挥社会的功能，罗马人制定的许多法律不论何时不论何地都是有效的，这与社会成员信仰什么宗教无关。我进而认为，只有这点可以成为“法的精神”。如果所想不谬，我们可以说，法律是罗马人创造的。

第二，查士丁尼的《罗马法典》，就像在他自己所写序言中所表明的那样，是在迄今存在的众多罗马法中选出的仅为统治基督教国家

东罗马帝国所需法律编纂而成。这就是说，不适合基督教国家的罗马法已被排除在这部《罗马法典》之外了。

如果是这样，按理就会有一些罗马法由于未被收入《罗马法典》而灭失，这里面说不定有除国教以外，承认个人信教自由的法律。至少这个假设是成立的。

后世近代国家制定法律时，受到了查士丁尼编纂的罗马法的影响。罗马人已经有过后来近代国家制定的若干法律也未可知，只是未被《查士丁尼法典》收录而已。所谓历史记录，往往有很多经过了记录者的过滤。罗马人制定的法律也不例外。

无论如何，单凭编纂《罗马法典》这一条，查士丁尼就有足够资格被授予“大帝”的尊称。没有迹象表明他修习过学问，很难想象他有什么教养，只能说是不可思议，成了历史上屡屡出现的奇迹之一例。

可是，《罗马法典》本身并未用于查士丁尼统治的东方，它是用拉丁语写就的。因为法律为罗马人所写，自然使用他们的语言拉丁语。参加编纂的4位法律专家是希腊人。他们的专业既是法律，拉丁语水平应该也很高超。然而，在称为拜占庭帝国已更加合适的东罗马帝国，普及的却是希腊语。由于语言障碍，《罗马法典》在查士丁尼企图诉诸的对象那里却行不通。

除了这个不幸之外，还有时代剧变的不幸。在《罗马法典》完成后不满百年的7世纪，阿拉伯人打败了波斯人，将大半个拜占庭帝国伊斯兰化。对基督教国家行之有效的罗马法，对伊斯兰教各国是否仍然有效，这个问题只能留给伊斯兰专家了。

《罗马法典》用拉丁语写就，纵令经过了漫长的中世纪，其威力仍在西方得到重新认识。贯穿整个中世纪，拉丁语一直是欧洲的共通语，而且欧洲国家都是基督教国家。因为这一点，时至今日，欧洲人

仍在赞颂查士丁尼，赞颂他复活了古代罗马法。两千年后的今天，各国大学都有研究罗马法的学科，这显示了《罗马法典》对人类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只是历史陈迹的圣索菲亚大教堂。

圣战思想

《罗马法典》尚在编纂期间，有一位主教一直反复力促查士丁尼。查士丁尼是热情的天主教徒，天主教神职人员可以自由进出君士坦丁堡的皇宫。每逢有机会接近皇帝，这位主教就会重复这样的话：

> 把天主教徒从异端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是神赋予您的使命。神会亲自走在您的军队前头。士兵们将在神的带领下，打倒敌人，让皇帝的旗帜再次飘扬在曾经处在异端统治下的土地上。您的敌人也是神的敌人。

查士丁尼动了心，但一时半会儿下不了决心。这个时期，拜占庭正与波斯萨珊王朝战斗。这种战斗已经成为无须特别着笔的常态。照例，这仍是一场波斯进攻、拜占庭迎战的战斗。查士丁尼投入了2.5万名士兵，让自己手下最优秀的将军率领。

战况是,拜占庭方面因英勇善战而占有利形势，但还处于僵持阶段，未能决战。

东罗马帝国在家门口迎战，却只能投入2.5万人，着实使人吃惊。西罗马帝国灭亡时连自卫的军事力量都没有剩下。这样看来，东罗马帝国的军事力量也很孱弱。罗马帝国直到元首制时代，一直是在东方防线投入8个军团的4.8万军团兵和几乎同样数量的辅助兵，共计近10万人的军事力量。而6世纪的拜占庭帝国只有当时数量四分之一的兵

力，无力在东方和西方两个方向同时作战。但对查士丁尼而言，他难以拒绝像君士坦丁和狄奥多西那样成为一统东西的帝国主人的诱惑。要进攻西方，就必须结束与波斯的战争。

查士丁尼向波斯国王库思老求和。库思老对受制于拜占庭军队的作战感到厌倦，放出话来说，如果用5250公斤的金条作为交换，就接受求和。查士丁尼决定接受这个条件，从而停止了东方的战争。对波斯作战的功臣贝利撒留也被召回到君士坦丁堡。就这样，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开始准备进攻北非汪达尔王国。

贝利撒留将军

贝利撒留和查士丁尼一样出身于巴尔干地区，但年龄要小18岁。他年轻时从军，在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战争中崭露头角。查士丁尼即位后，立即任命他为负责东部军队的大元帅。

贝利撒留年仅27岁便成为一位将军。他能运用新颖大胆的战略战术以少胜多。在这一点上，没有一个武将会比贝利撒留更优秀。查士丁尼要把战线改向西方，也只能把贝利撒留从东方召回，派往西方。查士丁尼于公元533年发动了夺回旧西罗马帝国领土的战争，率领军队的总司令年方33岁。



皇后狄奥多拉和女官们

查士丁尼皇帝深爱着出身低微但漂亮好强、心直口快的狄奥多拉。贝利撒留将军也爱着具有同样性格的安东尼娅，与这位有孩子的孀妇结婚，并终身相伴。狄奥多拉是舞女出身，安东尼娅是战车比赛的御者之女，同为下层出身。而且，两个人都是天生丽质、争强好胜、行为大胆。这样的两个人照理应该关系良好。然而，她们两人虽不敌对，但关系紧张。这可能是因为每次碰面，她们都觉得像在镜子里看到自己一样。

进攻北非的前一年，在首都君士坦丁堡爆发了以“尼卡（Nika）之乱”而闻名的暴动。战车比赛的蓝派粉丝和绿派粉丝之间起了争斗，市民也卷入其中，酿成暴动。3万名暴徒近逼皇宫。年已50岁的查士丁尼吓得不知所措，听信了宫廷官僚们的进言，决定逃离皇宫。这时，狄奥多拉挡在他的面前。皇后训斥查士丁尼说，逃跑不是皇帝的做派，

并让他命令贝利撒留镇压暴动，一步不退。贝利撒留果断应对，在暴动升级前将其镇压下去。

没有记录表明安东尼娅训斥过丈夫。但她非同小可，丈夫所到之处都有这位妻子的身影。她不单跟着丈夫，而是经常率领人马参战，支援丈夫作战。但她对丈夫手下的人事安排从不插嘴。而狄奥多拉却似乎多少要插插嘴。

在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上，最有名的皇帝是查士丁尼，最有名的将军是贝利撒留。在东方色彩愈发浓重的东罗马帝国，女人大多血统纯正却性格暧昧，温柔而生育能力强，查士丁尼和贝利撒留迷上的却是狄奥多拉和安东尼娅这样的女人。

进攻阿非利加

公元533年6月，军队从君士坦丁堡起航了，目标是打倒北非汪达尔王国。载着1.5万名士兵的500多艘大船队出征了。皇帝和皇后祝贺出征，大主教承诺请天神祝福。尽管旗子上没有像后来的十字军那样印有十字，士兵的胸甲上也没有十字，进攻的对象也不是异教徒而是异端，但对他们而言这也是“圣战”。

在进攻远离祖国的敌方地盘时，因为补给问题，经常是使用少量的精兵比较有利。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大西庇阿、苏拉、李锡尼、恺撒……这些古代名将的经历都证实了这一点。然而，1.5万名士兵要在有号称20万兵力严阵以待的北非登陆，兵力也太少了。也许凭东罗马帝国的军事力量也只能派出这点兵力，而这1.5万人的兵力也是不惜重金与波斯媾和后才得以派往西方的。这就要求只有这点兵力的贝利撒留采用比以往更新更大胆的战略。

普罗科皮乌斯写下了《哥特战记》，详细叙述了这场战争，使我们后世得以了解贝利撒留如何根据查士丁尼的筹谋，收复了旧西罗马帝国的领土。普罗科皮乌斯这位希腊人出生在巴勒斯坦的恺撒利亚，与贝利撒留同时代。据说从贝利撒留在美索不达米亚作战时起，他就开始担任贝利撒留的秘书官。公元533年起西进时他当然同行。对贝利撒留来说，就像是一位合适的随行记录者，而且不是一般的记录者。普罗科皮乌斯具备历史学家的素质，不仅有卓越的观察力，文章也写得好。贝利撒留也希望由他的妙笔来记录自己的业绩。

查士丁尼虽是政治家，却没有军事经验，也几乎没有离开过君士坦丁堡，不能说他很了解帝国各地的地形和人情现状。为此，贝利撒留不得不经常因这位上司的无理命令而抗争，有时甚至得冒着被撤换的风险去抗议。士兵们绝对支持贝利撒留。这也许也是因为他们尊敬和同情这位有义务在困难情况下取得战果的年轻将军。身为秘书官又兼随军记者的普罗科皮乌斯的心情也是如此。

满载拜占庭帝国将士的500艘大船队从君士坦丁堡港出发，要渡过马尔马拉海，穿过赫勒斯滂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进入爱琴海，然后南下，绕过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经西西里，再到汪达尔王国所在的北非登陆。即使经常停靠港口，这全部航程也要航行半个地中海。定在初夏出发，就是因为以多变闻名的地中海海风在夏季会平静一些。可未曾想，刚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就遇到了不幸。

船上的面包变质，食用后倒下的士兵和船员竟超过500人。长期航海用的面包必须是干面包。与其说是面包，不如说是饼干。两道烤制后，水分尽去，食用时得用水或葡萄酒浸泡才能吃。这次的面包是在君士坦丁堡烤制的，但略去了第二道烤制的过程，而且用烧公共浴室热水的温度来烤制，这些面包在航行中很快就变质腐败。

贝利撒留只得延长原定的靠港时间，动员附近的全部面包店，重新烤制长途航行用的面包。他把此事详细报告给了身在首都的查士丁

尼，要求惩罚负责安排军粮的大臣。调查查明，那位大臣只用低温烤制了一道，并将省下的费用据为己有。

查士丁尼撤掉了那位大臣，却没有给予更重的惩罚。“粮草”可以说是前线士兵打仗的基本保障。没有带过兵的查士丁尼即使脑子能理解，也不会有切身体会。

500艘大船队的航行，除补给生鲜食粮和水以外，还需要经常靠港。要不断等待每一支掉队的小船队，等船到齐形成大船队后再次起航。如果不耐心重复这种等待，就会有很多船只迷航。因而，船队只能沿海岸可以航行的水面前进。但也有些海域不能沿岸航行。贝利撒留的远征军要从希腊南端向西西里方向横渡爱奥尼亚海，如果顺风航程5天足矣。

可是，进入爱奥尼亚海后的几天，没了一点风，只能靠划桨来横渡这片海域，耗时达16天之久。虽然面包还有，但饮水告罄。这时，总司令妻子的远见起了作用。安东尼娅让人在船底藏了大量盛满水的罐子，这件事甚至没有让丈夫知道。士兵船员们都松了一口气。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才没有一个士兵不满贝利撒留让其妻子同行。

当时的西西里和意大利半岛一样，处在东哥特王国的统治之下，由哥特人士兵守卫。贝利撒留抵达西西里南部以后，立即向哥特人长官申请采购粮食和马匹的许可。由于统治意大利和西西里的东哥特王国国王花费心思要与东罗马帝国保持良好关系，驻西西里长官也非常合作，顺利完成了粮食和马匹的采购任务。贝利撒留考虑，单靠一份情报不足以正确把握形势。于是他一边采购粮食马匹，一边派秘书官普罗科皮乌斯去西西里的第一大城市锡拉库萨，打探东哥特王国的内情，并由此了解到，批评狄奥多里克之后继位的国王——懦弱的维提吉斯的势力，已经比在君士坦丁堡传闻的更加强大。

贝利撒留被迫改变战略。他需要考虑一旦西西里不能用做进攻北非的后方基地将如何应对。这时，更安全的方法应该是，假设这里不能用做后方基地而重新制定战略。大军必须尽早离开西西里向北非进发，并在可能补给军粮的地方断然登陆。

不知道是读过尤里乌斯·恺撒《内战记》的缘故，还是机缘巧合，贝利撒留选择的登陆地点不是敌方势力集中的迦太基，而是位于东南偏南方向远离迦太基的地方。这一带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地区，与统治者汪达尔人集中居住的以迦太基为中心的北部地区不同，这一带允许经营农庄的罗马人长期居住。贝利撒留把登陆地点选在了敌方防御薄弱的地带。

汪达尔人的守备队在这一带形同虚设。9月初断然实施的登陆没有遇到任何障碍。这时正值秋收，登陆的士兵开始掠夺附近的农庄。这不过是沿用了在东方与波斯作战时的做法，但与贝利撒留的战略背道而驰。总司令集合全体士兵，开始训话：

> 在决定受命远征阿非利加、收复长期以来一直被蛮族统治的这片土地时，我就在想，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所带军队的规模和士兵的熟练程度，而是要与这片土地自古以来的居民——罗马人建立友好关系，利用他们长年埋藏在心底的对汪达尔人的敌意。
>
> 然而，你们却想让我的这个想法泡汤。只要和气交涉就会廉价卖给我们的东西，为什么要费力去抢夺呢？如果你们不停止暴行，他们绝望后就只能投靠旺达尔人。我们就会变成侵略者，不要说真正的敌人，就连我们要从敌人手中解放出来的人也会跑到敌人一边去！

士兵们被33岁的总司令说服，人人羞愧，从此以后抢夺行为绝迹。其间，贝利撒留派往各地的部下也与农庄主们谈好了购粮事宜，贝利撒留解除了这方面的后顾之忧。贝利撒留还向各城市的行政官派

出使节，告诉他们，大军将保证他们的地位和人身安全，请他们像以前一样继续办理行政事务，只有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就是，以前以汪达尔国王名义做的事情，以后要以查士丁尼皇帝的名义去做。贝利撒留的做法转眼之间在周边一带传开，北上的贝利撒留军队所到之处，城镇村庄统统敞开了大门。贝利撒留向敌人的根据地进军，兵不血刃。部队走陆路北上，船队在他们右方的海上向敌人的根据地迦太基湾驶去。

汪达尔王国的覆灭

老练的国王根西里克死后，北非汪达尔王国陷入了长期的内部纷争。为争夺王位六亲不认，一旦失败，囚入大牢已是最好的下场。这样的状态不断持续。他们不是不知道贝利撒留率领的拜占庭军队正在步步逼近，可他们缺少一位强有力的统帅，来集结所有的力量，形成迎战态势。他们的军力并不差，日耳曼系蛮族有很高的出生率，仅直接战斗兵力就能集结到十五六万人。

可是，支撑军力的经济力量，却在一味衰弱。在汪达尔人所征服的北非，没有实现“蛮族统治下的和平”，没有形成日耳曼人和罗马人共存的状态。罗马人文明程度高，才能卓越，却成为败者，纷纷选择成为难民的道路，离开了阿非利加。

北非在罗马时代基础设施完备，土地肥沃，气候温暖，文明程度高，人才济济。汪达尔人虽然把这样的北非弄到了手里，但这个曾经居住在日耳曼荒蛮之地的北方蛮族，自身却没有丝毫改变。

汪达尔人于公元430年征服北非。公元533年贝利撒留率领东罗马军队前来攻打。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比高卢更繁荣、文明程度更高的

北非，已在汪达尔人的统治下度过了百年时光。汪达尔王国只与贝利撒留打了两仗，两仗皆败，便被轻而易举地灭亡掉了。

贝利撒留6月初离开君士坦丁堡，9月初登陆北非，9月15日进入迦太基城。他仅用了两周时间，就在相当于现在利比亚、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广大地域上把统治长达100年之久的汪达尔王国消灭得无影无踪。尽管贝利撒留战略巧妙，真正的原因却是汪达尔人毫无作为地虚度了这100年。

北非又回到了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尽管这次是东罗马帝国。但如果要问，这里是否又恢复到罗马时代那样丰饶的景况，答案却是否定的。土地和气候不能成为复兴的决定性因素。没有人才，条件再好的土地和气候也无法利用。被汪达尔人征服以后，北非开始了沙漠化的进程。查士丁尼夺回北非之后，沙漠化仍旧一如既往地发展着。

不要说与败者同化，汪达尔人的统治甚至拒绝与败者共存。但东罗马帝国派来负责行政的那些希腊人与汪达尔人并无两样，也把北非居民视为被统治者。不流血地进入迦太基城后，贝利撒留曾立即发布告示说，汪达尔人作为统治者来到这里，而我们是解放者。现在，这也只能是一句空话了。

贝利撒留进入迦太基城后又在北非逗留了8个月。不过这段时间都被耗在纯粹的军事行动上，如把汪达尔人余党赶出北非，允许难以消灭的毛里塔尼亚人（摩尔人）继续定居在现在的摩洛哥等地。贝利撒留还挟北非胜利之余威，威胁统治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哥特王国，成功地把直到直布罗陀海峡两岸的地带都纳入查士丁尼的统治之下。随着汪达尔王国的灭亡，撒丁岛被自动“收复”，西地中海也和东罗马帝国保持制海权的东地中海一样，被纳入了东罗马帝国圈。可以说，查士丁尼皇帝收复旧西罗马帝国领土的宏愿至此已完美实现。

然而，贝利撒留只被允许进行这些军事行动，而未被允许进行周密的战后处理来巩固军事行动的成果。拜占庭帝国承继了始于4世纪的帝政后期的政策，中央集权进一步发展，文官与武官的职务完全分离，战后处理属于行政官僚的文官职责范围。

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更加合理而进步的体系。但是，赢得战争也是战前的大量情报收集工作和基于这些情报正确深刻地洞察民情的成果。战斗打响后打仗的是士兵，但在此之前，总司令必须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于是乎，很多打了胜仗的统帅往往对敌人的心理理解颇深。

通观从共和政体到元首制的全部历史，罗马一以贯之的方针是，不仅把战斗的指挥权，还把战后与败者的媾和交涉以及对所征服之地的战后处理事务，全部交给受命出征的司令官去处理。正因为这样，罗马的司令官习惯于亲自审问俘虏，而不是交给手下办理。如果只想了解事实，通过拷问，让俘虏交代就能办到。若要了解事实背后的情况，只有让关心此事的人去审问才能指望有效果。然而，罗马人长期坚持的这个习惯，4世纪以后也被忘却了。

知道贝利撒留进入迦太基城后，查士丁尼立即派来了以宦官为首的4位高级官僚。

被阉割的男人并非无能。相反，他们都是在阴谋旋涡的皇宫里出人头地的，这方面有足够的能力。但是，重用被阉割的男人，并不是为了像东方君主国家那样让他们去管理后宫，而是认为他们无法拥有家庭，便会把这份忠诚拿来孝敬主人。但这样也很容易使他们在处理行政时只看主人脸色而罔顾国民意愿。

因为这个缘故，人们都说，宦官的统治严厉而高压，征税毫不留情，而且行贿受贿成为家常便饭。一旦由人构筑的防范网薄弱了，人们就会热衷于中饱私囊。

贝利撒留成功地在短短两周时间内就结束了势必为“恶”的战争。但从他手中接过接力棒的行政官僚花了20年时间，也没能做好战后处理，将战后统治做到应该达到的“善政”的程度。这种现象不只是在北非，在东罗马帝国成功收复的所有地方都是一样。自然与人类的疲弊在北非表现为土地沙漠化。我甚至认为，自然与人类的这种疲弊，并没有因为查士丁尼对土地的“夺回”或“收复”而得到改善，相反加快了恶化的速度。

到了第二年，即公元534年秋天，贝利撒留凯旋，回到了君士坦丁堡。听说查士丁尼皇帝和狄奥多拉皇后专程到港口迎接，在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举行的弥撒仪式上，为把基督教徒从“异端”阿里乌斯教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感谢神灵。凯旋仪式只允许为皇帝举行，但贝利撒留成为例外。虽然凯旋将军骑马行进，而不是按照古制乘着4匹白马战车，但市民们的狂热仍是真挚的。由皇帝推荐，贝利撒留被选为第二年公元535年的执政官。对34岁的贝利撒留而言，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一年。可是，查士丁尼皇帝丝毫没有打算让他干执政官的工作。

公元535年秋，享受久违的首都生活尚不满一年，贝利撒留再度被派往西方。查士丁尼下一个“收复”的目标是东哥特王国统治的意大利半岛。为此目的，仅仅考虑补给基地，也必须先制伏西西里。

进攻意大利

此次进攻意大利，只拨给贝利撒留7500人的兵力。我甚至想这个数字是不是中世纪的笔误！即使加上贝利撒留的私家兵力1000人马，也才8500人，这只是收复北非兵力的一半。靠这点兵力，居然要去收复有20万东哥特士兵严阵以待的意大利半岛！

况且，意大利半岛和北非的情况完全不同。意大利半岛在“蛮族统治下的和平”之下，统治者哥特人与被统治者罗马人的共存已经延续了60年。在汪达尔人统治之下，上层罗马人逃离了北非；而在哥特人统治之下，意大利半岛却没有出现难民。在阿里乌斯教派的统治之下，天主教会也依然存在。

罗马人是天主教徒，他们大概与信奉阿里乌派基督教的哥特人一样，不会把天主教国家拜占庭的军队当做敌人。但也不能指望他们会帮助拜占庭军队，积极奋起，打倒哥特人。意大利的情况与北非截然不同。在北非，虽然已过去百年，居民的心中仍怀有反汪达尔的感情。要用攻打北非一半的兵力进攻意大利，我在想，究竟是什么把这种想法灌进查士丁尼大脑的。

用少量兵力进行战争表面上看合理。但只投入少量兵力容易带来战争长期化的危险。在元首制时代的罗马帝国，打仗要准备10万人规模的军队，一次性投入战斗，这已经成为惯例。一次性投入10万军队，一年便能结束战争。战争不容置辩就是“恶行”，不得不行此“恶行”的军事人员必须植根于大脑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快结束战争。

由于东哥特人几乎未在西西里配置守军，贝利撒留轻松收复了西西里。要使西西里发挥后方基地的作用，他就必须安排守军驻守。留下守军后，剩下的兵力是5000人。贝利撒留得靠这5000人完成收复意大利半岛的作战。

贝利撒留在君士坦丁堡时就已明白，夺回东哥特王国统治下的意大利半岛与夺回汪达尔王国统治下的北非，不能采用同样的打法。他考虑兵分两路，同时进攻，完成收复意大利的作战。第一军以西西里为补给基地，在意大利半岛南端登陆后直接北上。另外一面，第二军以亚得里亚海东岸的达尔马提亚作为补给基地，从那里横渡亚得里亚海，向东哥特王国王宫所在地拉文纳发起进攻。这样作战的目的，是要把号称20万的敌方兵力一分为二。

查士丁尼也同意这个战略，甚至答应组建应在达尔马提亚集结的第二军。不过，这个允诺根本没有兑现。贝利撒留一开始就不得不以5000对付20万。不懂战争的人当最高统帅，难免空费人力和时间。

普罗科皮乌斯的《哥特战记》中记载，这场战争，从轻松收复西西里，开始进攻意大利半岛的公元536年起，到公元553年哥特人国王最后战死为止，实际打了17年之久。这种长期战争受害最大的是居住在意大利半岛的罗马人，他们没有任何自卫能力，也不是战争的参与者。

收复西西里后不久，贝利撒留一边为进攻意大利作准备，一边尝试通过交涉解决问题。

考虑到只有5000人的兵力，能通过交涉解决问题最好不过。

而且，狄奥达图斯虽然是东哥特人的国王，却是一个喜欢用拉丁语写自己的名字、仰慕希腊哲学、喜欢讲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人。贝利撒留向在罗马的狄奥达图斯派去了和平解决的使者。

拜占庭的部队威逼西西里，狄奥达图斯惊慌失措，对交涉非常积极。媾和条约的谈判极其顺利，连协约文本都已拟好：

一、东哥特王国国王承认罗马帝国皇帝（实际上是拜占庭帝国皇帝）的主权，正式表明其臣服地位。

二、作为象征，国王每年向皇帝赠送用300罗马磅（合120公斤）黄金打造的皇冠。

三、国王承诺，皇帝凡有要求，将派遣3000名士兵供其调遣，并承担全部费用。

四、未经请示皇帝旨意，国王不得以任何理由对天主教会神职人员和元老院议员处以死刑或没收财产。

五、未经皇帝许可国王不得任命元老院议员和“贵族”。

六、在公告和公文上，必须把皇帝的名字写在国王的前面；国王雕塑的右边必须立有皇帝的雕塑。

从没有课税及没有收回自卫权来看，只能说这个协约文本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东哥特王国的独立性。狄奥达图斯担心这个文本遭到拒绝，派出急使追上了携协约文本沿阿皮亚大道南下的东罗马帝国使节。接受邀请再次回到罗马的使节与哥特国王之间有下面一段对话：

“您认为皇帝会签署这个媾和协约吗？”

“我想大概会的。”

“如果拒绝了会怎样呢？”

“应该是战争吧。”

“那么这场战争是正确而合理的吗？”

“当然是。不过，这要从双方各自所站的立场来看。”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您是哲学家，可查士丁尼是皇帝。对自诩为柏拉图弟子的人来说，一定会反对使众多百姓流血的战争。可是，对奥古斯都的继承者来说，收回赋予他的正当权利比什么都重要。对查士丁尼来说，这意味着即使使用武力也要收复被夺走的昔日领土。”

这段逸事的真实性并未在学术上得到证明。不过，这也许会像马基雅弗利所说，真实也会成为合理的谎言。我以为，以这种条件和平解决，贝利撒留会同意，查士丁尼皇帝也会批准。

可是，这个方案胎死腹中。不是因为拜占庭方面，而是因为东哥特方面的拒绝。狄奥达图斯被全体家臣斥为软弱，被迫退位。事情到此还没有完，不久他竟被杀害。主张对拜占庭强硬的维提吉斯，在哥特人的欢呼声中登上东哥特王国的王位。事到如此，贝利撒留只能以5000兵力进攻意大利半岛了。

哥特战争

公元536年春天，贝利撒留开始行动。从西西里登陆意大利半岛只需渡过3公里宽的墨西拿海峡。区区5000人渡海，不需要征集大量船只，只从附近搞了一些渔船就跨过了海峡。登陆之后，就像征服西西里一样，从意大利南部一路轻松地推进到那不勒斯。哥特人把兵力集中在意大利北部，南部是军事力量的真空地带。

普罗科皮乌斯写道，登陆之后，意大利南部居民用欢呼声迎接沿罗马大道北上的贝利撒留军队。对没有自卫能力的人们而言，权且表示欢迎也是一种处世之术。他们是天主教徒，贝利撒留的军队应该是救星，但普罗科皮乌斯的笔下没有提及义勇兵来投奔继续北上的贝利撒留军队，也没有其他人在这方面的记录。这与登陆北非时有所不同。

那不勒斯从这个时代起已渐渐成为意大利南部的第一大城市，这时只有800名哥特兵驻屯。当时的那不勒斯住着很多犹太人，其社团对市政有很大的影响力。犹太人知道查士丁尼皇帝是热心的天主教徒，正在东方迫害犹太教徒。他们担心向他的军队敞开城门之后自己的命运，于是在恐惧的心情中等待着。实际上，这时查士丁尼想把已经改信天主教的法兰克人也拉进对哥特的战争，给法兰西王国送去了内容如下的一封信：

> 哥特人侵犯、盘踞意大利已有半个世纪。居住在意大利的人们与我们共同拥有真正的基督教义。我有拥有意大利的正当权利。我要求哥特人归还他们非法占有的土地和非法统治的人民。然而，他们无礼的答复令人忍无可忍。我不得不向他们宣战。
>
> 此次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异端阿里乌斯教派。因此，这是一场正统信仰击退邪恶信仰的战争。我们两人（东罗马帝国皇帝和法兰克国王）都被神授予了捍卫正确信仰的责任。

查士丁尼呼吁法兰克人翻过阿尔卑斯山脉进攻意大利北部，与北上的贝利撒留组成共同战线。但这个劝说在当时未见成效。不过，这封给法兰克国王的信函昭示了查士丁尼进行哥特战争的本意。拜占庭皇帝既已决定不能容忍同为基督教徒的“异端”，自然不可能承认“异教”犹太教徒。居住在那不勒斯的犹太人的恐惧十分正常，贝利撒留在此第一次遭遇到像样的抵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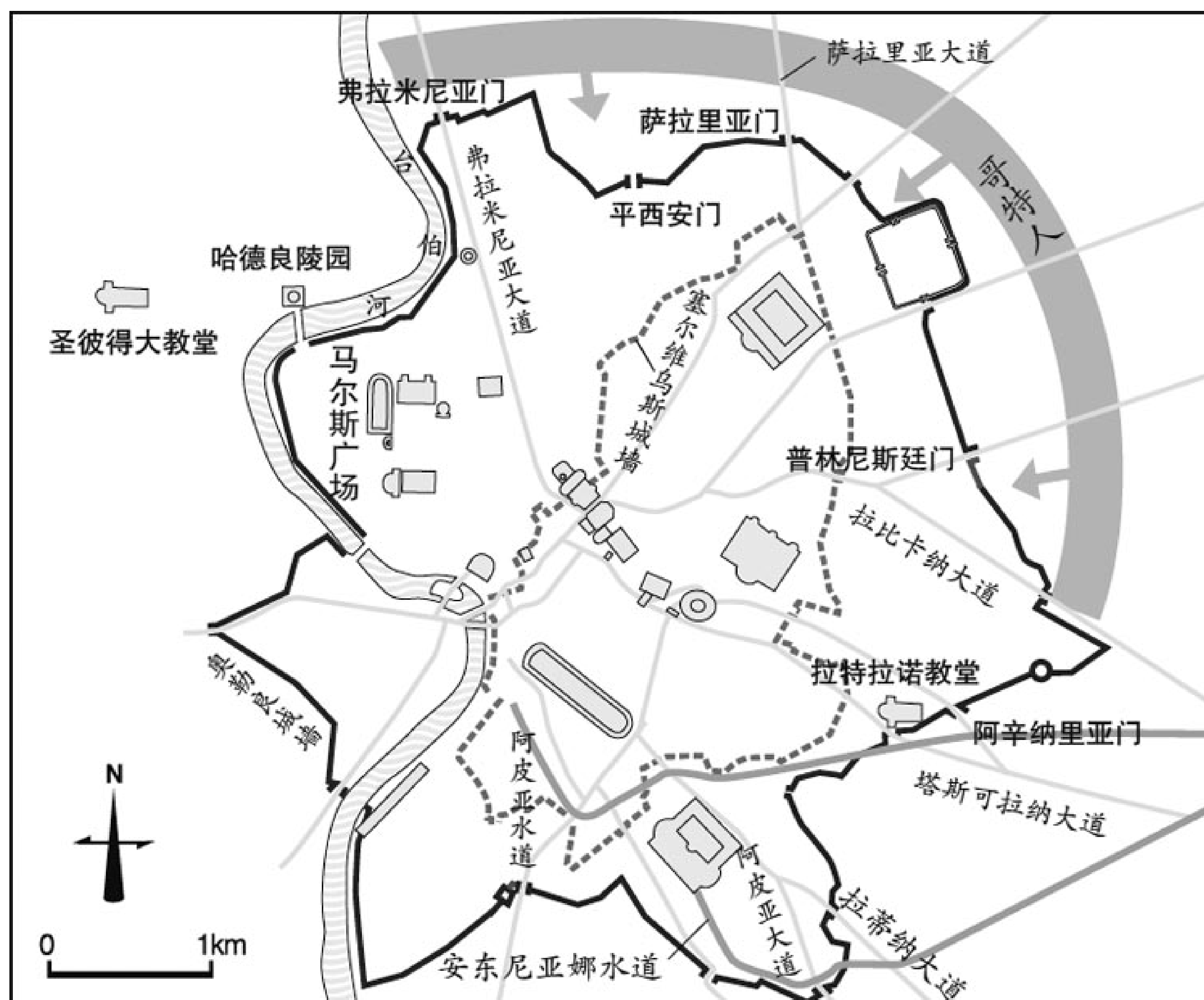
仅靠陆地方面的进攻不可能攻陷面临大海的城市。可是，贝利撒留没有可用于海上封锁的海上兵力，也没有充裕的时间沉下心来展开进攻。但不拿下那不勒斯就去不了罗马。贝利撒留想着如何速战速决正不得门路，这时有个士兵对他说，不妨尝试利用一下已经废弃不用的水道桥，这桥似可通到城里。

贝利撒留立即派队长指挥几名士兵，在夜幕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探察了一番。靠着微弱的灯火引导，一队人行进在高架水道内。他们发现水道桥通到城墙内的一座废屋。

所谓废屋，不就是一座水塔（castellum）嘛，这种水塔的作用是把高架水道流过来的水暂时贮存起来，除去杂物，然后向市内各处配水。我想这水塔应该是水道不能使用后才被废弃的。如果是“水塔”，就应在城墙之内，而且应该相当宽敞，作为穿过水道潜入市内的士兵隐蔽的场所再合适不过了。

这次哥特战争以后，水道这个与罗马大道齐名的由罗马人建造的两大基础设施之一就不复是水道，而成为历史遗迹了。这是由于为不断提供新鲜水源而建造的高架水道在军事上受到了注意的原因。水道桥在那不勒斯已经废弃不用，但在罗马，尚在使用中的水道桥转成了军事用途。让所有人都能用上足够的新鲜水，这本身就是高度的文明表征；建设水道只需考虑通水，这也是“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象征。

如果水道桥作为士兵潜入城市的通道而引起注意，罗马文明将无生存之地。首都罗马有11条水道，行省首府也有三四条，就连小城镇都必定通有一条水道。每次看到这些水道，我都会苦笑：“连这样的镇子都……”但时常向人们提供大量新鲜水这样最低限度却最重要的文明，哥特战争之后消失了。从公元前312年建设最古老的阿皮亚水道算起已有850年的历史，有记载的最新的安东尼亚娜水道建造以来也已有320年的历史。现在，把时常向普通人配水作为卓越政治的罗马文明死亡了。



罗马市略图

贝利撒留制定了严密的作战方案。他决定让士兵们在夜里通过不再使用的水道潜入市内，隐蔽在水塔中，黎明时这些士兵出来袭击守卫近处城门的敌人，用夺来的钥匙从内侧打开城门。大队人马在夜幕掩护下靠近城墙，等待黎明时分城门从内侧打开。贝利撒留向士兵们宣布这个方案之后说：

> 就把抢夺金银当做对你们勇敢的犒赏吧。但是禁止杀戮居民，他们是天主教徒，是你们的同胞。

作战获得完美成功，但居民并非全体安全。拜占庭军队的士兵把总司令的话理解成为不杀不抵抗者。

于是，出于保护妻子孩子的市民和由于对天主教徒士兵的恐惧而忘我抵抗的犹太人，凡抵抗者都被杀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知道不杀不抵抗者的800名哥特士兵却只是被俘而已。这800名士兵直接被编入了贝利撒留的部队。攻占那不勒斯耗时长达20天，牺牲者全是普通老百姓。蒙受伤害最大的是意大利人民，而他们却不是战争参与者，哥特战争的这个特征在那不勒斯已显露无遗。

从那不勒斯去罗马有两条路：一条是穿越平原的阿皮亚大道，另一条是蜿蜒穿过山岳地带的拉蒂纳大道。贝利撒留的军队沿这两条路北上。与其说贝利撒留这样做是分散风险，不如说他是想兵分两路同时行军，尽快到达罗马。那不勒斯到罗马之间不存在遭遇数量集中的哥特兵的危险。

贝利撒留率领沿拉蒂纳大道行进的部队，秘书官普罗科皮乌斯似乎沿阿皮亚大道前往罗马。尽管这条大道被弃置了200多年，从来没有维护过，现在仍然是石板相接，严丝合缝。这位巴勒斯坦出身的希腊历史学家叙述这条“大道女王”（regina viarum）时充满了惊叹的心情。

罗马正在酝酿着罗马主教居间调停的对策，试图避免那不勒斯那样的攻防战。哥特方面也不认为在这个阶段进行彻底的抗战是一条良策。他们需要集结15万人以上的兵力，一旦需要还要返回意大利北部。

公元536年12月10日，哥特将士们列队雄赳赳地从罗马西北面的弗拉米尼亚门出城，而贝利撒留的将士们则欢呼着从罗马东南面的阿辛纳里亚门进城，就像换防一般。统治者进行了不流血的更迭，也没有发生暴虐行径，犹太人只要在他们居住集中的“台伯河对岸”（Trastiber）不造次，也平安无事。

可是，任何人都能预料到，哥特人不会轻易放弃统治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意大利。贝利撒留没有闲暇观光初次看到的罗马。什么都可以放下，长达20公里的城墙必须修补。哥特人在意大利北部有根据地，他们会从北面进攻，必须修补拱卫北方的弗拉米尼亚门到萨拉里亚门这段城墙。可是，天主教神职人员却说，这部分城墙很完善，没有必要修补。贝利撒留问其原因，神职人员回答说，圣保罗一直在保佑这里。贝利撒留将这些意见当做耳旁风，抓紧实施工程。

36岁的总司令不仅要修补城墙，还要在城墙外侧挖一圈又深又宽的护城河。他还不能忘记从西西里进口大量小麦，从那不勒斯近郊的农产地购买主食以外的食品。

公元536年与537年之交的冬天是在工程的锤音和人车往来的嘈杂声中度过的。市民们起初还用怀疑的眼光看着这5000名士兵，后来他们发生了变化，开始一点点帮起忙来。贝利撒留决定给他们一个自卫军的名称，把他们组织起来，和拜占庭士兵一道担任防御。据说“自卫军”的人数达到3万，这对只统率着5000人的贝利撒留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消息了。

罗马攻防战

在古代，传统上都是在3月份开始打仗。公元537年3月，哥特军队沿弗拉米尼亚大道和萨拉里亚大道两路南下，在罗马城墙前布阵。除掉狄奥达图斯后当上东哥特王国国王的维提吉斯担任总指挥。他拥有15万兵力，照理能够包围全市，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这样做。从东面的弗拉米尼亚门到西面的普林尼斯廷门一带布满了哥特兵的帐篷。不知什么原因，台伯河以西、南侧阿皮亚大道和拉蒂纳大道的起点都不见哥特兵的身影。

贝利撒留把自己军队的大本营安在平西安门的内侧。这就是说，总司令亲临最前线。考虑到自己军队的兵力劣势，他把防御力量集中到敌人可能攻击最集中的各个城门。为了及时掌握各城门防守部队的情况，他还组织了专门士兵，在总司令与各部队之间进行联络。他要用3.5万人迎战15万人，必须采取能够想到的所有对策。

不过，贝利撒留也不是一无有利之处。他并无必要一定打胜，只要久拖不败，让敌人放弃即可。

对城市的攻防战，并不是两军隔着城墙的简单对峙。防守方不时会打开城门，冲出去打一仗，然后再撤回城里。这次的攻防战也是如此。尤其是贝利撒留擅长积极的战法，常常亲自指挥，冲出城墙战斗。这样，防守方的损失少得令人吃惊。贝利撒留自己解释了处在数量劣势的地位也可与敌人周旋，甚至经常给敌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原因。他说，其中的原因在于哥特骑兵与拜占庭骑兵的不同。哥特人的骑兵是一边驱马一边用长矛刺击，而拜占庭骑兵则受到波斯弓箭兵战法影响，一边驱马一边射箭，可以远距离击倒敌人。

攻防战向有利于防守方的方向发展。罗马是一个大都市，尽管与鼎盛时期相比人口锐减，但现在仍应有15万人。战斗隔着北边城墙激烈展开，市民却仍旧过着极其平静的日子。尤其在南半部，日常生活气氛平静，令人无法想象攻防战正在进行。在台伯河西岸的圣彼得大教堂，参拜的信徒络绎不绝。进攻方哥特人是阿里乌斯派基督教徒，人们在长年的经验中了解到，他们不会动天主派教堂一根手指头。这真是一场不可思议的战争。不过，这种情况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贝利撒留总能够打退敌人发动的总攻，而自己的军队每次出击都能打倒数量众多的哥特兵，安全返回。尽管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哥特方面却也一直没有放弃。你来我往之中，春去夏来。哥特方面使出了断水战法。他们在高架水道的每个桥拱下都挂了帐布，用作兵舍。但

为了这次断水作战，他们破坏了水道桥。由于水源未断，破坏之处一定会一片汪洋。哥特人大概也会想到不能让自己的阵营泡在水里。这给贝利撒留带来了两个担心：

第一，如何确保夏天的饮用水。

第二，敌人会通过遭到破坏而断水的水道桥潜入城内。

用水攻之法进攻有河流流经的城市，这个想法本身就很愚蠢。况且，出于处理7座山丘渗水的需要，罗马的下水道比上水道建设得更早。于是，鼓励使用井水就解决了第一个问题。罗马人洗澡是在热水里浸泡、清洗身体，是为了治病，而不是为了享乐。但在改信基督教之后，洗澡作为他们喜好的生活习惯也被保留了下来。这时，有人抱怨不能用足够的热水洗澡了。

贝利撒留采取了不怎么罗马式的方法解决了第二个问题。他首先破坏了不再来水的渠道，堆砌石块堵住破坏后的口子，再用灰浆涂抹加固。就这样，公元537年，已有850年历史的罗马水道不复存在了。

随着攻防战的延滞，存粮开始见底。虽然不久前实施了严厉的配给制度，但仍赶不上消耗的速度。要在粮食告罄之前，制定出彻底的对策。

贝利撒留决定减少吃饭的“人口”。通往意大利南部的大道依旧安全。他派人在市内各处宣读命令老人妇女儿童前往意大利南部避难的总司令布告。他还决定让奴隶也一起撤走。

总之，他想要尽量减少不能打仗却要保证口粮的人口数量。阿皮亚大道和拉蒂纳大道挤满了前往那不勒斯及更南方去避难的人和车，而塔斯可拉纳大道和拉比卡纳大道则因前往罗马近郊农村去避难的人

和车而混乱不堪。贝利撒留甚至拿出一部分配置在北面的兵力，来保证这些大道的通行安全，直到居民的避难告一段落。

可是，也有一些人对这种临战状态感到更大的不安。其中一人就是罗马主教兼教皇西尔维里乌斯。他曾经促成了贝利撒留兵不血刃地进入了罗马城，在贝利撒留到来以前早就与哥特方面的高官们相熟。

西尔维里乌斯是主教，住在主教宅邸，与罗马的主教教堂拉特拉诺的圣乔万尼大教堂毗邻。阿辛纳里亚门就在位于罗马南部的这座教堂附近。这位主教想出一条“拯救罗马的策略”，趁夜悄悄打开这座城门的锁，虚掩城门。他以为如果潜入城来的哥特士兵纵穿市内，从背后袭击正在防守北面的贝利撒留部队，就可以结束攻防战。

不知道是谁告的密，贝利撒留知道了这件事。可是，就算他是总司令，也不过是一介武将，既不能审问主教，也不能侦察主教是否已经私通哥特国王。他所能做的只是把主教和参与其事的几个元老院议员押送到君士坦丁堡，交给查士丁尼去发落。

这件事让贝利撒留注意到罗马居民中开始形成厌恶拜占庭军队的气氛。也难怪贝利撒留要惹人生厌，罗马人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一直与统治者共存，甚至没有觉得被宗教异端统治有什么不适。半个世纪后，拜占庭军队打着复国的旗号打过来，罗马人不得不忍受没完没了的攻防战。贝利撒留第一次感到自己正在逐渐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他不再信任过去一直天真地信任着的罗马人。他决定，此后每月两次更换罗马城墙15座城门的门锁，把守城门的罗马人自卫队员也要经常换防，并且只限少数心腹知道这个决定。

哥特人与居住在意大利的罗马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正在进攻罗马的哥特国王维提吉斯下令杀掉在拉文纳的全部元老院议员。除了两个人逃脱之外，意大利北部上流阶级的人悉数被杀。也许是身

在罗马的某位元老院议员向贝利撒留密告了主教西尔维里乌斯的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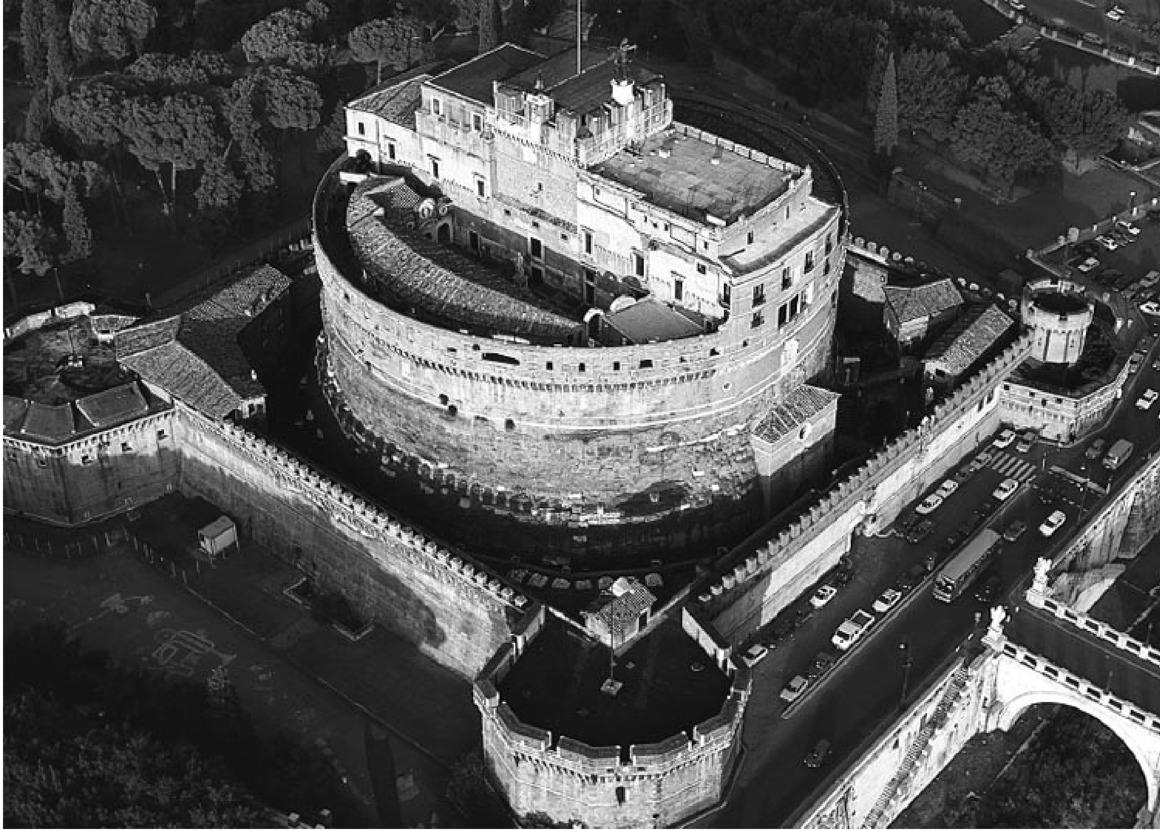
日耳曼人与居住在意大利的罗马人之间的共存关系就这样被割断了。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奥多亚克时代算起60年之后，自狄奥多里克把与被统治者共存作为统治的基本方针时算起43年之后，日耳曼民族与拉丁民族的共存关系宣告终结。日耳曼人开始把罗马人视为敌人，视为比敌人还要可恨的背叛者。

贝利撒留是武将。武将懂得没有比战斗开始后却又半途而废更愚蠢的事情。此外，厌恶拜占庭军队的空气尚未波及一般市民，“减少人口”的方法也开始奏效。

也许是知道了主教的策略，哥特方面开始向以前从不派兵的罗马南面和西面发起了进攻。

其中，敌人集中攻击的是400年前哈德良皇帝建造的陵园（现在的圣天使堡）。如果这里被攻下，台伯河西岸一带就将落入敌手，有9座桥与之相连的东岸也将受到敌人来自西边的攻击。贝利撒留一声令下，当天的防御也集中到这一处。普罗科皮乌斯这样叙述那天的攻防战。

> 哈德良陵园距离新奥雷里亚门只有一箭之遥。哈德良陵园是建筑史上的杰作，只能用“出色”二字来形容。整个建筑用切成长方形的大石块严丝合缝地堆砌而成，不使用砂浆。外墙用帕罗斯岛出产的白色大理石装饰。建筑物自身呈正四边形，每个边都是抛石可达的长度。建筑物高于环绕城市的城墙，周围排列着白色大理石做的诸神和马的雕像，都是造型美妙的杰作。



现在的圣天使堡（罗马时代的哈德良陵园）

哥特士兵不使用攻城器械。他们的战术是仗着人多不停地投掷石块，趁守方躲避的空隙架起云梯登城，把守城的士兵挑下城墙。哥特士兵数量惊人，梯子也多得吓人，他们云涌一般地冲过来，争先恐后地架起梯子。

一时间守城的士兵不知如何迎战，茫然地俯视着城下。不知谁下的命令，士兵们立即动起手来。他们拉倒诸神和马的雕像，并砸成碎石块，然后用双手举起碎石块朝敌人头上砸去。这着立即见效。敌人扔掉梯子，争先恐后地一溜烟逃开。

“大量杀戮”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建造的大理石雕像杰作，恐怕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不论是在共和政体时期，还是在帝政时期，罗马将军对出自希腊人之手的造型美术杰作的态度与对敌人重要俘虏的态度没有两样。罗马将军在必需时也会杀戮敌人，但没有杀戮过艺术作品。正因为胜者是如此尊重败者的遗作，我们生活在两千五百年后的人才

能在美术馆里欣赏到这些艺术品。离哈德良时代仅有400年的6世纪，时代变化了。贝利撒留是6世纪的武将，普罗科皮乌斯尽管理解希腊罗马文明，毕竟也是6世纪的历史学家。

哥特军队对罗马西面和南面的进攻没有因为进攻哈德良陵园失败而停止。他们攻占了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贝利撒留甚至不得不亲自率兵前去夺回。阿皮亚大道和拉蒂纳大道也不再安全。如果通往意大利南部的道路被封锁，就不可能去那不勒斯筹措军粮武器，普罗科皮乌斯曾被派去过好几次。

长期的攻防战也给进攻的哥特方面带来了许多不便。首先，士兵们被贝利撒留的巧妙战法所折腾，牺牲不断增加。哥特人在意大利生活了半个世纪，已经不再是以前不懂文明生活的蛮族了。有人开始抱怨在水道桥拱下挂帐布就地野营的不便。国王维提吉斯是靠着士兵们的支持当上国王的。他绝对不会允许放弃将近一年的进攻而撤军，但也不能无视士兵不断郁积起来的不满情绪。

现在已经不知道是哪一方提出的了。总之，双方都有了休战的愿望。休战而不求和，哥特国王维提吉斯便可不伤体面地撤军了。

公元538年3月，历时一年零九天之后，罗马攻防战暂时落下了大幕。普罗科皮乌斯没有描写全体坚守者欢欣沸腾的场面，也许他们连喜悦的气力也没有了。但38岁的贝利撒留从一开始就没想遵守休战协约。在开始追击撤走的哥特军的军事行动前，他给查士丁尼皇帝写了一封可以说是“御状”的信：

> 遵照陛下敕命，臣进攻哥特人统治之地，夺回西西里，称霸坎帕尼亚，并使罗马回到陛下手中。尽管师出有名，但也付出了惊人的牺牲。直到现在这个阶段，陛下的士兵们抗击了大群蛮族，英勇善战，给敌人以重大打击。

臣明白胜利靠的是神意。但王和将军的名声取决于他们制定的计划，取决于这计划的结果是好是坏。

请允许臣坦言，如果陛下希望士兵今后活下去，就请送粮食来；如果陛下希望他们勇敢战斗，继续收复失地，就请送武器、马匹和援兵来。

居住在意大利的罗马人当初把我们当做同胞和解放者来欢迎。但如果他们知道我们现在缺兵少粮，并由此认为我们辜负了他们当初对我们的期望，那么，他们的好意可能会直接转变成对我们的敌意。

就我个人而言，我的人生已经奉献给了陛下，如何调遣概由陛下决定。如果陛下认为我的死将有利于陛下的名誉和帝国的繁荣，我已作好准备，甘受一死。

简单地说，这只是一封“突然翻脸”的信，令人哑然失笑。我们不知道查士丁尼皇帝是如何解读这封信的。不过，他决定要派人支援。至于派什么人和怎么派，就只能是查士丁尼式的做法了。

1600名士兵渡过意大利半岛西面的第勒尼安海，在意大利南部泰拉奇纳登陆。7000名士兵沿意大利东面的亚得里亚海北上，在意大利中部皮切诺登陆。他们带去了大量金币和银币。当初开始意大利半岛收复战时只有5000人，现在的支援可是下了大决心的。不过，查士丁尼还派来了另一位司令官，说是指挥那7000人。

纳尔塞斯将军

我忘记了是拿破仑还是谁曾经说过，两位优秀的将军不敌一个平凡的将军。纳尔塞斯是宦官，与走宫廷官僚路线的许多宦官一样，他的出生地和出生年月不详。但传说公元538年时他已有60岁了。纳尔塞

斯完全不是人们通常想象的“宦官”，他是一个别有特色的宦官。只有他不是那种脑满肠肥、做官能力出众但长于中饱私囊的宦官，也不是那种一心只想着借侍奉在皇帝身边的机会要弄阴谋、陷害忠良的宦官。

从年轻时起，纳尔塞斯就一贯身材苗条，行动也与同僚不同，总是头脑清醒，精力充沛。他集皇帝和皇后的信任于一身，从皇宫的仆人做起，直到执掌整个宫廷。他被派到意大利来之前，业绩仅限于内政和外交，毫无指挥战斗的经验。他得到重用的原因在于他能在任何状态下解决问题。纳尔塞斯是一个充满自信的人。

派纳尔塞斯出来时，查士丁尼皇帝对他说：“在你认为对帝国有效时要听从贝利撒留的指挥。”没有比这更不懂战争的指示了。他把“对帝国有效”的判断权交给了纳尔塞斯。难道下这道指示的查士丁尼会认为自信满满的60岁的人会那么容易地听从38岁人的命令吗?

实际上，贝利撒留指挥的6500人和纳尔塞斯指挥的7000人是各自为政的。这时正处于罗马守军保住罗马、兵力倍增、乘势转入攻势的时期。两雄并立的状态导致了国家浪费了一年的时间和兵力。不，甚至造成了无法用兵力和时间衡量的巨大损失。

当时贝利撒留没有向查士丁尼皇帝告“御状”，但其手下将士的不满似乎也传到了君士坦丁堡。查士丁尼决定召回纳尔塞斯，把他指挥的7000名士兵也划归贝利撒留指挥。

一位不平庸的将军何止胜过两位，简直胜过三位、四位将军。指挥系统一手抓的贝利撒留一改战略，决定直接攻击敌人的根据地拉文纳。他有四个理由这样做：

一、维提吉斯得到了喘息时间，已再次集结了号称15万人的哥特军队。如果各个击破，收复意大利半岛的原定目标势必后延。

二、查士丁尼劝诱法兰克国王共同战斗，但法兰克国王一直在观望，没有参战。如今哥特方面已经转为守势，法兰克国王便翻过阿尔卑斯山脉，开始进攻意大利北部。

三、米兰遭到哥特军队进攻，陷入毁灭状态的惨状如果传到意大利其他地方，就会出现意大利居民完全站到反拜占庭一边的危险。

四、哥特军队钻了拜占庭军队二将并立无法组成统一战线的空子，扩大了行动范围，使得意大利中部的居民遭受兵祸，陷入了悲惨境地。

关于第一点，战争的拖延对进攻的一方更加不利，如果有办法阻止拖延，就值得一搏。

关于第二点，法兰西王国决然进攻意大利，并不是因为他们听从了查士丁尼的劝诱，赞同所谓天主教徒共同合作，消灭异端阿里乌斯教派的哥特王国的想法。在罗马时代，高卢被称为“阿尔卑斯山脉的那一边”（Transalpina）,法兰克人称霸于此。对他们而言，“阿尔卑斯山脉的这一边”（Cisalpina）的意大利北部并非另外的世界，而是来往容易的同一个世界。因而，对贝利撒留而言，法兰西王国不是同盟者，纵令不是敌人，也必须时常对其动向保持警惕，必须在其势力扩大到此之前控制意大利北部。

第三是米兰事件。贝利撒留已经派去1000人的兵力承担防卫。哥特人已经抛弃了狄奥多里克时代与罗马人共存的路线，把居住在意大利的罗马人视为敌人。他们袭击了米兰。普罗科皮乌斯这样写道：

> 守城兵和居民相信了哥特方面的承诺，打开了城门。所谓承诺，就是不杀不抵抗者，也不毁城。可是，哥特方面完全没有遵守这个承诺。首先，城市遭到完全破坏，被焚毁殆尽。其次，男人不论老幼全部被杀，人数达到30万。（这是相当夸大的数字。有研究

者说，这个时期的米兰人口在15万以下。——作者注）女人也全部被当做奴隶，分给了为哥特方面参战的勃艮第士兵。

米兰的长官（praefectus）列帕拉图斯被俘后没有立即被杀，而是被活生生地大卸八块，然后切成小块喂狗。只有队长威尔简提努斯和少数士兵逃脱，横穿意大利北部之后终于逃到了达尔马提亚，在那里向皇帝报告了米兰的惨状。

后来，哥特军队轻而易举地攻下了被米兰惨剧吓破胆的周边城市，将意大利北部的西半部分再次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罗马成为有名无实的首都以后，米兰一直是意大利半岛事实上的首都。霍诺里乌斯皇帝把皇宫移到拉文纳只是出于防御上的原因。拉文纳位于波河河口湿地，不可能替代位于平原地带的米兰，仅干线就有4条罗马大道会集到米兰。

圣安布罗西乌斯致力于使天主教会更加组织化，他任米兰主教时间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受这位优秀宗教家的影响，米兰发展成为一座规格次于罗马而信仰之强烈却胜于罗马的天主教城市。米兰居民对查士丁尼皇帝收复旧西罗马帝国领土的反应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敏感。正因为如此，贝利撒留在罗马攻防战休战时，立即派部将率1000名士兵前去保卫米兰。

现在，米兰化做一片无人的废墟。拜占庭军队的安全保障如此无力，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城市遭到彻底破坏，男人被杀，女人沦为奴隶被掳往勃艮第。人口仅次于罗马的都市米兰，竟连一个村庄都不复存在了。这样的境况持续着，米兰在数百年之间也未能再次崛起。在此期间，意大利西北部的中心移到了30公里以南的帕维亚。米兰城再次在历史上露脸已是进入中世纪后期的事了。

关于第四点，贝利撒留的秘书官普罗科皮乌斯这样叙述意大利中部的惨状。虽然行文略长，我还是把这部分全部译出。这是能让我们了解一旦家园化为战场人们境遇如何的最好史料：

> 那年（公元538年）夏天。田里小麦开始抽穗，却不是往年那样的丰收景象。农民数量不足，无法用牛拉犁耕地后播种，只能把种子撒在没有犁过的土地上。发芽成长的作物数量很少，能结果的就更少。
>
> 埃米利亚也是一样。农民连自食的小麦都收获不到，他们舍地弃屋，带着家人来到马尔凯。这里濒临亚得里亚海，拜占庭方面掌握着制海权，可以指望得到拜占庭送来的救援物资。
>
> 干农活的人口减少，农作物匮乏。托斯卡纳也发生了这种现象。托斯卡纳居民为躲避哥特军队多半逃进山区。可山里食物不足，他们只好采集橡树果磨粉，靠吃橡树果粉做成的面包活命。
>
> 粮食极端匮乏自是疾病的温床。很多人没有饿死，却死于疾病。据说仅马尔凯饿死的人数就不下5万，而意大利东北部的威尼托，死者人数远远超过这一数字。
>
> 我亲眼看到了实情，我想写下他们的死亡过程。
>
> 人先是消瘦下来，脸色变黄。身体长期得不到食物补给时，要靠古人所说的“吃自己的肉”来维持生命。各种器官的功能都已低下，胆汁泛滥，侵蚀脏器，肤色脸色都变成茶褐色，看上去蜡黄一片。这样的状态不断发展，皮肤失去原有的水分，干燥得令人难以想象，皱纹深刻，就像没有鞣过的皮革裹在骨头上。
>
> 不久，茶褐色变为铅色，再变为黑色。到了这一步，人的身体会变得像被火烧得发黑的木烛台，眼睛不再注视什么，只是吃惊似的大睁着。人们大多在这样的状态下迎来死亡。
>
> 由于过分饥饿，体力极度衰弱，偶尔看到野草想过去吃，却无力靠近，以手伸向前方想去拔草的姿势倒伏地面死去。

尸体被弃置原地，没有人还有体力掘墓埋尸，连贪吃的狗和啄尸的鸟都不会去看一眼这些被遗弃的尸体，那些尸身上连狗噬鸟啄的东西都没剩下。死神袭来时他们已饿得连自己的肉体都完全消耗殆尽。

纳尔塞斯被召回，贝利撒留成为唯一的司令，又像一年前那样可以一个人决定战略了。他绝对有必要利用这个机会逆转颓势。否则，3年来为什么要吃这么多苦？进入公元539年后，贝利撒留攻势果敢，势如喷火。他必须扭转现状，而且必须尽快。

拉文纳陷落

在过去近30年中，拉文纳已经数度遭受进攻。西罗马帝国最后的皇帝们把皇宫放在这里，推翻这些皇帝的北方日耳曼系蛮族国王们也把王宫放在这里。水路成网，拉文纳便位于网格纵深处，只从陆地方向进攻则易守难攻。

贝利撒留从陆地和海上两个方向对拉文纳同时发起进攻。他填埋了陆地上的运河，又动员周边港口城市的船只封锁海上。他为此花去了半年时间。到了公元539年12月，东哥特王国的国王维提吉斯和全体手下将士一起，接受了贝利撒留的劝降。

贝利撒留遵守了让对方投降所作的所有承诺，把国王及其家眷送到君士坦丁堡，查士丁尼皇帝接受了贝利撒留的进言，将保留他们的性命。东哥特人的财宝以及与国王一同保卫拉文纳的士兵也都被送往君士坦丁堡。

可是，皇帝在承诺保证全体哥特人和国王性命的信件中还有这样的内容：

> 我想，以后与哥特人的战争已经没有必要劳烦阁下这样的武将。皇帝急盼能早日亲见并赞美此次胜利的最大功臣，急盼听到帝国最高将军亲口说出的高见。除了我们的将军，无人能够迎战东方波斯再次发动的攻势。

一言以蔽之，皇帝以“别人无可替代”为由命令贝利撒留从意大利撤回。的确，贝利撒留已经占领了王宫所在地拉文纳，国王及其手下重臣们也都被押上拜占庭的船，正准备出发前去君士坦丁堡。

然而，哥特兵大都还留在意大利半岛，那可是不下10万人的战斗力。查士丁尼召回了贝利撒留却没有派来替代的司令官。这意味着，要让一直在贝利撒留手下作战的11位大队长在他离开后继续清剿哥特军队。这次可不是二将并立，而是十一将乱立了。

贝利撒留没有说一句抗议的话，就连对心腹普罗科皮乌斯也没有吐露半点内心的想法。他什么都没说，上了开往君士坦丁堡的船。在船上，他聊其他事情，可绝口不提查士丁尼的信件。

在君士坦丁堡，没有为他举行收复北非时那样的凯旋仪式，我想这恐怕也是贝利撒留的意思。然而，老百姓由衷的敬爱都集中在刚满40岁的贝利撒留身上。查士丁尼也破例准许贝利撒留拥有7000名家兵，给予他的地位大大高于作为臣下的将军，已近乎封建君主。尽管如此，对查士丁尼而言，贝利撒留终究不过是臣下，是将军。不到一年，贝利撒留便被派往东方，他的下一个任务是与波斯作战。

东哥特人的国王维提吉斯在君士坦丁堡的生活很自由，根本不像是战俘。他改信了天主教。他还被授予元老院议席，位列“贵族”，因为这位战俘已然成了皇帝的密友。虽然东哥特人的财宝被收归国库，但他衣食无忧。来到君士坦丁堡两年，他活得很悠然。和国王一起投降的哥特兵被编入了拜占庭军队。当然，他们也都改信了天主教。

战端再开

可以想见，国王被俘并遭到毁灭性打击的哥特军队由于贝利撒留的离开得以在意大利半岛东山再起。公元540年秋，贝利撒留离开还不到一年，托提拉被选为国王，哥特人又集结在他的麾下。拜占庭军队与哥特军队以意大利半岛为战场再开战端。对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来说，即是米兰和皮切诺惨剧的易地重演。

这种的状态持续了4年。哥特军队在托提拉的指挥下统一战略，协同作战，把11位指挥官各自为政的拜占庭军队玩弄于股掌之间。拜占庭方面不仅在军事上，在统治方面也一再失分。

拜占庭不能尽到保障安全这个为政者的第一职责。行政官们只热衷于横征暴敛，还把拜占庭帝国行政官僚贪污受贿的习惯带到了罗马。难怪意大利半岛居民们的感情开始倾向于哥特人一边了。

哥特国王托提拉利用了这一点，他把清廉与宽容放在首位。他不仅欢迎对待遇不满的拜占庭逃兵，还利用这些士兵去劝诱那些仍在拜占庭军队的士兵开小差。他严厉命令自己的哥特军队士兵不得袭扰农民市民等民间百姓，还命令以前强抢在乡下避难的女人索要赎金的人，免去赎金放人。托提拉亲自对士兵说，战胜拜占庭要靠端正的行为。



托提拉

托提拉还致函罗马元老院。在信函中，这位哥特国王称罗马人为亲爱的朋友，发誓哥特人将回到当年狄奥多里克实行的与罗马人共存的路线上。这个誓言不只停留在语言上，也表现在行动上，连普罗科皮乌斯也不得不认可哥特方面的这种公正性。

哥特人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自己的统治达到了现有的意大利北部，还进一步达到了意大利中部，甚至达到了那不勒斯以南的卢卡尼亚、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等地。这样，哥特将意大利南部地区也收归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些地方连狄奥多里克时代都不在日耳曼系蛮族的统治圈之内。留给拜占庭的，只是从拉文纳到罗马的带状地域。拜占庭受到挤压，唯一的优势是还保有亚得里亚海和第勒尼安海的制海权。

面对现状，就连不可一世的查士丁尼也必定感到有必要打开局面。这时浮现在皇帝脑海里的还是贝利撒留。贝利撒留在波斯前线收

到皇帝的命令，他被再次派往意大利战线，感觉上只是顺便路过了一下君士坦丁堡似的。这时的贝利撒留已经44岁。

这年秋天，贝利撒留到了拉文纳。他听取了自己不在的这4年中意大利战线的情况汇报，并亲自作了视察。我们不知道他在这之后作何感想。他给查士丁尼皇帝送去了下面这封信：

> 蒙神深深眷顾的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
>
> 再次回到意大利我才知道，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士兵、马匹、武器和军费，我们缺乏进行战争所需要的一切。



查士丁尼（左）与贝利撒留

在来这里的途中，我路过了色雷斯和伊利里亚两地，边走边招兵。可是我只招到4000人。这些人非但没有武装，而且完全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甚至不知如何使用武器。

我军在意大利的所有士兵也因军粮不足、拖发军饷，不满即将爆发。这4年来遭受的失败使他们丧失信心，如惊弓之鸟，一听到哥特军队，便会丢盔弃甲，逃之夭夭。

长久以来，在意大利已征不到税。能够征到税的地方都已处在蛮族的统治之下。征不到税便不能给士兵发饷。如此一来，我们指

挥官便无从行使叱责士兵让他们服从命令的权力。

陛下，您可知道，我们的士兵已经有很多投降了哥特方面。

如果以我之死便能结束战争，这即刻可以办到。但是，如果陛下希望打赢战争，就不能不作许多准备。没有军事力量，将军不过是徒有虚名。

首先请允许我的私家军队前来意大利。要与哥特重新开战，我必须拥有最低限度的兵力。此外，根据来意大利途中在巴尔干获得的情报，匈奴人的骑兵团有意参战。如果能够雇用他们，将会帮上大忙。但是他们不见现金不会参战。这时必须金钱先行。

贝利撒留紧急派遣一位信得过的队长，带着信件前往君士坦丁堡，严命他必须直接将信件交到皇帝手上。然而，不知道是查士丁尼没有理解贝利撒留直接上书的意义，还是认为没有必要，他亲切慰劳了送信的队长，甚至为他张罗结婚对象，却始终没有写回信。好像他钦准了7000名私家兵前往意大利，也许他认为这已足够。

贝利撒留等不来军费、武器、马匹和士兵，只能依靠手上的兵力重新开战。这时，意大利半岛的大半已归哥特人统治，战役不可能像8年前攻占意大利南部时那样顺利。艰苦作战，疲于奔命，两年时间转瞬即逝。

司令官不能保障军饷、军粮和武器，指挥也就不灵。贝利撒留只拨给派去防守罗马的两个队长3000名士兵。他们可能因此丧失了斗志，在哥特军队将要打过来之际，非但不专心准备防御，反而大肆倒卖军用物资。公元546年夏天，罗马再度遭到哥特军队的攻击。

在9年前的罗马攻防战中，敌人只集中攻击了一半的罗马城墙，还不能说是包围战。可是这次不一样了。托提拉指挥的哥特军队包围了包括台伯河西岸在内的整个罗马。台伯河上也拉起了牢固的铁锁链，

从奥斯提亚来的船只完全进不了罗马城。从罗马南去的阿皮亚大道及其他大道也被全部封锁。尽管这个时期罗马市内的人口进一步减少，但仍留有近10万人，他们被完全封锁在罗马城内。

贝利撒留断然决定突围。他让人在奥斯提亚调集了200艘船，让步兵和武器上船，靠牛在两岸牵引和人力划桨沿台伯河溯流而上。骑兵团顺着奥斯提亚大道和港口大道这两条沿台伯河通向罗马的大道行进，护卫逆河而上的船队。贝利撒留想利用流经罗马市内的台伯河去增援已被包围的防守部队。

行进在前面的两艘船比其他船只要大，船头经过特别加固。两艘大船的任务是突破铁锁链，其他船只也为防备岸上敌人的攻击，在船腹围上了一圈厚板。

哥特方面一定预料到罗马方面会利用台伯河突破封锁，所以事先在河上拉起铁锁链。他们在拉起铁锁链的地方筑起高塔，派200名士兵把守。

贝利撒留站立船头，亲自指挥，断然实施突破，取得了圆满成功。两岸的两座高塔均被破坏，哥特士兵一个不剩，全部被杀。船队成功靠岸，沿阿皮亚大道而来的骑兵团也逼近了守在城外的哥特军队，已是面对面的距离了。

然而，尽管派出密使提前作了指示，防守罗马的拜占庭的两个队长和他们手下的3000名士兵却按兵不动，至少没有像贝利撒留所期待的那样行动。这样，贝利撒留和他的部队面临被关进包围中的罗马的危险。贝利撒留只得再次登上船，命令其他船只和士兵撤回奥斯提亚。

未能响应此次突围的不仅是罗马市内的拜占庭将士，罗马居民也没有组成自卫队奋起响应，这与上次的情形不同。他们在挨饿，饥饿

不仅损害了他们的身体，也销蚀了他们的意志。

在进攻的哥特军队方面也能看到与前次攻防战的不同之处。他们并未像9年前那样不断发动进攻，而只是持续包围。这场攻防战很奇妙，感觉就是实施包围，从外部彻底封锁，等待市内的消耗。贝利撒留的秘书官普罗科皮乌斯看着这样的罗马写道：

> 被托提拉完全包围的罗马市内缺乏所有物资，其中食物匮乏最为严重，而且日益恶化。人们开始捕食平日绝不会去吃的东西。
>
> 被派去保卫这些罗马人的两个拜占庭将军和他们手下的士兵，非但没有奋起防御，反而热衷于向市民高价倒卖为他们特别储备的小麦。买得起的人极其有限，因为价格已经飙涨到了1摩第（约等于8.73升）小麦需花7枚金币的地步。
>
> 更多的市民只得采集荨麻来吃。这种杂草生长在神殿、公共浴场和会堂等倒塌后的遗址上，是罗马市内唯一量大的东西。但是这种草生有细刺，直接食用会伤及口腔和咽喉，需要煮炖，直到草刺变软。
>
> 但是，光吃荨麻体力就会下降。人们的身体随着包围日久逐渐消瘦，脸色也会变成铅色，宛若幽灵。人们嘴里嚼着荨麻，幽鬼一般地走在路上，不时有人突然倒毙。而市内没有埋葬之处，尸体便被弃置路旁。

贝利撒留命令市内的队长疏散人口，但结果与9年前攻防战时完全不同。

9年前疏散人口时，大量的人、车挤满了南下的大道，人们都有避难的去处，车上装着家具、衣物和食物。然而，公元546年的难民却一无所有。普罗科皮乌斯这样写道：

拜占庭军队的两位将领，最后允许市民离开罗马去各自希望的地方逃难。只有少数人选择留下，大多数人选择了逃离罗马。

可是，这些人迈出打开的城门后，却一个接一个地倒在大道上。长期的饥饿使得他们体力衰竭，沿大道行走也成为重负。他们在路旁、在河边迎来了死亡。

哥特兵在等着走在前面的人。哥特兵根本不需要战斗，只要枪尖一挑，无力抵抗的难民便呜呼哀哉。

这就是世界上曾经人人憧憬的、光鲜无比的罗马市民现在的形象。

不久，哥特军队于12月进入罗马城。他们所能做的只是等待，等待罗马从内部崩溃。被派来保卫罗马的拜占庭士兵已经在哥特人进城之前悄悄溜走了。

哥特国王托提拉首先参拜了耸立在台伯河对岸梵蒂冈的奉献给圣彼得的教堂。虽说是属于阿里乌斯教派，但哥特人也是基督教徒。后来的托提拉与曾经发誓成为罗马人亲密朋友、回到狄奥多里克共存路线上来的自己已判若两人。自己已成为统治者，被统治者的命运则取决于自己。这种想法清楚地反映在他们的行动上。

首先，三分之一的城墙被毁。虽然被毁长度总和是城墙总长的三分之一，但城墙到处被截断，已被破坏得无法使用。留下来的罗马市民被迫对城墙进行了破坏。其次，留下来的元老院议员和他们的家属全部被俘，哥特军队走到哪里，就把他们带到哪里，直到赎金送到。可是，元老院议员的财产基础是大农庄，长期的哥特战争已使农庄荒芜。筹集赎金也不像哥特国王所期待的那样顺利。这些被称为元老院阶级、权势显赫的元老院议员和他们的家人亲戚，就这样在肉体上被消灭了。没有被杀的人也都去向不明。

这就是自公元前753年罗马建国以来，一直与罗马国家共浴荣光的“罗马元老院”（senatus romanum）的终结。

也许是哥特人觉得这座罗马城已经失去所有魅力，便抢完能抢的东西，押着元老院议员离开了此地。此后40天，这个曾被称为“世界之都”、广袤帝国无人不晓的罗马，被抛弃在悲哀与荒凉之中，无人回头再看上一眼。这就是翌年2月贝利撒留再次夺到手里的罗马。

贝利撒留从修复城墙着手，开始重建罗马。但查士丁尼没有给他这个时间，命令贝利撒留把罗马防御交给别人，优先肃清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哥特势力。查士丁尼这个时期的命令，不像是在了解意大利战况之后发出的，而好像是基于造访君士坦丁堡皇宫的人带来的情报和某些人的陈情。战线南移到意大利南部，也许就是某位在意大利南部或西西里拥有大型农庄的人陈情的结果。不管怎样，贝利撒留接到了皇帝的命令，只能挥师南下。

耗费一年时间，贝利撒留终于取得了夺取意大利南部的胜利，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哥特势力被一扫而光。然而，在这一切告一段落后的公元548年秋天，送到贝利撒留手上的是查士丁尼皇帝的召回令。这次召回不是让他负责波斯战场。关于他回到君士坦丁堡后的任所，命令中没有任何表述。

因而，人们感到这时的召回就是事实上的解职。在君士坦丁堡和意大利战场，人们都在传言，贝利撒留因未能结束哥特战争而被追究责任。

的确，他第二次被派到意大利战场即将4年。在此期间，哥特军队的势力未见衰退，国王托提拉也安然无恙。出于好意来评价，他所取得的战绩也只能说是阻止了情况的进一步恶化。可是，考虑到贝利撒留回来时他所面临的局势和派给他的兵力，他不可能取得更好的战绩。

不过，在君主专制国家，君主作出决定，却不承担责任。臣下没有决定权，却不得不承担责任。尤其是在基督教国家，君主受神意而立，追究君主的责任就是追究神的责任。不能追究神的责任也就不能追究君主的责任。贝利撒留不过是臣子，查士丁尼大帝对他也不过是基督教国家的君主对待臣下而已。可是，查士丁尼召回了贝利撒留，却没有派人去顶替他。

查士丁尼这样做，是因为斯拉夫民族对巴尔干地区的入侵不断激化，拜占庭帝国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于此。巴尔干紧靠君士坦丁堡的西边，而意大利半岛对君士坦丁堡而言则是遥远之地。

贝利撒留离去后，意大利半岛的状况已不能用“悲惨”二字来形容。哥特军队与拜占庭军队在意大利半岛各地冲突不断。意大利天主教会的主教们看不下去，派代表去君士坦丁堡请愿，请求查士丁尼皇帝不要再在意大利打仗了。

可是皇帝没有理睬这个近似哀求的请求，但又不愿增派军队一决胜负。这样，又过去了4年。在此期间，贝利撒留有时会被派往多瑙河下游指挥与保加利亚或斯拉夫民族的战斗。除此之外，不管享有多高荣誉，在皇宫里有多高地位，他事实上一直处于“赋闲”状态。从48岁到52岁，这对男人来说是最后拼搏的时期，而贝利撒留却被放在闲职上虚度年华。

战争结束

公元552年，查士丁尼似乎终于下了决心要结束哥特战争。可是他没有任命52岁的贝利撒留，而是任命年过七旬的纳尔塞斯一个人担任总司令职务。不过，即使在这个年龄，纳尔塞斯也还保持着不输给壮年男人的智慧。

纳尔塞斯有着宫廷官僚的资历，而贝利撒留则只有军人资历。贝利撒留是一旦被任命就会立即奔赴战场战斗、然后直接向最高司令官皇帝报告的一类人。纳尔塞斯却是没有完全作好准备就不上战场的一类人。

公元552年，纳尔塞斯横跨巴尔干地区进入意大利北部。我们不清楚他率领了多少士兵去意大利，但加上尚在意大利的兵力，总数在3万人。收复意大利的战争以5000人兵力开始，花了17年的岁月也未能结束，这次投入了当初6倍的兵力。纳尔塞斯一定对这些情况了如指掌。他决定用决战的形式一决胜负。这种打法就是引诱哥特军队进行会战，力求击毙敌方头目，一战定乾坤。

这个战略本身并不坏。但纳尔塞斯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他带来的士兵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人数过万的伦巴底人。

伦巴底人是起源于东北欧的蛮族，居住在现已成为各方势力真空地带的多瑙河中游以南一带。在北方蛮族中是最新到来的部族。6世纪时，人们已开始犹豫是否还把已在高卢称霸的法兰克人和逐渐称霸西班牙的西哥特人继续称为“蛮族”。这时的伦巴底人却还只是名副其实的蛮族。

纳尔塞斯把武器交给伦巴底人，教他们如何使用，向他们支付佣兵费来使他们通过货币接触货币经济。他还把他们投入与哥特军队的战斗中，让他们积累实战经验。他把这群乌合之众造就成了出色的军人。然而，这样做很快就让意大利人和拜占庭人都吃了大苦头。伦巴底人即将成为因哥特战争而疲惫不堪的意大利半岛的下一个主人。

会战，就是以广阔的平原为战场，两军相对布阵，一声令下，两军士兵激烈冲撞，一战而决胜负。会战是战斗之花。两军的司令必须同时有会战的决心，会战才能进行，这应该是会战的一个缺点。不论纳尔塞斯如何想打会战，如果哥特国王托提拉不愿意，会战就打不

成。自从贝利撒留被召回之后，哥特军队在战斗中一直处于优势，托提拉很是强硬。

公元552年夏，纳尔塞斯率领拜占庭军队沿弗拉米尼亚大道南下，托提拉率领哥特军队则沿同一条大道北上。两军接近，距离只有18公里。纳尔塞斯派使者给托提拉送去一封信，内容当然不是建议讲和，上面只写了一句话："如果投降就饶恕你们！"

托提拉看了信，口头回答了使者。回答很简单，只有一句话："不战胜则战死。"使者问道："何时开战？"托提拉的回答也只有一句："8天以后。"

然而，第二天天一亮，哥特军队便发起了进攻。纳尔塞斯似乎预料到了这一点，他选在平原宿营，这样数量上占优势的己方军队能够展开，可以及早发现敌人的偷袭，并迅速布阵。这位老将并没有花时间作鼓舞士气的演说。他让人抬着许多准备奖赏给英勇作战的士兵们的金链子从整齐的队列前面走过，展示给士兵。

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日头西斜。虽然伦巴底士兵的伤亡大于敌人，但他们死死守住了奉命坚守的阵地。而哥特军队有6000人战死，国王托提拉一度逃出包围，但很快被追上，壮烈战死。

敌兵尸横遍野，获胜的纳尔塞斯跪在地上祈祷，感谢神、基督和圣母玛利亚。战败的哥特人尽管属于阿里乌斯教派，但也是基督教徒。然而正统天主教徒人人都坚信不疑，神与自己同在，而不在敌人一方。

祈祷之后，纳尔塞斯向为自己而战的伦巴底士兵支付佣兵费，然后把他们解散。伦巴底的士兵们沿弗拉米尼亚大道向北撤离，回阿尔卑斯山脉背面的故乡去了。他们在回乡途中一路抢掠，暴行连连。

纳尔塞斯率领剩下的拜占庭军队，踏着哥特士兵的尸体，继续沿弗拉米尼亚大道南下。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了贝利撒留离开后又被哥特人占领的罗马城。

命运多舛的罗马城也是意大利半岛命运的写照。

公元536年——贝利撒留入城。

公元546年——托提拉入城。

公元547年——贝利撒留入城。

公元549年——托提拉入城。

公元552年——纳尔塞斯入城。

这就是没有力量保卫自己的人所不得不经历的命运历程。

意大利和居住在那里的人们因长达17年的哥特战争疲弊已极，而拜占庭军队和哥特军队也免不了消耗。哥特王国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拥有15万到20万兵力了。他们呼吁同为日耳曼系的阿勒曼尼人共同作战，结果反被戏弄，遭到攻击。不过他们尚存气力与拜占庭军队继续战斗。托提拉战死后，哥特人选出特阿斯接替托提拉，着手重组军队。

纳尔塞斯却不等他们做完这一切，当他得知哥特人重组军队所需资金藏在库马的神殿后，便立即进攻那不勒斯附近的这座古城。他料到特阿斯知道后会率兵赶来保卫库马，便设下了一个圈套。

就这样，第一次会战半年以后的公元553年春天，拜占庭与哥特在濒临第勒尼安海的意大利南部平原展开了激战。激战在第一天未能决出胜负，整整对决了两天。翌日，当落日的余晖把第勒尼安海染成金

黄色的时候，东哥特王国的最后一位国王特阿斯与众多士兵一道战死沙场。这是英勇奋战之后壮丽的一死。

得知国王战死，哥特军队投降了，保命是唯一的条件。纳尔塞斯命令他们选择要么服膺拜占庭皇帝的统治在意大利生活，要么离开意大利回到阿尔卑斯山脉北面去。哥特士兵多半选择了后者。

意大利之死

就这样，普罗科皮乌斯叙述的这场战争的第18个年头结束了。

《哥特战记》撰写至此，普罗科皮乌斯搁笔。从收复西西里算起，查士丁尼皇帝发动的收复意大利的战争长达18年，终于在公元553年结束。在罗马帝国存续的时期，意大利是帝国的本土。这片土地和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因持续了18年之久的这场战争而蒙受了意想不到的打击和损失。同样信奉天主教的拜占庭帝国发动了哥特战争。这场战争给意大利和居住在那里的人们的打击，比一个世纪前蛮族的反复入侵更加沉重。这是近现代许多历史研究者所公认的事实。意大利人口锐减，土地荒废，引领复兴的领导层被消灭殆尽。

此外，哥特战争的幸存者也没有运气拥有光辉的明天。这次以“皇帝代理官”（exarch）之名负责统治意大利和西西里的纳尔塞斯，露骨地暴露出了他那君主专制国家官僚的本质。他知道身在君士坦丁堡的查士丁尼想要收回战争期间花掉的费用。纳尔塞斯对已是拜占庭帝国领土的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居民横征暴敛，课以重税，而且是在人口锐减、土地荒废、生产凋敝的状态之下。纳尔塞斯似乎相当长寿，这位皇帝代理官连续统治意大利长达15年之久。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居民在

18年的战争之后，又在苛政之下痛苦挣扎了15年。扼杀帝国本土意大利和首都罗马的不是蛮族，而是同胞东罗马帝国。

翻译成农庄也好，别墅也罢，在整个罗马时代，“villa”（拉丁文原意有农场、农庄、村庄、乡间宅邸、别墅等义。——译者注）都是农业生产的基地。近年来，整个意大利都在发掘它们的遗迹。规模大且分明是农业生产基地的“villa”，多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据从事发掘的考古学家说，很难证明到6世纪后半叶仍然有西罗马帝国延续下来的“villa”。他们说，从这个时期开始，宏伟壮观的“villa”都化为了废墟。

如果他们所言不谬，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villa”熬过了蛮族灭亡西罗马帝国，却未能熬过拜占庭帝国发动的战争和战后的苛政，而古代的大规模农庄就相当于现代的基础产业。

贝利撒留之死

就在纳尔塞斯在意大利独擅大权的公元559年，贝利撒留少有地被授权指挥在巴尔干地区与保加利亚人的作战，他获胜后回到了君士坦丁堡。这是年已59岁的他指挥的最后一场战争。之后，贝利撒留又被赋予闲职，在皇宫中闲晃。公元561年，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在绝对专制的国家里极易致命的事件。

当时，查士丁尼皇帝去世的流言在君士坦丁堡传得满城风雨。查士丁尼已经79岁，死亡并不足为奇。贝利撒留未经确认就信以为真，公然毫不掩饰地批判查士丁尼。查士丁尼闻讯后大为震怒。皇帝暴怒，盘踞皇宫的官僚便趁机搞起阴谋。这也是绝对君主政体国家必有的现象。贝利撒留的一个朋友被捕，交代说贝利撒留阴谋暗杀皇帝。

可是不知为何，对贝利撒留的“处罚”决定竟花了两年时间。公元563年判决下达，贝利撒留被没收全部财产，软禁在家。查士丁尼也许难下决心将40年来给帝国带来无数胜利的忠臣投入牢狱。这种状态持续了半年。半年后重新判决贝利撒留无罪，返还财产，恢复自由。

可是，贝利撒留仅有8个月的时间享受这一切。公元565年3月13日，拜占庭帝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武将病逝，享年65岁。

查士丁尼之死

公元565年11月14日，贝利撒留死后8个月，查士丁尼病逝，他83岁的天年亦属罕见。

他的统治长达38年。最后的15年让他颇多烦恼。老皇帝的忧虑大约有下述三点：

一、与波斯萨珊王朝的战争渐渐转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使拜占庭和波斯这两个东方强国疲弊至极。不久以后，波斯就在新兴的阿拉伯民族面前一下子崩溃了。这也可以说是波斯与拜占庭之间毫无收益的长期战争的余波。

二、拜占庭帝国很难阻止渡过多瑙河下游蜂拥进入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入侵。即使在查士丁尼和贝利撒留的出生之地，也是拜占庭帝国之祖君士坦丁大帝出生之地的巴尔干地区，帝国的力量也一直在衰退。

三、在东部、巴尔干，尤其是在西部，长期持续的哥特战争给拜占庭帝国的财政带来重创。查士丁尼的侄子，后来继位当上皇帝的查士丁二世在统治之初就明确说过：

> 在我面前打开的国库里，除了许多借款凭证以外，一无所有。帝国财政的现状令人绝望。缺乏军费，军事便会乏力，这样下去只会被蛮族欺凌。

这就是最大限度扩张领土、炫耀最高权势、号称最繁荣的查士丁尼时代的东罗马帝国乃至拜占庭帝国的形象。

这位被后世尊为大帝的查士丁尼死后3年，在意大利施以苛政的纳尔塞斯也去世了。这一年是公元568年，同年伦巴底人南下来犯。意大利已经再也无人无力抗击这个新来蛮族的入侵了。

东罗马帝国耗时18年赶走了哥特人，收复了意大利，却又在15年之后遭到伦巴底人的掠夺。伦巴底人的统治给意大利半岛留下了深刻而惨痛的创伤，甚至让人觉得哥特人的统治根本算不上什么。

此后45年过去，历史走到了公元613年。先知穆罕默德开始在阿拉伯半岛传教。此后100年间伊斯兰势力迅速发展，不断蚕食着拜占庭帝国的领土。

公元636年，叙利亚被伊斯兰化。

公元642年，埃及被伊斯兰化。

公元650年，阿拉伯人进攻小亚细亚，一度逼近君士坦丁堡。

公元670年，北非被伊斯兰化。

公元698年，北非的心脏迦太基陷落。

进入8世纪后，伊斯兰势力迅速波及伊比利亚半岛，他们甚至越过比利牛斯山脉，入侵法兰西。公元732年的普瓦捷战役阻止了这一攻

势，但其时伊斯兰已经成为覆盖从中东到北非，进而覆盖到伊比利亚半岛的巨大势力。

地中海的东、南、西三面均为伊斯兰势力所包围，基督教势力只残存于地中海的北面。中世纪就在这样的状态下过去了。



世纪到7世纪的意大利半岛（选自**A. Giardina, G. Sabbatucci, V. Vidotto, Manuale di Storia, Vol. 1: II Medioevo**）

地中海已经不再是罗马人曾经称呼的“内海”（Mare Internum），她已经变成了分隔异教和不同文明的界海。

从意大利首都罗马到突尼斯的首都突尼斯，如果乘飞机要比从罗马到巴黎还快。可是一出机场，你就会感到来到了不同的文化圈。没有“孰优孰劣”的问题，只是纯感觉上的“互不相同”。不过，如果你去美术馆欣赏罗马时代的雕像和镶嵌画，如果你移足郊外，站在残留至今的众多罗马时代遗迹面前，你一定会产生与身在罗马市内的古罗马广场和圆形竞技场中一样的感觉。

面对北非突尼斯和利比亚的遗迹，要比身在罗马更适合想象往昔的罗马时代。

这是因为由于文明的进步，残留在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遗迹给人一种感觉，好像它们被埋没在众多建筑中苟延残喘；而残留在因人们久不居住而沙漠化的北非的罗马遗迹，却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在利比亚的古城市遗址，人们可以180度地眺望地中海，天空湛蓝，阳光强烈，连筑城所用的大理石也变得色彩柔和，赏心悦目。

北非的遗迹并不苟延残喘于现实生活的人群之中。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经绝迹，而今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因文明迥异，根本不会去凭吊遗迹。于是，遗迹至今还在那里展现着自己的生命。

一人独自站在那里，把身子靠在圆柱上，或是坐在半圆形剧场的石座位上，你甚至会听见曾经生活于此的罗马人的声音。你甚至还能实际感受到，罗马时代的北非，其文明程度之高，内涵之丰富，比同时代的西班牙、高卢以及不列颠都更接近帝国的本土意大利。

在古代，地中海的南北两面属于同一个文明圈，直到7世纪以后才开始分离。过去是连在一起的，现今却已分开，那已经不是罗马人创

造的罗马世界了。

罗马世界灭亡于地中海不再是“内海”之时，消失于地中海不再是连接人与人之间的通途，而变为隔离人与人的界海之时。

以后的地中海成了这样的一片海洋，海边崖顶必定建有通知人们撒拉森海盗来袭，让人们上山逃难的撒拉森塔（Torre Saraceno），海面上航行着满载十字军士兵东去的船只。

公元1000年逝去的时候，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这些意大利海洋城市国家（城邦）与东方伊斯兰世界的交易日益兴旺，地中海渐渐成为贸易船只往返航行之海。再后来，地中海又成为高举古代复兴与人权复兴大旗的文艺复兴时代之海。

可能是盛者必衰、诸行（res gestae）无常的缘故吧。

我想，如果这就是历史之理的话，那么我们后人应该正冠整衣目送历史，正是我们对先人孜孜努力积累起来的历史应有的礼貌。

—— 全书终 ——

结语

为什么要写罗马史，还要写上15卷？回答简单之至。这与“历史的写法”、“带着对现代的问题意识写史”之类全无关系，其发端只是“朴素的疑问”而已。

问到罗马史，答复都与“衰亡”相联系，这是以往的一般倾向。我想这是因为受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的影响。我的第一个疑问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既然有衰亡，那以前必定强盛过，那么人们为什么不关心强盛期，却只谈衰退期呢？

于是，我首先想知道罗马为什么，又是如何强盛的。我在本丛书的第1卷到第5卷里写了罗马的强盛期。这5卷中描写的罗马在对外战争中度过了这一时期，这一时期在罗马史上是“高速发展的时期”。也许这一时期开始于王政，其后共和政体一贯到底，因而近现代以这个时期“共和政体的罗马”为题材的史书和研究著作汗牛充栋。也许是受法国革命的影响，近现代的历史学家和研究者似乎都喜欢共和政体时代的罗马。

也许是因为上面的原因，随着共和政体向元首制的转变，从面向一般读者的历史书籍到学术研究，无论是质的方面还是量的方面都在锐减。我考虑过这里的原因，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帝政时代的罗马脱离了政治史的一般观念。政治史的一般观念是，王政经过共和政体这种亦称贵族政体的元老院主导的寡头政体之后，下面应该是民主政体。可是罗马却走向了被称为“元首制”的君主政体。这被视为是历史的倒退，换句话说，这是保守，是反动。

可是我生活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时代，知道政治意识形态是多么的苍白无力。既然如此，我想抛开政治史的一般观念，而只考虑对一般人来说统治是否是善政。

这样一想，我觉得像过去那样轻视元首制下的帝政时代终究很可惜。首先，在长期而广泛地享受体味着强盛期所获得的果实这个意义上，这一时代相当于罗马史上的“稳定发展时期”。

在历史上生而又亡的国家，几乎都是在强盛之后立即走向衰退，鲜有能在强盛期与衰退期之间拥有长期稳定的发展时期。也许因为这一点，长存的国家必定拥有稳定的发展期。无论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代的威尼斯共和国，还是古代的罗马帝国，无不如此。

其次，帝政罗马的第二个特色是“pax”（和平）的形成。所谓“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就是“罗马主导的国际秩序”。由罗马主导的这种和平，时间持久而能够在地域辽阔的帝国全境得到维持，着实了不起。就说欧洲、北非和中近东长达两百年没有战争这件事，虽已过去了两千年还直让人感叹不已。

我认为，我们的目的是了解这种“和平”为什么会实现和怎样实现，这与政体是否为帝政并无什么关系。

本丛书的第6卷到第11卷这5卷书即聚焦于此。提出“罗马主导的国际秩序”这一思想的人是尤里乌斯·恺撒，撇开他的故事就无从展开。描写恺撒的第4卷和第5卷两卷书对了解帝政不可或缺。恺撒是罗马史从共和政体走向帝政，即从“高速发展时期”走向“稳定发展时期”的“导演”，连罗马人也认为恺撒是罗马帝国事实上的第一位皇帝。苏埃托尼乌斯所著《皇帝传》（中译本《罗马十二帝王传》，有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和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译者注）也是从恺撒写起。

本丛书的最后三分之一是始于第11卷终于第15卷的时代。历史走到这里总算是步入了罗马史所独有的衰亡时期。

论述罗马衰亡的史书和研究著作多如海滨之沙粒。除了荒唐无稽的之外，多多少少都有正确之处。收集这些书籍，便有可能便捷地了解罗马衰亡的主要原因。但是，我没有心情在四处拾人牙慧的工作中耗费只有一次的人生。

于是，在最后5卷书中，我把重点放在写“如何”衰亡，而未放在“为何”衰亡的阐述上。

一个国家的历史犹如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想彻底了解它，就只能从它的诞生一直追寻到它的死亡。

写从诞生到死亡的所谓通史，对我而言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写以《海洋之都的故事》为书名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历史，第二次就是这套《罗马人的故事》。虽然这两个国家在享有一千多年的漫长历史方面相类似，但若论及给同时代其他国家和后世的巨大影响，这两个国家却截然不同，不可比较。这就是《海洋之都的故事》两卷而终，而《罗马人的故事》却写了15卷的原因。不写上15卷，就写不了罗马的历史。

写这部15卷的《罗马人的故事》，首先是因为我自己想了解罗马人。现在写完了，我可以由衷地说，我懂罗马人了！

如果读者也能在读完本书，掩卷之后觉得“我也懂了”，这对我来说便是无上的喜悦。所谓书籍，是靠作者写书、出版社出书、读者读书才能构成的媒体，连接这三者的红线就是“共享同一种想法”。

盐野七生

2006年秋于罗马

附录一 罗马人用以自律的“基本道德”一览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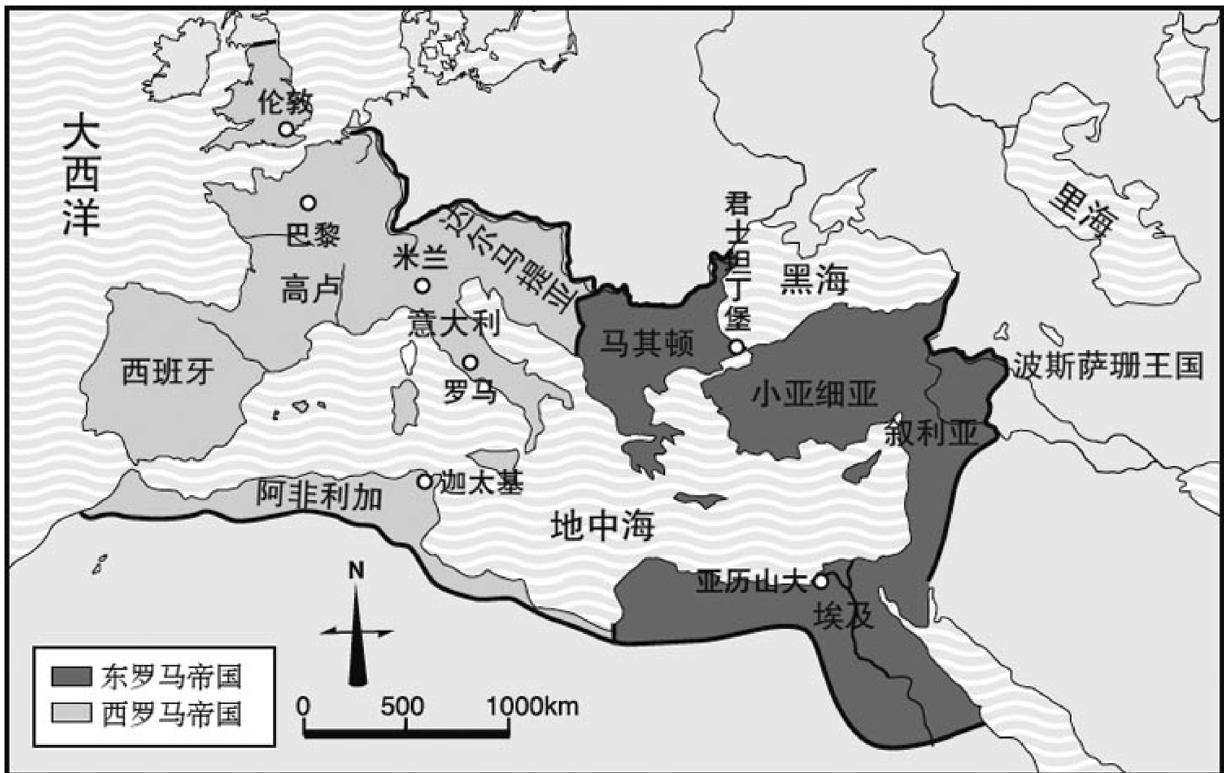
拉丁语	盐野译案	意大利语	英语	法语	西班牙语	德语	罗马人认知的意义及其解释
pietas	虔诚	pietà	piety	piété	piedad	Pietät	尊重永恒价值。对诸神意志心怀敬意。重视现实生活中的良好行为。
humanitas	人性	umanità	humanity	humanité	humanidad	Humanität	重视人际关系，不管这种关系是家庭之间、朋友之间还是国家之间的。
libertas	自由	libertà	liberty	liberté	libertad	Freiheit	尊重个人人格。保护自己及他人之人格意志。
clementia	宽容	clemenza	clemency	clémence	clemencia	Nachsicht	宽容对待投降之敌。宽容对待不同宗教、文化和风俗。
mores moralis	道德	morale	morality	morale	moralidad	Moral	道德是一种经过漫长岁月沉淀积累的智慧，它不是某个时代某个个人所能

							单独形成的，因而是一种值得尊重的传统。
autorita	权威	autorità	authority	authorité	authoridad	Authorität	不惟上司和权力者是从，而是服从智慧者和经验优越者的价值观。
fides	信义	féde	fidelity	fidélité	fidelidad	Treue	信义是认同罗马意志的人们之间应有的感情基础，并不限于朋友之间。
disciplina	纪律	disciplina	discipline	discipline	disciplina	Diszipin	纪律是使家庭、社会、帝国等人类共同生活其间的各种组织发挥功能所必不可少的。重要的是应该通过每天的训练使纪律得到遵守。
severitas	严格	severità	severity	sévérité	severidad	Severität	这更是一种严于律己的纪律。
gravitas	威严	gravità	graveness	gravité	gravedad	Gravetät	认清真正重要的事情，充满责任感地予以实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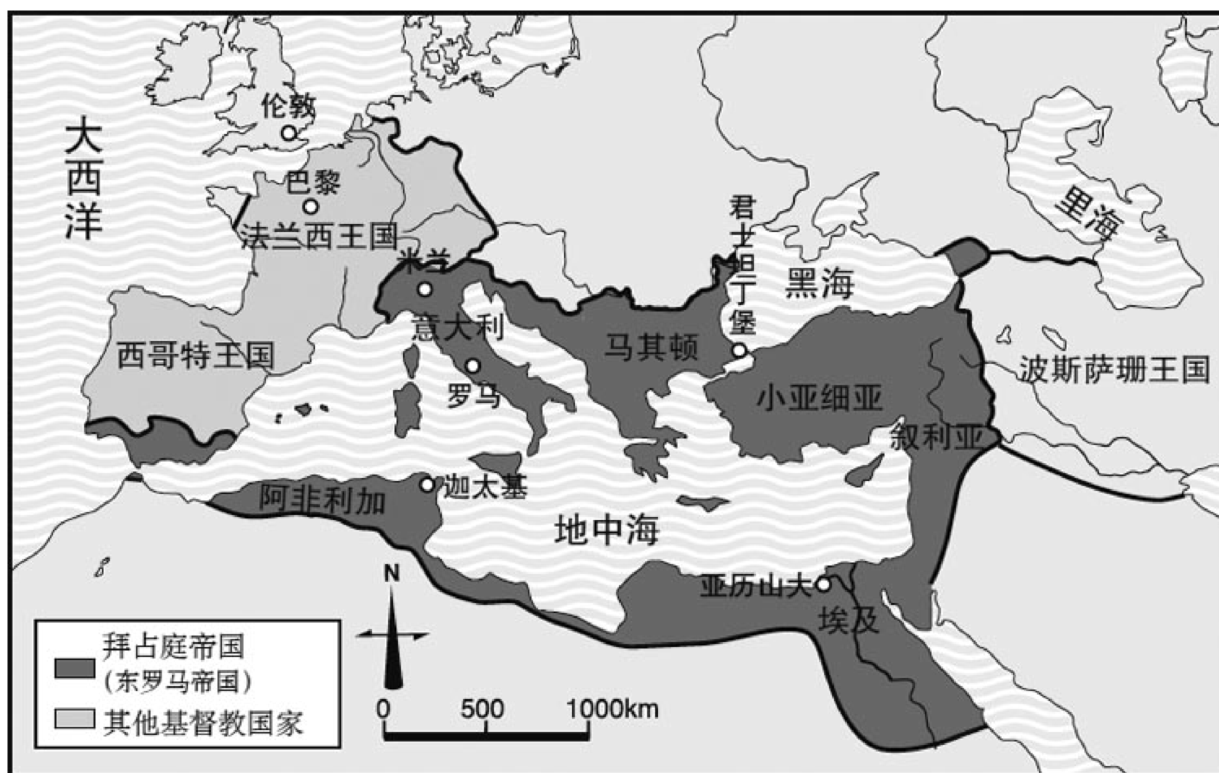
constantia	一贯性	constanza	consistency	consistance	consistencia	Konsequenz	方针一旦确定便扎扎实实坚持到最后的、一以贯之的态度。

附录二 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的盛衰（公元395—1453年）

罗马帝国的东部在与西部分离之后延续了一千多年，这点一直得到人们的赞赏。下面是这一千多年的实况地图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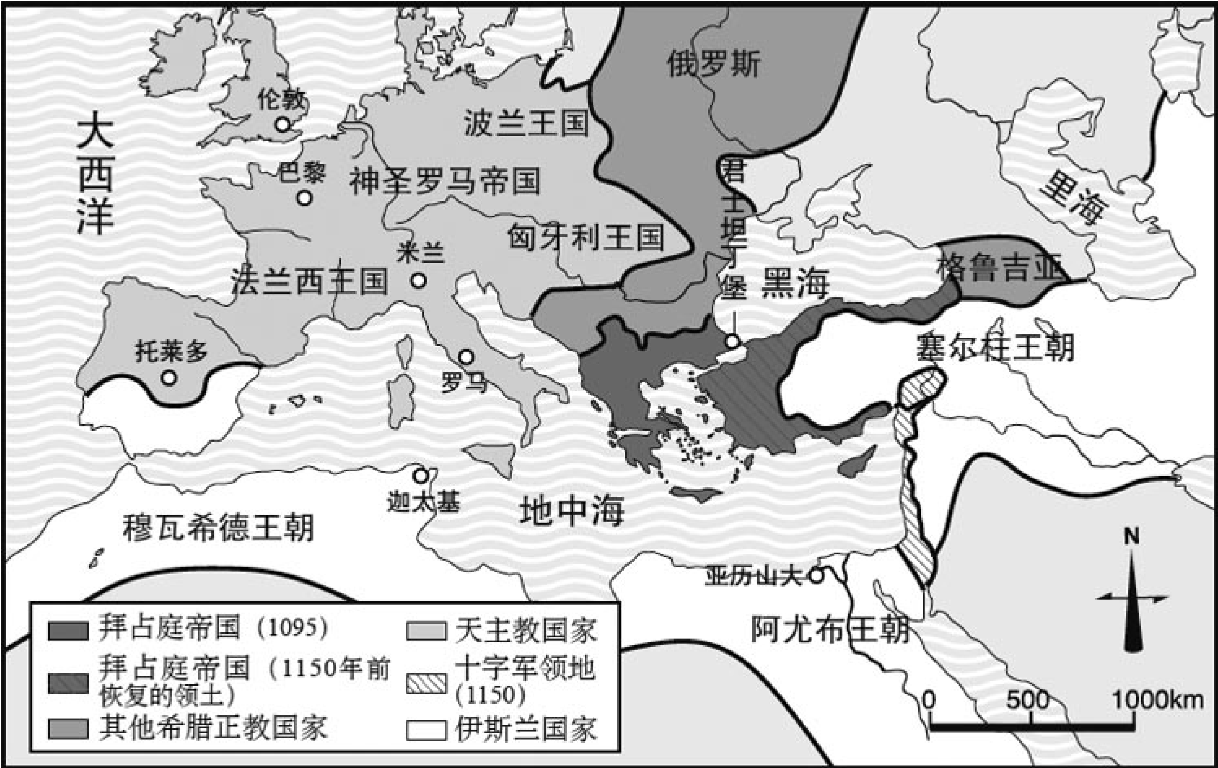
1.公元395年前后的东罗马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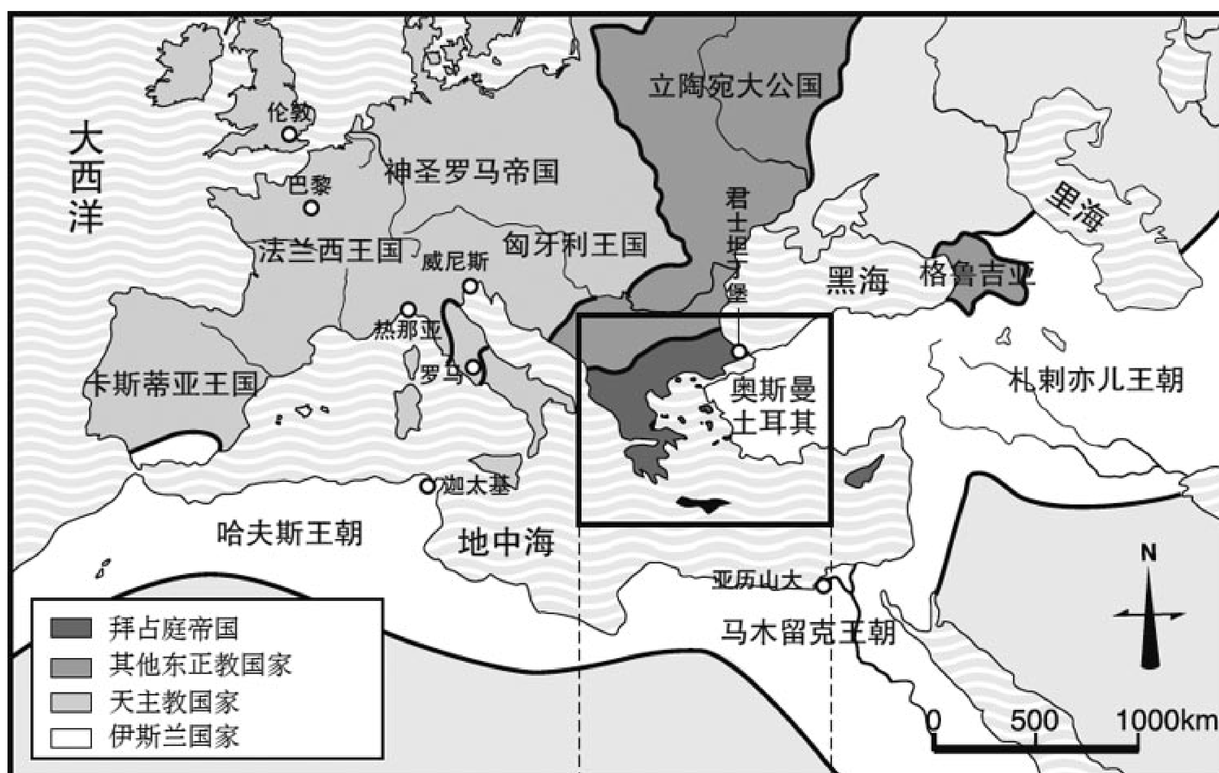
2.公元565年查士丁尼大帝去世当年的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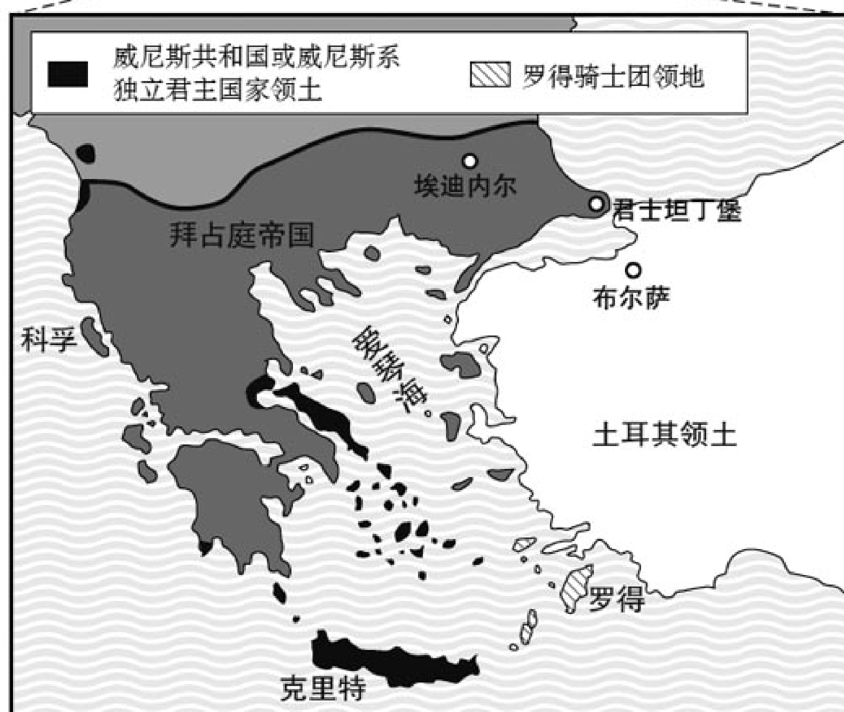


3.公元**740**年前后的伊斯兰势力范围（选自**A. Giardina, G. Sabbatucci, V.Vidotto, Manuale di Storia, Vol.1: II Mideoev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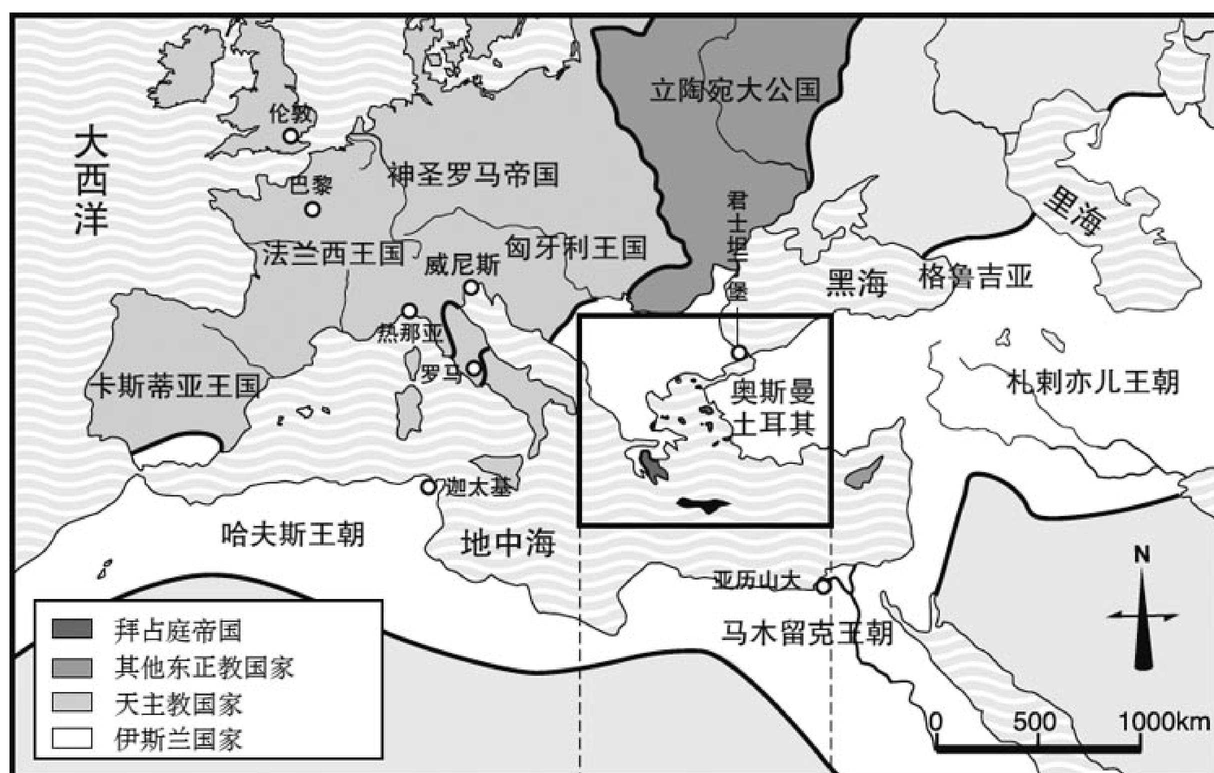


4.十字军时代的拜占庭帝国（公元**1180**年前后）





5.公元1340年前后的拜占庭帝国





6.灭亡前夕的拜占庭帝国（**1453**）

大事年表

<table>
<tr><th>公元</th><th>西罗马帝国
（意大利、莱茵河流域、高卢、不列颠尼亚、西班牙、北非）</th><th>东罗马帝国
（中东、小亚细亚、埃及、巴尔干、多瑙河流域）</th><th>其他各国</th></tr>
<tr><td rowspan="2">395</td><td colspan="2">狄奥多西皇帝任命汪达尔人出身的斯提利科为军队总司令。
1 月 7 日，狄奥多西皇帝逝世。帝国东部由长子阿卡狄乌斯、西部由次子霍诺里乌斯继承。自此，罗马帝国东西分离。
西哥特人以阿拉里克为统帅入侵巴尔干地区，斯提利科率罗马军队迎战，因东罗马帝国宰相鲁非努斯作梗而退兵。</td><td>（日本）古坟时代。
（朝鲜）高句丽，好太王即位（391）</td></tr>
<tr><td></td><td>11 月 27 日，在君士坦丁堡的阅兵式上，鲁非努斯被士兵刺杀。</td><td></td></tr>
<tr><td>396</td><td></td><td>阿拉里克率兵再次入侵巴尔干地区，把侵略之手伸向希腊全境。</td><td>（朝鲜）高句丽，进攻百济，占领其北部（396）</td></tr>
<tr><td>397</td><td>奥古斯丁被选为北非希波·雷吉乌斯主教。
春，斯提利科率军从意大利出发，奔赴希腊。
负责阿非利加的大元帅吉尔多宣示效忠东罗马皇帝阿卡狄乌斯。北非禁止向意大利出口粮食。
罗马元老院宣布吉尔多为公敌。</td><td>斯提利科的西罗马军队击退阿拉里克。东罗马帝国皇帝阿卡狄乌斯任命逃过一命的阿拉里克为负责罗马帝国伊利里亚地方的大元帅。</td><td></td></tr>
<tr><td>398</td><td>派遣吉尔多的亲弟弟马西泽尔讨伐吉尔多。吉尔多的部队战前投降，吉尔多被杀。</td><td></td><td></td></tr>
<tr><td>401</td><td>秋，居住在多瑙河上游北边的蛮族入侵行省雷蒂亚。斯提利科率军前往击退入侵。
阿拉里克率西哥特人入侵意大利北部。</td><td>帝国内部排斥蛮族、异端运动激化。
哥特人出身的东罗马军队司令盖纳斯失势被杀。</td><td></td></tr>
<tr><td>402</td><td>斯提利科回师意大利，致力于讨伐阿拉里克。
4 月 6 日，斯提利科军在波伦佐与阿拉里克军会战。会战以斯提利科军获胜而告终，阿拉里克逃回巴尔干。
斯提利科致力于完善防御体系直到翌年，把高卢的罗马军队根据地从特里尔移到法国南部的阿尔勒。</td><td></td><td></td></tr>
<tr><td>404</td><td>秋，罗马举行纪念斯提利科战功的凯旋仪式。
西罗马帝国皇帝的根据地从米兰移到拉文纳。</td><td></td><td></td></tr>
</table>

（续）

公元	西罗马帝国 （意大利、莱茵河流域、高卢、不列颠尼亚、西班牙、北非）	东罗马帝国 （中东、小亚细亚、埃及、巴尔干、多瑙河流域）	其他各国
405	秋，以拉达加伊索率领的东哥特人为首的日耳曼系蛮族入侵西罗马帝国。		
406	5 月，斯提利科立法使征召奴隶士兵成为可能。 6 月，西罗马军队在意大利中部与拉达加伊索率领的蛮族对战。斯提利科指挥的西罗马军队围攻蛮族军队。 8 月 23 日，蛮族军队投降，战斗以西罗马军队的胜利告终。 12 月，日耳曼系蛮族渡过莱茵河，再度入侵高卢。		
407	僭称君士坦丁三世的士兵率领驻屯在不列颠尼亚的罗马士兵开始进入高卢。 秋，斯提利科派遣讨伐军进入高卢。		
408	斯提利科公布与西哥特人族长阿拉里克进行的同盟交涉。元老院经讨论，同意与阿拉里克的同盟协约。 斯提利科的长女，霍诺里乌斯皇帝的皇后玛利亚去世。斯提利科将次女嫁给霍诺里乌斯续弦。 霍诺里乌斯皇帝访问帕维亚军事基地时，当地的斯提利科派高级军官遇害。 8 月，斯提利科去拉文纳谒见霍诺里乌斯皇帝，被以叛逆罪处死。 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人从巴尔干入侵意大利，封锁罗马，要求履行协约。罗马元老院同意支付巨额金银和物品，封锁解除。	5 月，阿卡狄乌斯皇帝去世。皇子狄奥多西二世继位，母亲优多克西娅摄政。	
409	夏，阿拉里克率领西哥特人开始再度围攻罗马。		
410	8 月 24 日，西哥特人进入罗马市内，开始历时 5 天的“罗马浩劫”。霍诺里乌斯皇帝的妹妹加拉·普拉西提阿被西哥特人掳走。 霍诺里乌斯皇帝下诏将行省防御交给各行省自理。 阿拉里克在离开罗马前往意大利南部途中去世。阿道法斯继位，成为西哥特人族长。 阿道法斯在高卢南部与加拉·普拉西提阿举行婚礼，霍诺里乌斯皇帝不予承认。		
411	霍诺里乌斯皇帝开始复兴因浩劫而荒废的罗马（—417）。 冬，进入高卢的君士坦丁三世被部下刺杀，不列颠尼亚兵陷入混乱。		

（续）

公元	西罗马帝国 （意大利、莱茵河流域、高卢、不列颠尼亚、西班牙、北非）	东罗马帝国 （中东、小亚细亚、埃及、巴尔干、多瑙河流域）	其他各国
412	霍诺里乌斯皇帝派君士坦提乌斯将军赴高卢，率不列颠尼亚士兵平定蛮族。		
			（朝鲜）高句丽建好太王碑（414）
415	西哥特人族长阿道法斯被杀。加拉·普拉西提阿回到意大利。 君士坦提乌斯与加拉·普拉西提阿结婚。 西罗马帝国与西哥特人结为同盟，决定让西哥特人定居高卢西部。		
419	君士坦提乌斯与加拉·普拉西提阿育子，被命名为瓦伦提尼安三世。		
			（中国）刘裕灭东晋，兴宋（420）
421	1 月，霍诺里乌斯皇帝指名君士坦提乌斯为共治皇帝。 8 月，君士坦提乌斯去世。 加拉·普拉西提阿携子瓦伦提尼安三世移往东罗马帝国。		
423	秋，霍诺里乌斯皇帝去世。		
425	瓦伦提尼安三世皇帝和母亲加拉·普拉西提阿回到西罗马帝国。 加拉·普拉西提阿提拔波尼法提乌斯将军担任皇帝侍卫长，同时担任负责北非的大元帅。任命埃提乌斯将军为负责高卢的大元帅。		
427	加拉·普拉西提阿向波尼法提乌斯发出召回令，波尼法提乌斯拒绝接受。加拉·普拉西提阿向北非派遣以哥特人为主的讨伐军。		
429	波尼法提乌斯向汪达尔人请求援军。以根西里克为族长的汪达尔人从西班牙举族前往北非。 波尼法提乌斯怀柔讨伐军，尝试共同迎战汪达尔人。		
430	8 月，汪达尔人攻陷北非主要城市希波·雷吉乌斯。波尼法提乌斯逃往意大利。 希波·雷吉乌斯主教奥古斯丁去世。		

（续）

公元	西罗马帝国 （意大利、莱茵河流域、高卢、不列颠尼亚、西班牙、北非）	东罗马帝国 （中东、小亚细亚、埃及、巴尔干、多瑙河流域）	其他各国
432	波尼法提乌斯在意大利北部里米尼附近的平原与埃提乌斯对决。埃提乌斯获胜，波尼法提乌斯战死。 加拉·普拉西提阿任命埃提乌斯为“联军总司令”。		
437	瓦伦提尼安三世皇帝与东罗马帝国狄奥多西二世皇帝的女儿结婚。		
439	迦太基陷落，汪达尔人统治北非全境。		（中国）北魏统一长江以北。南北朝时代开始。
442	西罗马帝国与汪达尔人媾和，汪达尔人占领北非得到承认。		
444		匈奴人的阿提拉因兄长之死而统帅整个部族。 阿提拉率领匈奴人入侵东罗马帝国，直逼君士坦丁堡。	
447		东罗马帝国缔结承认匈奴人为“同盟”的协约。	
450	加拉·普拉西提阿去世。 加拉的女儿、瓦伦提尼安三世皇帝的姐姐霍诺丽亚娅派使者前往阿提拉处求婚，阿提拉接受，瓦伦提尼安三世拒绝。	7 月 28 日，狄奥多西二世皇帝去世。事实上的最高权力者皇姐普尔喀丽娅指名元老院议员马尔基安继位。普尔喀丽娅与马尔基安结婚。	
451	阿提拉率领的匈奴人渡过莱茵河中游入侵高卢。 埃提乌斯与以西哥特人为首的日耳曼各族交涉共同作战。 6 月 24 日，西罗马帝国军队在香槟平原与匈奴人会战（“沙龙会战”）。西罗马帝国获胜，匈奴人从高卢撤退。 秋，匈奴人进攻意大利。		
452	匈奴人掠夺意大利北部全境。 秋，罗马主教利奥率元老院议员面见阿提拉，请求其退出意大利。阿提拉承诺，匈奴人回到多瑙河以北。		
453	阿提拉去世。		

（续）

公元	西罗马帝国（意大利、莱茵河流域、高卢、不列颠尼亚、西班牙、北非）	东罗马帝国（中东、小亚细亚、埃及、巴尔干、多瑙河流域）	其他各国
454	埃提乌斯向瓦伦提尼安三世皇帝为自己的儿子与皇帝的女儿提亲。瓦伦提尼安三世皇帝震怒，刺死埃提乌斯。		（日本）古坟时代。
455	3 月 16 日，瓦伦提尼安三世皇帝在罗马的阅兵式上遇刺。罗马元老院选出元老院议员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穆斯继位。 北非的根西里克率领汪达尔人在意大利登陆，压制奥斯提亚。 6 月，马克西穆斯皇帝被杀。 6 月 15 日，罗马主教利奥造访根西里克。汪达尔人发动“罗马浩劫”（直到 29 日）。 阿维图斯在高卢被拥立为皇帝。		
456	阿维图斯进入意大利被杀。		
457	蛮族出身的军人马约里安被选为皇帝。马约里安意欲加强西班牙的海军力量，计划远征北非。	马尔基安皇帝去世。军人利奥被选为继任皇帝。	
461	马约里安皇帝被杀。塞维鲁被选为继任皇帝。		
465	塞维鲁皇帝去世。在宫廷官僚里西默操纵下，东罗马帝国前皇帝马尔基安的女婿安特米乌斯登上帝位。		
467	安特米乌斯皇帝进入罗马，举行加冕礼。		
468	东西罗马帝国并肩作战，共派军队镇压北非的汪达尔人。 罗马帝国军队中了根西里克的奸计，在迦太基全军覆没。		
		利奥皇帝与根西里克缔结媾和协约。	
472	3 月，宫廷官僚里西默将奥利布里乌斯扶上帝位。 7 月，安特米乌斯的军队与奥利布里乌斯和里西默的军队在罗马市内决战。 7 月 11 日，安特米乌斯战死。 8 月 20 日，里西默病死。 10 月 23 日，奥利布里乌斯遭暗杀。		
473	格利西里乌斯登上帝位。		
474		东罗马帝国指名达尔马提亚大元帅尤里乌斯·尼波斯为西罗马帝国皇帝。	

（续）

公元	西罗马帝国 （意大利、莱茵河流域、高卢、不列颠尼亚、西班牙、北非）	东罗马帝国 （中东、小亚细亚、埃及、巴尔干、多瑙河流域）	其他各国
475	10月31日，宰相奥列斯特的儿子罗穆路斯·奥古斯都登上帝位。	东罗马帝国皇帝芝诺被赶下帝位。	
476	蛮族出身的奥多亚克将军反叛。 9月，奥多亚克战胜皇帝的军队，奥列斯特被杀，罗穆路斯·奥古斯都被迫退位。**西罗马帝国灭亡**。 奥多亚克称意大利王。	芝诺重登帝位。	
477	汪达尔人族长根西里克去世。		
			（中国）萧道成灭宋，建立齐国（479）
481	克劳德维克任法兰克王（直到511）。		
488		狄奥多里克率东哥特人西进。	
489	4月28日，奥多亚克军队与东哥特军队在意大利北部索查河作战。狄奥多里克率领的东哥特军队获胜。		
490	8月11日，奥多亚克的军队与东哥特军队在米兰附近再次交战，奥多亚克战败后逃进拉文纳。东哥特军队开始对拉文纳发动攻城战。		
493	5月，奥多亚克与狄奥多里克缔结媾和协约，其后奥多亚克被杀。狄奥多里克掌权意大利。		
500	狄奥多里克访问罗马，受到市民欢迎。		
			（中国）齐灭，梁建国（502）。
525	元老院议员阿尔比乌斯被告发暗通东罗马帝国皇帝，企图在意大利清除包括狄奥多里克在内的阿里乌斯教派。 重臣波伊西乌斯为阿尔比乌斯辩护遭软禁。		
526	波伊西乌斯被处死。 8月，狄奥多里克去世。		
527		4月4日，查士丁尼被伯父查士丁任命为共治皇帝。 8月1日，查士丁皇帝去世。查士丁尼成为一人皇帝。 《罗马法典》开始编纂。	
529	本笃建立修道院。		

（续）

公元	西罗马帝国 （意大利、莱茵河流域、高卢、不列颠尼亚、西班牙、北非）	东罗马帝国 （中东、小亚细亚、埃及、巴尔干、多瑙河流域）	其他各国
533	9 月 15 日，贝利撒留进入迦太基城。汪达尔王国灭亡。	查士丁尼皇帝命令贝利撒留将军开始收复旧西罗马帝国领土。 6 月，贝利撒留及其部队从君士坦丁堡出发赴北非。 秋,贝利撒留凯旋君士坦丁堡。	
535		贝利撒留被选为执政官。 秋，查士丁尼皇帝再次派遣贝利撒留去西部。	
536	春，贝利撒留在意大利半岛登陆。 贝利撒留攻占意大利南部城市。哥特人逃往意大利北部。 12月10日,贝利撒留率领拜占庭军队进入罗马城。 宫廷官僚卡西多里乌斯辞去公职，在意大利南部建 Vivarium 学园。		
537	哥特人南下，开始进攻罗马城。		
538	3 月，贝利撒留守住罗马城，迫使哥特人媾和。		（日本）这个时期，佛教由百济传来。
		查士丁尼皇帝把宫廷官僚纳尔塞斯作为将军派往意大利。	
539	贝利撒留攻占拉文纳,东哥特国王维提吉斯投降。 为应对波斯的紧张局势，贝利撒留被召回君士坦丁堡。		
		贝利撒留被派往东方，指挥与波斯的战争。	
540	秋，哥特人新选托提拉为国王，再度集结，开始入侵意大利半岛。		
544		秋，查士丁尼皇帝再次派遣贝利撒留赴意大利。	
546	哥特人占领罗马。贝利撒留率军从奥斯提亚逆台伯河而上，直逼罗马。 12 月，罗马城墙遭到破坏，哥特人侵入市内。元老院被废除。		
547	2 月，贝利撒留进入罗马。后奉查士丁尼皇帝之命进军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肃清哥特人。		

548	贝利撒留接到撤回君士坦丁堡的命令。		

（续）

公元	西罗马帝国 （意大利、莱茵河流域、高卢、不列颠尼亚、西班牙、北非）	东罗马帝国 （中东、小亚细亚、埃及、巴尔干、多瑙河流域）	其他各国
552	夏，纳尔塞斯率领以伦巴底族为主力的军队与哥特人决战并获胜。	查士丁尼皇帝派纳尔塞斯赴意大利。	
553	春，拜占庭与哥特决战。纳尔塞斯率领的拜占庭军队获胜，在意大利肃清哥特人。		
			（中国）陈霸先灭梁，建陈（575）。
559		贝利撒留在巴尔干与蛮族作战并获胜，回到君士坦丁堡。	
561		贝利撒留批评查士丁尼皇帝。	
563	贝利撒留被判没收全部财产和在家监禁，半年后改判无罪。		
565		3 月 13 日，贝利撒留去世。 11 月 14 日，查士丁尼皇帝逝世。	
568	纳尔塞斯去世。 伦巴底人南下，攻取意大利。		
			（日本）苏我马子杀物部守屋（587）。 （中国）陈灭，隋统一中国全境（589）。 （日本）圣德太子摄政（593）。
613		先知穆罕默德开始布教。	
636		叙利亚伊斯兰化。	
642		埃及伊斯兰化。	
650		阿拉伯人入侵小亚细亚，直逼君士坦丁堡。	
670	北非伊斯兰化。		
698	迦太基被伊斯兰攻陷。		
1453		5 月 29 日，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攻陷。东罗马帝国灭亡。	

参考文献

《原史料（同時代人の記述ないし著作）》

Ambrosius　アンブロシウス

De obitu Theodosii, 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Latinorum（CSEL）Vol. LXXIII; De obitu Valentiniani, CSEL Vol. LXXIII; Epistulae XL, Patrologia Latina（PL）Vol. XVI.

Augustinus　アウグスティヌス

De civitate Dei libri XXII, PL Vol. XLVIII; Epistulae, PL Vol. XXXIII など、手紙、説教を含む全著作。日本語訳は『神の国』（岩波文庫、1982-91年、服部英次郎他訳、全５冊：『告白』（岩波文庫、1976年、服部英次郎訳、全２冊）など

Symmachus, Aurelius　シンマクス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Auctores Antiquissimi（MGH, AA） Vol. VI（O. Seeck編）.

Victor, Aurelius　アウレリウス・ヴィクトル

Epitome de Caesaribus, Leipzig, 1911（Pichlmayer編）.

Cassiodoros　カシオドロス

Chronicon, MGH, AA Vol. XI（Th. Mommsen編）; Variae, MGH, AA Vol. XII（Th. Mommsen編）.

Chronica Minora saec. IV, V, VI, VII（3 vols.）, MGH, AA Vols. IX, XI, XIII.

Berlin, 1892-98 (Th. Mommsen編).

Claudianus, Claudius　クラウディアヌス

Invectives contre Eutrope, MGH, AA Vol. X, Paris, 1933 (Th. Birt編); De bello Gildonico; De bello Pollentino sive Gothico; De consolatu Stilichonis; Epithalamium de niptiis Honorii Augustii; Fescennia da nupitiis Honorii Augustii; In Eutropium; In Rufinum; Panegyricus de quarto consolatu Honoriis Augusti; Panegyricus de sexto consolatu Honoriis Augusti, Panegyricus de tertio consolatu Honorii Augusti, MGH, AA Vol. X, Paris, 1892 (Th. Birt編).

Codex Theodosianus, Lyon, 1665 (J.Gothofredus編); 同書, Berlin, 1905 (Th. Mommsen & P.M. Meyer編).

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 (CIL), Berlin, 1863.

Corpus Iuris Civilis (Institutiones, Digesta, Codex Iustinianus, Novellae), Berlin, 1912-22, (Mommsen, Krueger, Schoell, Kroll編).

Corpus legum ab imperatoribus romanis ante Iustinianum latarum, Leipzig, 1857 (G. Haenel編).

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Latinorum (CSEL) Vol. V, Wien, 1882 (Zangemeister編).

Epigraphica,《Rivista italiana di epigrafia》, Milano, 1939-.

Eunapius　エウナピウス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IV, Leipzig, 1870 (C. Mueller編).

Eusebius　エウセビウス

Historia Ecclesiastica; Vita Constantini, Berlin, 1903-0 (E. Schwartz編). 日本語訳は『教会史』(山本書店、秦剛平訳、1986-88、全三冊)、『コンスタンティヌスの生涯』(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秦剛平訳、2004)

Eutropius　エウトロピウス

Breviarium ab Urbe condita, Leipzig, 1887 (F. Ruehl編).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FHG) (5 Vols.), Paris, 1841-84 (C. Mueller & Th. Mueller編).

Georgius　ゲオルギウス

Historia Francorum, MGH, Scriptores rerum Merovingicarum Vol. I, Paris, 1884 (W. Arndt編).

Heronimus　ヒエロニムス
In Rufinum, PL Vol. XXIII; Epistolae（完録版） PL Vols. XXII-XXX, Vienna, 1910-18.
Isidorus　イシドルス
Historia Vandalorum, MGH, AA Vol. XI; Historia vel Origo Gothorum, MGH, AA Vol. II.
Libanius　リバニウス
R. Foerster, Libanii opera（12 vols.）, Leipzig, 1903-27（R. Foerster編）.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ae, Auctores Antiquissimi（MGH, AA）.
Marcellinus, Ammianus　マルケリヌス
Rerum gestarum libri（Clark編）, Berlin, 1910（伊訳）; Historiae,（A. Selem編）, Milano, 1994.
Namatianus, Rutilius　ナマティアヌス
De reditu suo, Milano, 1992（A. Fo編）.
Orosius, Paulus　オロシウス
Historiae adversus paganos libri VII, Wien, 1882.
Panegyrici latini veteres, Leipzig, 1911（E. Baehren編）.
Patrologia Greca（PG）, Paris, 1857（J.P. Migne編）.
Patrologia Latina（PL）, Paris, 1878（J.P. Migne編）.
Paulus Diaconus　パウルス・ディアコヌス
Historia Langobardorum（羅伊対訳 Storia dei Longobardi, Milano, 1991）. ロンゴバルド族出身者がラテン語で書いたロンゴバルド族とその時代の歴史
Procopius　プロコピウス
Anecdota（伊訳 Storia segreta, Roma, 1972）; Polemon（伊訳 Le guerre persiana, vandalica, gotica, Torino, 1977）.
Regesten der Kaiser und Paepste fuer die Jahre 311 bis 476 n. Chr., Stuttgart, 1919（O. Seeck編）.
Rufius, Festus　ルフィヌス
Festi Breviarium rerum gestarum populi Romani, Leipzig, 1886（C. Wagener編）.
Sidonius Apollinaris　シドニウス・アポロナリス

Camina, MGH, AA Vol. VIII, Berlin, 1887 (C. Lütjohann編).
Socrates　ソクラテス（紀元４世紀—５世紀の教会史家）
Historia Ecclesiastica, PG Vol. LXVII.
Vegetius, Flavius　ヴェゲティウス
Epitoma rei militaris（羅伊対訳：L'arte della guerra romana, Milano, 2003).
Zosimus　ゾシムス
'Ιστορία νέα, Leipzig, 1887 (L. Mendelssohn編).
作者不明（帝政末期の人）
De Rebus Bellicis（羅伊対訳 Le cose della guerra, Milano, 1989).

《後世の研究著作》

Aalberg, N., *Die Franken und Westgothen in der Völkerwanderungszeit*, Upsala, 1932.

Adriani, M., *Tolleranza e intolleranza religiosa nella Roma antica*,《Studi Romani》6, 1958; *Il concetto di tolleranza religiosa nella storia delle religioni*,《Cultura e Scuola》1, 1961.

Aegyptus, Rivista italiana di Egittologia e di Papirologia, Milano, 1920刊行開始.

Agnello, S.L., *Silloge di iscrizioni paleocristiane della Sicilia*, Roma, 1953.

Albertini, E., *L'Empire Romain*, Paris, 1929.

Albertoni, G., *L'Italia carolingia*, Roma, 1997.

Alföldi, A., *On the foundation of Constantinople, a few notes*,《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JRS)》37, 1947; *The conversion of Constantine and pagan Rome*, Oxford, 1948; *A conflict of ideas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the clash between the Senat and Valentinian I*, Oxford, 1952.

Alföldy, G., *Noricum*, London, 1974; *The Social History of Rome*, London, 1985.

Allard, P., *La persécution de Dioclétien*, Paris, 1908; *Storia critica delle persecuzioni*, Firenze, 1913-18 (伊訳).

Altheim, F., *Attila und die Hunnen*, Baden-Baden, 1951; *Römische Religionsgeschichte II*, Milano, 1960 (伊訳).

Amari, M., *Storia dei Musulmani in Sicilia* (3 voll.), Catania, 1933-39.

Amatucci, G.A.,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romana*, Napoli, 1912-16;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latina cristiana*, Bari, 1929.

Amory, P., *People and Identity in Ostrogothic Italy*, Cambridge, 1997.

Andreoli, A., *Contributo topografico alla battaglia dei Campi Catalaunici*, 《Historia》 1, 1927.

Frank, T.（編）, *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6 vols.）, Baltimore, 1933-40.

Angenendt, A., *Studien zu Pirmin und den monastischen Vorstellungen des frühen Mittelalters*, München, 1972.

Anton, H., *Der König und die Reichskonzilien im westgotischen Spanien*, 《Historisches Jahrbuch》 92, 1972.

Arce, J., *El último siglo de la Hispania romana*, Madrid, 1986.

Arquillière, H., *L'Augustinisme politique. Essai sur la formation des théories politiques du moyen âge*, Paris, 1934.

Atti del IV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Archeologia Cristiana, Città del Vaticano, 1940.

Ausenda, G.（編）, *After Empire. Towards an Ethnology of Europe's Barbarians*, Woodbridge, 1995.

Azzara, C., *Gregorio Magno, i Longobardi e l'Occidente barbarico. Costanti e peculiarità di un rapporto*, 《Bullettino dell'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vo e Archivio muratoriano》 97, 1991; *L'ideologia del potere regio nel papato altomedievale (secoli VI-VIII)*, Spoleto, 1997.

Balducci, C., *La politica di Valentiniano III*, Bologna, 1934.

Baratta, M., Fraccaro P. & Visintin, L., *Grande atlante geografico, storico, fisico, politico, economico*, Novara, 1939（45枚の図版つき）.

Barbagallo, C., *Lo Stato e l'istruzione pubblica nell'Impero Romano*, Catania, 1911; *Giuliano l'Apostata*, Genova, 1912; *Storia Universale, Vol. II-2: Roma antica. L'Impero*, Torino, 1932.

Barker, E., *L'Italia e l'Occidente dal 410 al 476*, 《Storia del mondo medievale》 1, Milano, 1978.

Barnes, T.D., "*Patricii*" *under Valentinian III*, 《Phoenix》, 1975.

Baron, S.W., *Histoire d'Israel*, Paris, 1957.

Barra, G., *Acta Martyrum*, Torino, 1945.

Bartoli, A., *Il senato romano in onore di Ezio*, 《Rendiconti della pontificia accademia romana di archeologia》 22, 1946-47.

Bartolini, E., *I barbari, Le invasioni barbariche nel racconto dei contemporanei*, Milano, 1982.

Bassett, S. (編), *The Origins of Anglo-Saxon Kingdoms*, London-New York, 1989.

Bayet, J., *Histoire politique et psychologique de la religion romaine*, Paris, 1959 (伊訳).

Bayless, W.N., *The Visigothic Invasion of Italy in 401*, 《Classical Journal》 72, 1976.

Baynes, N.H., *Constantine the Great*, London, 1929.

Beaujeu, J., *La religion romaine à l'apogée de l'empire Vol. I: La politique religieuse des Antonins*, Paris, 1955.

Beck, H.G., *Kirche und theologische Literatur im byzantinischen Reich*, München, 1959; *Konstantinopel–das neue Rom*, 《Gymnasium》 71, 1964; *Konstantinopel. Zur Sozialgeschichte einer frü hmittelalterlichen Hauptstadt*, 《Byzantmische Zeitschrift》 58, 1965.

Beloch, J., *Der Verfall der antiken Kultur*,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84, 1900.

Bertolini, O., *Roma di fronte a Bisanzio e ai Longobardi*, 《Storia di Roma》 4, Bologna, 1941; *Storia Universale Vol. III-1: I Germani, migrazioni e regni nell'Occidente già romano*, Milano, 1959-65.

Bloch, G., *L'empire romain. Evolution et décadence*, Paris, 1922.

Boak, A.E.R., *Manpower Shortage and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West*, London, 1955.

Bognetti, G.P., *L'età longobarda* (4 voll.), Milano, 1966-68.

Boissier, G., *La fin du paganisme*, Paris, 1891.

Bouché-Leclercq, A., *L'intolerance religieuse et la politique*, Paris, 1911.

Brion, M., *La vie d'Attila*, Paris, 1933; *Theoderic*, Paris, 1935.

Brogiolo, G.P., & Gelichi, S., *La città nell'alto medioevo italiano. Archeologia e storia*, Roma-Bari, 1998.

Brown, P.,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From Marcus Aurelius to Muhammad*, London, 1971;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Saint Augustine*, London, 1972.

Bühler, J., *Die Germanen in der Völkerwanderung*, Leipzig, 1922.

Bugiani, C., *Storia di Ezio generale dell'Impero sotto Valentiniano III*, Firenze, 1905.

Bulic, F., *L'imperatore Diocleziano*, Spalato, 1916

Buonaiuti, E., *Sant'Ambrogio*, Roma, 1926.

Burckhardt, J., *Das Zeit Constantins des Grossen*, Stuttgart, 1929.

Burns, T.S., *A History of the Ostrogoths*, Bloomington, 1984.

Bury, J.B.,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Arcadius to Irene*, London, 1889; *The Provincial List of Verona*, 《JRS》 13, 1923;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 (2 vols.), London, 1923; *The Invasion of Europe by the Barbarians*, New York, 1967.

Calderini, A., *Aquileia romana*, Milano, 1930; *Manuale di Papirologia*, Milano, 1938.

Calza, G., *La statistica delle abitazioni e il calcolo della popolazione in Roma imperiale*, 《Rendiconti dei Lincei》, 1917.

Cameron, A., *Theodosius the Great and the Regency of Stilicho*, 《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73, 1969; *Claudian: Poetry and Propaganda at the Court of Honorius*, Oxford, 1970; *Circus Factions. Blues and Greens at Rome and Byzantium*, Oxford, 1976; *Il tardo impero romano*, Bologna, 1995; *Un impero, due destini. Roma e Costantinopoli fra il 395 e il 600 d.C.*, Genova, 1997.

Cantarelli, L., *Annali d'Italia dal 455 al 476*, 《Studi e Documenti di Storia e Diritto》, 1896; *La Diocesi Italiciana*, Roma, 1903.

Caravale, M., *Ordinamenti giuridici dell'Europa medievale*, Bologna, 1994.

Carcopino, J., *Aspects mystiques de la Rome païenne*, Paris, 1941.

Carraresi, G., *Cronologia generale dell'era volgare dall'anno 1 all'anno 2000*, Firenze, 1875.

Carrington, P., *The Early Christian Church*, Cambridge, 1957.

Carson, R.A.G., Kent, J. P. C. & Burnett, A. M., *The Roman Imperial Coinage X*, London, 1994.

Carson, R.A.G., Hill, P.V. & Kent, J.P.C., *Late Roman Bronze Coinage, A.D. 324-498*, London, 1965.

Cecchelli, C., *Mausolei imperiali e reali del Basso Impero e dell'alto Medioevo*, 《Atti del III Convegno Nazionale di Storia dell'Architettura》, Roma, 1941.

Cerfaux, L., & Tondriau, J., *Un concurrent du Christianisme*, Paris-Roma, 1956.

Cesa, M., *Impero tardoantico e barbari: la crisi militare da Adrianopoli al 418*, Como, 1994.

Cessi, R., *Marcellino e l'opposizione imperiale romana sotto il governo di Maioriano*, 《Atti del R. Istituto Veneto》, 1915-16; *La crisi imperiale degli anni 454-455 e l'incursione vandalica in Roma*, 《Archivio Società Romana di Storia Patria》 40, 1917; *Regnum e imperium in Italia*, Bologna, 1919.

Chadwick, N., *The Celts*, Harmondsworth, 1970.

Chastagnol, A., *Observations sur le consulat suffect et la préture du Bas-Empire*, 《Revue historique (RH)》 219, Paris, 1958; *La préfecture urbaine à Rome sous le Bas-Empire*, Paris, 1960; *Les fastes de la préfecture de Rome au Bas-Empire*, Paris, 1962; *Lesénat romain sous le règne d'Odoacre. Recherches sur l'epigraphie du Coliseé au V siècle*, Bonn, 1966; *Le Bas-Empire*, Paris, 1969; *L'evolution de l'ordre sénatorial aux III et IV siècles de notre ère*, 《RH》 496, Paris, 1970; *Le recrutément des sénateurs au IV siècle, in Recherches sur le structures sociales dans l'Antiquité classique* (Colloque de Caen, aprile 1969), Paris, 1971; *La fin du monde antique. De Stilicon à Justinien*, Paris, 1976.

Chenon, E., *Etude historique sur le defensor civitatis*, Paris, 1889.

Christlein, R., *Die Alamannen. Archäologie eines lebendigen Volkes*, Stuttgart-Aalen, 1979.

Chrysos, E.K., & Schwarcz, A., *Das Reich und die Barbaren*, Wien-Köln, 1989.

Ciccotti, E., *Il tramonto della schiavitù nel mondo antico*, Torino, 1899; *Motivi demografici e biologici nella rovina della civiltà antica*, 《Nuova Rivista Storica》, 1930.

Cilento, N., *L'Italia meridionale longobarda*, Milano-Napoli, 1966.

Claude, D., *Die byzantinische Stadt im 6. Jahrhundert*, München, 1969.

Clover, F.M., *Geiseric the Statesman: A Study of Vandal Foreign Policy*, Chicago, 1966.

Cohen, H., *Description historique des monnaies frappées sous l'Empire Romain*, Paris, 1880-92.

Contamine, Ph., *La guerre au Moyen Age*, Paris, 1980.

Costa, G., *Graziano il cristianissimo*, 《Religione e politica nell'Impero Romano》

[illegible], «Religione e politica nell'Impero Romano»,
Torino, 1923.

Costanzi V., *La rivolta di Pavia e la catastrofe di Stilicone,* 《Bull. della Società Pavese di Storia Patria》, 1904.

Courcelle, P., *Histoire littéraire des grandes invasions germaniques,* Paris, 1948.

Courtois, C., *Les Vandales et l'Afrique,* Paris, 1955.

Cracco Ruggini, L., *Economia e società nell'Italia annonaria. Rapporti fra agricoltura e commercio dal IV al VI secolo d.C.,* Milano, 1961; *Il paganesimo romano tra religione e politica (384-394 d.C.): per una reinterpretazione del Carmen contra paganos,* 《Atti della 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Rendiconti Classe di Scienze morali, storiche e filologiche》 376, Roma, 1979; *La fine dell'impero e le trasmigrazioni dei popoli,* La storia, Milano, 1993.

Cumont, F., *Les religions orientales dans le paganisme romain,* Paris, 1929.

Dagron, G., *La città bizantina, in Modelli di Città. Strutture e funzioni politiche* (Pietro Rossi編), Torino, 1987; *La romanité chrétienne en Orient. Héritages et mutations,* London, 1984.

Dalton, O.M., *Byzantine Art and Archaeology,* Oxford, 1911; *East Christian Art,* Oxford, 1925.

Daniel, N., *Gli Arabi e l'Europa nel medioevo,* Bologna, 1981.

De Bacci Venuti, T., *Dalla grande persecuzione alla vittoria del Cristianesimo,* Milano, 1913.

De Labriolle, P., *La réaction payenne. Étude sur la politique antichrétienne du I au VI siécle,* Paris, 1934.

Delbrück, H.,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The Barbarian Invasion Vol. II,* Lincoln-London, 1980.

Delbrueck, R., *Antike Porphyrwerke,* Berlin, 1932.

De Lepper, J.L.M., *De rebus gestis Bonifatii comitis Africae et magistri militum,* Tillburg-Breda, 1941.

Delogu, P., Guillou, A., & Ortalli, G., *Longobardi e Bizantini,* Torino, 1980.

Demandt, A., *Die Kelten,* München, 1998.

Demougeot, E., *Note sur la politique orientale de Stilicon, de 405 à 407,* 《Byzantion》 20, 1950; *De l'unité à la division de l'Empire romain, 395-410. Essai sur le gouvernement impérial,* Paris, 1951; *La formation de l'Europe et les invasions barbares Vol. II,* Paris, 1969; *Constantin III, l'empereur d'Arles,* Montpellier, 1974.

De Regibus, L., *Politica e religione da Augusto a Costantino*, Genova, 1953.

De Rossi, G.B., *Inscriptiones Christianae Urbis Romae I-II*, Roma, 1857-88; *Roma sotterranea cristiana*, Roma, 1864-67; *Inscriptiones Christianae urbis Romae septimo saeculo antiquiores*, Roma, 1957.

Díaz Martinez, P.C., *El alcance de la ocupacíon sueva de Gallaecia y el problema de la germanización, in Galicia: da romanidade á xermanización. Problemas históricos e culturais*, Santiago de Compostela, 1992.

Diehl, E., *Inscriptiones Latinae Christianae Vol. I-III*, Berlin, 1925-31.

Dill, S., *Roman Society in the last Century of the Western Empire*, London, 1898.

Doehaerd, R., *Le Haut Moyen Age occidental: économies et sociétés*, Paris, 1971.

Duchesne, L., *Le dossier du Donatisme*, 《Mélanges de l'Ecole Française de Rome》, 1890.

Dudden, F.H., *The Life and Times of St. Ambrose*, Oxford, 1935.

Dufourcq, A., *Le Christianisme et l'Empire*, Paris, 1930.

Dvornik, F., *Byzance et la primauté romaine*, Paris, 1964.

Ensslin, W., *Gottkaiser und Kaiser von Gottes Gnaden*, Monaco, 1943; *Theodoric der Grosse*, München, 1947.

Etienne, R., *Le culte impérial dans la péninsule Ibérique d'Auguste à Dioclétien*, Paris, 1958.

Fargues, P., *Claudien. Étude sur sa poesie et son temps*, Paris, 1933.

Ferrari Dalle Spade, G., *Immunità ecclesiastiche nel diritto romano imperiale*, 《Atti R. Istituto Veneto di Scienze, Lettere ed Arti》 99, 1939-40.

Ferrero, G., *La rovina della civiltà antica*, Milano, 1926.

Ferril, A.,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Military Explanation*, London, 1986.

Fliche, A. & Martin, V. (編), *Histoire de l'Eglise, Vol. II: De la fin du II siècle à la paix Constantinienne; Vol. III: De la paix Constantinienne à la mort de Théodose*, Torino, 1938-40 (伊訳).

Follieri, E., *La fondazione di Costantinopoli: riti pagani e cristiani, in Roma, Costantinopoli, Mosca. Da Roma alla Terza Roma.*

Fournier, G., *Les Mérovingiens*, Paris, 1966.

Fracassini, U., *L'Impero Romano e il Cristianesimo. Da Nerone a Costantino*, Perugia, 1913.

Francovich, R., & Noyé, G., *La storia dell'alto medioevo italiano (VI-X secolo) alla luce dell'archeologia*, Firenze, 1994.

Frediani, A., *Gli itinerari alpini delle invasioni barbariche*, 《Archivio di Studi per l'Alto Adige》, Firenze, 1993; *Gli assedi di Roma*, Roma, 1997.

Freeman, E.A., *Aetius and Boniface, in Western Europe in the Fifth Century*, London, 1904.

Frey, I.B., *Corpus inscriptionum Iudaicarum*, Roma, 1936-52.

Gabba, E., *Iscrizioni greche e latine per lo studio della Bibbia*, Torino, 1958.

Gabotto, F., *Storia dell'Italia occidentale nel Medio Evo*, Torino, 1911.

Gabrieli, F., & Scerrato, U., *Gli Arabi in Italia. Cultura, contatti, tradizioni*, Milano, 1979.

Galdi, M., *La religione dei Romani, Storia delle religioni I* (Tacchi Venturi, P. 編), Torino, 1954.

Galassi, G., *Roma o Bisanzio*, Roma, 1930.

Gallina, M., *Potere e società a Bisanzio. Dalla fondazione di Costantinopoli al 1204*, Torino, 1995.

Garcia Moreno, L.A., *Historia de España visigoda*, Madrid, 1989.

Garrucci, R., *Storia dell'arte cristiana nei primi otto secoli della Chiesa*, Prato, 1873-85.

Gasparri, S., *Prima delle nazioni. Popoli, etnie e regni fra Antichità e Medioevo*, Roma, 1997.

Gautier, E.F., *Genséric roi des Vandales*, Paris, 1933.

Geary, P., *Before France and Germany. The Cre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erovingian World*, Oxford-New York, 1988.

Geffcken, J., *Der Ausgang des griechisch-römischen Heidentums*, Heidelberg, 1920.

Gentili, R., *La rivalità tra Ezio, Felice e Bonifacio e l'invasione dei vandali in Africa*, 《Il Mondo Classico》 5, 1935.

Gerosa, P., *S. Agostino e la decadenza dell'impero romano*, Torino, 1916.

Gibbon, E.,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1776-88; *A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1896-1900 (J.B. Buryの解説つき); 同伊訳, Torino, 1926-27; *Declino e caduta dell'impero romano*, Milano, 1986; *Storia della decadenza e caduta dell'impero romano*, Torino, 1987.

Gigli, G., *La crisi dell'impero romano,* Palermo, 1947.

Ginsburg. G., *Rome et la Judée,* Paris, 1928.

Ginzel, F., *Handbuch der mathematischen und technischen Chronologie,* Leipzig, 1906-14.

Giovanditto, A., *Teodorico e i suoi Goti,* Novara, 1993.

Giovannoni, G., *Nuovi contributi allo studio della genesi della basilica cristiana,* 《Atti Pont. Accad. di Archeologia》, 1920; *La tecnica della costruzione presso i Romani,* Roma, 1925.

Gitti, A., *Eudossia e Genserico,*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ASI)》, 1925; *Ricerche sui rapporti tra i vandali e l'impero romano,* Bari, 1953.

Goffart, W., *Barbarians and Romans A.D. 418-584,* Princeton-Oxford, 1980.

Gordon, C.D., *The Age of Attila: Fifth Century Byzantium and the Barbarians,* Ann Arbor, 1960.

Goyau, G., & Cagnat, R., *Chronologie de l'empire romain,* Paris, 1891.

Graley, G., *Ces fameux Champs Catalauniques,* Troyes, 1964.

Grant, M.,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A Reappraisal,* London, 1976.

Grégoire, H., *Recueil des inscrip. grecques chrét. d'Asie Mineure,* Paris, 1922; *Les persécutions dans l'Empire romain,* Bruxelles, 1964.

Gregorovius, F., *Storia della città di Roma nel Medioevo,* Roma, 1912.

Grenier, A., *Le génie romain dans la religion, la pensee et l'art,* Paris, 1938.

Grisar, H., *Roma alla fine del mondo antico,* Roma, 1930 (伊訳).

Grossi Gondi, F., *Trattato di epigrafia cristiana latina e greca,* Roma, 1920.

Grumel, V., *L'Illyricum de la mort de Valentinien I (375) à la mort de Stilicon (408),* 《Revue des études byzantines》 9, 1951.

Guarducci, M., *I graffiti sotto la Confessione di S. Pietro in Vaticano* (3 voll.), Città del Vaticano, 1959.

Gutermann, S.L., *Religious toleration and persecution in Ancient Rome,* London, 1951.

Gwatkin, H.M., *Studies on Arianism,* London, 1900.

Haarhoff, Th., *Schools of Gaul. A study of pagan and christian education in the last century of the Western Empire,* Oxford, 1920.

Hadrill, W., *Occidente barbarico,* Milano, 1963.

Halphen, L., *Les barbares,* Paris, 1926.

Hansen, A., *De vita Aetii*, Dorpat, 1840.

Hartmann, L., *La rovina del mondo antico* , Torino, 1904（伊訳）.

Heater, P., *Goths and Romans, 332-489*, Oxford, 1991; *The Goths*, Oxford, 1996.

Heering, W., *Kaiser Valentinian*, Magdeburg, 1927.

Hefele, K. J. & Leclercq, H., *Histoire des Conciles*, Paris, 1907-21.

Heitland, W.R., *The Roman Fate. An Essay of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 1922.

Hillgarth, J.N., *Christianity and Paganism, 350-750. The Conversion of Western Europe*, Philadelphia, 1986.

Hodgkin, T., *Italy and her Invaders Voll. I-II*, Oxford, 1880-90.

Homo, L., *Les empereurs romains et le Christianisme*, Paris, 1931; *Le haut Empire* 《Histoire Romaine》 3, Paris, 1933; *Topographie et démographie dans la Rome Imperiale*, 《Comptes Rendus de l'Acad. des Inscriptions》, 1933.

Hönn, K., *Konstantin der Grosse. Leben einer Zeitwende*, Leipzig, 1940.

Howald, E., *Kultur der Antike*, Potsdam, 1935.

Hübener, W.（編）, *Die Alemannen in der Frühzeit*, Bühl-Baden, 1974.

Hughes, K., *The Church in Early Irish Society*, London, 1966.

Huttmann, M.A., *The Establishment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Proscription of Paganism*, New York, 1914.

Jalabert, L. & Mouterde, R., *Inscriptions grecques et latines de la Syrie*, Paris, I, 1929; II, 1939.

James, E., *The Franks*, Oxford, 1988.

Julien, Ch.A., *Histoire de l'Afrique du Nord*, Paris, 1931.

Juster, J., *Les Juifs dans l'Empire Romain*, Paris, 1914.

Kaegi, W.E., *Byzantium and the Decline of Rome*, Princeton, 1968.

Karsten, S., *Die Germanen*, Berlin, 1928.

Kollwitz, J., *Oströmische Plastik der theodosianischen Zeit*, Berlin, 1941.

Kornemann, E., *Das Problem des Untergangs der antiken Welt*, 《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 1922.

Krautheimer, R., *Corpus Basilicarum christianarum Romae*, Città del Vaticano, 1937; *Three Christian Capitals. Topography and politics*, 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 1983（伊訳）; *Tre capitali christiane. Topografia e politica*, Torino, 1987.

Lanciani, R., *Pagan and Christian Rome,* London, 1892; *Ruins and Excavations of*

Ancient Rome, London, 1897.

Lanzoni, F., *Le Diocesi d'Italia dalle origini al principio del secolo VII*, Faenza, 1917.

Laqueur, R., *Eusebius als Historiker seiner Zeit*, Berlin, 1929.

Last, H., *The study of the persecutions*, 《JRS》 27, 1937.

Latouche, R., *Les grandes invasions et la crise de l' Occident au v.e siècle*, Paris, 1947.

Latte, K., *Die Religion der Römer und der Synkretismus der Kaiserzeit*, Tubingen, 1927.

Leciejewicz, L., *Gli slavi occidentali*, Spoleto, 1991.

Lemerle, P., *Les plus anciens recueils des miracles de S. Démétrius et la pénétration des Slaves dans les Balkans* (2 voll.), Paris, 1979-81.

Leon, J., *The Jews of Ancient Rome*, Filadelfia, 1960.

Le Patourel, J., *The Norman Empire*, Oxford, 1976.

Levi, M.A., *L'Impero romano*, Torino, 1963.

Lizérand, G., *Aetius*, Paris, 1910.

L'Occidente e l' Islam nell' alto Medioevo (2 voll.), Spoleto (研究会論文集).

Lot, F., *De l'étendue et de la valeur du caput fiscal sous le Bas Empire*, 《Revue Historique de Droit》, 1925; *La fin du monde antique et le début du moyen âge*, Paris, 1927; *Du régime de l'hospitalité*,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 histoire》 7, 1928; *L'impôt foncier et la capitation personnelle sous le Bas Empire*, Paris, 1928; *Les invasions barbares et le peuplement de l'Europe* (2 voll.), Paris, 1937.

Lot, F., Pfister, Ch. & Ganshof, F., *Les destinées de l'empire en Occident de 395 à 888*, Paris, 1928.

Lugli, G., *Aspetti urbanistici di Roma antica*, 《Rendiconti Pont. Accademia d' Archeologia》, 1937.

Maddalena, A., *Le fonti per la storia di Diocleziano e di Costantino*, 《Atti del R. Istituto Veneto》 45.

Maenchen-Helfen, O.J., *The World of the Huns*, Berkeley-Los Angeles, 1973.

Manaresi, A., *L'Impero Romano e il Cristianesimo*, Torino, 1914.

Marchesi, C.,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latina*, Messina, 1932-33.

Marrou, H., *Μουσικὸς α'νήρ*, Grénoble, 1938; *St. Augustin et la fin de la culture antique*, Paris, 1938, *Decadenza romana o Tarda antichità? III-IV secolo,*

Milano, 1979.

Martroye, F., *Une tentative de révolution sociale en Afrique. Donatistes et circoncellions,* 《Revue des questions historiques》 76, 77; *Genséric. La conquete vandale en Afrique et la destruction de l'empire d'Occident,* Paris, 1907.

Marucchi, O., *Epigrafia cristiana,* Milano, 1910.

Matagrin, A., *Histoire de la tolerance,* Paris, 1905.

Matthews, J., *Western Aristocracies and Imperial Court, A.D. 364-425,* Oxford, 1975.

Mattingly, H., *Christianity in the roman empire,* Dunedin, 1955.

Maurice, J., *Numismatique Constantinienne,* Paris, 1908-12.

Martindale, J.R., *Prosophograph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Vol. II,* Cambridge, 1980.

Mayr Harting, H., *The Coming of Christianity to Anglo-Saxon England,* London, 1972.

Mazzarino, S., *La politica religiosa di Stilicone,* 《Rendiconti R. Istituto Lombardo》 70, 1938; *Stilicone. La crisi imperiale dopo Teodosio,* Roma, 1942; *Serena e le due Eudossie,* 《Real. Ist. Stud. Rom》, Roma, 1946; *Antico, tardoantico, ed era costantiniana,* Bari, 1974; *Aezio, la "Notitia Dignitatum" e i Burgundi di Worms, Renania romana,* Roma, 《Atti dei Convegni Lincei》 23, 1976; *Stilicone. La crisi imperiale dopo Teodosio,* Milano, 1990.

Mazzarino, S. & Giannelli, G., *Trattato di Storia romana Vol. II,* Roma, 1962.

Mazzolai, A., *Alarico,* Firenze, 1996.

McCormick, M., *Eternal Victory. Triumphal Rulership in late Antiquity, Byzantium and the early medieval West,* Cambridge, 1986.

Melucco Vaccaro, A., *I Longobardi in Italia. Materiali e problemi,* Milano, 1982.

Mochi, S., *Vescovi e città (sec. IV-VI),* Bologna, 1933.

Momigliano, A., *La caduta senza rumore di un impero nel 476 d.C.,* 《Annali della 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di Pisa》 3, 1973.

Mommsen, Th., *Stilicho und Alarich,* 《Gesammelte Schriften》 4, Berlin, 1906; *Le province romane da Cesare a Diocleziano,* 《Romisch. Gesch.》 5, Torino-Roma, 1879 (伊訳).

Monumenta Asiae Minori Antiqua Voll. I-VIII, 1962.

Moorhead, J., *Theoderic in Italy*, Oxford, 1993.

Moreau, J., *La persécution du Christianisme dans l'empire*, Paris, 1956.

Moricca, U.,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latina cristiana*, Torino, 1925.

Morpurgo, A., *Arbogaste e l'Impero Romano dal 379 al 394*, Trieste, 1883.

Musset, L., *Les invasions. Le second assaut contre l'Europe chretienne (VII-XI siècles)*, Paris, 1965; *Le invasioni barbariche*, Milano, 1989.

Nagl, M.A., *Galla Placidia*, Paderbon, 1908.

Negri, G., *L'imperatore Giuliano l'Apostata*, Milano, 1902.

Niel, J.C., *451. Attila dans les Gaules, La bataille de Troyes*, Guénange, 1951.

Nischer-Falkenhof, E., *Stilicho*, Vienna, 1947.

Oberziner, L,. *Le guerre germaniche di Flavio Giuliano*, Roma, 1896.

Obolensky, D., *Byzantium and the Slavs.* Collected Studies, London, 1971.

O' Flynn, J.M., *Generalissimos of the Western Roman Empire*, Edmonton, 1983.

Olivetti, A., *Sulle stragi di Costantinopoli del 337*, 《Rivista di Filologia》 43, 1915; *Osservazioni storiche e cronologiche sulla guerra di Costanzo contro i Persiani*, Torino, 1915.

Orlandis, J., *Historia social y economica de la España visigoda*, Madrid, 1975.

Ortega & Rubio, *Los Visigotos en España*, Madrid, 1903.

Ostrogorsky, G., *Geschichte des byzantinischen Staates*, München, 1963.

Palanque, J.R., *St. Ambroise et l'Empire Romain*, Paris, 1933.

Papini, M.A., *Ricimero, l'agonia dell'impero romano d'Occidente*, Milano, 1959.

Paredi, A., *S. Ambrogio e la sua età*, Milano, 1941.

Pareti, L., *Storia di Roma e del mondo romano Voll. IV-VI*, Torino, 1955, 60, 61.

Paribeni, R., *L'età di Cesare e di Augusto*, Bologna, 1950.

Parker, H.M.D., *The Legions of Diocletian and Constantin*, 《JRS》 23, 1933.

Paronetto, V., *La crisi politica in Africa alla vigilia dell'invasione vandalica*, 《Miscellanea greca e romana》 4, 1975.

Passerini, A., L*inee di storia romana in età imperiale*, Varese-Milano, 1949.

Pastorino, B., *La prima spedizione di Alarico in Italia*, Facoltà di Magistero dell'Università di Torino, 1975.

Pavan, M., *La politica gotica di Teodosio nella pubblicistica del suo tempo*, Roma, 1964.

Pepe, G., *Il medioevo barbarico in Italia*, Torino, 1941; *Il medioevo barbarico in*

Europa, Milano, 1967.

Perrin, O., *Les Burgondes*, Neuchatel, 1968.

Pfister, K., *Der Untergang der antihen Welt*, Leipzig, 1940.

Picotti, G.B., *Il patricius nell'ultima età imperiale*, 《ASI》 4, 1928; *Sulle relazioni tra re Odoacre e il senato e la chiesa di Roma*,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4, 1939.

Pietri, Ch., *Roma christiana. Recherches sur l'Eglise de Rome, son organisation, sa politique, son idéologie de Miltiade à Sixte III (311-440) Vol. I-II*, Rome, 1976.

Piganiol, A., *L'impôt foncier des clarissimes et des curiales au Bas-Empire romain*, 《Mélanges d'archéologie et d'histoire》 27, 1907; *L'impôt de capitation sous le Bas Empire Romain*, Paris, 1916; *L'empereur Constantin*, Paris, 1932; *L'Empire chrétien (325-395)*, Paris, 1947.

Pincherle, A., *Cristianesimo e Impero romano*, 《Bull. Com. Int. Sc. Hist.》, 1933.

Pippidi, D.M., *Recherches sur le culte impérial*, Paris, 1939.

Pirenne, H., *Mahomet et Charlemagne*, Bruxelles, 1937.

Pohl, W., *Kingdoms of the Empire. The Integration of Barbarians in Late Antiquity*, Leiden-New York-Köln, 1997, *Die Germanen*, München, 1998.

Puech, H.Ch. (編), *Histoire des religions*, Paris, 1970-76.

Ravegnani, G., *Giustiniano*, Teramo, 1993.

Rehm, W., *Der Untergang Roms in abendländischen Denken*, Leipzig, 1930.

Reinhart, W., *Historia general del reino hispánico de los Suevos*, Madrid, 1952.

Rougé, J., *Recherches sur l'organisation du commerce maritime en Méditerranée sous l'Empire romain*, Paris, 1966.

Ricciotti, G., *Storia d'Israele*, Torino, 1942.

Riché, P., *Les invasions barbares*, Paris, 1953.

Ridley, R.T., *Zosimus the Historian*, 《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 65, 1972.

Rinaldi Tufi, S., *Archeologia delle province romane*, Roma, 2000.

Roberti, M., *Invasione vandalica dell' Africa Romana*, 《Rivista di Storia del Diritto Italiano》, 1938.

Romano, R., *Le dominazioni barbariche in Italia (395-1024)*, Milano, 1910.

Rose, H.J., *Roman Religion 1910-1960*, 《JRS》, 1960.

Ross Taylor, L., *The divinity of the Roman Emperor*, Middleton, 1931.

Rostagni, A., *Giuliano l'Apostata*, Torino, 1920.

Reinhart, W., *Historia general del reino hispánico de los Suevos*, Madrid, 1952.

Rougé, J., *Recherches sur l'organisation du commerce maritime en Méditerranée sous l'Empire romain*, Paris, 1966.

Ricciotti, G., *Storia d'Israele*, Torino, 1942.

Riché, P., *Les invasions barbares*, Paris, 1953.

Ridley, R.T., *Zosimus the Historian*, 《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 65, 1972.

Rinaldi Tufi, S., *Archeologia delle province romane*, Roma, 2000.

Roberti, M., *Invasione vandalica dell' Africa Romana*, 《Rivista di Storia del Diritto Italiano》, 1938.

Romano, R., *Le dominazioni barbariche in Italia (395-1024)*, Milano, 1910.

Rose, H.J., *Roman Religion 1910-1960*, 《JRS》, 1960.

Ross Taylor, L., *The divinity of the Roman Emperor*, Middleton, 1931.

Rostagni, A., *Giuliano l'Apostata*, Torino, 1920.

Schreiber, H., *Gli unni*, Milano, 1983; *I Vandali*, Milano, 1984.

Schultze, V., *Geschichte des Untergangs des griechisch-römischen Heidentums*, Jena, 1887-92.

Schurer, E., *Gesch. des jud. Volkes in Zeit. Jesu Christ*, Leipzig, 1901.

Scott, K., *The imperial Cult under the Flavians*, Stuttgart, 1939.

Seaver, J.E.,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in the Roman Empire (300-438)*, University of Kansas, 1952.

Senac, Ph., *Musulmans et Sarrasins dans le Sud de la Gaule du VIII au XI siècle*, Paris, 1980.

Sesan, V., *Kirche und Staat in römisch-byzantinischen Reiche seit Konstantin bis zum Falle Konstantinopels*, Czernovitz, 1911; *Die Religionspolitik der christlichen römischen Kaiser von Konstantin bis Theodosius*, Leipzig, 1911.

Simon, M., *Verus Israel*, Paris, 1948.

Sinnigen, W.G., *The officium of the urban prefecture during the Later Roman Empire*, 《Papers and Monograph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17, Roma, 1957.

Solari, A., *Gli Unni e Attila*, Pisa, 1916; *La tradizione geografica sugli Unni, Sulle leggi di Costanzo II contro i Pagani*, 《Rendiconti Accad. di Bologna》 9, 1924-25; *Coerenza ideale nell'attività legislativa dell'imp. Giuliano*, 《Atti del III Congresso Studi Romani》, 1930, *La elezione di Gioviano*, 《Klio》, 1933; *La ques-*

gresso Studi Romani», [illegible], *La elezione di Gioviano*, «Klio», [illegible], *La ques-*

tione sociale nel dissidio tra Valentiniano ed Ezio, 《L'Antiquite classique》 2, 1933; *Intorno alla reazione sociale del 408-410,* 《Klio》, 1935; *L'Impero romano* (4 voll.), Genova-Roma, 1940-47.

Sorel, G., *La ruine du monde antique,* Paris, 1923.

Spengler, L., *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Berlin, 1920-22.

Staccioli, R., *Guida di Roma antica,* Milano, 1986.

Stauffer, E., *Le Christ et les Césars,* Paris, 1956 (仏訳).

Stenton, F.M., *Anglo-Saxon England,* Oxford, 1943; *Angli e Sassoni al di qua e al di là del mare* (2 voll., Spoletoでの研究会論文集)

Straub, J., "*Parens Principum*": *Stilichos Reichpolitik und das Testament des Kaisers Theodosius,* 《Regeneratio Imperii》, 1972.

Tabacco, G., *La storia politica e sociale. Dal tramonto dell'Impero alle prime formazioni di Stati regionali,* Torino, 1974.

Teillet, S., *Des Goths à la Nation gothique. Les origins de l'idée de nation en Occident du V au VII siècle,* Paris, 1984.

Terzaghi, N.,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latina da Tiberio a Giustiniano,* Milano, 1934.

Testini, P., *Archeologia cristiana,* Roma, 1959.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X: The Augustan Empire, 44 B.C.-70 A.D., 1934; *Vol. XI: The imperial Peace, A.D.70-192,* 1936; *Vol. XII: The imperial crisis and recovery, A.D. 193-324,* 1939; *Vol. XII: The Imperial Crisis and Recovery A.D. 193-324,* 1939.

The Cambridge Mediaeval History Vol. I: The Christian Roman Empire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Teutonic Kingdoms, 1936; *Vol. IV: The Byzantine Empire (1: Byzantium and its Neighbours; 2: Government, Church and Civilisation),* 1966-67.

Thompson, E.A., *Storia di Attila e degli Unni,* Firenze, 1963; *The Visigoths from Fritigern to Euric,* 《Historia》 12, 1963; *The Early Germans,* Oxford, 1965; *The Goths in Spain,* Oxford, 1969; *Barbarians Invaders and Roman Collaborators,* 《Florilegium》 2, 1980; *Romans and Barbarians,* Madison, 1982.

Thouvenot, R., *Salvien et la ruine de l'Empire Romain,* 《Mélanges de l'Ecole Française de Rome》, 1920.

Todd, M., *The Early Germans,* Oxford-Cambridge (Mass.), 1992.

Toesca, P., *Storia dell'arte italiana Vol. I,* Torino, 1927.

Tomaselli, G., *Il crollo dell'impero romano in Occidente*, Messina-Firenze, 1973.

Tramontana, S., *La monarchia normanna e sveva,* 《Il mezzogiorno dai Bizantini a Federico II》, Torino, 1983.

Turchi, N., *La religione di Roma antica,* Bologna, 1939.

Vaccari, A., S. *Girolamo,* Roma, 1921.

Valentini, R. & Zucchetti, G., *Codex topographicus Urbis Romae I,* Roma, 1940.

Vàrady, L., *Stilicho proditor arcani Imperii,* 《A. Ant. Hung.》 16, 1968.

Vasiliev, V., *Histoire de l'empire byzantin I,* Paris, 1932.

Vassili, L., *La figura di Nepoziano e l'opposizione ricimeriana al governo imperiale di Maggioriano,* 《Athenaeum》, 1936.; *Rapporti fra regni barbarici e impero nella II metà del V secolo,* 《Nuova Rivista Storica》 21, 1937.

Vessel, C., *Inscriptiones Christianae Graecae veteres Occidentis,* Halle, 1936.

Villari, P., *Le invasioni barbariche in Italia,* Firenze, 1901.

Vlasto, A.P., *The Entry of the Slavs into the Christendom. An Introduction of the Medieval History of the Slavs,* Cambridge, 1970.

Vogt, G., *Kaiser Julian und das Judentum,* Leipzig, 1939.

Wallace-Hadrill, J.M., *L'Occidente barbarico, 400-1000,* Milano, 1963.

Weber, W., *Die sozialen Gründe des Untergangs der antiken Kultur,* 《Die Wahrheit》, 1896.

Webster, G., *The Roman Imperial Army,* London, 1979.

Werner, H., *Der Untergang Roms. Studium zum Dekadenzproblem in der antiken Geistesgeschichte,* Stuttgart, 1939.

Wes, M.A., *Das Ende des Kaisertums im Westen des römischen Reichs,* The Hague, 1967.

Westermann, W., *The economic Basis of the Decline of ancient Cultur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15.

Wickham, C., *Early Medieval Italy. Central Power and Local Society, 400-1000,* London, 1981.

Wilcken, U. & Mitteis, L., *Grundzuge und Chrestomathie der griech. Papyrusurkunden,* Berlin, 1916-12.

Wilpert, G., *I sarcofagi cristiani antichi,* Roma, 1929.

Wilpert, J., *Roma fondatrice dell' arte monumentale paleocristiana e medievale,* 《Atti

del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toria dell'Arte», Roma, 1912; *Die Mosaiken und Malereien der christlichen Bauten*, 1916.

Wolfram, H., *Geschichte der Goten bis zum Mitte des 6. Jahrhundert*, München, 1979; *Storia dei Goti*, Roma, 1985.

Wood, I., *The Merovingian Kingdoms, 450-751*, London-New York, 1994.

Wroth, W., *Catalogue of the Imperial Byzantine Coins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1908.

Zecchini, G., *Aezio: l'ultima difesa dell'Occidente romano*, Roma, 1983.